

联共(布)党史 简明教程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版 社

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КОМИССИИ ЦК ВКП(б)



ОДОБРЕН ЦК ВКП(б). 1938 ГОД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

联共(布)中央审定。1938年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等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302,000字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287 定价 0.83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导言 1—2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

(1883—1901年) 3—28

- 一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 3
- 二 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9
- 三 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7
- 四 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20
- 五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列宁《火星报》的出现 24
- 简短的结论 26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党内布尔什维克

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出现(1901—1904年) 29—58

- 一 1901—1904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29
- 二 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火星报》为列宁计划而斗争。列宁的《怎么办?》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32
-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党纲党章的通

过和统一的党的成立。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和党内两派即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	42
四 孟什维克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的尖锐化。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	48
简短的结论	57

第三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日俄战争和俄国

第一次革命时期(1904—1907年)	59—105
一 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彼得堡的罢工。1905年1月9日工人在冬宫前举行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遭到枪杀。革命的开始	59
二 工人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	64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	68
四 革命的进一步高涨。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	85
五 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革命的退却。第一届国家杜马。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88
六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96
简短的结论	104

第四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08—1912年)

一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反政府阶层知识分子的蜕化。 颓废情者。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入马克思主义 人阵营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唯物 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驳斥修正主义分子而 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106
二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15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布 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146
四	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党的八月 联盟	151
五	1912年召开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正 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54
	简短的结论	160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

	工人运动高涨年代(1912—1914年)	162—177
一	1912—1914年间革命运动的高涨	162
二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 尔什维克党团	166
三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的胜利。革命运动的继续 增长。帝国主义战争前夜	174
	简短的结论	177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俄国

	第二次革命(1914年—1917年3月)	178—201
一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和起因	178
二	第二国际各党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第二国 际瓦解为各个社会沙文主义党	182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 策略	185
四	沙皇军队在前线的失败。经济破坏。沙皇制度的危机	192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覆灭。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临时政府的成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4
简短的结论	200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时期(1917年4月—1918年)	202—248
一 二月革命后的国内状况。党走出地下状态转向公开政治活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列宁的四月提纲。	
党的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	202
二 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四月代表会议	208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的成功。临时政府军队在前线进攻的失利。工人和士兵七月游行示威的被镇压	213
四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217
五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阴谋。阴谋被粉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221
六 彼得格勒的十月起义和临时政府人员的被捕。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227
七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布列斯特和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237
八 列宁关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贫农委员会和制裁富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及其被镇压。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243
简短的结论	247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	
时期(1918—1920年)	249—273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249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 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254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高尔察克的 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的进攻及其被粉碎。三个 月的喘息时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261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 击。波兰计划的失败。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 的结束	266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英法日波武装干涉 和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269
	简短的结论	272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 和平工作时期(1921—1925年)	274—308
一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苏维埃国家。恢复 时期的困难	274
二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第十次代表 大会。 反对派的失败。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277
三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党的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患病。列 宁的合作社计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	285
四	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 患病加紧积极活动。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 派的失败。列宁的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 党员。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 大会	292
五	苏联在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 “新反对派”。党的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国家社会主 义工业化方针	298
	简短的结论	308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

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	300—330
一 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309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的落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315
三 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321
简短的结论	329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年) 331—363

一 1930—1934年间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中国东三省。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两个战争策源地	331
二 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334
三 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方针。技术的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344
四 布哈林派蜕化为政治上的两面派。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蜕化为一帮白卫杀人凶手和特务。谢·米·基洛夫遭凶杀。党在加强布尔什维克警惕性方面的措施	357
简短的结论	362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1935—1937年).....	364—387
一 1935—1937 年间的国际形势。经济危机的暂时缓 和。新的经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比西尼亚。 德意两国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第 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364
二 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 成。农业的改造和集体化的完成。干部的意义。斯 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 平的提高。苏维埃革命的力量	369
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苏联新宪法的通过	376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 孽的被消灭。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准备。党的扩 大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381
结束语.....	388—399

导　　言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经历了漫长而光荣的途程，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出现的人数不多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发展成为现在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

联共（布）是在革命前俄国工人运动基础上，由那些同工人运动相联系并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成长起来的。联共（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为指针。联共（布）的领袖们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联共（布）在工人运动内部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即同社会革命党（更早是同他们的前辈——民粹派）、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作原则斗争中，在党内则是同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派别，即同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和其他反列宁主义集团作原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联共（布）是在同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即地主、资本家、富农、暗害分子和特务作革命斗争中，在同资本主义包围势力的一切雇佣走狗作革命斗争中，得到巩固和锻炼的。

联共（布）的历史是三次革命，即1905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2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1917年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

的历史。

联共(布)的历史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的历史，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历史，是在我国建成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就是用我国工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经验丰富自己。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研究我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作斗争、同劳动群众的一切敌人作斗争的历史，有助于掌握布尔什维主义，能提高政治警惕性。

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英勇历史，就是用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规律的知识武装自己，用革命动力的知识武装自己。

研究联共(布)的历史，就能增强信心，确信列宁斯大林党的伟大事业必将最后胜利，确信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胜利。

本书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简要叙述。

第一章

为在俄国建立 社会民主工党而斗争

(1883—1901年)

一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工业资本 主义的发展。现代工业无产阶级 的出现。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

沙皇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要比其他国家晚。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的工厂还很少。地主贵族的农奴制经济占着主要地位。工业在农奴制度下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强制性的农奴劳动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经济发展的整个进程要求消灭农奴制度。沙皇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战争期间遭到军事失败而削弱，又慑于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不得不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

但在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地主还是继续压迫农民。地主对农民进行掠夺，在“解放”农民时剥夺了、割去了农民先前享有的一大部分土地。农民就把这部分土地称为“割地”。农民为了自身的“解放”，被迫向地主交付将近二十亿卢布的赎金。

农奴制度废除以后，农民不得不在最苛刻的条件下租佃地主的土地。农民除向地主交纳货币租金外，还往往被迫用自己的农具和马匹去替地主白白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这就叫作“工役”或

“劳役”。农民往往不得不把自己收成的一半作为实物地租交给地主。这就叫作“对分制”。

可见，当时情形几乎完全同农奴制度存在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时的农民已有了人身自由，不能再被当作物品来买卖了。

地主用各种掠夺方法（地租、罚款），把落后的农民经济的脂膏榨取净尽。大多数农民因受地主的压迫，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极端落后，时常发生歉收和饥荒。

农奴制经济的残余、苛重的赋税和付给地主的大量赎金（这些往往超过农民经济的收入），引起农民群众破产和贫困，迫使农民离乡背井出外谋生。农民进入工厂。厂主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

一大群警察局长、巡官、宪兵、警察和乡丁骑在工农头上，他们保护沙皇、资本家和地主，反对劳动群众，反对被剥削者。肉刑一直存在到1903年。虽然农奴制度已经废除，但农民由于极小的过失，由于没有交纳赋税，仍然遭受鞭笞。工人常受警察和哥萨克毒打，特别是在工人忍受不了厂主的虐待而停工即举行罢工的时候。工人和农民在沙俄时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沙皇专制制度是人民的死敌。

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沙俄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完全没有权利，经常受到各种侮辱和欺凌。沙皇政府嗾使俄罗斯居民把各民族地区的土著民族看作下等种族，正式把他们叫作“异族”，培植鄙视和仇视他们的心理。沙皇政府故意挑起民族纠纷，怂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组织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在南高加索挑拨鞑靼人和阿尔明尼亚人互相残杀。

在各民族地区，一切或几乎一切国家职务都由俄罗斯官吏充任。各个机关和法庭的一切事务都采用俄语。禁止用民族语文出版书报，学校里禁止用本民族语文教课。沙皇政府力图扼杀民族

文化的任何表现，对一切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强迫“俄罗斯化”的政策。沙皇制度是残害非俄罗斯民族的刽子手和掌刑人。

农奴制度废除以后，俄国工业资本主义虽然还受农奴制残余的阻碍，但已发展得相当迅速了。在 1865—1890 年这二十五年内，单是大工厂和铁路的工人，就由七十万零六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即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了。到九十年代末，大工厂、矿业和铁路的工人，单以欧俄五十省来说，就已增加到二百二十万零七千人，而以全俄来说，则已增加到二百七十九万二千人。

这已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无论就其在大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团结性来说，还是就其战斗的革命的品质来说，它同农奴制时代的工厂工人、同小手工业和其他一切工业的工人根本不同。

九十年代的工业高涨，首先跟加紧修筑铁路分不开。十年内（1890—1900年）一共修筑了二万一千多俄里新铁路。铁路需要大量的金属（制造路轨、机车和车辆），需要愈来愈多的煤炭、石油等燃料，这就引起了冶金工业和燃料工业的发展。

在革命前的俄国，也如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工业高涨年代总是跟工业危机和工业停滞年代交替着，因而使工人阶级受到严重打击，使数十万工人陷于失业和贫困。

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在农奴制度废除后有很迅速的发展，但俄国经济发展程度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绝大多数居民还是从事农业。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有名的著作中，引用了 1897 年全国人口调查册中的重要数字，指明当时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人口六分之五，而从事大小工业、商业、铁路和水路运输业、建筑业、森林采伐等等的人口，总共只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左右。

由此可见，俄国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小资产阶级国家，即小私有的、生产率很低的个体农民经济还占主要地位的国家。

资本主义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发展起来。农民这一在革命前的俄国人數最多的阶级，日益瓦解，日益分化。在农村里，一方面从最富裕的农民中间产生出富农上层，即农村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有许许多多农民陷于破产，贫苦农民即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人数，逐渐增加起来。中农人数一年比一年减少。

1903年，俄国约有一千万农户。据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本小册子中所作的计算，这个户数中至少有三百五十万是无耕马的农民。这些贫苦户通常只种很小一块土地，其余的土地租给富农，而自己出外谋生。贫苦农民按其地位说来，跟无产阶级非常接近。列宁称他们为农村的无产者或半无产者。

另一方面，一百五十万户富农（总农户数是一千万），占有全部农民耕地的半数。这个农民资产阶级靠盘剥贫农和中农，靠剥削长工和短工的劳动而发财致富，变成农业资本家。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俄国工人阶级就已开始觉醒起来，同资本家进行斗争了。沙俄时代的工人生活非常困苦。在八十年代，工厂里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二个半小时，纺织工业中甚至长达十四以至十五小时。对女工童工劳动的剥削采用得很广。童工劳动时间虽与成年工人相等，但所领的工资也如女工一样，要比成年男工少得多。工资非常低。大部分工人每月只能领得七八个卢布。就是金属加工厂和铸造厂里工资最高的工人，每月至多也只能领得三十五个卢布。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结果造成工人大量的残废和死亡。根本没有什么工人保险，看病完全自费。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工人集体宿舍一间矮小的黑屋子，要住十至十二个工人。厂主时常克扣工人的工资，强迫工人在

厂主开设的店铺高价购买食品，并用罚款的办法掠夺工人。

工人们开始商量，共同向厂主提出要求，以改善他们难以忍受的生活状况。他们撂下工作——宣布罢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发生的那些罢工，通常是由于罚款过高、发工资时实行蒙骗、降低计件工资标准等引起的。

在最初举行的罢工中，工人常因忍无可忍而毁坏机器，打破厂房玻璃，捣毁厂主的店铺和办事处。

先进工人开始明白，要同资本家顺利地进行斗争，必须组织起来。工人协会相继出现了。

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这个最初的工人组织存在了八九个月，后来就被沙皇政府破坏了。

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了由木工哈尔土林和钳工奥勃诺尔斯基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协会纲领说，协会的任务与西方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相同。协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它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奥勃诺尔斯基曾在国外住过一些时候，他在那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所领导的第一国际的活动有所了解。这一点在“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纲领上有了反映。协会认为自己的当前任务是为人民争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权利等等）。当前要求中还包括限定工作日。

协会有会员二百人，还有同样数目的同情者。协会开始参加工人的罢工，领导工人的罢工。这个工人协会也被沙皇政府破坏了。

然而，工人运动继续发展，席卷了愈来愈多的地区。八十年代发生过很多次罢工。五年（1881—1886年）间发生的罢工至少有四十八次，共有八万工人参加。

1885年奥列哈沃-祖也沃的莫罗佐夫工厂的大罢工，在革命运动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当时这个厂大约有八千工人。劳动条件一天比一天坏：从1882年至1884年，工资减过五次，1884年那次一下就把计件工资标准减了四分之一，即减了百分之二十五。此外，厂主莫罗佐夫还用各种罚款剥削工人。罢工后的审判表明，工人每挣一卢布工资，厂主就用罚款从中扣去三十至五十戈比。工人忍受不了这种掠夺，于1885年1月宣布了罢工。这次罢工是事先准备好的。领导罢工的是先进工人彼得·莫伊先科，他先前是“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有革命工作的经验。在罢工前夜，莫伊先科同其他一些最觉悟的织布工人一起拟定了向厂主提出的许多要求，这些要求并经工人秘密会议通过。首先工人们要求停止抢劫式的罚款。

这次罢工被武力镇压下去了。六百多工人被捕，其中几十人被交付法庭审判。

1885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些工厂也举行过同样的罢工。

第二年，沙皇政府慑于工人运动的增长，被迫颁布了罚款法，规定所罚的款项不得落入厂主的私囊，而必须用于工人自己的需要。

根据莫罗佐夫厂和其他厂的罢工经验，工人们懂得了：通过有组织的斗争，他们可以争得很多的东西。工人运动中开始涌现出了许多坚决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能干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同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始在俄国建立起来。

二 俄国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以前，民粹派在俄国进行过革命工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出现于 1883 年，这就是“劳动解放社”。它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因进行革命活动受沙皇政府迫害、被迫逃亡国外、侨居日内瓦时所组织的。

普列汉诺夫先前本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在国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同民粹主义决裂而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点上进行过很多工作。它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其他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刊印后秘密散布到俄国国内。格·瓦·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以及该社的其他参加者，还写过许多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学说、解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空想主义者)的臆造，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定将崩溃，正如农奴制度已经崩溃一样；资本主义造成了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他们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才能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摆脱贫剥削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无产阶级要认识本身的力量，认识本身

的阶级利益，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坚决作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这个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摆脱资本政权并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公有制，不是用和平手段可以达到的；要达到这一步，工人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反对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以便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并建立起新社会即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工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革命的阶级，因而也是最先进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才能把一切不满意资本主义的势力集合到自己周围，引导他们去冲击资本主义。但要战胜旧世界和建立无阶级的新社会，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共产党的工人政党。

正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进行了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工作。

当“劳动解放社”在国外用俄文出版刊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时候，俄国还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思想上为这个运动开拓道路。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主义运动道路上所遇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在先进工人和怀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中最为流行的民粹主义观点。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成了能够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的强大先进力量。但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阶级的先进作用。俄国民粹派错误地认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单靠农民“骚动”就能把沙皇和地主政权推翻。民粹派不熟悉工人阶级，他们不了解，不和工人阶级联盟，没有工人阶级领导，单是农民不可能战胜沙皇制度和地主。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阶级

是社会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起初，民粹派企图发动农民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为着这一目的，革命的知识青年就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去，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到民间去”。由此产生了“民粹派”这一名称。但农民并没有跟他们走，因为他们对农民也并不真正熟悉，并不真正了解。大多数民粹派分子被警察逮捕了。于是民粹派决定不要人民，单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结果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民粹派的秘密团体“民意党”准备行刺沙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果然用炸弹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了。但这并没有使人民获得丝毫益处。刺杀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不能消灭地主阶级。一个沙皇刚被刺死，另一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又代之而起。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下，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更坏了。

民粹派采取这种刺杀个别人物、实行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来反对沙皇制度，是错误的、对革命有害的。个人恐怖政策，是从民粹派所谓“英雄”是积极的而“群氓”是消极的、“群氓”应等待“英雄”建立丰功伟绩这一谬论出发的。这一谬论认为，只有个别杰出人物才能创造历史，而群众、人民、阶级，或如民粹派作家们轻蔑地称呼的“群氓”，不会自觉地有组织地行动，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拒绝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工作，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民粹派强迫当时影响最大的革命家之一斯切潘·哈尔土林停止组织革命工人协会的工作，而完全去干恐怖活动。

民粹派用刺杀压迫者阶级的个别代表人物这种对革命无益的行动，转移了劳动群众同压迫者阶级作斗争的注意力。他们阻碍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发挥。

民粹派妨碍工人阶级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阻碍创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

虽然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已被沙皇政府破坏，但民粹主义观点在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中仍然保持了很久。民粹派的残余拼命抵抗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阻挠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因此，只有同民粹主义作斗争，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俄国成长壮大起来。

“劳动解放社”开展了反对民粹派错误观点的斗争，指出民粹派的学说和民粹派的斗争方式对工人运动极为有害。

普列汉诺夫在反民粹派的著作中指出，虽然民粹派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民粹派的观点与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

普列汉诺夫第一个给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对民粹派观点给以一针见血的打击，同时光辉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受到普列汉诺夫致命打击的是民粹派的哪些基本错误观点呢？

第一，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种“偶然”现象，资本主义不会在俄国发展起来，因此无产阶级也不会成长和发展起来。

第二，民粹派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中的先进阶级。他们妄想不要无产阶级而达到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以及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第三，民粹派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持着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律。他们在这方面是些完全落后的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创造历史的不是阶级，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别杰出人物即“英雄”；群众、“群氓”、人民、阶

级是盲目地跟着“英雄”走的。

普列汉诺夫在同民粹派作斗争和揭露他们的时候，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靠这些著作进行学习和得到培养的。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扫清了基地。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他在 1895 年出版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列宁指出，这本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4 卷第 347 页）^①。

普列汉诺夫在反民粹派的著作中证明说，象民粹派那样提出问题，即问资本主义应否在俄国发展，是很荒谬的。普列汉诺夫用事实证明说，问题在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离开这条道路。

革命者的任务不是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革命者的任务是要依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强大革命力量即工人阶级，发展它的阶级意识，把它组织起来，帮助它建立自己的工人政党。

普列汉诺夫把民粹派第二个基本错误观点，即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能起先进作用的观点，也批倒了。民粹派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作“历史上的不幸”，撰文指摘“无产阶级化是一种病害”。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它完全适用于俄国。他证明说，虽然农民在人数上占优势，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比较少，革命者却正是应当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寄托于它的增长。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267 页（本书译者注中提到的书均指中文版本）。——译者注

为什么正是应当寄托于无产阶级呢？

因为无产阶级虽然现在人数很少，但它是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即大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是具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一年年增长着，在政治上发展着，由于大生产中的劳动条件而容易组织起来，由于自己的无产者地位而最有革命性，因为它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身上的锁链。

农民却不是这样。

农民（这里是指个体农民。——编者注）虽然人数众多，但它是同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即小生产相联系的，因而是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远大前途的劳动阶级。

农民这个阶级不仅不增长，反而一年年分化为资产阶级（富农）和贫农（无产者、半无产者）。除此而外，他们由于本身分散而不如无产阶级那样容易组织起来，他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不如无产阶级那样乐于投入革命运动。

民粹派认为俄国到达社会主义不会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会通过他们视为社会主义萌芽和基础的农民公社。然而公社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萌芽，因为在公社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富农，即剥削贫农、雇农和力量单薄的中农的“土豪”。当时有名无实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和间或实行过的按人口重分土地的办法，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享用土地的是公社里拥有耕畜、农具和种子的社员，即富裕的中农和富农。无耕马的农民、贫农和一般力量单薄的农民，却不得不把土地让给富农，自己去受人雇用，去当雇农。农民公社事实上是掩饰富农的豪强的一种方便形式，是沙皇政府按连环保原则向农民征税的一种便利的工具。因此，沙皇政府没有触动过农民公社。把这样的公社当作社会主义的萌芽或基础是很可笑的。

普列汉诺夫把民粹派第三个基本错误观点，即认为“英雄”、杰

出人物及其思想在社会发展中起头等重要作用而群众、“群氓”、人民、阶级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一观点，也批倒了。普列汉诺夫斥责民粹派为唯心主义，他证明说，真理不在唯心主义方面，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方面。

普列汉诺夫发挥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证明，决定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不是杰出人物的愿望和思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发展，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更，是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方面相互关系的变更，是各个阶级为着自己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不是思想决定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是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与社会的经济发展背道而驰，与先进阶级的要求背道而驰，那末这种杰出人物就会变成无用之物；反之，如果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愿望正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正确反映先进阶级的要求，那他们就能成为真正杰出的人物。

对于民粹派所谓群众是群氓、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并把群氓变为人民的论断，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并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英雄，也就是说，不是英雄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英雄并推动历史前进。英雄，杰出人物，只有当他们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理解应当如何改善这些条件的时候，才能在社会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杰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条件，以至俨然以历史“创造者”自居，不顾社会的历史要求而一意孤行，那他们就会变成滑稽可笑、一钱不值的倒霉人物。

民粹派就是这种倒霉的英雄。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对民粹派的斗争，大大地消除了民粹派在革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还远未完成。这个任务，即彻底打垮民粹主义，打垮这个马克思主义敌人的

任务，落到列宁的肩上了。

自从“民意党”被破坏以后，大多数民粹派分子很快就放弃了反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而主张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民粹派已变成富农利益的代表者了。

“劳动解放社”先后拟定了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第一个草案在1884年，第二个草案在1887年）。这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建党准备工作是很重要的一步。

但“劳动解放社”也有严重的错误。在它的第一个纲领草案中，还有民粹派观点的残余，还包含有个人恐怖的策略。其次，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能够而且应当引导农民前进，并且只有同农民联盟，才能战胜沙皇制度。再次，普列汉诺夫把自由资产阶级看作是能够给革命以援助——虽然是不可靠的援助——的力量；至于农民，那他在某些著作中却完全忽略了。例如他说：

“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没有其他可为我国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119页）

普列汉诺夫的这些错误观点，就是他后来的孟什维主义观点的萌芽。

无论“劳动解放社”或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还没有在实践上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这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民主党纲领原理在俄国产生和巩固起来的时期。在1884—1894年这十年中，社会民主党还只是以个别人数不多的团体和小组的形式存在，它们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没有联系，或是很少联系。当时社会民主党好象一个还没有诞生但在母亲胎胞里发育着的婴儿，如列宁所说，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①。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6页。——译者注

列宁指出：“劳动解放社”“只是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①。

在俄国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并把“劳动解放社”的错误纠正过来的任务，只得由列宁来解决了。

三 列宁革命活动的开始。彼得堡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布尔什维主义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生于辛比尔斯克市（现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市）。1887年，列宁进了喀山大学，但不久就因参加学生革命运动被捕并被开除学籍。列宁在喀山加入了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自从列宁迁居萨马拉后，很快就以列宁为中心成立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还在那个时候，列宁就以深知马克思主义而使大家惊服了。

1893年底，列宁迁居彼得堡。列宁最初发表的几次言论，已经给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参加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由于非常深知马克思的学说，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时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对工人事业的胜利有坚定强烈的信心，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列宁成了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领导者。

列宁受到了他所指导的那些小组的先进工人的热烈爱戴。

工人巴布什金回忆列宁给工人小组讲课的情形时说：“我们听的课生动有趣，大家听了都非常满意，经常赞叹我们讲师的智慧。”

1895年，列宁把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当时已有二十个左右）统一成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而为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作了准备。

① 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5页。——译者注

列宁向“斗争协会”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从政治上加以领导的任务。列宁提出，要从专门在宣传小组的少数先进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到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进行迫切的政治鼓动。这个向群众性鼓动的转变，对于俄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工业正值高涨时期。工人数量增加了。工人运动加强了。据不完全的统计，1895—1899年的罢工工人数目不下于二十二万一千。工人运动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力量。现实生活本身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派作斗争时所捍卫的观点，即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能起先进的作用。

在列宁领导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工人为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进行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从政治上教育了工人。

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哪个工厂一罢工，“斗争协会”因为通过自己小组成员而很熟悉各企业的情形，立刻就能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这些传单揭露厂主虐待工人的情形，说明工人应当怎样为本身的利益斗争，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的病害如工人生活困苦、工人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极其繁重的劳动、工人毫无权利等等，都揭露无遗。同时这些传单又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要求。1894年底，列宁在工人巴布什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给彼得堡的谢勉尼柯夫工厂罢工工人的号召书。1895年秋，列宁写了声援托伦顿厂男女罢工工人的传单。这个厂是英国资本家开办的，他们赚了亿万的利润。这里的工作日长达十四小时以上，而织布工人每月不过挣七卢布左右。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了胜利。在很短一个时期，“斗争协会”印发了几十种这样的告各工厂工人的传单和

号召书。每一份传单都有力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工人看到，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1896年夏，在“斗争协会”领导下举行了彼得堡三万纺织工人的大罢工。基本的要求是缩短工作日。在这次罢工的压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于1897年6月2日颁布法令，把工作日限定为十一小时半。在法令颁布以前，工作日根本是不限定的。

1895年12月，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但列宁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来帮助“斗争协会”，从监狱里寄出他写的小册子和传单。列宁在监狱里写了小册子《谈谈罢工》和揭露沙皇政府的专横暴戾的传单《告沙皇政府》。列宁在监狱里还写了党纲草案（用牛奶写在一本书的字行中间）。

由于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强有力的推动，俄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九十年代中期，南高加索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组织。1894年，莫斯科成立了“工人协会”。九十年代末，西伯利亚产生了“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在九十年代，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雅罗斯拉夫里和科斯特罗马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后来这些团体统一成了“社会民主党北方协会”。九十年代后半期，顿河岸罗斯托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基辅、尼古拉也夫、土拉、萨马拉、喀山、奥列哈沃-祖也沃等城市都相继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团体和协会。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如列宁所说，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不容忽视的萌芽。

列宁后来就是根据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革命经验来进行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建党的工作的。

自从列宁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被捕后，彼得堡“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分大大改变了。新的人物出头露面，他们自称为“青年人”，而把列宁和他的战友称为“老头子”。他们开始实行错误的政治路

线。他们说，必须叫工人只进行反对厂主的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政治斗争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自由资产阶级。

这些人就被称为“经济派”。

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妥协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集团。

四 列宁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思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虽然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对民粹主义那一套观点已经给了一个大打击，但民粹派观点在九十年代初期还博得一部分革命青年的同情。有一部分青年继续认为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认为将来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民粹派的残余竭力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攻击马克思主义者，竭力诽谤他们。当时必须从思想上彻底粉碎民粹主义，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为建立社会民主党创造条件。

这个任务由列宁完成了。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一书中，彻底揭穿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实际上早已放弃了任何反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主张同沙皇政府和解。列宁谈到当时的民粹派时写道：“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得妥妥贴贴。”(《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

第1卷第161页)^①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闭眼不看农村贫民的生活状况、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和富农对贫农的剥削，而一味赞美富农经济的发展。他们事实上代表富农的利益。

同时，民粹派又在他们的杂志上拼命攻击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故意颠倒是非，歪曲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硬说马克思主义者是希望农村破产，是想“让每个农夫到工厂的锅炉里去受熬煎”。列宁在揭露民粹派这种荒谬批评时指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望”，而在于俄国资本主义的真实发展进程，而在这个进程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必然要增加起来。但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列宁指出，愿意消灭资本家地主的压迫、消灭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并不是民粹派，而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主要手段这一思想。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许多著作中，批判了民粹主义者的主要派别民意党人所运用、后来又由民粹派继承者社会革命党人所运用的那些政治斗争手段，特别是个人恐怖的策略。列宁认为这种策略是对革命运动有害的，因为这种策略用单个英雄人物的斗争来代替群众的斗争。这种策略意味着不相信人民革命运动。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列宁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接着列宁又指出，正是俄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然后俄国无产阶级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和世界各国无产

① 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238页。——译者注

阶级一道，循着公开的政治斗争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由此可见，列宁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正确地指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道路，确定了工人阶级是社会的先进革命力量，确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

列宁和他的拥护者所进行的斗争，还在九十年代就从思想上把民粹主义彻底粉碎了。

列宁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也有巨大的意义。如历史上常见的那样，一个大的社会运动通常总有一些暂时的“同路人”混入。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的“同路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广泛传播。于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们常在合法的即沙皇政府准许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同民粹主义进行斗争，但他们是想利用这个斗争和马克思主义旗帜来使工人运动服从和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学说中最主要的东西，即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最著名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竭力赞美资产阶级，并号召大家“承认我们不文明，去向资本主义学习”，而不是去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列宁认为在反民粹派的斗争中可以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协议，利用他们去反对民粹派。例如共同出版过一本反民粹派的文集。但列宁同时又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他们那种自由资产阶级的本性。

后来，这些“同路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党员，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则成了彻头彻尾的白卫分子。

除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处的“斗争协会”外，在俄国西部各

民族边区也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出现。九十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从波兰民族主义的党里分化出来，成立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九十年代末，有几个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立起来。1897年10月，在俄国西部省份成立了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联盟（简称崩得）。

1898年，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等几个城市的“斗争协会”和崩得，作了统一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尝试。为了这一目的，它们于1898年3月在明斯克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只有九名代表。列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了。用大会名义发表的《宣言》，有许多地方还不能令人满意。《宣言》回避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回避了无产阶级在反沙皇制度和反资产阶级斗争中的同盟者问题。

大会在决议和《宣言》中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完成了这个正式手续，起了很大的革命宣传作用。

虽然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举行过了，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次大会没有把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组织统一起来，没有在组织上把它们联成一体。各地方组织的工作还没有统一的路线，没有党纲和党章，没有中央统一的领导。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各地方组织中思想上的涣散开始增长起来，结果就给“经济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派别在工人运动中的加强造成了良好的条件。

只是靠了列宁和他创办的《火星报》多年紧张的工作，才战胜

了这种涣散现象，克服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五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

列宁《火星报》的出现

列宁没有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住在舒申斯克村，是因“斗争协会”案在彼得堡监禁很久以后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那里去的。

但列宁就是在流放中也还在进行革命工作。列宁在流放中写完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事业。在那里他还写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这本有名的小册子。

列宁虽然脱离了直接的实际的革命工作，但他仍然设法同实际工作者保持着联系，从流放地跟他们通信，向他们了解情况，给他们出主意。当时列宁特别关心“经济派”问题。他比谁都明白，“经济主义”是妥协主义、机会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就会使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受到破坏，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失败。

所以“经济派”刚一露头，列宁就给以迎头痛击。

“经济派”硬说，工人只应进行经济斗争，而政治斗争应当让自由资产阶级去搞，工人应当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列宁认为“经济派”这样宣传，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工人阶级需要有独立的政党，就是企图把工人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

1899年，一部分“经济派”分子（普罗科波维奇、库斯柯娃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发表了自己的宣言。他们公开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放弃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放弃工

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要求。“经济派”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事情，而工人只要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就行了。

列宁一读到这个机会主义文件，就把附近的政治犯即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召集起来，经过商议，以列宁为首的十七个同志提出了一个揭露“经济派”观点的激烈抗议书。

这个由列宁起草的抗议书在全俄各地马克思主义组织中间传播开来，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国的发展。

俄国“经济派”所宣传的观点，也就是外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伯恩施坦派即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信徒们所宣传的观点。

因此，列宁对“经济派”作斗争，同时也就是对国际机会主义作斗争。

为反对“经济主义”，为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而进行的斗争，基本上是列宁创办的秘密报纸《火星报》进行的。

1900年初，列宁和“斗争协会”的其他一些会员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了俄罗斯。列宁立意创办一个大型的全俄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当时在俄国已有许多规模很小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组织，但它们还没有联成一体。当时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从上到下腐蚀着党，思想上的混乱是党内生活的特征”^①，所以创办全俄秘密报纸，是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只有这样的报纸，才能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联成一体，为建立真正的政党作好准备。

但由于警察的迫害，这样的报纸不能在沙俄境内出版。否则，过不了一两月就会被沙皇密探发觉而被捣毁。因此列宁决定把它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3页。——译者注

拿到国外出版。报纸在国外用最薄最结实的纸张刊印，再秘密转寄到俄国。有几号《火星报》在俄国境内由巴库、基什涅夫、西伯利亚的秘密印刷所进行了翻印。

1900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国外去同“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磋商全俄政治报纸的出版问题。这个想法，列宁在流放中就已十分周详地考虑过。列宁从流放地回来的途中，曾为这个问题在乌发、普斯科夫、莫斯科、彼得堡等好几个地方开过会。每到一处，他都和同志们约定秘密通信的密码、寄送出版物的地址等等，并同他们讨论了将来斗争的计划。

沙皇政府感觉到，列宁是它最危险的敌人。沙皇的暗探，一个叫祖巴托夫的宪兵，在秘密的呈报中说，“现时在革命中再没有比乌里杨诺夫更重要的人物了”，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把列宁刺死。

列宁到国外后，同“劳动解放社”，也就是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查苏利奇，商定了共同出版《火星报》。整个出版计划，从头至尾都是列宁拟定的。

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在国外出版了。报头下面载有一句名言（题词）：“星火可以燎原。”这是十二月党人^①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赋诗回答诗人普希金的致意时所用的一个句子。

果然，列宁点燃的“火星”，后来燃成了燎原的革命烈火，把地主贵族的沙皇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烧成了灰烬。

简短的结论

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工党，首先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那些有害于革命事业的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①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者，因1825年12月起义反对沙皇政府和农奴制而得名。——译者注

只有从思想上批倒民粹派观点，才能为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扫清基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给了民粹主义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打击。

列宁在九十年代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事业，彻底打垮了民粹主义。

1883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跨出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在八十年代中期，工人阶级已走上有组织的斗争的道路，走上有组织的罢工这种群众性发动的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还只从事于宣传，不了解必须转到工人阶级中去进行群众鼓动，因此它们也就没有在实践中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没有领导工人运动。

列宁组织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在工人中进行了群众鼓动，领导了群众罢工，因而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转到在工人中进行群众鼓动、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阶段。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一个萌芽。继彼得堡“斗争协会”之后，各大工业中心和各个边沿地区都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

1898年进行了第一次（虽然没有成功）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尝试，即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还没有把党建立起来，因为既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也没有造成一个中央统一的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为了把零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统一起来、联成一体而成为一个党，列宁提出并且实现了创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全俄报

纸《火星报》的计划。

“经济派”是这个时期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主要敌人。他们否认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党，赞成各个团体保持零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列宁和他创办的《火星报》就是对准他们开火的。

《火星报》最初几号的出版（1900—1901年），意味着转向一个新的时期，即把一些零散的团体和小组真正组成为一个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期。

第二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 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两派的出现

(1901—1904年)

一 1901—1904年间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十九世纪末欧洲爆发了工业危机。这次危机很快就蔓延到了俄国。在危机年代(1900—1903年)倒闭的大小企业将近三千家。有十万多工人被解雇。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大降低。工人先前通过顽强的经济罢工从资本家那里争得的一点让步，又被资本家夺回去了。

工业危机和失业并没能阻止和削弱工人运动。恰巧相反，工人的斗争愈来愈带有革命的性质了。工人开始从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最后，工人又转到游行示威，提出关于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

1901年，彼得堡奥布霍夫兵工厂发生的五一罢工变成了工人与军队间的流血冲突。工人们只能用石头和铁块去反抗武装的沙皇军队。工人们的顽强抵抗被击破了。接着就是残酷的镇压：约有八百个工人被捕，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服苦役。但英勇的“奥布霍夫防卫战”对俄国工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们中间激起了同情的浪潮。

1902年3月，巴土姆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这些行动都是社会民主党巴土姆委员会组织的。巴土姆的游行示威激发了南高加索全境的工农群众。

同年，在顿河岸罗斯托夫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开始是铁路工人，接着有很多工厂的工人参加进来。罢工激发了全市工人。在城外开了几天的群众大会，到会工人达三万之多。在这些群众大会上宣读了社会民主党的宣言，一些人发表了演说。警察和哥萨克无法驱散这成千上万人的工人集会。有几个工人被警察打死了，第二天送葬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示威。沙皇政府只是从邻近城市调来大批军队，才把这次罢工镇压下去。罗斯托夫工人的斗争，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

1903年的罢工规模更大。这一年，在南俄各地，包括整个南高加索（巴库、梯弗里斯、巴土姆）和乌克兰各大城市（敖德萨、基辅、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都发生了群众性政治罢工。罢工更持久更有组织了。同过去工人阶级的发动不同，现在工人的政治斗争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是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的。

俄国工人阶级已经奋起同沙皇政权作革命斗争了。

工人运动对农民发生了影响。1902年春夏两季，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和伏尔加河流域，农民运动开展起来了。农民烧毁地主的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杀死他们痛恨的地方官和地主。政府派遣了军队来镇压起义的农民，向他们开枪射击，成百地逮捕他们，把许多领导者和组织者关进监狱，但革命的农民运动仍有增无已。

工农的革命发动表明俄国革命日益成熟、日益迫近了。

学生的反政府运动也在工人革命斗争影响下加强起来。政府为对付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罢课封闭了学校，把成百的学生关进监狱，最后还想出了把不肯屈服的学生送去当兵的办法。对此，全国

各大学学生于 1901 年底至 1902 年初这个冬天举行全国总罢课。参加这次罢课的达三万人。

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使自由派资产者和那些把持着所谓地方自治局的自由派地主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地“抗议”沙皇政府采取“极端行动”迫害他们在大学念书的子弟。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派分子的据点是地方自治局。所谓地方自治局，就是专管有关农村居民的纯粹地方性事宜（修筑道路，建造医院和学校）的地方管理机关。自由派地主在地方自治局里占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同自由派资产者有密切的联系，差不多同他们融为一体了，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上已开始从半农奴制经济过渡到更为有利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部分自由派当然是拥护沙皇政府的，但他们反对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担心正是这种“极端行动”会使革命运动加强起来。他们害怕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但更害怕革命。自由派抗议沙皇政府的“极端行动”是想一举两得：第一，“开导”沙皇；第二，给自己戴上对沙皇制度“大为不满”的假面具，以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离开革命，从而削弱革命。

当然，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对于沙皇制度的生存没有任何危险，但它毕竟表明沙皇制度的“永恒”基础情况不妙。

✓ 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运动导致 1902 年成立了资产阶级的“解放社”，它就是后来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沙皇政府眼见工农运动的洪流在全国日益汹涌澎湃，就拼命来制止革命运动。对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愈来愈多地采用武力，枪弹和皮鞭已成为沙皇政府回答工农发动的通常手段，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

沙皇政府除加紧施行高压手段外，还企图用其他一些较为“灵活的”不带高压性的办法来引诱工人离开革命运动。曾经尝试建立一种受宪兵和警察监护的冒牌工人组织。这种组织当时被叫作“警察社会主义”的组织，或祖巴托夫组织（以建立这些警察的工人组织的宪兵上校祖巴托夫而得名）。沙皇的保安局通过自己的奸细力图欺骗工人，说沙皇政府自愿帮助工人来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祖巴托夫分子向工人说：“既然沙皇自己站在工人方面，还何必搞什么政治，何必干什么革命呢。”祖巴托夫分子在几个城市里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04年，加邦神父按照祖巴托夫组织的样式，为着同样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名为“彼得堡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的组织。

但沙皇的保安局控制工人运动的尝试没有得逞。沙皇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对付不了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把这种警察组织一扫而光。

二 列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 “经济派”的机会主义。《火星报》为 列宁计划而斗争。列宁的《怎么办？》 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虽然1898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成立，党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当时还没有党纲和党章。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不久就被破获，再也没有恢复过，因为没有人去恢复它。不仅如此，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了。

如果说1884—1894年是战胜民粹主义，为建立社会民主党而从思想上进行准备的时期，1894—1898年是试图（虽然没有成

功)把各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统一成社会民主党的时期，那末 1898 年以后的时期，就是党内思想上组织上混乱状态更加厉害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增加了革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了。于是知识分子中的大批革命青年涌进了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在理论上很孱弱，在组织和政治上没有经验，只是从当时充满出版界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会主义作品中获得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模糊的、大部分是不正确的概念。这种情况，就使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理论和政治水平降低，使其中掺进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情绪，使思想上的混乱、政治上的动摇和组织上的涣散更加厉害起来。

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和革命时机的显然逼近，要求成立一个能领导革命运动的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但当时党的各个地方机关，各个地方委员会、团体和小组的情况非常不好，它们的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非常厉害，使建立这样一个政党成了极其困难的任务。

其所以困难，不仅是因为建党工作必须在沙皇政府残酷迫害的烈火中进行，沙皇政府经常把一些组织中的优秀工作人员抓走，把他们送去流放、关进监狱和判处服苦役。其所以困难，还因为很大一部分地方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除了本地那种细小的实际工作外，什么事情也不愿过问，不懂得党内缺乏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的害处，习惯于党的涣散状态，习惯于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并认为没有统一集中的政党也可以过得去。

要建立集中的政党，就必须克服各个地方机关的这种落后性、守旧心理和狭隘的实际主义。

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时党内还有很大一批人拥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在俄国有《工人思想报》，在国外有《工人事业》杂志)，他们

从理论上为党内组织上的涣散和思想上的混乱辩护，甚至往往赞美这种状况，认为建立统一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个不必要的和臆想出来的任务。

这些人就是“经济派”和他们的信徒。

要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击败“经济派”。

于是列宁就来执行这些任务和进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

关于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应该从何着手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要建立党必须从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认为召开代表大会就能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起来，把党建立成功。列宁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首先必须把党的目的和任务问题弄清楚；必须知道我们所想建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党；必须在思想上同“经济派”划清界限；必须如实地公开地告诉党，在关于党的目的和任务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即“经济派”的意见和革命社会民主派的意见；必须在报刊上广泛地宣传革命社会民主派的观点，正如“经济派”在他们的机关报刊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样；必须让各个地方组织有在这两派之间作自觉选择的机会。只有做了这番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可以召开党代表大会。

列宁直截了当地说：

“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78页）^①

因此列宁认为，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工作应从创办一个为革命社会民主派的观点进行宣传鼓动的战斗的全俄政治报着手，创办这样的报纸应是建党工作的第一步。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34页。——译者注

列宁在《从何着手?》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拟定了一个具体的建党计划(后来在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又加以发挥)。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认为，创办全俄政治报应当是行动的出发点，是建立我们所希望的组织^①的第一个实际步骤，并且是我们使这个组织不断向深广发展的纲。……没有报纸就不可能有系统地进行有坚定原则的和全面的宣传鼓动。进行这种宣传鼓动一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的经常的和主要的任务，而在目前，在广大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110页)^②

列宁认为，这样的报纸不仅会成为从思想上把党凝为一个整体的工具，而且会成为从组织上把各个地方组织统一成为一个党的工具。这个报纸的代办员和通讯员网既然代表了各个地方组织，就会成为一个骨架而使党能够围绕着它在组织上集中起来。列宁说：因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③。

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这种代办员网将成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的骨干，——这种组织，其规模之大使它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其广泛性和多样性使它能够实行精密而细致的分工；其坚定性使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转变关头’和意外情况下都能坚持不渝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其灵活性使它一方面在敌人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一点的时候，善于避免同这个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这个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

① 指建党。——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6—7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8页。——译者注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112页)①

《火星报》就应当成为这样的报纸。

而《火星报》也确实成了这样的全俄政治报，确实为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凝为一体作好了准备。

讲到党本身的结构和成分时，列宁认为党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人数不多、经常进行工作、作为骨干的领导工作人员，这里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即摆脱了其他任何职业而专搞党的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具有最必要的理论知识、政治经验、组织技能，并且善于同沙皇警察作斗争，善于避开警察的耳目；(二)广泛的地方党组织网，人数众多并且受到千百万劳动者同情和拥护的党员群众。

列宁写道：“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3)参加这种组织的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缩小到只吸收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与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参加，这种组织也就会越难‘捕捉’；(5)而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间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越多。”(同上，第456页)②

讲到当时应当建立的党的性质及其对于工人阶级的作用以及党的目的和任务时，列宁认为党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应当是领导工人运动、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力量。党的最终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最近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要推翻资本主义，就必须先推翻沙皇制度，所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4—335页。——译者注

以党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阶级，发动全体人民去同沙皇制度斗争，开展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并推翻沙皇制度，为走向社会主义扫除第一个大障碍。

列宁说：“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2页）^①

又说：

“我们应当记住，为满足个别要求，为取得个别让步而同政府展开的斗争，不过是和敌人的小小接触，不过是小小的前哨战，决战还在后面。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座强有力 的敌人堡垒，从那里向我们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和子弹，杀害我们的优秀战士。我们一定要夺取这座堡垒。只要我们能够把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统一成一个党，并能使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我们就一定能够拿下这座堡垒。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实现俄国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也夫的伟大预言：‘等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拳头，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就会被粉碎！’”（同上，第59页）^②

这就是列宁在沙皇专制的俄国条件下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计划。

“经济派”马上就来向列宁的计划开火了。

“经济派”认为反对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是所有阶级的事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11—212页。——译者注

情，首先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所以这个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无关紧要，因为工人主要是关心同厂主进行经济斗争，主要是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主要的和当前的任务不是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不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是组织“工人对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并且他们所谓同政府作经济斗争，就是要求改善工厂立法。“经济派”硬说用这样的方式就能“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

“经济派”已经不敢公开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政党了。但他们认为党不应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应去干预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尤其不应去领导它，而应跟着它走，研究它，从中吸取教训。

其次，“经济派”认为：自觉成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组织和指导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把工人提高到社会主义意识的水平，相反地应该去适应并降低到工人阶级中等阶层以至更落后的阶层的水平；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而应该等待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自己锻炼出社会主义意识。

讲到列宁提出的建党组织计划时，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等于是强制自发运动。

列宁在《火星报》上，特别是在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给了“经济派”的这种机会主义哲学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了它。

(一) 列宁指出，引诱工人阶级脱离反对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斗争，把它的任务局限于反对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而毫不损伤厂主和政府，就是使工人永远陷于奴隶地位。工人对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是争取改善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条件的工联主义斗争，但工人斗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改善自己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且是要根本消灭那迫使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和遭受

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当工人运动道路上还站着沙皇制度这只资本主义的看门狗时，工人就无法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无法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因此，党和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是扫除沙皇制度，以便打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列宁指出，赞美工人运动的自发过程而否认党的领导作用，把党的作用归结为充当事变的登记者，这就是宣传“尾巴主义”，主张把党变成自发过程的尾巴，变成运动的消极力量，即只能观望自发过程和指靠自流趋势的力量。进行这种宣传，就是企图消灭党，也就是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政党的地位，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而当工人阶级面前站着这样的敌人，如拥有各种斗争手段的沙皇制度，以及按现代方式组织起来、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来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资产阶级的时候，使工人阶级陷于没有武器的地位就等于背叛工人阶级。

(三)列宁指出，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降低自觉性的作用，即降低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那就是：第一，侮辱向往自觉性象向往光明一样的工人；第二，使党蔑视理论，亦即使党蔑视其认识现在和预见将来的武器；第三，完全彻底地滚进机会主义泥潭。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80页)^①

(四)列宁指出，“经济派”硬说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能从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产生出来，这是欺骗工人阶级，因为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是从自发运动中，而是从科学中产生的。“经济派”否认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就是替资产阶级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242页。——译者注

思想体系清扫道路，使其容易灌输和注入到工人阶级中去，因而就是葬送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就是帮助资产阶级。

列宁说：“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第390页）^①

又说：

“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同上，第391—392页）^②

（五）列宁把“经济派”所有这些错误总结起来得出结论说：“经济派”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能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而是想要建立一个打算保存资本主义统治的、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因此“经济派”是背叛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良主义者。

（六）最后，列宁指出，“经济主义”不是在俄国偶然产生的现象，“经济派”是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他们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有其同盟者，即拥护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者。当时在西方，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派愈来愈得势，他们打着“自由批评”马克思的旗号，要求“修正”即修改马克思学说（由此就有“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要求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俄国“经济派”推行的同样也是这种放弃革命斗争、放弃社会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以上就是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发挥的基本理论原理。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56页。——译者注

～ 由于《怎么办?》一书的传播，在它出版一年后(它是1902年3月出版的)，即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经济主义”的思想立场给人留下的已只是不愉快的回忆，而“经济派”这一称号在党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心目中已经臭了。

这就是说，已经从思想上把“经济主义”彻底粉碎了，把机会主义即尾巴主义、自流主义的思想体系彻底粉碎了。

但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的意义还不限于此。

《怎么办?》一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列宁在这部有名的著作中：

(一)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彻底揭露了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指出这种根源首先在于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而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二) 把理论、自觉性和党的意义提到了应有的高度，指出它们是使自发的工人运动革命化的力量和领导力量；

(三) 光辉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

(四) 英明地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

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的基础。

《火星报》既拥有这样的理论财富，就能够为实现列宁的建党计划、聚集全党力量、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捍卫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反对“经济派”、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者而开展一个广泛的运动，并且确实开展起来了这样一个运动。

《火星报》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纲草案。大家知道，工人党的纲领是对工人阶级的斗争目的和斗争任务的简要而科学的说明。党纲既要规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也要规定党在实现最终目的的道路上所应争取的种种要求。因此，制定党纲草案不能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拟制党纲草案时，在《火星报》编辑部内，列宁同普列汉诺夫以及其他编委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与争论几乎导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完全决裂。但决裂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由于列宁的坚持，终于在党纲草案中加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最重要的条文，并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党纲的土地问题部分，全部是列宁提出的。列宁当时已经主张土地国有，不过他认为在斗争第一阶段上必须提出一个要求：把“割地”即地主在“解放”农民时割去的那一部分农民土地归还给农民。普列汉诺夫反对土地国有。

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党纲问题上的争论，部分地决定了后来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意见分歧。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党纲党章的通过和统一的党的成立。

**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和党内两派即布
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

这样，列宁原则的胜利以及《火星报》为实现列宁组织计划所取得的成功，准备好了建立党或如当时所说建立真正的党所必需的一切基本条件。《火星报》的方针已在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获得了胜利。现在已经可以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了。

1903年7月17日(7月30日)^①，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外秘密举行的。大会最初几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后因比利时警察要求大会代表离开比境，

^① 本书中俄历和公历并用时，俄历在括号外，公历在括号内。——译者注

于是大会移到伦敦举行。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四十三名代表，代表着二十六个组织。每个委员会有权选派两名代表参加大会，但有些委员会只派了一名代表。所以四十三名代表一共拥有五十一票表决权。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164页）^①。

大会成分不是清一色的。大会上没有露骨的“经济派”代表出席，因为他们已经遭到失败。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巧妙地改头换面了，以致能派出几个代表混进代表大会。此外，崩得的代表也只是口头上与“经济派”有所不同，实际上他们是拥护“经济派”的。

所以出席大会的不仅有《火星报》的拥护者，而且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火星报》的拥护者有三十三人，即占大多数。然而并非所有自命为火星派的人都是真正的列宁火星派。大会代表分成了几个集团。列宁的拥护者，即坚定的火星派，共有二十四票。有九个火星派分子是拥护马尔托夫的，他们是不稳定的火星派。有一部分代表动摇于《火星报》和《火星报》反对者之间，他们在大会上共有十票，这就是中派。公开的《火星报》反对者共有八票（三个“经济派”分子和五个崩得分子）。只要火星派内部一发生分裂，《火星报》的敌人就能占得上风。

由此可见，代表大会上的情形是异常复杂的。列宁费了很大力量，才保证《火星报》在大会上获得了胜利。

大会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党的纲领。讨论纲领时引起大会上机会主义分子反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机会主义者在纲领的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不赞成大会上革命分子的意见。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译者注

但他们决定主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开火，理由是说国外许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因此也就可以不把这一条列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机会主义者还反对把农民问题上的要求写进党纲。这些人根本就不想革命，所以他们对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农民采取歧视态度，对之表示厌恶。

崩得分子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民族自决权。列宁总是教导说，工人阶级必须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在纲领上规定这个要求，就等于主张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助长民族压迫。

列宁对这一切反对意见都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纲领。

这个纲领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部分。最高纲领说的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低纲领说的是党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所应实现的当前任务：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农村中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把地主夺去的农民土地（“割地”）归还给农民。

后来，布尔什维克用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代替了归还“割地”的要求。

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

这个纲领一直存在到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时，我们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通过了新的纲领。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之后，就来讨论党章草案。大会既已通过了党纲，为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当然也要通过党章，以便彻底消除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消除组织涣散和党内缺乏坚强纪律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党纲的通过还比较顺利，那末党章问题却在大会

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尖锐的意见分歧，是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即党员资格这一条的条文时展开的。什么人可以当党员，党的成分应是怎样的，党在组织方面应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还是一种不定形的东西，这就是讨论党章第一条时产生的问题。当时有两个条文互相对立：一个是由列宁提出而为普列汉诺夫和坚定的火星派支持的条文；另一个是由马尔托夫提出而为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不稳定的火星派、托洛茨基以及代表大会上所有一切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支持的条文。

列宁的条文是说：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条文虽认为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是做党员的必要条件，却不承认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是做党员的条件，竟认为党员也可能不是党的一个组织中的一员。

列宁把党看作是有组织的部队，其中各个成员并不是自行列名入党，而是由党的一个组织接收入党，因此他们必须服从党的纪律；而马尔托夫却把党看作是一种组织上不定形的东西，其中各个成员都是自行列名入党，他们既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此也就不必服从党的纪律。

由此可见，马尔托夫的条文与列宁的条文不同，它为那些不稳定的非无产者分子大开入党之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些暂时同情革命的人有时甚至也能给党不大的帮助。但这些人决不会加入组织，不会服从党的纪律，不会执行党的委托，不会承担由此产生的危险。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分子却主张承认这样的人为党员，主张给予他们影响党内事务的权利和机会。他们甚至主张让每个罢工者都有自行“列名”入党的权利，虽然参加罢工的也有非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

因此，马尔托夫派所想有的并不是列宁和列宁派在大会上所力争的那种一元化的、战斗性的、组织严密的党，而是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形的党，这样一个党单只因为它成分复杂和不可能有坚强纪律，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战斗性的党。

不稳定的火星派脱离坚定的火星派而同中派结成联盟，再加上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同他们联合，就使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占得了优势。大会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

从火星派因为党章第一条而发生分裂以后，大会上的斗争更加剧烈了。大会已临近结束，即将选举党的领导机关——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了。可是，在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以前出了几件事，使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由于党章的关系，大会讨论到了崩得问题。崩得想在党内获得一种特殊地位。它要求承认它是俄国犹太工人的唯一代表。接受崩得这一要求，就等于在党组织里把工人分成不同的民族类别而放弃工人阶级统一的阶级的地区组织。大会否决了崩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民族主义。于是崩得分子退出了大会。接着，两个“经济派”分子也退出了大会，因为大会拒绝承认他们那个国外联合会为党的国外代表机关。

七个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列宁派的变化。

对于党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列宁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列宁认为必须把坚定彻底的革命者选进中央委员会。马尔托夫派却竭力想使不坚定的、机会主义的分子在中央委员会里占优势。大会多数在这个问题上赞成列宁的意见。选进中央委员会的都是拥护列宁的人。

根据列宁的提议，选进《火星报》编辑部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

和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大会上要求把《火星报》原先六个编委都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拥护马尔托夫的分子。大会以多数否决了这个提议。列宁提出的三人小组当选了。于是马尔托夫声明，他不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这样，大会通过对党中央机关问题的表决确定了马尔托夫派的失败和列宁派的胜利。

从这时起，拥护列宁的人因在大会选举时获得多数票，就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而反对列宁的人因为获得少数票，就被称为孟什维克^①。

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总结一下，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 大会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主义”，即对于公开的机会主义的胜利；

(二) 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建好了统一的党的骨架；

(三) 大会揭示出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把党一分为二，即分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坚持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后者则滚进了组织涣散的泥潭，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潭；

(四) 大会表明，旧的机会主义者“经济派”虽已被党击溃，新的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又在党内代之而起；

(五) 大会在组织问题上没能胜任，表现过动摇，有时甚至让孟什维克占了优势，虽然大会到结束时已有所改正，但它毕竟不仅没能揭穿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使他们在党内陷于孤立，甚至没能向党提出这样的任务。

后一情况，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在代表

① 布尔什维克是俄语“большевики”一词的音译，意即多数派；孟什维克是俄语“меньшевики”一词的音译，意即少数派。——译者注

大会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更加尖锐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 孟什维克首领们的分裂行动和 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的 尖锐化。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

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党内斗争更加尖锐了。孟什维克竭力破坏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夺取党的中央机关。孟什维克要求让他们的代表加入《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而且他们的人数要在编辑部里占多数，在中央委员会里同布尔什维克相等。由于这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根本抵触，布尔什维克拒绝了孟什维克的要求。于是孟什维克就瞒着党暗中成立了他们以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反党派别组织，并如马尔托夫所说，“发动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他们所采取的反党斗争手段，就是“破坏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阻挠一切”（列宁语）^①。他们盘踞在十分之九是由那些脱离了俄国实际工作的旅外知识分子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里，从那里向党、向列宁和列宁派开火射击。

普列汉诺夫给孟什维克帮了大忙。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本来是同列宁一道走的。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被孟什维克实行分裂的要挟吓倒了。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同孟什维克“和解”。把普列汉诺夫拉到孟什维克方面去的，是他过去那些机会主义错误的货色。普列汉诺夫本人很快就从一个主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7卷第352页。——译者注

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调和的人变成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要求把代表大会否决了的所有原来的孟什维克编委都加进《火星报》编辑部。列宁当然不能同意这种做法，于是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在党中央委员会里站定脚跟，从这个阵地上去打击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违反代表大会的意志，独自一人把先前的孟什维克编委补进了《火星报》编辑部。从这时起，即从《火星报》第52号起，孟什维克就把《火星报》变成了自己的机关报，并经过《火星报》来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

从这时起，党内开始有了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的叫法，前者是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而后者是指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火星报》。

自从《火星报》转入孟什维克手里，它就成了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成了宣传孟什维克机会主义，首先是宣传组织问题上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机关报。孟什维克同“经济派”和崩得分子结合起来后，就在《火星报》上，如他们所说，开始向列宁主义大举进攻。普列汉诺夫没能坚持调和立场，不久也加入了这种进攻。按事物的逻辑，这也是势所必然的：谁主张同机会主义者调和，谁就必然要滚到机会主义那里去。在新《火星报》上出现了雪片似的声明和论文，说党不应当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说党内必须容许自由的团体和个人存在，他们不必服从党机关的决议；说必须让每个同情党的知识分子以及“每个罢工者”和“每个示威者”都有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权利；说要求党员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态度；说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就是“硬性压制”党员意志；说要求全体党员，无论领导人或普通党员，都同样服从党的纪律，就是在党内建立“农奴制度”；说“我们”在党内不是需要集中制，而是需要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使各个人和各个党组织都有权不执行党的决议。

这是放肆宣传组织上的松懈，宣传破坏党性和党的纪律，赞美知识分子个人主义，为不守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辩护。

孟什维克显然是在拖党后退，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退到组织涣散状态上去，退到小组习气上去，退到手工业方式上去。

必须给予孟什维克一个坚决的回击。

于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有名的著作（1904年5月出版）中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回击。

以下就是列宁在这本书里所发挥而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基础的基本组织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它的一支部队。但工人阶级有很多部队，所以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可以称为工人阶级的党。党与工人阶级其他部队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于，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部队、觉悟的部队、马克思主义的部队而不是普通的部队，它以社会生活的知识、社会生活发展规律的知识、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为武装，所以它善于引导工人阶级，善于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因此，决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就象不能把部分和整体混淆起来、不能让每个罢工者都能自行宣布为党员一样，因为谁要是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谁就会把党的觉悟水平降低到“每个罢工者”的水平，谁就会把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觉悟部队的这种作用取消掉。党的任务不是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每个罢工者”的水平，而是把工人群众、把“每个罢工者”提高到党的水平。

列宁写道：“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完全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

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① 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05—206页）^②

（二）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部队，而且同时又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它有为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员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如果党不是本阶级有组织的部队，不是一个组织体系，而是一些自行宣布为党员、但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因而没有组织起来、亦即不必服从党的决议的人所构成的简单的总和，那它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意志，永远不能实现自己党员行动上的统一，因而就会无法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党只有当它所有的党员都组织成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地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把它引向一个目标。

孟什维克提出反驳，说这样一来，许多知识分子，譬如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学生等等，就会留在党外，因为他们不愿意加入党的某个组织，这或是因为他们经受不起党的纪律，或是因为他们如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觉得“加入某个地方组织是有失体面的事情”。孟什维克的这种反驳正好打了孟什维克自己，因为党并不需要经受不起党的纪律和害怕加入党的组织的

① 马尼洛夫是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具有多愁善感、痴心妄想的性格。这里，马尼洛夫精神是想入非非的意思。——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57—458页。——译者注

党员。工人并不害怕纪律和组织，所以他们一决定来做党员，就乐意加入组织。只有怀着个人主义心理的知识分子才害怕纪律和组织，因此他们确实是会留在党外的。但这正是一种好现象，因为这样一来，党就能避免不稳定分子涌进党内来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当时，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高涨的时期，是特别厉害的。

列宁写道：“如果说，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末……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03页）^①

又说：

“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同上，第212页）^②

又说：

“……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因为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学生先生在党组织监督下工作，就急于要承认他们是党员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同上，第307页）^③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54—45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66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484页。——译者注

(三)党不只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而且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其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其他一切组织。党既是本阶级中以先进理论、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为武装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最高组织形式，就完全能够领导，而且也应该领导工人阶级的其余一切组织。孟什维克力图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结果就会削弱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亦即削弱无产阶级并解除它的武装，因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8页）^①。

(四)党是工人阶级先进部队与工人阶级千百万群众联系的体现。党若不与非党群众发生联系，不扩大这种联系，不巩固这种联系，那末，无论它是怎样优秀的先进部队，无论它组织得怎样好，也是不能生存和得到发展的。党如果闭关自守而与群众隔绝，丧失或哪怕是削弱同本阶级的联系，那它一定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而不可避免要陷于灭亡。党要想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得到发展，就应当扩大同群众的联系，获得本阶级千百万群众的信任。

列宁说：“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同上，第208页）^②

(五)党要正确地发挥作用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就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需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需要有由党代表大会所体现、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中央委员会所体现的统一的全党最高领导机关，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的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就不能实现领导本阶级的任务。

当然，由于党在沙皇专制制度条件下处于秘密存在的地位，党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60页。——译者注

的组织当时不可能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基础上，因此党不得不具有极秘密的性质。但列宁认为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立刻就会消失，那时党就会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党，而党的组织就会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原则上，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

列宁写道：“从前，我们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组织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间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别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91页）^①

列宁责备孟什维克是组织上的虚无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不容许党的权力和党的纪律加在他们头上。列宁写道：

“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同上，第310页）^②

（六）党要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就应当在实践上实行统一的无产阶级纪律，即全体党员，无论是领导人或普通党员，都必须同样遵守的纪律。因此，党内不应有什么不必服从纪律的“上等人”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60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7页。——译者注

和必须服从纪律的“平凡人”之分。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保持党的完整和党的队伍的统一。

列宁写道：“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根本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编辑部，这最好是用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不是农奴！’……一语来说明。这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把自己看成高于群众组织和群众纪律的‘上等人物’。……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总觉得任何一种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282页）^①

又说：

“随着我们这个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同上，第312页）^②

列宁总结对于意见分歧的分析、指出孟什维克的立场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时，认为孟什维主义的基本罪过之一就是低估了党组织的意义，不承认党组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武器。孟什维克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组织对于革命的胜利没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看法，认为单靠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还不足以获得胜利，——为要获得胜利，还必须用无产阶级“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思想上的统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

① 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348—34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译者注

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6卷第328页）^①

列宁就是用这样一段预言来结束他这本书的。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本有名的著作中所发挥的基本的组织原理，就是如此。

这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反对小组习气而捍卫了党性，反对捣乱派而捍卫了党，粉碎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奠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

但这本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列宁在这本书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关于党的学说，确定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组织，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武器，没有这个武器，就无法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由于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在党的工作者中间的传播，大多数地方组织团结到了列宁的周围。

可是，各地方组织愈是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孟什维克首领们的行为也愈加狠毒。

1904年夏，孟什维克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帮助和两个变质的布尔什维克——克拉辛和诺斯科夫的叛变而夺得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当时看得很清楚，孟什维克是力图造成分裂的。布尔什维克失去《火星报》和中央委员会之后，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必须创办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0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报纸。必须筹备新的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便建立新的党中央和清算孟什维克的破坏行为。

于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就来执行这一任务。

——布尔什维克积极准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4年8月，在瑞士境内由列宁领导举行了有二十二名布尔什维克出席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全党书》，它成了布尔什维克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

在三个区域（南方区域、高加索区域、北方区域）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会议上选出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它负责进行了实际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05年1月4日，布尔什维克主办的《前进报》创刊号出版了。

这样，在党内就形成了两个彼此独立的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机关报。

简短的结论

在1901—1904年时期，在革命工人运动增长的基础上，俄国各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在反对“经济派”的原则的、顽强的斗争中，列宁的《火星报》的革命路线获得了胜利，克服了思想上的涣散和“手工业方式”。

《火星报》把零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联成一体，并为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火星派方针的最终胜利进行的斗争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个集团，即布尔什维克集团和孟什维克集团。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是在组织问题上展开的。

孟什维克同“经济派”接近起来，并在党内代替了他们的地位。孟什维克的机主义暂时还只表现在组织问题上。孟什维克反对建立列宁式的、战斗的、革命的党，而主张建立涣散的、无组织的、尾巴主义的党。他们在党内推行分裂路线。他们在普列汉诺夫帮助下夺得了《火星报》和中央委员会，并利用这两个中央机关去实现他们的分裂主义的目的。

布尔什维克眼看孟什维克要造成分裂，就采取措施来约束分裂派，动员各个地方组织准备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前进报》。

这样，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夜，在日俄战争已经开始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已表现为两个彼此独立的政治派别。

第 三 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 日俄战争和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

(1904—1907 年)

一 日俄战争。俄国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 彼得堡的罢工。1905年1月9日工人 在冬宫前举行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 遭到枪杀。革命的开始

从十九世纪末起，各帝国主义国家为称霸太平洋和瓜分中国开始加紧进行争夺。沙俄也参加了争夺。1900年，沙皇军队伙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辽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修筑了中东铁路，并调兵守卫该路。北满被沙俄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的势力已伸展到朝鲜。俄国资产阶级拟定了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

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当时日本已迅速地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侵略亚洲大陆，首先是从中国下手。日本也如沙俄一样力图把朝鲜和满洲据为已有。日本当时已梦想占领库页岛和远东地区。英国害怕沙俄势力在远东加强，所以暗中支持日本。日俄战争逼近了。寻找新

市场的大资产阶级和最反动的地主阶层，推动沙皇政府去进行这场战争。

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战先开始了战争。日本在俄国境内设置有周密的间谍网，它知道对方在这场斗争中没有准备。1904年1月，日本不宣而战，向俄军要塞旅顺口发动突然袭击，重创了旅顺口的俄国舰队。

日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沙皇政府本来指望这次战争能帮助它稳定政局、阻止革命。但是它失算了。战争更加动摇了沙皇制度。

装备恶劣、训练不良、由一些庸碌无能和贪污腐败的将军所指挥的俄国军队屡战屡败。

资本家、官吏和将军们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盗窃之风盛行一时。军队的供给很坏。正当缺乏炮弹的时候，军队却收到一车厢一车厢的神像，好象是在嘲笑他们一样。士兵们痛心地说：“日本人用炮弹打我们，我们却用神像打他们。”专车不去运输伤员，却去运输沙皇将军抢来的财物。

日军包围了旅顺口要塞，接着就把它占领了。沙皇军队遭到多次失败之后，在沈阳城下被击溃。沙皇三十万大军在这次战役中死伤和被俘的人数达十二万。接着，沙皇从波罗的海派往旅顺口解围的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彻底击溃而覆没。对马之败是一次灭顶之灾：沙皇派去的二十艘军舰中，十三艘被击沉击毁，四艘被俘。战争结果是沙俄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可耻的和约。日本占领了朝鲜，从俄国手中夺得了旅顺口和半个库页岛。

人民群众不要这场战争，并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俄国的害处。由于沙俄落后，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这场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孟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即主张保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此相反，认为沙皇政府在这场掠夺战争中失败有好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加强革命力量。

沙皇军队的失败向广大人民群众揭示了沙皇制度的腐朽。人民群众对沙皇制度的憎恨与日俱增了。列宁写道，旅顺口的陷落是专制制度陷落的开始。

沙皇想用战争扼杀革命，但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日俄战争加速了革命。

沙俄的资本主义压迫，因有沙皇制度的压迫而强化。工人不仅感到资本主义剥削和苦役劳动的痛苦，而且感到全体人民没有权利的痛苦。因此，觉悟的工人力求领导城乡一切民主分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农民因没有土地，因受许多农奴制残余的束缚而喘不过气来，他们遭受着地主和富农的盘剥。沙俄境内各族人民受到本民族地主资本家和俄罗斯地主资本家的双重压迫。1900—1903年的经济危机已经加重了劳动群众的苦难，而战争又使苦难更加深重。战争的失败加深了群众对沙皇制度的憎恨。人民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由此可见，引起革命的原因实在太多了。

1904年12月，在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组织得很好的巴库工人大罢工，结果是工人获得胜利，工人和石油业主订立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

巴库罢工成了南高加索和俄国许多地区革命高涨的开端。

“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斯大林）这次罢工好象是预示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雷前闪电。

1905年1月9日（22日）的彼得堡事件，就是革命风暴的开始。

1905年1月3日，彼得堡最大的普梯洛夫工厂（现为基洛夫工厂）开始举行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厂里解雇了四名工人。普梯洛夫工厂的罢工迅速扩大，彼得堡其他工厂也相继加入。这次罢工变成总罢工了。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沙皇政府决定一开始就把运动镇压下去。

早在1904年，即普梯洛夫工厂罢工以前，警察局已通过奸细加邦神父在工人中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这个组织在彼得堡各区都设有自己的分会。当罢工开始时，加邦神父在他这个组织的会上提出了一个挑衅的计划：让全体工人在1月9日集合起来，举着教堂旗幡和沙皇画像，和平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陈述本身疾苦的请愿书。他说，沙皇一定会出来接见人民，倾听和满足人民的要求。加邦是为沙皇的保安局效劳；挑起枪杀工人的惨剧，把工人运动淹没于血泊中。但这个警察计划却反过来对着沙皇政府了。

请愿书在工人的集会上讨论过，并作了一些修改。布尔什维克也在这些集会上讲了话，不过他们没有明说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由于他们的影响，在请愿书上加进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工人结社自由、召集立宪会议来改变俄国国家制度、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政教分离、停止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要求。

布尔什维克在这些会上发言时向工人指明，自由不是用向沙皇请愿的方法获得的，而要靠拿起武器去争取。布尔什维克警告工人会遭到枪击。但他们阻止不住往冬宫请愿的游行。很大部分工人还相信沙皇会帮助他们。强有力的运动席卷了群众。

彼得堡工人在请愿书上写道：

“我们，彼得堡市的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和老弱父母，特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生活困苦，备受压迫，当牛做马，遭受着欺凌侮辱和非人的待遇…… 我们已再三

忍耐，但是我们日甚一日地被推入困苦、无权和愚昧的深渊，暴政专横压制着我们…… 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到了与其让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继续下去还不如死去为好的可怕时刻……”

1905年1月9日清晨，工人们前往当时沙皇所在的冬宫。工人们带着全家——妻子、孩子和老人——去见沙皇；他们手无寸铁，只是抬着沙皇的画像，举着教堂旗幡，唱着祷告歌。上街的队伍总共有十四万多人。

尼古拉二世并没有和他们讲友爱。他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这一天有一千多工人被沙皇军队打死，有两千多工人被打伤。彼得堡的街头染遍了工人的鲜血。

布尔什维克是和工人们同去了的。他们中有许多人被打死或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当时就在染遍工人鲜血的街头向工人解释，谁是这一残酷暴行的祸首，应该怎样同他作斗争。

1月9日从此称为“流血星期日”。工人在1月9日得到了血的教训。工人对沙皇的信念在这天被枪毙了。他们懂得了，只有用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1月9日傍晚，各工人区开始构筑街垒。工人们说：“沙皇揍了我们，那我们也要揍他！”

沙皇制造血腥暴行的可怕消息传遍了全国。全体工人阶级、全国人民义愤填膺。每一个城市里的工人都用罢工来抗议沙皇的暴行，并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人现在已是喊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上街了。在1月间，罢工人数达到很大的数字——四十四万。一个月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超过了过去整整十年的罢工人数。工人运动上升到了极大的高度。

革命在俄国开始了。

二 工人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 农民革命运动的增长。“波将 金”号装甲舰上的起义

1月9日以后，工人的革命斗争具有更加尖锐的政治性质。工人群众开始由经济罢工和支持性罢工转到政治罢工，转到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甚至开始转到武装抵抗沙皇军队。在彼得堡、莫斯科、华沙、里加和巴库这些集中了大量工人的大城市里，罢工进行得特别顽强和有组织。五金工人走在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前列。先进工人队伍用自己的罢工振奋了觉悟较低的阶层，发动了整个工人阶级去作斗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迅速增长了。

五一游行示威在许多地方引起了群众与军警的冲突。在华沙，示威群众受到枪击而死伤者达数百人。华沙工人响应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以示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在5月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全俄各地参加五月罢工的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巴库、洛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都卷入了总罢工。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同沙皇军队冲突的事件日益增多。敖德萨、华沙、里加、洛兹和其他许多城市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在波兰的大工业中心洛兹市，斗争进行得特别激烈。洛兹工人在市区的街道上构筑了几十座街垒，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三天巷战（1905年6月22—24日）。在这里，武装发动与总罢工汇合起来了。列宁认为这些战斗是俄国工人的第一次武装发动。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的罢工是夏季罢工中特别出色的一次。这次罢工从1905年5月底开始一直坚持到8月初，几乎持续了两个半月。参加罢工的工人约有七万，其中许多是妇女。

这次罢工是布尔什维克北方委员会领导的。在城外的塔尔卡河畔，差不多每天都有几千工人举行集会。工人在这些大会上讨论了自己的需求。在工人大会上常有布尔什维克出来发言。为了镇压罢工，沙皇当局命令军队驱散工人，向工人开枪射击。几十个工人被打死，数百个工人受伤。城内宣布了戒严。但工人还是继续坚持，拒绝复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忍饥挨饿，但不屈服。只是到了极端疲惫的时候，工人才不得已去上工。罢工锻炼了工人。工人阶级在这次罢工中作出了勇敢、坚定、沉着和团结的榜样。在这次罢工中，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受到了真正的政治教育。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在这次罢工期间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实际上是俄国最初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之一。

工人的政治罢工震撼了全国。农村也跟着城市发动起来了。从春天起就开始了农民的骚动。一群一群的农民起来造地主的反，捣毁地主的田庄、糖厂和酒厂，焚烧地主的楼房和庄院。许多地方的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大批砍伐地主的林木，要求把地主土地转交给人民。农民把地主的粮食和其他食品夺来分给饥民。地主们惊惶万分，不得不逃往城市。沙皇政府调遣士兵和哥萨克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队开枪射击农民，逮捕“祸首”，拷打和折磨他们。但农民并不停止斗争。

在俄国中部、伏尔加河流域和南高加索(特别是在格鲁吉亚)，农民运动不断扩大。

社会民主党人深入农村。党中央发出了告农民书：《农民们，请听我们说》。特维尔、萨拉托夫、波尔塔瓦、切尔尼果夫、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梯弗里斯和其他许多省份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都发表了告农民书。社会民主党人在农村中开大会，成立农民小组，建立农民委员会。1905年夏天，许多地方发生了社会民主党人组织

的农业工人罢工。

但这还只是农民斗争的开始。农民运动只扩展到八十五个县，即约近沙俄欧洲部分总县数的七分之一。

工人和农民的运动以及俄国军队在日俄战争中的多次失败，对军队发生了影响。沙皇制度的这个支柱动摇了。

1905年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装甲舰上爆发了起义。该舰当时停泊在离正在举行工人总罢工的敖德萨不远的地方。起义的水兵惩治了他们切齿痛恨的军官，把装甲舰开到了敖德萨。“波将金”号装甲舰转到革命方面来了。

列宁对这次起义极为重视。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必须领导这一运动，使其能与工农群众和地方驻军的运动汇合起来。

沙皇派了一批军舰去镇压“波将金”号，但这些军舰上的水兵拒绝对自己的起义同伴射击。革命的红旗在“波将金”号装甲舰上飘扬了好几天。但布尔什维克党在1905年还不象后来在1917年那样是领导运动的唯一政党。当时在“波将金”号上有许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虽然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起义，但起义还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和有充分经验的领导。一部分水兵在决定关头动摇了。黑海舰队中的其他军舰没有来响应这艘起义的装甲舰。革命的装甲舰因为缺乏煤炭和粮食，不得不开到罗马尼亚岸边，向罗马尼亜当局投降。

“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起义最后失败了。后来落到沙皇政府手里的水兵被交付法庭审判，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流放服苦役。但起义这一事实本身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是陆海军中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发动，是沙皇军队的很大一支部队第一次转到革命方面来。这次起义使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士兵群众和水兵群众自己更加认识、更加了解了陆海军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与人民联合的思想。

工人向群众性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的转变，农民运动的加强，人民与军警的武装冲突，以及黑海舰队中的起义，——这一切说明人民武装起义的条件正在成熟。这种情形使自由资产阶级不得不认真行动起来。它害怕革命，同时又用革命恐吓沙皇。它是想勾结沙皇反对革命，要沙皇“为人民”实行小小的改良以便“稳定”人心，分裂革命力量，借以防止“革命惨象”。自由派地主们说：“必须割点土地给农民，不然他们就会割死我们的。”自由资产阶级准备同沙皇分掌政权。列宁在当时谈到工人阶级的策略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策略时写道：“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

沙皇政府继续用残暴手段镇压工农，但它不能不明白，单用高压手段是对付不了革命的。因此，除高压手段外，它还采取了随机应变的政策。一方面，它通过自己的奸细唆使俄国各族人民互相摧残，制造蹂躏犹太人的暴行，挑拨阿尔明尼亚人和鞑靼人互相残杀。另方面，它又答应召集缙绅会议^①或国家杜马^②之类的“代议机构”，并委托大臣布里根拟定一种不让杜马拥有立法权的杜马法案。所有这些办法的采用，都是为了分裂革命力量，使人民中间的温和阶层脱离革命。

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布里根杜马，决心拆穿这套嘲弄人民代表机关的把戏。

反之，孟什维克决定不拆杜马的台，而且认为必须去参加。

① 缙绅会议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俄国的中央等级代表机关。——译者注

② 国家杜马是沙皇俄国于1906—1917年按反民主选举法产生的代议机关。
——译者注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策略基础

革命把社会各个阶级都发动起来了。革命引起的国内政治生活中的转变推动它们离开了旧日的习惯了的地位，迫使它们变更自己的部署来适应新的环境。每个阶级，每个政党，都在努力制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动路线，自己对其他阶级的态度，自己对政府的态度。甚至沙皇政府也不得不定出一种在它看来很不寻常的新策略，即答应召集布里根杜马这种所谓的“代议机构”。

社会民主党也必须定出自己的策略。其所以必须这样作，是因为革命在不断高涨，是因为无产阶级面前摆着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组织武装起义问题，推翻沙皇政府问题，建立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的问题，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等等。社会民主党必须定出一个统一而周密的马克思主义策略。

但是由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和分裂行动，俄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分裂成为两个派别。虽然当时的分裂还不能认为是完全的分裂，虽然这两个派别形式上还不是两个不同的党，但事实上它们却很象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报纸。

孟什维克除了他们和党内的多数在组织问题上的旧分歧之外，还加上了策略问题上的新分歧，这就使分裂更加深了。

由于没有统一的党，也就没有统一的党的策略。

如果立刻召开党的第三次例行的代表大会，由它来制定统一

的策略，并责成少数忠实地执行大会决议，服从大会多数的决议，那也许是摆脱当时状况的出路。布尔什维克当时向孟什维克建议的正是这样的出路。但孟什维克根本就不愿听人提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认为使党继续缺乏党所批准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执行的策略是一种罪恶，决定自己担负起发起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责任。

所有的党组织，不论是布尔什维克的或孟什维克的，都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但孟什维克拒绝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决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他们把自己的代表大会叫作代表会议，因为他们的代表人数很少；但实际上这是个代表大会，是孟什维克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的决议是全体孟什维克必须执行的。

1905年4月，在伦敦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二十四名代表，代表着二十个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所有大的党组织，都派有代表参加。

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是“党内分裂出去的部分”，然后就转到下一个议题，即制定党的策略的问题。

与代表大会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了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

“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①，——这就是列宁对当时情况的评论。

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实际上都同样是策略问题，但双方就这些问题却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各自通过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许多决议表明，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之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在策略问题上存在着极深的分歧。

以下就是这些分歧的要点。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6卷第580页。——译者注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策略路线。大会认为，虽然目前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虽然它在目前不能越出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但愿意这个革命完全胜利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因为这个革命的胜利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组织起来，在政治上得到提高，获得政治上领导劳动群众的经验和本领，并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农民才会支持无产阶级这种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策略，因为没有革命的完全胜利，农民就不能推翻地主而获得地主的土地。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自由资产阶级不愿意这个革命完全胜利，因为它需要沙皇政权这个皮鞭来对付它最害怕的工人和农民，所以它会努力保存沙皇政权，只是把沙皇政权的权力稍微限制一下。因此，自由资产阶级将力图在君主立宪制度基础上用同沙皇妥协的办法来结束革命。

只有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只有身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保证同农民的联盟，只有使自由资产阶级陷于孤立，只有由社会民主党来积极参加组织反沙皇制度的人民起义，只有因起义胜利而成立能够根除反革命势力并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临时革命政府，只有社会民主党不拒绝在顺利条件下参加这个临时革命政府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在这一切条件下，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策略路线。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所以只有自由资产阶级才能做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而应与自由资产阶级接近。这里主要是不要用自己的革命性吓跑自由资产阶级，不要给自由资产阶级以退出革命的借口，因为自由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革命就会削弱下去。

也许起义会获得胜利，但社会民主党在起义胜利后却应当靠

边，以免吓跑自由资产阶级。也许起义的结果会成立临时革命政府，但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去参加，因为这个政府不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府，而主要的是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政府并坚持自己的革命立场会吓跑自由资产阶级，从而破坏革命。

从革命的前途着想，最好是召集缙绅会议或国家杜马之类的代议机构，工人阶级可以从外面对它施加压力，以便把它变成立宪会议，或推动它去召开立宪会议。

无产阶级有它特殊的、纯粹工人的利益，它应该管的正是这种利益，而不应妄想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因为这个革命是一般政治的革命，所以它关系到一切阶级而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

简单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的两种策略，就是如此。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对孟什维克的策略提出了经典性的批评，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作了英明的论证。

这本书出版于1905年7月，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闭会两个月之后。照书名来看，也许会觉得列宁在这本书中只讲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并且只讲到俄国孟什维克。实际上，他批评孟什维克的策略，也就是揭露国际机会主义的策略；他在论证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策略并把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时，同时也规定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基础。

以下就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所发挥的基本策略原理。

(一) 始终贯彻于列宁这本书中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列宁承认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正如他说的那样，这个革命“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①。但他认为这个革命不是上层的革命，而是能把全体人民、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发动起来的人民革命。因此列宁认为，孟什维克企图缩小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降低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作用，使无产阶级避开这个革命，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58页）^②

列宁又说：“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同上，第104页）^③

列宁预料到革命可能有两种结局：

（1）或者结局是彻底战胜沙皇制度，是推翻沙皇制度并建立民主共和国；

（2）或者是力量不够，结局就会是沙皇同资产阶级靠牺牲人民利益做成交易，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甚至多半是一种嘲弄宪法的把戏。

无产阶级愿意达到最好的结局，即彻底战胜沙皇制度。但这种结局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袖、领导者时才能实现。

列宁写道：“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否能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7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43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601页。——译者注

手，抑或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32页）^①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完全可能避免替资产阶级当助手的命运，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根据列宁的看法，这种可能有如下述：

第一，“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的一般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同上，第75页）^②。

第二，无产阶级有其不依赖资产阶级而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使它能够团结成为“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同上）^③。

第三，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愿意革命彻底胜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同上，第57页）^④。

列宁写道：“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 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枝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63页。——译者注

③ 同上。——译者注

④ 同上，第541页。——译者注

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57—58页）^①

列宁接着说：“因此，无产阶级也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资产阶级会退出的愚蠢意见。”（同上，第94页）^②

为要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变为现实，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要无产阶级有一个愿意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这是进行领导这个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为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成其为领导者；领袖没有被率领者，就不成其为领袖。列宁认为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

第二，就是要把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竭力想由自己充当革命的唯一领导者的那个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这也是进行领导这个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为这种思想根本不容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1—54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89页。——译者注

有两个革命领导者存在。列宁认为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列宁写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65页）^①

又说：

“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它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的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同上，第94页）^②

列宁分析了孟什维克的反对意见，即认为布尔什维克这样一种策略“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种意见，并给这种意见下了一个评语，说它是“叛卖革命的策略”，是“变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③列宁当时写道：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51—55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89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85页。——译者注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能够说革命的规模会因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一起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的规模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把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麻痹起来的力量，即恰巧能做到‘迫使它退出’……的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95—96页）^①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所发挥的关于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这一基本策略原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领导作用）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如此。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问题的新方针，它与马克思主义武库中过去存在过的策略方针根本不同。从前，例如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始终是落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不管有意无意，总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始终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认为这样的情形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同时声明说，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尽可能坚持自己最近的阶级要求，并应当有它自己的政党。现在，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按照列宁的方针，情形已经改变成这样，就是无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被排除于革命领导之外，而农民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

有人说普列汉诺夫“也曾主张”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一种误会。普列汉诺夫向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献过媚眼，而且不嫌在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这是事实，但在实际上他是反对这个思想的实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0—591页。——译者注

质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这一政策的条件下，在孤立自由资产阶级这一政策的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反对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政策。实际上，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方针是孟什维克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方针。

(二)列宁认为胜利的人民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制度和争得民主共和国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宁同孟什维克相反，他认为“一般民主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一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并认为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75页)①。

为要引导群众去实行起义，并使起义本身成为全民的起义，列宁认为必须提出这样一种口号，必须向群众发出这样一种号召，实现这种口号和号召能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组织他们去举行起义而瓦解沙皇制度的政权机构。列宁认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就是这样的口号，而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就是为维护这些决议而写的。

他认为这样的口号就是：

(1)采用“群众政治罢工……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义”(同上，第75页)②；

(2)组织“立刻用革命的方法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工人阶级的其他迫切要求”(同上，第47页)③；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6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63—56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29页。——译者注

(3)“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以便用革命的方法“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直到没收地主土地（《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88页）^①；

(4)武装工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在城市中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和在农村中实现民主改革的策略，就是说做到既不顾政府，也不顾法律，而是藐视政府和法制，打破现行法律，用无所顾忌的手段自动建立新秩序。这是一种新的策略手段，采用这种手段就能使沙皇制度的政权机构瘫痪，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主动性。在这一策略的基础上也就成长起来了城市中的革命罢工委员会和农村中的革命农民委员会，后来前者发展成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后者发展成了农民代表苏维埃。

第二，就是采用群众性政治罢工，采用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后来在革命进程中对群众起了极大的革命动员作用。这是无产阶级手中一种新的很重要的武器，是从前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中未曾有过而后来得到了大家公认的武器。

列宁认为人民起义胜利的结果，应是沙皇政府被临时革命政府所取代。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巩固革命的成果，镇压反革命势力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列宁认为不实现这些任务就无法彻底战胜沙皇制度。但要实现这些任务和彻底战胜沙皇制度，临时革命政府就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政府，而应该是获得了胜利的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专政的政府，应该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列宁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②这一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1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页。——译者注

著名原理得出结论说，临时革命政府要想保证彻底战胜沙皇制度，就不能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列宁写道：“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就先后次序而言的最后，不是就重要性而言的最后——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62—63页）^①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47—548页。——译者注

至于社会民主党应怎样对待临时革命政府以及社会民主党可否参加这个政府，那末列宁完全坚持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说：

“如果力量对比及其他不能预先准确判定的因素对我们有利，我们党可以派全权代表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以便同一切反革命企图作无情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独立利益；这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党对自己的全权代表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因为社会民主党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一点说，它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无论社会民主党是否有可能参加临时革命政府，都必须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他们懂得，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革命的成果，必须经常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37页）^①

孟什维克反驳说，临时政府毕竟是资产阶级政府，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愿意重犯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法国资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就不能去参加这样的政府。列宁批驳这种意见时指出，孟什维克在这里混淆了两件不同的事情，暴露出他们没有能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问题：当时在法国，说的是社会党人在国内缺乏革命形势的时候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所以社会党人不应该参加这样的政府；而现在在俄国，说的是社会党人在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参加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资产阶级政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去参加并且在顺利条件下应该去参加这样的政府，以便不仅“从下面”、从外面，而且“从上面”、从政府内部去打击反革命。

（三）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7—518页。——译者注

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列宁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以为社会民主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要求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并不是为了在革命战胜沙皇制度以后就把革命结束，而是为了尽量延长革命状态，彻底消灭反革命残余，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并在这个时候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得到启发，组织成为一支伟大的军队，然后就开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在讲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规模、讲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应使这个革命具有什么样的规模时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指孟什维克。——编者注）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96页）^①还说：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领导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中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种策略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91页。——译者注

手段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8卷第105页）^①

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出版两个月后，又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解释道：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同上，第186页）^②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关系问题上一个新的指导思想，这是认为到资产阶级革命终结时就要在无产阶级周围重新配置力量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理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在确定这个新思想的时候，列宁所依据的是：第一，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著名原理；第二，马克思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说的必须把农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的著名思想。马克思在这封信里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③但马克思的这些英明思想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发挥，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又用各种办法把它们埋藏起来，不再提起。于是一个任务落到了列宁肩上，就是要让马克思的这些被遗忘的原理重见天日，把它们完全恢复过来。但列宁恢复马克思的这些原理时，并没有局限于——并且也不能局限于——把它们简单地重复一遍，而是加以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634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译者注

发展，加工成一个严整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其中加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新的成分，即无产阶级与城乡半无产者分子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这一原理。

这个思想粉碎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策略立场，他们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农民群众包括贫农群众在内一定会离开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会出现一个漫长的间歇时期，一个长达五十年到一百年甚至更久的“平静”时期，那时无产阶级将“和平地”受着剥削，而资产阶级将“合法地”牟取暴利，直到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到来。

这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担任领导者，有居民中的半无产者即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作为同盟者。

按照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在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应当转变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同其他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条件下所实现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则应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准备基础。

这个理论推翻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流行理论，这种流行理论否认城乡半无产者群众的革命潜力，认为“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没有其他可为我国反政府运动或革命运动所依靠的社会力量”（这是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典型）^①。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将单独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将在没有同盟者的情况下反对一切

① 见《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版第3卷第119页。——译者注

非无产者阶级和阶层。他们不愿意顾及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不仅剥削着无产阶级，而且剥削着千百万城乡半无产者阶层；这些阶层备受资本主义压迫，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欧洲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由于社会的经济继续发展而在民族中占大多数、在社会中占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条件才算成熟。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彻底推翻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反无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当时在列宁这个理论中还没有作出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直接结论。但这个理论已包含有一切或几乎一切早晚作出这种结论所必需的主要成分。

大家知道，列宁在1915年，即过了十年，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以上就是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中所发挥的基本策略原理。

列宁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它从思想上粉碎了孟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策略方针；武装了俄国工人阶级去进一步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去对沙皇制度进行新的冲击；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

但列宁这部著作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就在于它用新的革命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奠定了基础，而我国无产阶级在1917年正是依靠这一策略战胜了资本主义制度。

四 革命的进一步高涨。1905年10月的全俄政治罢工。沙皇政府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

1905年秋，革命运动已遍及全国各地。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

9月19日，莫斯科开始了印刷工人的罢工。罢工浪潮扩展到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城市。在莫斯科本市，印刷工人罢工得到了其他产业部门工人的支援而变成了政治总罢工。

10月初，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线开始罢工。过了一天，整个莫斯科铁路枢纽站都罢工了。罢工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所有的铁路线。邮政局和电报局停止了工作。全俄各城市工人纷纷举行有成千成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决定停止工作。一个个工厂，一个个城市，一个个地区，都相继卷入罢工。小职员、学生、知识分子（律师、工程师和医生）也加入了罢工工人的洪流。

十月政治罢工发展成了全俄罢工，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地区，直至最边远的地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工人，直至最落后阶层的工人。参加这次政治总罢工的，仅仅产业工人就约有一百万，人数相当多的铁路工人和邮电职员等等还未计算在内。国内全部生活陷于停顿。政府已经瘫痪了。

工人阶级领导了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口号产生了应有的结果。

十月总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迫使吓得要死的沙皇颁布了10月17日宣言。1905年10月17日的宣言答应为人民施行“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

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答应召集立法杜马，吸收各阶级的居民来参加选举。

这样，布里根的谘议性杜马被革命力量扫除了。布尔什维克抵制布里根杜马的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

虽然如此，但 10 月 17 日宣言终究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是沙皇的诡计，是沙皇为了麻痹轻信者、赢得时间、聚集力量、然后打击革命所需要的一种喘息时机。沙皇政府口头上答应给予自由，实际上一点切实的东西也没有给。除了许诺之外，工人农民还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东西。10 月 21 日 实行了很小一部分政治犯的赦免，而不是群众期待的政治大赦。同时，政府为了拆散人民力量，组织过许多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暴行，使成千累万的人牺牲了生命；而为了摧残革命势力，又成立了匪帮式的警察团体：“俄罗斯人民同盟”和“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同盟”。在这两个团体中间起重大作用的是一些反动的地主、商人、神父和半刑事犯的流氓，所以人民称之为“黑帮”。黑帮分子在警察协助下，公开殴打和杀害先进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焚烧和射击群众大会和公民集会的场所。沙皇宣言产生的结果看来就是如此。

当时民间流行着这样评论沙皇宣言的歌谣：

“沙皇心发颤，颁布一宣言，
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

布尔什维克向群众解释说，10 月 17 日宣言是一个骗局。他们斥责政府在颁布宣言后的所作所为是挑衅。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拿起武器，准备武装起义。

工人更加努力地成立战斗队了。他们已经明白，政治总罢工争得的 10 月 17 日的第一个胜利，要求他们继续努力、继续斗争，去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在评价 10 月 17 日宣言时，说它是力量对比暂时处于某种

均势的瞬间，就是说，当时无产阶级和农民迫使沙皇发表了宣言，但还无力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已不能单用旧的手段维持统治，所以不得不在口头上许诺“公民自由”和“立法”杜马。

在十月政治罢工那些疾风暴雨的日子里，在同沙皇斗争的烈火中，工人群众的革命创造力创造了新的强大的武器——工人代表苏维埃。

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各工厂代表组成的会议，它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治组织。1905年初次产生的苏维埃，是1917年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的雏形。苏维埃是表现人民创造精神的新的革命的形式。它纯粹是各革命阶层居民打破沙皇政府的一切法律和规章制度而创立起来的。它是人民奋起反对沙皇制度的自动性的表现。

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看作革命政权的萌芽。他们认为苏维埃的力量和作用完全取决于起义的力量和成功。

孟什维克不认为苏维埃是革命政权的萌芽机关，也不认为它是起义机关。他们把苏维埃看作地方自治机关，如民主产生的城市自治机关之类。

1905年10月13日(26日)，彼得堡所有的工厂进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当天夜间就举行了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继彼得堡之后，莫斯科也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革命中心的苏维埃，是沙皇帝国首都的苏维埃，本应该在1905年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由于孟什维克的拙劣的领导，它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大家知道，当时列宁还不在彼得堡，还在国外。孟什维克趁列宁不在，钻进了彼得堡苏维埃，并夺得了领导权。在这样的条件下，赫卢斯塔列夫、托洛茨基、帕尔乌斯等孟什维克分子能扭转彼得堡苏维埃的方向去反对起义的政策，是毫不奇怪的。他们不是

设法使士兵同苏维埃接近并使两者在共同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反而要求把士兵撤出彼得堡。苏维埃不是把工人武装起来，使他们作好起义准备，而是裹足不前，反对准备起义。

莫斯科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革命中完全起着不同的作用。莫斯科苏维埃从成立时起就执行了彻底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还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成了武装起义的机关。

在 1905 年 10—12 月期间，许多大城市和几乎所有的工人中心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当时还作了组织陆军士兵代表苏维埃并把它们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统一起来的尝试。有些地方还成立过工农代表苏维埃。

苏维埃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它们往往是自发产生，没有定型，成分上不固定，但它们的行动却象一个政权机关。苏维埃用夺取手段实现了出版自由，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号召人民拒绝向沙皇政府纳税。在个别场合，它们还没收沙皇政府的资金来满足革命的需要。

五 十二月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 革命的退却。第一届国家杜马。 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

1905 年 10 月和 11 月，群众革命斗争继续轰轰烈烈地发展着。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

1905 年秋，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规模很大。农民运动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份。萨拉托夫、唐波夫、切尔尼果夫、梯弗里斯、库泰依斯和其他一些省份发生过真正的农民起义。但农民

群众冲击的力量还是不足。农民运动还缺乏组织和领导。

在许多城市，如梯弗里斯、海参崴、塔什干、撒马尔汗、库尔斯克、苏胡姆、华沙、基辅、里加等，士兵中的骚动也更厉害了。在喀琅施塔得，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水兵中，都爆发了起义（1905年11月）。但这些起义由于彼此分散，都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一些部队和军舰的起义，往往是由军官的虐待和伙食的恶劣（如所谓“豌豆暴动”）等造成的。许多起义的水兵和士兵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必须推翻沙皇政府，必须坚决把武装斗争继续下去。起义的水兵和士兵太和气、太慈善，他们常常错误地把起义开始时逮捕的军官放掉，听了长官的诺言和劝告就平息下来。

革命已经发展到马上要举行武装起义了。布尔什维克号召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反对沙皇和地主，向群众说明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布尔什维克不停地准备武装起义。在士兵和水兵中进行了革命工作，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军事组织。在许多城市中组织了工人战斗队，在战斗队员中进行了武器使用的训练。组织了在国外购置枪械并把它们秘密运回俄国的工作。参加组织枪械运输工作的有党内著名的工作人员。

1905年11月，列宁回到了俄国。在这些日子里，列宁避开沙皇的宪兵和特务，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文章，成了对党的日常工作的指示。

在这期间，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进行了大量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露并狠批了孟什维克，指出他们是反对革命、反对武装起义。他坚决地准备工人去迎接同专制制度的决战。在沙皇宣言发表那天，斯大林同志在梯弗里斯群众大会上向工人说道：

“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了这点，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也还是武装。”

1905年12月，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虽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还同在一个社会民主党内，实际上他们是两个不同的党，各有自己单独的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见面了。在此以前，他们互相用书信或通过其他同志来保持联系。

从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必须指出的有两个决议：一个是关于恢复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两个党的党的统一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抵制第一届杜马即所谓维特杜马的问题。

由于这时莫斯科已经开始武装起义，代表会议按照列宁的意见赶忙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而代表们也就回到各地亲自参加起义去了。

但沙皇政府也没有睡觉。它也在作决战的准备。沙皇政府同日本媾和减轻了自己的困难处境，就转而对工人和农民实行进攻。沙皇政府在农民起义的许多省份宣布戒严，颁布了“就地正法”、“格杀勿论”的残暴命令，并下令逮捕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驱散工人代表苏维埃。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和受他们领导并与广大工人群众紧相联系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决定立刻准备武装起义。12月5日(18日)，莫斯科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苏维埃提议宣布政治总罢工，并在斗争进程中把它转变为起义。这个决议在许多工人群众大会上得到了拥护。莫斯科苏维埃考虑到工人阶级的意志，一致决定开始政治总罢工。

莫斯科无产阶级开始起义时已有自己的战斗组织，约有一千个战斗队员，其中半数以上是布尔什维克。莫斯科许多工厂也有战斗队。起义者方面总共约有两千战斗队员。工人指望卫戍部队保持中立，指望把一部分卫戍部队分化和争取过来。

12月7日(20日)，莫斯科开始了政治罢工。但这次罢工没能

扩展到全国，它在彼得堡就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种情况从一开始就减少了起义胜利的机会。尼古拉铁路（现为十月铁路）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这条线路上的运行没有中断，所以政府能够把近卫团从彼得堡调到莫斯科来镇压起义。

在莫斯科本市，卫戍部队已经动摇了。工人开始起义时多少还指望得到它们的支援。但革命者错过了时机，结果沙皇政府把卫戍部队的骚动镇压下去了。

12月9日（22日），莫斯科出现了第一批街垒。接着莫斯科许多街道都筑满了街垒。沙皇政府出动了火炮。它调来了超过起义者数倍的兵力。几千武装工人进行了九天英勇的斗争。沙皇政府只是从彼得堡、特维尔和西部边区调来了几个团，才把起义镇压了下去。各区的起义领导机关在战斗开始前夜不是已被破获，便是已被隔绝。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也被破获了。武装发动变成了彼此没有联系的各个区的起义。各区失去了领导它们的中心，又没有全市共同的斗争计划，所以主要是局限于防御。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这是莫斯科起义力量薄弱的主要根源，同时也是这次起义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

起义在莫斯科的红色勃列斯尼区进行得特别顽强和激烈。红色勃列斯尼区是起义的主要堡垒和中心。这里集中了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精锐的战斗队。但是红色勃列斯尼区遭到了火与剑的镇压，淹没在血泊和炮击后的烈火之中了。莫斯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不仅在莫斯科发生过。革命的起义还席卷了其他许多城市和地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莫托维里哈（现为皮尔姆）、诺沃罗西斯克、索尔莫沃、塞瓦斯托波尔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都爆发过武装起义。

俄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也奋起进行了武装斗争。格鲁吉亚起

义几乎席卷全境。在乌克兰的顿巴斯一带，即在戈尔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鲁干斯克（现为伏罗希洛夫格勒），起义的规模很大。在拉脱维亚，斗争进行得很顽强。在芬兰，工人成立了赤卫队，并举行了起义。

但所有这些起义，也如莫斯科起义一样，都被沙皇政府用惨无人道的残暴手段镇压下去了。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十二月武装起义作了不同的评价。

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武装起义以后对党提出责备，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孟什维克硬说起义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事情，说在革命中不用起义也可以，说不用武装起义而用和平斗争手段就可以取得胜利。

布尔什维克斥责这种评价是叛卖性的评价。他们认为莫斯科武装起义的经验恰巧证明工人阶级的武装斗争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列宁回答普列汉诺夫“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种责备时说道：

“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50页）^①

1905年十二月起义是革命的最高点。在12月，沙皇专制政府打败了起义。从十二月起义失败时起，便开始了革命逐渐退却的转变。革命由高涨转为逐渐低落。

沙皇政府急忙利用这次失败来彻底粉碎革命。沙皇的刽子手和狱吏展开了他们血腥的工作。讨伐队在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横行无忌。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66页。——译者注

但是革命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工人和革命农民是缓缓退却的，是且战且退的。更多的工人阶层加入了斗争。1906年有一百多万工人参加罢工。1907年参加罢工的有七十四万。农民运动在1906年上半年席卷了沙俄一半左右的县份，下半年运动所及的县份仍占总县份数的五分之一。陆海军中的骚动仍在继续。

沙皇政府在同革命的斗争中并不是只采用高压手段。它用高压手段获得初步的成功之后，就决定用另一种手段来给革命以新的打击，即召开新的所谓“立法”的杜马。它打算用召开这种杜马的办法来引诱农民离开革命，从而断送革命。1905年12月，沙皇政府颁布了法令，要召开新的所谓“立法”的杜马，以表示与布尔什维克用抵制手段扫除了的那个旧的“咨议性”的布里根杜马有所不同。沙皇的选举法当然是反民主的。选举不是普遍的。半数以上的居民，例如妇女和二百多万工人，被根本剥夺了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选民被分成四个选民团，即当时所谓的土地所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团、农民选民团和工人选民团。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选举实际上不是无记名的。选举法保证一小撮地主资本家在杜马中比之千百万工农占有极大的优势。

沙皇想利用杜马来引诱群众脱离革命。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农民还相信经过杜马可以获得土地。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欺骗工农，说什么不经过起义、不经过革命就可以得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为了同这种对人民的欺骗作斗争，布尔什维克根据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决议，宣布并实行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策略。

工人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时，要求把党的力量统一起来，把无产阶级政党统一起来。布尔什维克根据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关于统一问题的著名决议，支持工人的这一要求，并向孟什维克提

议召开党的统一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实行统一。

列宁是主张统一的，但他所主张的是不会把革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掩盖起来的统一。调和派（波格丹诺夫、克拉辛等人）力图证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间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他们给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列宁竭力反对调和派，要求布尔什维克带着自己的纲领去参加代表大会，好让工人们明白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是什么立场，以及统一是在什么基础上实行的。布尔什维克制定了这样的纲领，并把它交给党员们讨论。

1906年4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召开了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百一十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七个地方党组织。此外，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崩得代表三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三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三人。

布尔什维克组织因为在十二月起义时和起义后遭到破坏，没有能都派代表出席。除此之外，孟什维克在1905年的“自由日子”里接纳了大批同革命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只要指出如下一点就足以说明，就是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当时梯弗里斯的产业工人很少）所选派的大会代表竟与无产阶级最大的组织彼得堡组织所选派的代表人数相等。因此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占了多数，虽然是不大的多数。

大会成分既是如此，也就决定了大会在许多问题上通过的决议具有孟什维主义的性质。

这次大会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仍然是各自保持原有的观点，各有自己独立的组织。

第四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对目前

形势和无产阶级阶级任务的估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组织问题。

虽然孟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占了多数，但他们为了不使工人疏远自己，仍不得不接受列宁所提出的关于党章第一条即党员资格这一条的条文。

在土地问题上，列宁维护土地国有的主张。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只有在革命获得胜利的时候，只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在这种场合下实行土地国有，能使无产阶级容易联合农村贫民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土地国有要求无偿地夺取（没收）全部地主土地而转交给农民。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在号召农民进行反对沙皇和地主的革命。

孟什维克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他们坚持土地地方公有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地主土地不是交给农民公社支配，甚至也不是交给它们使用，而是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或者说地方自治局）支配。农民必须按各人的力量租佃这种土地。

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纲领是一个妥协主义的因而是对革命有害的纲领。它不能动员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它不是要彻底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孟什维克的纲领是要革命半途而废。孟什维克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孟什维克的纲领。

在讨论关于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国家杜马这两项决议案时，孟什维克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反无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本质。孟什维克马尔丁诺夫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斯大林同志回答孟什维克时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或者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或者是民主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就是党内存在着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意见分歧的所在。”^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20页。——译者注

至于讲到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在自己的决议案中竭力替它吹嘘，说它是解决革命问题、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的最好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则相反，认为杜马是沙皇制度的一种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是掩盖沙皇制度腐朽机体的一块屏风，一旦沙皇制度感到它碍事时，立刻就会把它抛弃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是三名布尔什维克和六名孟什维克。参加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全是孟什维克。

很清楚，党内斗争将继续下去。

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在那些形式上统一的地方组织里，往往由两个报告人来介绍代表大会的情况，一个代表布尔什维克，一个代表孟什维克。对两条路线讨论的结果，各地方组织中的大多数党员，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实际生活愈来愈证明布尔什维克正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孟什维克的中央，愈来愈暴露出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出自己完全没有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能力。1906年夏秋两季，群众革命斗争重新加强起来。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维阿波尔格，水兵举行了起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加剧了。而孟什维克的中央提出的却是机会主义的口号，群众并没有跟这些口号走。

六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解散。第二届 国家杜马的召开。党的第五次代 表大会。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 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

沙皇政府觉得第一届国家杜马不够驯服，就在1906年夏天把它解散了。沙皇政府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讨

伐队的迫害活动，并宣布要在最短时期内召开第二届国家杜马。沙皇政府公然骄横起来。它看见革命在走向低落，已经不害怕革命了。

布尔什维克应当决定参加还是抵制第二届杜马的问题。当讲到抵制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通常是指积极的抵制，而不是指简单地和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布尔什维克认为，积极的抵制是提醒人民防止沙皇把他们由革命道路引上沙皇“宪制”道路的一种革命手段，是打破沙皇这种阴谋并组织人民去重新进攻沙皇制度的一种手段。

对布里根杜马实行抵制的经验，证明抵制“是由事变完全证实了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27页）^①。这次抵制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提醒人民防范了沙皇宪制道路的危险，而且在杜马还没有产生以前就把它搞垮了。这次抵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在革命向上高涨的时候实行的，并且是依靠着这种高涨实行的，而不是在革命低落的时候实行的，因为搞垮杜马只有在革命高涨条件下才能做到。

抵制维特杜马，即抵制第一届杜马，是在十二月起义失败以后沙皇已经获得胜利的时候，即在可以认为革命是在走向低落的时候实行的。

列宁写道：“但是不言而喻，当时还没有理由认为这个胜利（指沙皇的胜利。——编者注）是决定性的胜利。1906年夏天一连串分散的、局部的军队起义和罢工是1905年十二月起义的继续。抵制维特杜马的口号是争取集中和联合这些起义的口号。”（《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2卷第20页）^②

对维特杜马的抵制虽然也大大破坏了这届杜马的威信，并削

①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5页。——译者注

弱了一部分人民对杜马的信任，却未能把杜马搞垮。其所以未能把它搞垮，是因为这次抵制，如现在清楚地看到的，是在革命低落、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实行的。因此，1906年对第一届杜马的抵制没有成功。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写道：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了，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拒绝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 关于个别人所说的话，作相当的修改，也适用于政治和政党。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82—183页）^①

讲到第二届国家杜马的时候，列宁认为由于形势改变和革命低落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应当把抵制国家杜马的问题重新研究一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0卷第26页）^②。

列宁写道：“历史已经表明：当杜马召集起来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它内部和在它周围进行有益的鼓动；同革命农民接近而反对立宪民主党的策略，在杜马内部是有可能实行的。”（同上，第29页）^③

由此可见，不仅要善于在革命高涨时坚决进攻，在最前列进攻，而且要善于在已经没有高涨形势时正确地退却，在最后面退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92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123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127页。——译者注

却；要善于根据已经改变的形势来改变策略，不要乱糟糟地退却，而要有组织地、镇静地、毫不慌张地退却，以求利用最小一点可能来使干部免遭敌人的打击，重新组织队伍，积蓄力量，为重新向敌人进攻作好准备。

布尔什维克决定参加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了。

但布尔什维克参加杜马，并不是要象孟什维克那样在杜马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进行同杜马分不开的“立法”工作，而是要利用杜马讲坛来宣传革命。

反之，孟什维克的中央却号召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在杜马中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把杜马看作能够约束沙皇政府的立法机关。

大多数党组织都反对孟什维克中央所采取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要求召开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

1907年5月，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内）共有十五万党员。这次大会共有三百三十六名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有一百零五名；孟什维克有九十七名。其余的人代表着各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即波兰、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崩得，这些组织是由上次代表大会接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托洛茨基企图在会上结成自己的单独的中派小集团，即半孟什维克的小集团，可是谁也没有跟他走。

布尔什维克因为得到波兰代表和拉脱维亚代表的拥护，在会上获得了稳定的多数。

会上引起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早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已进行过斗争。大会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黑帮、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都作出了布尔什

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对这些政党所应采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

大会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并通过决议要同“俄罗斯人民同盟”、保皇派、贵族联合会等黑帮政党，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工商党和“和平革新”党作无情的斗争。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明显的反革命政党。

至于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大会主张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揭露性的斗争。大会要求揭露立宪民主党虚伪骗人的“民主主义”立场，要求对自由资产阶级妄想领导农民运动的企图进行斗争。

对于所谓民粹派的或劳动派的政党（人民社会党、劳动团、社会革命党人），大会主张揭露他们冒充社会主义者的企图。同时，大会又认为可以同这些政党达成个别的协议，以便共同进行和同时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这些政党当时还是民主派政党，还代表着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利益。

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维克就已提出召开所谓“工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的计划是要召开一个由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代表大会，由这个“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既象是“非党的党”，又象是“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的无纲领的工人党。列宁揭穿了孟什维克这种极有害的企图，指出他们是想取消社会民主工党而把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融化到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大会严厉地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工人代表大会”口号。

在大会工作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工会问题。孟什维克主张工会“中立”，即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作用。大会否决了孟什维克的提案，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工会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党应力求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工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

胜利。但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沾沾自喜，安于既得的胜利。这不是列宁对他们的教诲。布尔什维克知道，同孟什维克的斗争还在前头。

斯大林同志在1907年发表的《一个代表的札记》一文中，对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作了如下的评价：

“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把全俄国的先进工人事实上联合成一个全俄国的统一的党，——这就是伦敦代表大会的意义，这就是它的一般性质。”

斯大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举出了说明代表大会成分的具体材料。原来，布尔什维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主要是从大工业地区（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地）选出的，而孟什维克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则是从手工业工人和半无产者占优势的小生产地区，以及几个纯粹的农民地区选出的。

斯大林同志对代表大会的情况作出总结说：“很明显，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的策略。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还隐蔽着的地区的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半资产阶级分子的策略。数字就是这样说明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记录》1935年俄文版第XII页和第XIII页）^①

沙皇解散第一届杜马后，本想得到一个更为驯服的第二届杜马。但第二届杜马使沙皇的希望落空了。于是沙皇决定把这届杜马也解散，并按更坏的选举法召开第三届杜马，希望这届杜马会更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50页和第52页。——译者注

驯服。

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沙皇政府举行了所谓六三政变。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共有六十五名代表，都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新的选举法颁布了。工农权利被进一步削减。沙皇政府继续实行进攻。

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对工农大肆进行血腥镇压。成千累万的革命工人和农民惨遭讨伐队枪毙或绞杀。革命者在沙皇刑讯室里受尽各种刑罚和折磨。工人组织，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受到特别残酷的迫害。沙皇的密探拼命搜寻当时匿居芬兰的列宁。他们想摧残革命领袖。1907年12月，列宁冒了很大的危险才逃出毒手，再度流亡国外。

艰苦的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到来了。

这样，第一次俄国革命最后是失败了。

造成失败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当时在革命中还没有工农反沙皇制度的巩固的联盟。农民虽然奋起进行了反地主的斗争，并同工人结成了联盟去反对地主，但他们还不了解不推翻沙皇就不可能推翻地主，还不了解沙皇同地主是一鼻孔出气的，甚至相当一部分农民还信任沙皇，还对沙皇的国家杜马寄托着希望。因此，有许多农民不愿同工人结成联盟去推翻沙皇制度。当时农民相信妥协主义的社会革命党胜过相信真正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其结果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缺乏组织。列宁指出：

“……农民的行动过于散漫、无组织和没有充分采取攻势，而这也正是革命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9卷第354页)^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5页。——译者注

(二)相当一部分农民不愿同工人一起去推翻沙皇制度的这种心理，也影响到军队的行动，因为军队大多数是由身穿军服的农民子弟组成的。虽然沙皇军队个别部队中也发生过骚动和起义，但大多数士兵还是帮助了沙皇镇压工人的罢工和起义。

(三)工人的行动也不够协调一致。先进的工人阶级队伍在1905年展开了英勇的革命斗争。较为落后的阶层，即工业最不发达省份里那些住在农村的工人，却发动得比较迟缓。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特别踊跃是在1906年，但这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四)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进的基本的力量，但工人阶级党的队伍还没有必要的统一和团结。工人阶级的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成了两个集团，即布尔什维克集团和孟什维克集团。布尔什维克执行彻底的革命路线，号召工人推翻沙皇制度。孟什维克却以其妥协主义的策略阻碍了革命，使相当一部分工人迷失了方向，分裂了工人阶级。因此，工人在革命中的行动并非始终都是协调一致，而工人阶级既然还没有自己队伍的统一，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袖。

(五)西欧帝国主义者帮助了沙皇专制政府镇压1905年革命。外国资本家害怕丧失他们在俄国的投资和巨额收入。此外，他们还担心一旦俄国革命胜利，其他国家的工人也会起来革命。因此，西欧帝国主义者就来帮助刽子手沙皇。法国银行家贷给沙皇一笔巨款来镇压革命。德国皇帝使数万大军作好准备，想用武装干涉来援助俄国沙皇。

(六)1905年9月缔结的日俄和约给沙皇帮了大忙。战争的失败和革命的迅猛发展，迫使沙皇匆忙签订了和约。战争的失败削弱了沙皇制度，而和约的缔结巩固了沙皇的地位。

简短的结论

俄国第一次革命是我国发展中整整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革命利用了沙皇在满洲战场上遭受失败而实力削弱这一点，扫除了布里根杜马，并接二连三取得了沙皇的让步，而走向高涨，从10月的政治总罢工发展为12月的武装起义。在第二个时期，沙皇与日本媾和后恢复了元气，利用自由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惧，利用农民的动摇，把维特杜马投给他们作为施舍，并转而向工人阶级、向革命发起进攻。

在不过是三年的革命时期(1905—1907年)，工人阶级和农民受到了他们在三十年平常的和平发展时期所不能受到的丰富的政治教育。革命时期的几年，使得和平发展条件下几十年也无法使人看清楚的事情看清楚了。

革命揭示出：沙皇制度是人民的死敌，沙皇制度是只有坟墓才能使它伸直的驼背。

革命表明：自由资产阶级不想同人民联盟而想同沙皇联盟；自由资产阶级是反革命力量，同它妥协就等于背叛人民。

革命表明：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排除立宪民主党自由资产阶级，使农民摆脱它的影响，消灭地主，把革命进行到底，扫清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最后，革命表明：劳动农民虽然动摇，但毕竟是能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唯一的重要力量。

在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有两条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斗争着。布尔什维克采取扩展革命的方针，主张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制度，实现工人阶级领导权，孤立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同农民联盟，成立由工农代表组成的临时革命政

府，使革命达到胜利的结局。反之，孟什维克采取收缩革命的方针。他们所主张的是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而不是用起义推翻沙皇制度，是自由资产阶级领导权而不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同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联盟而不是同农民联盟，是召开国家杜马，把它作为全国“革命势力”的中心，而不是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于是孟什维克滚进了妥协主义泥潭，成了向工人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事实上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只有布尔什维克是党内和国内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可以理解，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意见分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已分裂成了两个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丝毫没有改变党内的实际状况，只是把党的形式上的统一保持下来并把它稍微巩固了一下。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朝着党的实际上的统一前进了一步，并且这种统一是在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下进行的。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运动时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妥协主义路线，赞同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于是大会再次证实了已由俄国第一次革命全部进程证实了的事情。

革命表明：布尔什维克善于在形势要求进攻时就去进攻；他们学会了在最前列进攻和引导人民进行冲击。但除此而外，革命还表明：布尔什维克也善于在形势不利、革命走向低落时有秩序地退却，布尔什维克学会了正确地退却，毫不慌张、毫不忙乱地退却，以求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在根据新的形势把队伍重新组织起来后再去向敌人进攻。

不善于正确地进攻，就不能战胜敌人。

不善于正确地退却，毫不慌张、毫不慌乱地退却，就不能在遭受失败时避免覆灭。

第四章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1908—1912年)

一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反政府阶层知识分子的蜕化。颓废情绪。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入马克思主义敌人营垒而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驳斥修正主义分子而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于是这天在历史上就称为六三政变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即第三届国家杜马选举法，从而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10月17日发表的宣言，因为这个宣言上说，沙皇政府必须经过杜马同意才能颁布新的法令。第二届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们被送去服苦役和终身流放。

新选举法使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人数大大增加，而使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人数减少了好几成。

第三届杜马按其成分是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杜马。在总共四百四十二个杜马代表席位中，右派（黑帮）占一百七十一席，十月党人和同他们相近的团体占一百一十三席，立宪民主党人和同他们相近的团体一百零一席，劳动派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十八席。

右派（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们在杜马开会时坐在右边议席上）所代表的是工农最凶恶的敌人，即黑帮农奴制地主（他们常常在镇压农民运动时鞭笞和枪杀大批农民，他们是蹂躏犹太人、殴打示威工人、在革命期间野蛮地焚烧群众集会场所的组织者）。右派主张用最残暴的手段镇压劳动群众，拥护沙皇的无限权力，反对1905年10月17日颁布的沙皇宣言。

在杜马里同右派接近的是十月党，或称“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党人所代表的是大工业资本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大地主的利益（1905年革命开始时，立宪民主党人中很大一部分大地主转到了十月党人方面）。十月党人同右派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承认——也只是口头上承认——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人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立宪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所占的议席，要比它在第一、第二两届杜马中所占的少，因为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地主的票已转到十月党人方面去了。

第三届杜马中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即所谓劳动派。劳动派在杜马中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民主派（布尔什维克）之间。列宁指出，虽然劳动派在杜马中十分软弱，但是他们代表着群众，代表着农民群众。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人和工人民主派之间，这是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必然产生的结果。列宁向布尔什维克代表即工人民主派提出了一个任务：“……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阵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5卷第486页)①

在1905年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以后，立宪民主党人愈来愈暴露出他们是一种反革命的力量。他们愈来愈抛弃自己的“民主”假面具，而表现为十足的保皇派，沙皇制度的维护者。1909年，一群著名的立宪民主党人著作家出版了一部《路标》文集，立宪民主党人在这部文集中代表资产阶级感谢沙皇镇压了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向沙皇的皮鞭绞架政府匍匐跪拜，直言不讳地写道：应该“为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即自由资产阶级）挡开人民的凶焰”。

沙皇政府在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和镇压了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之后，就来大力摧毁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苦役牢房、大狱和流放地关满了革命者。革命者在监狱里遭到毒打，受尽各种刑罚和折磨。黑帮的恐怖猖獗到极点。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几千个革命者惨遭杀害。当时一般人把绞架叫作“斯托雷平的领带”。

沙皇政府在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时候，不可能局限于高压手段，局限于讨伐队、枪毙、监禁和苦役。沙皇政府眼看农民轻信“沙皇老爹”的心理消失下去而惶恐不安，于是它就大耍手腕，打算培植一个人数众多的农村资产阶级即富农，作为自己在农村中的坚强支柱。

1906年11月9日，斯托雷平颁布了一道新的土地法令，允许农民退出公社而另立独立农庄。根据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公社土地使用制可以破坏。每个农民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可以退出公社。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份地，而他们从前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公社必须给每个退社农民分地，分的地必须在一个地

①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38页。——译者注

方(所谓独立农庄，独立田庄)。

富裕的农民——富农现在有了可能用贱价向力量单薄的农民收买土地。在该法令颁布后的几年间，有一百多万力量单薄的农民完全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富农独立农庄和独立田庄的数目靠掠夺力量单薄的农民的土地而增加起来。有时它们简直成了十足的大地产，在那里广泛采用雇佣劳动，即雇农劳动。政府强迫农民把公社中最好的土地分给富农庄主。

如果说从前在“解放”农民时掠夺农民土地的是地主，那末现在掠夺公社土地的便是富农，他们得到最好的地段，用贱价向贫农收买份地。

沙皇政府给富农发放大量贷款来收买土地和成立独立农庄。斯托雷平想把富农变成小地主，变成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卫士。

在九年(1906—1915年)内退出公社的农户，总共在二百万户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使少地的农民和农村贫民的状况更恶化了。农民中的分化加剧。农民开始同富农庄主发生冲突。

同时农民已经开始理解，只要存在着沙皇政府和地主与立宪民主党的国家杜马，他们就无法得到地主的土地。

起初，在另立独立农庄的现象盛行时期(1907—1909年)，农民运动有过低落，但是不久，到1910—1911年间以及较晚的时候，农民反对地主和富农庄主的运动就在公社社员同庄主发生冲突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了。

工业方面在革命以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集中的情况，即工业规模扩大和集中于愈来愈大的资本家集团手中的情况，大大加剧了。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资本家已开始联合起来成立同盟，以图在国内提高商品价格，把赚来的超额利润用作鼓励商品输出的基金，使商品可以输出到国外市场去贱价销售，夺取国外市

场。资本家的这种同盟，这种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就叫作托拉斯和辛迪加。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托拉斯和辛迪加的数量更多了。大银行数目也日渐增加，它们在工业中的作用愈益增长。流入俄国的外国资本有增无已。

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愈益变成垄断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了。

工业经过几年停滞以后又重新活跃起来：煤炭、金属和石油的产量提高了，纺织品和食糖的生产增长了。粮食的出口大大增加了。

虽然俄国当时在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但它同西欧相比仍然是个落后的国家，并且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当时俄国还不能生产机器和机床，它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当时俄国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化学工业，还不能生产矿质肥料。在武器制造方面，俄国也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落后。

列宁指出俄国金属消费很低是俄国落后的标志时写道：

“俄国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半世纪内，铁的消费增加了四倍，但是俄国依然还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贫穷和半野蛮的国家，它所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英国少四分之三，比德国少五分之四，比美国少十分之九。”（《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6卷第543页）^①

俄国经济政治落后的直接结果，就是俄国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本身都依赖于西欧资本主义。

这表现于俄国国民经济中如煤炭、石油、电器工业和冶金业等最重要的部门都操在外资手中，沙俄所用的机器和设备几乎全部要从国外输入。

这表现于重利盘剥的外债，沙皇政府每年要从人民身上榨取

^① 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87页。——译者注

几万万卢布来交付外债的利息。

这表现于与“盟国”缔结的许多秘密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政府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提供几百万俄国士兵到帝国主义战线上去支援“盟国”，以保证英法资本家获得骇人听闻的利润。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宪兵和警察，沙皇奸细和黑帮分子，用盗匪手段袭击工人阶级的现象特别流行。当时用高压手段来迫害工人的不仅有沙皇的鹰犬。工厂主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他们在工业停滞和失业人数增加的年代特别加紧向工人阶级进攻。工厂主宣布大批开除工人（同盟歇业），把积极参加罢工的觉悟工人列入“黑名单”。凡加入了本工业部门厂主同盟的企业，都拒绝雇用列入这种“黑名单”或“黑名单”的工人。计件工资标准在1908年降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日普遍延长到十至十二小时。抢劫式的罚款制度又盛行起来了。

1905年革命的失败，使革命同路人开始瓦解和蜕化。这种蜕化和颓废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厉害。同路人是在革命汹涌高涨时期从资产阶级方面跑进革命队伍的，他们一到反动时期就离开党了。其中一部分跑进了公开与革命为敌的阵营，另一部分则盘踞在保全下来的工人阶级合法团体中，竭力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道路，拼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威信。同路人离开革命竭力去迁就反动势力，想同沙皇制度和睦相处。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的失败，把那些贪生怕死和钻营私利的革命同路人招去替它当走狗，即替它当奸细。沙皇的保安局派遣到工人组织和党组织中去充当内奸的许多无耻叛徒，在内部进行特务活动，出卖革命者。

反革命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大举进攻。一大群时髦作家涌现出来，他们“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讥笑革命，赞美叛卖行为，借口“崇拜个性”而鼓吹淫乱。

在哲学方面“批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加剧了，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用冒牌“科学”论据作掩饰的宗教流派。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已成时髦。

这班老爷虽然牌号不同，但目的都一样：引诱群众离开革命。

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也浸染了颓废情绪和怀疑心理，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来也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站稳过。其中有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是1905年归附布尔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两人都是孟什维克）一类的著作家。他们从两方面同时展开“批评”，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即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批评与一般批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批评不是采取公开的直率的方式，而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为幌子，采用了暧昧的骗人的手法。他们说：我们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我们想把马克思主义“改善”一下，想使它摆脱某些基本原理的束缚。实际上，他们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在竭力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他们口头上伪善地否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并继续用两面派手法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伪善的批评非常危险，因为它是要欺骗党内普通工作人员，而且确实能把他们引入迷途。这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批评愈伪善，它对党也就愈危险，因为它同反动势力对党对革命的总进攻会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一部分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鼓吹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即所谓“寻神派”和“造神派”）。

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摆着一个极迫切的任务：必须给予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蜕化变节分子以应有的驳斥，撕破他们的假面具，把他们彻底揭穿，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

本来可以期望普列汉诺夫和他那些自命为“著名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的孟什维克朋友们把这一任务担负起来的。但他们却宁愿撰写几篇无足轻重的批评性小品文来敷衍一下，接着就溜之大吉了。

这个任务，是由列宁在他那本 1909 年出版的有名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完成的。

列宁在该书中写道：“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第一本是 1908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札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札罗夫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好象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勇敢的战士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着‘现代认识论’，引证着‘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3 卷第 11 页）^②

当卢那察尔斯基为他那些哲学上的修正主义者朋友们辩护，说“也许我们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的时候，列宁回答道：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编者注）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

① 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12—13 页。——译者注

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们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2页）^①

但事实上列宁这本书远远超出了这个谦虚的任务的范围。实际上，列宁这本书不仅对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巴札罗夫、瓦连廷诺夫及其哲学老师阿芬那留斯和马赫进行了批评，批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企图用精巧圆滑的唯心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时，列宁这本书还捍卫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了从恩格斯逝世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问世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科学方面、首先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最重大的和最主要的成果。

列宁在他这本书中狠狠地批评了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及其外国老师们之后，对哲学上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作出了如下几个批判性的结论：

（一）“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同上，第270页）^②；

（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走向唯心主义”（同上，第291页）^③；

（三）“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全都落到了唯心主义……的网里去了”（同上，第282页）^④；

（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7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64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353页。——译者注

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92页）^①；

（五）“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即排斥科学而崇尚信仰的反动分子。——编者注）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同上）^②；

（六）“哲学唯心主义是……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同上，第304页）^③。

为了评价列宁这本书在我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为了了解列宁在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蜕变变节分子时捍卫了多么巨大的理论财富，必须哪怕是简略地介绍一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其所以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而了解这个基础，就是说，掌握这个基础，是我们党的每个积极活动家应尽的义务。

那末：

（一）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呢？

（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

二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5页。——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同上，第715页。——译者注

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摈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摈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大家知道，费尔巴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译者注

哈虽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竭力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恩格斯屡次说过：费尔巴哈“虽然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在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2—654页）^①。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来，是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是：

（1）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依赖的各个对象或现象的偶然堆积，而是把它看作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现象互相有机地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现象，如果被孤立地、同周围现象没有联系地拿来看，那就无法理解，因为自然界的任何领域中的任何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条件没有联系、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反之，任何一种现象，如果把它看作是同周围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现象，那就可以理解、可以论证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和第229页。——译者注

(2)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在发展；有某种东西在破坏，在衰颓。

因此，辩证方法要求我们观察现象时不仅要从各个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角度去观察，而且要从它们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它们的发展的角度，从它们的产生和衰亡的角度去观察。

在辩证方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在辩证方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原始的活细胞。——编者注）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484页）^①

恩格斯说，因此，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上，第23页）^②。

(3)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看作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19—420页。——译者注

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循环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恩格斯说：“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23页）①

恩格斯在说明辩证的发展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写道：

“在物理学中……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或所承受的某一形式的运动的量在数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水的温度最初对它的液体状态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增加或减少，便会达到这样的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聚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水就会变为蒸汽或冰。…… 例如，必须有一定的最低强度的电流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一定的压力下都有其特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相当的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译者注

物理学的所谓常数(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点。——编者注)，大部分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名称，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变化)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该物体的状态的质的变化，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527—528页)^①

接着，恩格斯讲到化学时又说：

“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知道这一点……拿氧来说：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得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同上，第528页)^②

最后，恩格斯在批评杜林，批评这位大骂黑格尔而暗中又剽窃黑格尔关于从无感觉世界王国进到感觉的王国，从无机界王国进到有机生命王国，是向新状态的飞跃这一著名原理的杜林时写道：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例如在把水加热或冷却的时候，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因此，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同上，第45—46页)^③

(4)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它们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7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87—488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81页。——译者注

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活动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行的。

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263页）^①

其次：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301页）^②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

不难了解，把辩证方法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 1905 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其次。既然世界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和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没有什么私有制和剥削的“永恒原则”，没有什么农民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资本家的“永恒观念”。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正如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样。

这就是说，不要指靠已经不再发展的社会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要指靠正在发展的、有前途的阶层，即使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斗争的时期，俄国无产阶级同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个体农民比较起来，还是占极少数。但是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农民则是一个日趋瓦解的阶级。正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发展着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就指靠无产阶级。他们没有错，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后来从一个不大的力量发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的头等力量。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其次。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

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其次。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以上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观察社会生活，观察社会历史的情形。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那从根本上说来，它是同哲学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1）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意识”的体现，而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辩证方法所判明的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4卷第651页）^①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列宁《哲学笔记》俄文版第318页）^②

（2）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29页）^③

其次：

“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译者注

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2页）^①

马克思谈到物质和思维问题时说道：

“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同上，第302页）^②

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时写道：

“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意识、感觉、经验…… 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266—267页）^③

其次：

“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感觉的东西；物质是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 物质、自然界、存在、物理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心理的东西是第二性的。”（同上，第119—120页）^④

“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同上，第288页）^⑤

“脑是思想的器官。”（同上，第125页）^⑥

(3) 唯心主义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知识的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并且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译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4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2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146—147页。——译者注

⑤ 同上，第361页。——译者注

⑥ 同上，第153页。——译者注

反，它认为，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而只有还没有被认识、而将来科学和实践的力量会加以揭示和认识的东西。

恩格斯在批判康德和其他唯心主义者所谓世界不可认识和“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论点，坚持唯物主义关于我们的知识是可靠知识这一著名原理时写道：

“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创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330页）^①

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以及马赫的其他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222页。——译者注

信徒堕入信仰主义，列宁坚持唯物主义的著名原理，即我们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科学知识是可靠的；科学的规律是客观真理，列宁写道：

“现代信仰主义决不否认科学；它只否认科学的‘过分的奢望’，即科学想达到客观真理的奢望。如果客观真理存在着（如唯物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只有那在人类‘经验’中反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才能给我们提供客观真理，那末一切信仰主义就被完全否定了。”（《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3卷第102页）^①

简略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特征就是这样。

显而易见，把哲学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把这些原理应用到社会历史上去，应用到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上去，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末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社会生活、社会历史不再是一堆“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成为社会有规律的发展，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的实际活动不应该以“卓越人物”的善良愿望为基础，不应该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的要求为基础，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

其次。既然世界可以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以认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成果。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24页。——译者注

这就是说，尽管社会生活现象错综复杂，但是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准确的科学，能够拿社会发展规律来实际应用。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不应该以任何偶然动机为指南，而应该以社会发展规律、以这些规律中得出的实际结论为指南。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从关于人类美好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就是说，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意识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形成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源泉，产生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①的源泉，不应当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存在中去寻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所以有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奴隶占有制度下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在封建制度下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是一种，——那不能用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本身的“本性”和“属性”来解释，而要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的不同的社会物

^① 原文为“учреждение”，系指和一定的理论观点相适应的组织和机构。——译者注

质生活条件来解释。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①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要不陷入空想家的地位，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当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当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出发；不应当从“伟大人物”的善良愿望出发，而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

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空想派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他们陷入唯心主义，不是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上，而是不顾这种需要并且违反这种需要，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以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依据，任何时候也不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

但是，从马克思的话中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意义，它们不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因此马克思说：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卷第406页）^①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为着有可能去影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加速这些条件的发展，加速这些条件的改善，就应当依据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思想，这种理论和思想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因而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能动员他们，把他们组织成一支决心粉碎社会反动势力、为社会先进势力开辟道路的无产阶级党的大军。

“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所以垮台，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先进理论、先进思想有动员作用、组织作用和改造作用，他们陷入庸俗唯物主义，把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的作用看成几乎等于零，从而要党消极起来，无所作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它以正确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需要的先进理论为依据，把这种理论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并且把充分利用这种理论的动员力量、组织力量和改造力量，看作自己的职责。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来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

现在还要说明一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对于归根到底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和政治设施等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应该作怎样的了解？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究竟是什么，它们的特征究竟怎样？

首先，“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无疑包括社会所处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译者注

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怎样呢？地理环境是不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这是很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

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

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末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三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十八倍，比苏联高二十五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1)既然如此，那末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种力量就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就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鞋子、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要有这些物质资料，就必须生产它们，要生产它们，就需要有人们用来生产食品、衣服、鞋子、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生产工具，就需要善于生产这些工具，善于使用这些工具。

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

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

但是生产力还只是生产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一个方面，它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生产的另一个方面，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同自然界作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的，而是以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时候，在生产内部彼此建立这种或那种相互关系，即这种或那种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的合作和互助关系，可能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最后，也可能是在一种生产关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形式的过渡关系。可是，不管生产关系带有怎样的性质，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制度下，都同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生产的必要因素。

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①

可见，生产、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2)生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译者注

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人们利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得粗浅一些，过着不同方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下有另一种生产方式，在封建制度下又有一种生产方式，如此等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设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

或者说得粗浅一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怎样，人们的思想方式也就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这就是说，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关键，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社会的观点和思想中去寻求，而要到社会在每个特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到社会的经济中去寻求。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应当掌握生产发展规律的知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的时候，首先应当从生产发展的规律出发，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

(3)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所以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者延缓它的发展。而且必须指出：生产关系不能过分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并和这一增长相矛盾，因为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并且给生产力以发展余地的时候，生产力才能充分地发展。因此，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们迟早必须适合——也确实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不然，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会根本破坏，整个生产就会破裂，生产就会发生危机，生产力就会遭到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是两者冲突的例子，在那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同生产力的性质极不适合。这种不适合的结果，就是破坏生产力的经济危机，而这种不适合的情况本身是以破坏现存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性质的新生产关系为使命的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

反之，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①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

^①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合的问题，可参看斯大林后来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译者注

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所以，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必须怎样。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状况所回答的则是另一个问题：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且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

下面就是从古代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情景。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加工材料的金属工具进一步改良，过渡到冶铁风箱，过渡到陶器生产，与此相适应，手工业得到发展，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手工业生产以及后来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得到发展；从手工业生产工具过渡到机器，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机器工业；进而过渡到机器制，出现现代大机器工业，——这就是人类史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远不完备的情景。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发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发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发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变化和发展，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也相应地变化和发展。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有些同时用来防御猛兽的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这时人们拥有的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金属工具；这时，不知道畜牧业、也不知道农业的那种贫乏原始的狩猎经济，已经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以及这些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所代替；这时已经有可能在各个人之间和各部落之间交换产品，有可能把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资料确实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时已经有可能迫使大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并且把大多数人变为奴隶。这里社会一切成员在生产过程中的那种共同的自由的劳动没有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不劳动的奴隶主剥削的奴隶的强迫劳动。因此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也没有了。代替它的是私有制。这里，奴隶主是第一个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者。

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除了封建所有制以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

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的私有经济。这样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铁的冶炼和加工更进一步的改善，铁犁和织布机的推广，农业、种菜业、酿酒业和榨油业的继续发展，除手工业作坊以外工场手工业企业的出现，——这就是当时生产力状况的特征。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者在生产中能表现出某种主动性，愿意劳动，对劳动感兴趣。于是，封建主就抛弃奴隶，抛弃这种对劳动不感兴趣、完全没有主动性的工作者，宁愿利用农奴，因为农奴有自己的经济、自己的生产工具，具有为耕种土地并从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实物缴给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种劳动兴趣。

私有制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私自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因为雇佣工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为了不致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套上剥削的枷锁。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外，还存在着摆脱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这种私有制在初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手工业企业被用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用农民简陋的生产工具耕作的贵族庄园，被根据农艺学经营的、使用农业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所代替。

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工作者比闭塞无知的农奴更有文化、更加伶俐，能够懂得机器和正确地使用机器。因此，资本家宁愿利用摆脱农奴制羁绊、有相当文化程度来正确使用机器的雇佣工人。

可是，资本主义把生产力发展到巨大的规模以后，便陷入它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出日益增多的商品并且减低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使竞争尖锐化，使大批中小私有者破产，把他们变成无产者，缩小他们的购买力，因而使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并把千百万工人集合在大工厂内，这样就使生产过程具有社会性，因而破坏本身的基础，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不相容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在危机时期，资本家由于自己使居民群众遭受破产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不得不烧掉产品，销毁制成的商品，停止生产，破坏生产力；千百万居民则被迫失业挨饿，而这并不是由于商品不够，却是因为商品生产太多。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它同社会生产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孕育着革命，这个革命的使命就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这就是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

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

因此，生产力在这里以加快的速度发展着，因为适合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有这样发展的充分广阔的天地。

这就是人类史上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情景。

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的情况，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

马克思说：“劳动资料^①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马克思《资本论》1935年俄文版第1卷第121页）^②

其次：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③

①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是指生产工具。——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译者注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才是停滞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364页）^①

恩格斯在说明《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道：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为《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②

（4）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32页。——译者注

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设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跻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度地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因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编者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①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页)^②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由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到一定时期为止，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的。但这只是到一定时候为止，只是到已经产生和正在发展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时候为止。而在新生产力成熟以后，现存的生产关系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就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只有通过新兴阶级的自觉活动，只有通过这些阶级的暴力行动，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扫除。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新社会思想、新政治设施和新政权的巨大作用，它们的使命就是用暴力消灭旧生产关系。在新生产力同旧生产关系冲突的基础上，在社会新的经济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社会思想，新思想组织和动员群众，群众团结成为新的政治大军，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并且运用这个政权，以便用暴力消灭生产关系方面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于是，自发的发展过程让位给人们自觉的活动，和平的发展让位给暴力的变革，进化让位给革命。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宣言》1938年

① 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译者注

俄文版第 52 页)^①

其次：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同上，第 50 页）^②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资本论》193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603 页）^③

以下就是马克思在 1859 年为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天才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3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272 页。——译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56 页。——译者注

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选集》俄文版第1卷第269—270页）①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情形。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此就可看出，列宁打退修正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节分子的谋害尝试而为党捍卫了多么巨大的理论财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出现对我党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

党组织在反动年代进行工作，要比过去革命开展时期困难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译者注

多。党员人数锐减。党内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因害怕沙皇政府迫害而离开了党。

列宁指出，革命政党在这样的时候应当补习一下。在革命高涨时期，它们学习了怎样进攻；在反动时期，它们应当学习怎样正确地退却，怎样转入地下，怎样保存和巩固秘密党，怎样利用合法的机会，利用各种合法组织特别是群众组织来巩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

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有重新高涨的可能而仓皇退却，他们可耻地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想要取消、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秘密党。因此这样的孟什维克就被称为取消派。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同，他们深信最近几年革命会有新的高涨，认为党必须使群众作好准备去迎接这个新高涨。革命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解决。农民还没有获得地主土地，工人还没有获得八小时工作制，人民深恶痛绝的沙皇专制制度还没有推翻，而且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现在又把人民在1905年从它手里争得的一点点政治自由毁灭掉了。所以，产生1905年革命的种种原因仍然有效。因此，布尔什维克确信革命运动定会重新高涨，并为迎接它进行着准备，聚集着工人阶级的力量。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确信革命必然会重新高涨，还因为1905年革命使工人阶级学会了在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中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资本实行进攻的反动年代，工人决不会忘记他们在1905年所得到的这些教训。列宁当时引证了工人的来信，信上讲到厂主又在虐待和侮辱工人时说道：“你们等着吧，1905年又会到来的！”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政治目标，仍然同1905年一样，是要推翻沙皇制度，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个目标，继续向群众提出那

几个基本的革命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可是，党已不能采取 1905 年革命高涨时期那样的策略了。例如，党决不能在最近时期号召群众举行政治总罢工或武装起义，因为这时革命运动已经低落，工人阶级已非常疲惫，反动阶级已大大加强。党不能不考虑到新的形势。进攻的策略必须转变为防御的策略，即聚集力量的策略，使干部转入地下、在地下进行党的工作的策略，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人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的策略。

而布尔什维克也就巧妙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列宁写道：“我们在革命以前就进行了多年的工作。难怪人们把我们叫作坚如磐石的人。社会民主党人已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党，这个党决不会因第一次军事进攻遭到失败而颓丧，决不会张皇失措，决不会醉心于冒险行动。”（《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2 卷第 126 页）^①

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进行着斗争。但同时布尔什维克又认为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利用一切合法借口来维持和保存党同群众的联系，借以加强党的力量。

“这是我们党从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转到采取迂回的斗争方法，转到利用从保险基金会起到杜马讲坛止的所有一切合法机会的时期。这是我们在 1905 年革命中遭到失败后实行退却的时期。这个转变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新的斗争方法，以便聚集力量再去对沙皇制度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斯大林语，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35 年俄文版第 366—367 页）^②

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可以说是地下党组织的掩护物和联系群

① 见《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422 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319 页。——译者注

众的工具。布尔什维克为保持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合法的社会组织：疾病救济会、工人合作社、俱乐部、文化团体以及民众文化馆等。布尔什维克利用国家杜马讲坛来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并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由于保存了秘密的党组织，并且通过它领导了其他各种类型的政治工作，也就保证了党能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即准备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

布尔什维克在执行革命路线的时候，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时反对党内两种机会主义：既反对公开反党的取消派，又反对暗中反党的所谓召回派。

自从取消派这一机会主义派别开始出现时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同它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列宁指出，取消派是自由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列宁提议斥责了取消主义，即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孟什维克）企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而代之以一种不定形的团体，这种团体无论如何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甚至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来换取合法性”（《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128页）^①。

会议号召全党所有的组织坚决反对取消派的企图。

可是，孟什维克没有服从代表会议的这一决议，却日益滑到背叛革命而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的取消主义的道路上去。孟什维克日益公开地抛弃无产阶级党的革命纲领，抛弃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孟什维克想以抛弃党的纲领和策略为代价，换取沙皇政府准许公开的合法的冒牌“工人”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46页。——译者注

政党存在。孟什维克决定同斯托雷平制度妥协，迁就斯托雷平制度。所以取消派又被称为“斯托雷平工党”。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同革命的公开敌人，即由唐恩、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等人领导并获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其他孟什维克分子帮助的取消派进行斗争，同时又同暗藏的取消派，即用“左的”词句掩盖自己机会主义面目的召回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所谓召回派，是指一部分先前的布尔什维克，他们要求召回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主张根本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

1908年，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由此就有“召回派”这一名称。召回派组织了自己单独的团体（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和布勃诺夫等人），来开始进行反对列宁和列宁路线的斗争。召回派坚决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这样，他们就使工人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召回派使党脱离工人阶级，使党失去同非党群众的联系，想在地下组织里闭关自守，并使地下组织失去利用合法掩护物的可能而受到打击。召回派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里和通过国家杜马可以影响农民，可以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揭露立宪民主党人用欺骗手段引诱农民的政策。召回派阻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所以，召回派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力图取消利用合法团体的机会，并且在实际上放弃了对广大非党群众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放弃了革命工作。

1909年为讨论召回派的行为而召集的布尔什维克《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斥责了召回派。布尔什维克声明他们和召回派毫无共同之处，并把召回派从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开除出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都不过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遇到困难的时刻，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别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四 布尔什维克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的斗争。反党的八月联盟

当布尔什维克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坚定路线的时候，托洛茨基却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正是在这些年代，列宁称他为“犹大什克·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奥地利）组织了一个著作家集团，创办了一个“非派别的”而其实是孟什维克派的报纸。关于托洛茨基，列宁当时这样写道：“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②

后来，在1912年，托洛茨基组织了八月联盟，即所有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派别所结成的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盟。取消派和召回派也在这个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中联合起来了，这就证明他们是一路货。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派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取消主义立场。可是，托洛茨基却用中派主义，即用调和主义把自己的取消主义掩盖起来，硬说他是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是想使他们双方达到和解。列宁谈到这一点时说道，托洛茨基比公开的取消派更卑鄙、更有害，因为他欺骗工人说他是站在“派别之外”，其实他是完全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培植中派主义的主要集团。

斯大林同志写道：“中派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思想体系是迁就的思想体系，是在一个共同的党内使无产阶级利

① 犹大什克是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卑称。这里列宁借用它来称呼叛徒托洛茨基。
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1页。——译者注

益服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是和列宁主义相违背的、相对立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9版第379页）①

在这个时期，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事实上是暗藏的托洛茨基代理人，因为他们常常帮助他反对列宁。1910年1月，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其他暗藏的托洛茨基同盟者的帮助下，违反列宁意旨而召集了中央全会。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因有许多布尔什维克被捕而发生了变化，所以动摇分子有可能通过反列宁的决议。例如这次全会竟决定停办布尔什维克的《无产者报》，并拨款帮助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加米涅夫参加了托洛茨基报纸的编辑部，并和季诺维也夫一起力图把托洛茨基的报纸变成中央机关报。

只是由于列宁的坚持，中央一月全会才通过了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决议，但就在这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坚持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不把取消派明确点出来。

结果正如列宁所预见和警告的那样：只有布尔什维克才遵照中央全会的决议停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而孟什维克则继续出版他们那一派的取消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列宁的立场，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上发表了一篇专文。这篇文章谴责了托洛茨基主义帮凶们的行为，指出必须消除由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李可夫的叛卖行为而在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中所造成的不正常状态。该文还提出了后来由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实现了的迫切任务：召开全党代表会议，在俄国出版合法的党报和成立党的秘密的实际中心。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是根据完全拥护列宁主张的巴库委员会的决议写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2页。——译者注

成的。

为了同从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起到召回派和造神派止完全由反党分子组成的托洛茨基反党八月联盟相对抗，主张保存和巩固无产阶级秘密党的分子组成了一个护党联盟。参加这个联盟的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护党派。普列汉诺夫及其孟什维克护党派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坚持孟什维克立场，却坚决同八月联盟和取消派划清界限，并力求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列宁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提议，同普列汉诺夫成立了共同反对反党分子的暂时联盟，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盟对党有利，而对取消派却有致命的危险。

斯大林同志完全拥护这个联盟。他当时在流放地。斯大林同志从流放地写信给列宁说：

“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唯一正确的：（一）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真正符合俄国国内工作的利益，即把一切真正有党性的分子团结起来的利益；（二）这条路线，也只有这条路线，才能在孟克^①工人和取消派之间挖掘一道鸿沟，驱散并歼灭取消派，使合法组织赶快从取消派的挟持之下解放出来。”（《列宁斯大林文集》俄文版第1卷第529—530页）^②

由于把地下工作和合法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布尔什维克终于成了公开的工人组织中的重大力量。例如，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四个合法的代表大会，即民众大学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工厂医生代表大会和禁酒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团中就起过重大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合法的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获得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例如，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团在民

① 孟克是孟什维克的简称。——编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199页。——译者注

众大学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揭露了沙皇制度摧残一切文化活动的政策，并指出，不消灭沙皇制度，俄国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高涨。工人代表团在工厂医生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讲述了工人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并得出结论说，不推翻沙皇制度，就不可能真正举办工厂医疗事业。

布尔什维克把取消派从那些保全下来的合法组织中逐渐排挤出去。由于同普列汉诺夫护党派成立统一战线这种特殊的策略，布尔什维克夺得了许多工人孟什维克组织（如在维波尔格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等处）。

在这个困难时期，布尔什维克通过自己的工作做出了把合法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的典范。

五 1912 年召开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

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

同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以及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向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全体布尔什维克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使他们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其所以绝对必须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必须铲除党内那些分裂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派别，而且还因为必须把聚集工人阶级力量的工作进行到底，必须准备工人阶级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

可是，要实现这个任务，首先就必须把机会主义分子即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现在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谁都认为布尔什维克继续同孟什维克留在一个党内是绝对不可能了。由于孟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叛卖行为，由于他们企图取消无产阶级政党而组织一个改

良主义新党，布尔什维克同他们的决裂成了必不可免的事情。当布尔什维克还同孟什维克留在一个党里时，他们对孟什维克的行为总要担负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可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如果不背叛党和工人阶级，就绝对不能再替孟什维克的公开叛卖行为担负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在一个党的范围内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就变成了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背叛。因此，必须把同孟什维克的实际上的决裂贯彻到底，直到在组织上同他们正式决裂，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只有这样做，才能重新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阶级组织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

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被孟什维克破坏了的党的真正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建立起来。

这个任务应由布尔什维克筹备召开的第六次全党代表会议来完成。

但这个任务还只是事情的一面。同孟什维克正式决裂，使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还摆着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当时的任务不仅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而正式形成为独立的党，而且首先在于同孟什维克决裂后建立一个新的党，即建立一个与通常那种西方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清除了机会主义分子的、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的新型的党。

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所有一切孟什维克，不分色彩，从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丁诺夫起，到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始终不渝地使用着他们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武库中搬来的武器。他们希望在俄国也有一个象德国或法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党。他们之所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布尔什维克是一种新的、不寻常的、异于西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当时西方各国社会民

主党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们是一种混合物，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分子，也有机会主义分子；既有革命的朋友，也有革命的敌人；既有拥护党性的人，也有反对党性的人，并且前者在思想上逐渐同后者调和，前者在实际上逐渐向后者屈服。为什么要同机会主义分子，同革命叛徒调和呢？——布尔什维克问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党内和平”，为了“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布尔什维克。同谁统一呢，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吗？是的，是同机会主义分子统一，——他们这样回答。很明显，这样的党决不能成为革命的党。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看见，从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开始由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蜕化成为主张“社会改良”的党，其中每一个党，作为一个组织来说，都已由领导力量变成了自己议会党团的附属品。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这样的党对无产阶级不会有好处，这样的党决不能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

布尔什维克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党，而是另一种党，即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它对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不调和态度和对资产阶级采取革命态度；它团结紧密而坚如磐石；它是主张社会革命的党，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布尔什维克想在俄国建立的正是这样的新的党。而布尔什维克当时正是在建立和准备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同“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召回派、各色各样唯心主义者直至经验批判主义者作斗争的全部历史，就是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历史。布尔什维克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可供一切想要建立真正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人们效法的党。布尔什维克从旧《火星报》时期起就在准备建立这样的党了。他们坚持到底、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地准备着。在这一准备工作中起了基本和决定作用

的，是列宁的《怎么办？》《两种策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思想上的准备。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组织上的准备。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准备。最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这样一个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可以确有把握地说，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政治集团是象布尔什维克集团这样经过认真准备才形成为一个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党是一件完全准备好了的、完全成熟了的事情。

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的任务，就是要以驱逐孟什维克和宣告新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形成的手续来完成这件已经准备好了的事情。

党的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于1912年1月在布拉格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党组织的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具有党代表大会的意义。

会议的通报报道了原被破坏的党中央机关已经恢复、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的消息，指出反动年代是党从俄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为一定的组织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受到种种迫害，尽管受到来自外部的沉重打击，尽管经历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背叛和动摇，无产阶级的党终于保持了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组织。

会议的通报说：“保全下来的不仅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纲领和革命传统，而且还有它的组织。迫害手段虽能破坏和削弱这个组织，但是任何迫害都不能把它彻底消灭。”^①

会议指出了俄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征兆和党的工作活跃起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342页。——译者注

来的事实。

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报告之后确认：“在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在为巩固当地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组织和小组积极进行工作。”^①

会议指出，各地都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在退却时期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把秘密工作同党在各种合法工人社团中的合法工作结合起来。

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两同志是缺席选进中央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地。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加里宁同志。

当时成立了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实际中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斯大林同志负责主持。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除斯大林同志外，还有雅·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潘达梁、谢·奥尔忠尼启泽和米·加里宁等同志。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过去反对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作了一个总结，并决定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就正式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独立存在。

布尔什维克既已在思想上组织上打垮了孟什维克，把他们驱逐出党，就给自己保存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面旧有的党旗。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到 1918 年都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括号标明：“布尔什维克”。

1912 年初，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结果时写道：

“不管取消派混蛋们怎样捣乱，我们终于把党和它的中央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分册第 348 页。——译者注

委员会恢复起来了。我想您会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高兴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9卷第19页）^①

斯大林同志在评价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意义时说道：

“这次代表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划清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界限，把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成了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俄文版第361—362页）^②

从孟什维克被驱逐而布尔什维克正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变得更坚强更有力了。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这就是与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之一。第二国际各国党口头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实际上却容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公开的机会主义分子留在自己队伍中间，让他们瓦解、断送第二国际。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从无产阶级党身上不断清除机会主义的污泥浊水，结果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的党，即后来取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党。

如果在无产阶级党队伍里留下了机会主义分子，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走上康庄大道并引导无产阶级前进，就不可能取得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成为国内战争的胜利者，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布拉格代表会议在它的决议中提出了如下的最低纲领作为党在当前的主要政治口号：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

在这些革命口号下，布尔什维克进行了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

①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1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0页。——译者注

在这些口号下，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在1912—1914年重新高涨起来。

简短的结论

1908—1912年，是革命工作最困难的时期。在革命失败以后，在革命运动低落和群众感到疲惫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从直接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转到用迂回方法进行这一斗争。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的艰苦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为保持自己同群众的联系而利用了甚至极小的合法机会（从保险基金会和工会起到杜马讲坛止）。布尔什维克始终不懈地聚集着力量去迎接革命运动的新高涨。

在革命遭到失败、反政府派别分崩离析、脱离了党的知识分子（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对革命失望并对党的理论基础加紧进行修正主义袭击的艰苦环境中，布尔什维克表明，党内只有它这支力量没有卷起党的旗帜，而仍然忠于党的纲领，并打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者”的攻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锻炼和对革命前途的明确认识，帮助了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核心来捍卫党和党的革命原则。列宁这样评论布尔什维克：“难怪人们把我们叫作坚如磐石的人。”^①

孟什维克在这个时期愈来愈离开革命。他们演变成为取消派，要求取消、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秘密党，他们愈来愈公开地抛弃党的纲领，抛弃党的革命任务和口号，企图自己另组织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即工人所称的“斯托雷平工党”。托洛茨基支持取消派，

^① 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2页。——译者注

但他假装维护“党的统一”，实际上是同取消派统一。

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不了解当时必须采取新的迂回的斗争方法去反对沙皇制度，却要求党拒绝利用合法机会，要求党召回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人代表。召回派促使党脱离群众，阻碍党聚集力量去迎接革命的新高涨。召回派用“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其实他们也和取消派一样拒绝进行革命斗争。

取消派和召回派结合成为一个反对列宁的总联盟，即由托洛茨基组织起来的八月联盟。

布尔什维克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在反对八月联盟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成功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秘密党。

✓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举行的代表会议（1912年1月）。这次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永远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形式上联合在一个党内的局面。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正式形成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创立了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机会主义分子即孟什维克从无产阶级党里清除出去，对于党和革命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决定的意义。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把背叛工人事业的妥协派即孟什维克驱逐出党，无产阶级党在1917年就不可能发动群众去夺取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 战争前工人运动高涨年代

(1912—1914年)

一 1912—1914年间革命运动的高涨

斯托雷平实行反动，得势并不长久。一个除了皮鞭和绞架而外不愿给人民任何东西的政府，本来是不可能稳固的。高压手段已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再也不能恐吓人民了。工人在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所产生的疲倦心理开始消失。工人又重新奋起斗争了。布尔什维克断定革命必然会重新高涨的预见已被证实。1911年，罢工人数已超过十万，而在过去几年内每年罢工人数却不过五六万。1912年1月举行的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已指出工人运动开始活跃的事实。但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是在1912年4—5月间由于连纳工人惨遭枪杀而爆发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时候开始的。

1912年4月4日，在西伯利亚连纳金矿举行罢工时，沙皇的宪兵队长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工人五百多。听说一群手无寸铁、和平前去同资方进行谈判的连纳矿工遭到枪杀，全国都沸腾起来了。沙皇专制政府干下这次新的血腥暴行，是为了摧毁矿工的经济罢工，以讨好连纳金矿老板英国资本家。英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俄国股东靠极无耻地剥削工人，从连纳金矿每年取得七百多万卢布的骇人听闻的利润。他们付给工人极低的工资，供给工人不能食用的、腐

烂变质的食品。连纳金矿的六千矿工不堪忍受这种欺压与凌辱而举行了罢工。

连纳枪杀事件发生后，无产阶级在彼得堡、莫斯科以及所有工业中心和工业地区举行了群众性罢工、游行示威和集会以示抗议。

有几个企业的工人在共同通过的决议上写道：“我们万分震惊，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抗议，都不能表达我们每个人的沸腾心情于万一。对于我们，无论眼泪或抗议都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有组织的群众斗争。”

当沙皇大臣马卡罗夫回答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国家杜马中对连纳枪杀事件提出的质询而蛮横声言，说“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的时候，工人更加怒不可遏了。参加抗议血腥屠杀连纳工人的政治罢工的人数，增加到三十万。

连纳事件象飓风一样冲破了斯托雷平制度所造成的“沉静”气氛。

斯大林同志 1912 年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明星报》上谈到这点时写道：

“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 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在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①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企图埋葬革命，这是枉费心机。连纳事件表明革命力量仍然活着，工人阶级中积聚了巨大的革命能量。1912 年的五一罢工大约有四十万工人参加，罢工带有鲜明的政治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2 卷第 232 页。——译者注

性质，它提出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口号，即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一切地主土地。这三大口号是要把广大的工人以及广大的农民和士兵都团结起来，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的冲击。

列宁在《革命的高涨》一文中写道：“全俄无产阶级的轰轰烈烈的五月罢工，以及与罢工相连的游行示威、革命宣言和向工人群众发表的革命演说，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15卷第533页）^①

取消派被工人的革命行动弄得惊惶失措，竟出来反对罢工斗争，称它为“罢工狂”。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想用“请愿运动”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劝工人在要求“权利”（要求取消对结社、罢工等的限制）的“请愿书”上签名，以便把它递交国家杜马。但取消派只征集到一千三百人签名，而团结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革命口号周围的工人却有几十万。

工人阶级是循着布尔什维克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当时国内的经济情况有如下述。

还在1910年，工业停滞已由主要工业部门生产的活跃和扩大所代替。生铁冶炼量在1910年为一亿八千六百万普特，1912年为二亿五千六百万普特，而到1913年已增至二亿八千三百万普特。煤炭开采量在1910年为十五亿二千二百万普特，而1913年已达到二十二亿一千四百万普特。

在资本主义工业增长的同时，无产阶级也迅速增长起来。当时工业发展的特点，就是生产进一步集中于大企业和最大企业。1901年，在有五百名以上工人的大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四十六点七，而1910年在这种企业里做工的工人已达工人

^① 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88页。——译者注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左右，即占全体工人一半以上。工业集中的这种速度是空前的。甚至在北美这样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里，当时在大企业中做工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左右。

无产阶级的增长和集中于大企业，是在存在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的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就使俄国工人阶级变成了全国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力量。企业中对工人实行的野蛮剥削方式，再加上沙皇鹰犬横行这种不堪忍受的警察制度，就使每次重大的罢工都具有政治性质。同时，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群众罢工具有特别巨大的革命力量。

走在工人革命运动前头的是英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继彼得堡之后是波罗的海沿岸边区、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然后是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南部地区。1913年，运动已扩展到西部边区、波兰和高加索。1912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七十二万五千，而据其他比较完备的统计在百万以上；1913年罢工人数，据官方统计是八十六万一千，而据比较完备的统计是一百二十七万二千。1914年上半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一百五十万左右。

这样，1912—1914年间革命的高涨，即罢工运动的规模，已使全国接近于1905年革命开始时的局势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群众性罢工具有全民的意义。它的目标是反对专制制度。罢工斗争得到了绝大多数劳动居民的同情。工厂主用同盟歇业来报复工人的罢工。1913年，莫斯科省资本家解雇了五万纺织工人。1914年3月，彼得堡在一天内就有七万工人被解雇。其他企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用群众性募捐，有时则用支持性罢工来支援举行罢工的和受到同盟歇业打击的同志。

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群众性的罢工唤起了农民群众，把他们也卷进了斗争。农民再次挺身起来反对地主，捣毁地主的庄园和富农的独立农庄。在1910—1914年间，总共发生了一万三千多次农

民发动。

军队中的革命发动也开始了。1912年在土尔克斯坦驻军中发生了武装发动；在波罗的海舰队和塞瓦斯托波尔酝酿着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革命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表明，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是为了局部的要求，不是为了“改良”，而是为了把人民从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俄国在走向新的革命。

列宁为了更接近俄国，于1912年夏从巴黎迁到加里西亚（原属奥地利）。在这里由列宁主持开过两次中央委员和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一次是1912年底在克拉科夫举行，另一次是1913年秋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波罗宁诺镇举行。这两次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关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的决议：关于革命高潮，关于罢工和党的任务，关于巩固秘密组织，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关于党的报刊，关于保险运动。

二 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第四届 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真理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用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和扩大对群众的影响的强大武器。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由斯大林、奥里明斯基和波列塔也夫发起创办的。群众性的工人报纸《真理报》随着革命运动的新高涨而诞生。1912年4月22日（5月5日），《真理报》创刊号出版了。这是工人的真正的节日。为了纪念《真理报》的诞生，决定5月5日为工人出版节。

还在《真理报》创办以前，已出版了专供先进工人阅读的布尔什维克周报《明星报》。《明星报》在连纳事件时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登载过列宁和斯大林动员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许多战斗性政论文章。但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周报已不能满足布尔什维克

党的需要了。必须出版一种供最广大的工人阶层阅读的群众性的政治日报。《真理报》就是这样的报纸。

在这个时期，《真理报》的作用是特别巨大的。《真理报》争取了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站到布尔什维主义方面来。《真理报》经常受到警察迫害，遭到罚款，为登载书报检查机关所不喜欢的文章和通讯而被没收，它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存在，完全是靠了数以万计的先进工人的积极支持。《真理报》能够交付巨额罚款，完全是靠了工人的踊跃捐款。被没收的每一号《真理报》，往往仍有相当多的份数能够到达读者手中，因为先进工人半夜就来到印刷厂，把一捆一捆的报纸取走。

沙皇政府在两年半内把《真理报》查封过八次，但《真理报》每次都在工人援助下又用一种新的类似的名称，如《拥护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劳动的真理》等等，重新出版。

当时《真理报》每天平均销售四万份，而孟什维克的日报《光线报》每天印数不超过一万五六千份。

工人认为《真理报》是工人自己的报纸，对它非常信任，敏感地注视着它发表的意见。每份《真理报》都是辗转传阅，给几十个读者看，培养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号召他们进行斗争。

《真理报》上都讲些什么呢？

每一号《真理报》都刊载有几十篇工人通讯，叙述工人的生活情况、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资本家及其管事和工头们对工人的种种压迫和侮辱。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揭露。《真理报》的简讯常常报导饥饿的失业工人因找工作无望而自杀的消息。

《真理报》经常反映各个工厂和各个工业部门工人的疾苦和要求，叙述工人怎样为自己的要求进行斗争。几乎每一号都载有各

个企业罢工的消息。每当发生了大规模的持久的罢工，《真理报》就组织其他企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募捐援助罢工者。募得的罢工基金有时达几万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因为要知道，当时大多数工人每天的收入只有七八十个戈比。这种做法培养了工人的无产阶级团结精神，使他们意识到全体工人利益的一致。

每当听到发生了政治事件，每当听到胜利或失败的消息，工人都要把信件、贺词或抗议书等寄给《真理报》。《真理报》在自己的文章中，用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观点阐明工人运动的任务。一个合法的报纸是不可能直接号召推翻沙皇制度的。它只能暗示。但觉悟的工人能够很好地领会，并把暗示的意思解释给群众。例如，当《真理报》说到“1905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时，工人们就懂得这是指布尔什维克的几个革命口号，即推翻沙皇制度，成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真理报》在第四届杜马选举前夜组织了先进工人。它揭露了孟什维克主张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主张成立“斯托雷平工党”的叛徒立场。《真理报》号召工人投票选举坚持“1905年的不折不扣的要求”的人，即选举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选举是多级的。先在工人大会上选出初选代表，再由初选代表选出复选代表，然后复选代表参加杜马工人代表的选举。在选举那天，《真理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复选代表的候选名单，号召工人投票选举他们。为了使预定的候选人不致遭到被捕的危险，这种名单是不能预先公布的。

《真理报》帮助了组织无产阶级的发动。当1914年春彼得堡大规模举行同盟歇业，以致不宜宣布群众性罢工的时候，《真理报》就号召工人采取其他的斗争方式，例如在工厂开群众大会、上街游行示威。当时在报纸上不能公开这样讲。但觉悟的工人一读列宁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这一不惹人注意的标题所写的一篇文章，

就懂得了号召的意思，因为文章上说目前必须用工人运动的更高级的形式来代替罢工，意思就是号召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革命活动就是这样同通过《真理报》对工人群众进行的合法的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结合起来的。

《真理报》不仅报道了工人的生活、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同时《真理报》还系统说明了农民的生活、农民的饥饿痛苦、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斯托雷平“改革”后农民的好地被富农庄主攫为己有的情况。《真理报》使觉悟工人看到，农村中积蓄了大量的易燃物。《真理报》教导无产阶级说，1905年革命的任务并没有解决，新的革命即将到来。《真理报》教导说，无产阶级在这第二次革命中应当成为人民的真正的领袖和领导者，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将有革命的农民这样强有力同盟者。

孟什维克竭力想使无产阶级抛弃革命念头。他们劝告工人说：你们别去考虑什么人民，什么农民的饥饿痛苦，什么黑帮农奴制地主的统治，你们应当一心争取“结社自由”，向沙皇政府呈递这样的“请愿书”。布尔什维克向工人解释说：孟什维克这种放弃革命和放弃同农民联合的宣传，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工人只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做自己的同盟者，就一定能战胜沙皇制度；象孟什维克这种恶劣的牧师，应当作为革命的敌人一脚踢开。

《真理报》在“农民生活”栏内讲了些什么呢？

我们从1913年的通讯中举出几篇作例子。

来自萨马拉的一篇标题为《一个土地案件》的通讯说：布古尔玛县诺沃哈兹布拉特村有四十五个农民被控，罪名是说，在把公社土地划给独立田庄主时，他们反抗过土地丈量官。很大一部分被控农民都被判处长期徒刑。

普斯科夫省的一篇简讯说：“普西茨村（札瓦利耶车站附近）农民对乡丁实行了武装反抗。有人受伤。冲突的原因是土地纠纷。

乡丁已往普西茨村集结，副省长和检察长已前往视察。”

乌发省的通讯说农民在出卖份地，说饥荒和退社的法令加速了农民丧失土地的过程。例如波利索夫卡村有二十七户农民，共有五百四十三俄亩耕地。饥荒发生时，有五户永远变卖了三十一俄亩土地，每俄亩卖价是二十五至三十三卢布，但土地实际价值比这贵两三倍。村里还有七户抵押了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每俄亩押了十八至二十卢布，期限六年，年息百分之十二。如果注意到居民贫困和利率极高的情况，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一百七十七俄亩土地中有一半要落到高利贷者手中，因为债户当中未必有一半在六年内能够偿清这样大的一笔数目。

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俄国地主的大地产和农民的小地产》一文中，清楚地向工人和农民指明有多大一笔地产握在地主寄生虫手中。仅仅三万个大地主就占有土地约七千万俄亩，而一千万农户总共也只有这样多土地。每个大地主平均占有土地二千三百俄亩，而农民，连富农在内，每户平均不过七俄亩，而且其中五百万力量单薄的农户，即全体农户的半数，每户不过一二俄亩。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农民遭受贫困和饥饿，根源在于存在着地主的大地产即农奴制的残余，农民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摆脱这种残余。

《真理报》经过那些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深入到农村中去，唤起先进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在创办《真理报》时期，各个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但杜马党团、报刊、保险基金会和工会等合法组织形式还没有完全从孟什维克手中夺取过来。为了把取消派从工人阶级的合法组织中驱逐出去，布尔什维克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由于有《真理报》的努力而胜利完成了。

《真理报》是为保护党性、为重建群众性工人革命政党而斗争

的核心。《真理报》把合法组织团结到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基地周围，把工人运动指向一个确定的目标，即准备革命。

《真理报》拥有大量的工人通讯员。它在一年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但《真理报》不仅通过来信来稿同工人群众保持联系。每天都有很多工人从企业来到编辑部。《真理报》编辑部担负了很大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地方党支部代表常到这里来接头。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报都往这里送。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都从这里转发。

由于布尔什维克为重建群众性革命工人政党同取消派进行了两年半顽强的斗争，到1914年夏天，俄国积极的工人已有五分之四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真理派”的策略。举一件事就可以说明。1914年捐款支持工人报纸的七千个工人团体中，有五千六百个团体捐给布尔什维克报刊，而捐给孟什维克报刊的只有一千四百个团体。但孟什维克在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有钱的朋友”，他们供给了孟什维克报纸所需资金的一半以上。

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随着《真理报》成长起来了一整代革命的无产阶级，正是这一代人后来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真理报》受到几万以至几十万工人的拥护。革命高涨年代（1912—1914年）给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皇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采取的任何迫害都没能把这一基础摧毁。

“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斯大林）^①

党的另一个全俄合法机关，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04页。——译者注

克党团。

1912年，政府宣布举行第四届杜马选举。我们党对于参加这次选举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和《真理报》是全俄范围的两大合法据点，布尔什维克党就是通过这两个据点在群众中进行自己的革命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带着自己的口号独立参加杜马选举，并对各个政府党和自由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同时给以打击。布尔什维克进行这次选举运动的口号是：成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

第四届杜马选举在1912年秋天举行。10月初，政府因对彼得堡选举进程不满意，企图侵犯许多大厂工人的选举权。我们党的彼得堡委员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议，号召各大企业的工人罢工一天作为回答。政府陷于困境只好让步，于是工人在选举大会上有了可能选举他们愿意选举的人。绝大多数工人在表决时都赞成斯大林同志所拟定的给初选代表和杜马代表的《委托书》。《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提到了1905年没有解决的任务。

《委托书》上说：“……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1905年更加深入。……这一运动的先锋，也象1905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国解放事业休戚相关的多灾多难的农民。”^①

《委托书》上说，必将到来的人民发动必定是采取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形式，既要反对沙皇政府，又要反对同沙皇制度谋求妥协的自由资产阶级。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5—246页。——译者注

列宁对号召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这个《委托书》极为重视。工人们纷纷通过决议来响应这个号召。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巴达也夫同志由彼得堡工人选进了杜马。

工人选举杜马代表是同其他居民阶层分开进行的（即所谓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团选出的九名代表中，六名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即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沙果夫和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奸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至少拥有工人阶级人数五分之四的各大工业中心选出的。但几个取消派不是工人选出的，即不是工人选民团选出的。因此在杜马里是七名取消派对六名布尔什维克。起初，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在杜马里组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但因取消派阻碍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工作，所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后，于1913年10月遵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指示退出了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成立了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常在杜马里发表揭露专制制度的革命演说，并就工人遭到迫害和遭到资本家残酷剥削的事件向政府提出质询。

他们在杜马里还就土地问题发表演说，号召农民同农奴制地主作斗争，揭露立宪民主党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和把土地交给农民。

布尔什维克向国家杜马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法案，这个法案当然没有被黑帮杜马通过，但它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同党中央、同列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从列宁那里得到指示。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时直接领导过这个党团。

布尔什维克代表没有局限于在杜马内部进行工作，他们还在

杜马外开展了大量活动。他们时常巡视各个工厂，到全国各工人中心去作报告，召集秘密会议来解释党的决议，成立新的党组织。代表们巧妙地把合法活动同秘密的地下工作结合起来。

三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的 胜利。革命运动的继续增长。 帝国主义战争前夜

在这个时期，布尔什维克党作出了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的范例。它建立地下组织。它印发秘密传单。它在群众中进行秘密的革命工作。同时，它还愈来愈多地夺得工人阶级的各种合法组织。党竭力争取工会、民众文化馆、夜大学、俱乐部和保险机关。这些合法组织向来是取消派分子的藏身处所。布尔什维克为把这些合法团体变成我们党的据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巧妙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终于把两个首都的大多数工会组织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布尔什维克在1913年选举彼得堡五金工会理事会时获得了特别辉煌的胜利：在三千五金工人的大会上，只有一百五十人投取消派的票。

象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样一个合法组织，它的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孟什维克在杜马中有七名代表，布尔什维克只有六名代表，但孟什维克的七人小组主要是来自非工人地区，所代表的还不到工人阶级的五分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六人小组则是来自国内各个主要工业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代表着全国工人阶级五分之四以上。工人认为自己的代表是六人小组（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基等），而不是七人小组。

布尔什维克所以能争取到各种合法组织，是因为他们不管沙皇政府怎样野蛮迫害，不管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怎样造谣中伤，始终保持了秘密的党和自己队伍的坚强的纪律，坚定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工人运动的敌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这样，布尔什维克就在合法组织中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孟什维克在这些组织中遭到了全面的失败。无论在杜马讲坛上进行鼓动方面，还是在工人报刊和其他合法组织中，孟什维克都被排挤到后面去了。卷入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确定不移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而抛开了孟什维克。

此外，孟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也遭到了破产。俄国各边沿地区发生的革命运动，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民族问题纲领。但孟什维克除了崩得提出的那个谁也不会满意的“文化自治”外，提不出任何纲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纲领，斯大林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以及列宁的文章《论民族自决权》和《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阐述了这个纲领。

毫不奇怪，在孟什维主义遭到这样的失败之后，八月联盟便摇摇欲坠了。这个由各色各样分子组成的联盟，经不起布尔什维克一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为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成立的八月联盟，很快就被布尔什维克打垮了。首先退出联盟的是前进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接着退出的是拉脱维亚人，然后剩下的人也散了伙。

取消派在同布尔什维克斗争中遭到失败后，就向第二国际求援。于是第二国际就来援助他们。第二国际借口要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和好”，借口建立“党内和平”，要求布尔什维克停止批评取消派的妥协主义政策。但布尔什维克决不调和；他们拒绝服从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的决议，寸步也不让。

布尔什维克在合法组织中获得胜利，不是也不可能偶然的。其所以不是偶然的，不仅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的纲领和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其所以不是偶然的，还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反映了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革命工人运动一天天扩展，席卷了一批批新的城市和地区。1914年到来后，工人的罢工不仅没有逐渐平静下去，反而更加强烈地开展起来。罢工更加顽强持久，卷入罢工的工人也日益增多。1月9日有二十五万工人举行罢工，其中彼得堡有十四万。5月1日罢工人数超过了五十万，其中彼得堡有二十五万多。工人在这些罢工中表现得非常坚定。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的罢工持续了两个多月，列斯涅尔工厂的罢工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彼得堡许多企业大批工人中毒的事件，激起了十一万五千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又转为游行示威。运动继续发展着。1914年上半年（包括7月初），罢工的工人共有一百四十二万五千人。

5月间，巴库石油工业工人举行总罢工，引起了俄国全体无产阶级的密切注意。罢工进行得很有组织。6月20日，巴库有两万工人游行示威。警察用残酷手段对付巴库工人。为了抗议警察暴行并声援巴库工人，莫斯科开始举行罢工，接着罢工扩展到其他许多地区。

7月3日，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为响应巴库罢工而举行了群众大会。警察向工人开枪。彼得堡无产阶级义愤填膺。7月4日，彼得堡九万工人响应党的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举行罢工以示抗议，7月7日罢工人数是十三万，7月8日达到了十五万，7月11日达到了二十万。

各个工厂都卷入了风潮，到处都在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事情发展到构筑街垒。巴库和洛兹也构筑了街垒。在许多地方，

警察向工人开枪。政府采取了“非常”手段来镇压运动，首都变成了军营，《真理报》被查封。

但这时出现了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一个国际性的新因素，结果把事变进程改变了。正当彼得堡七月革命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总统彭加勒来到彼得堡，同沙皇谈判当前战争开始的问题。过了几天，德国就向俄国宣战了。沙皇政府利用战争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组织和镇压工人运动。革命的高涨因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而沙皇政府正是想从这次战争中找到摆脱革命的出路。

简短的结论

在革命新高涨年代(1912—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工人运动，并在布尔什维克口号下把它引向新的革命。党巧妙地把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党摧毁了取消派及其朋友托洛茨基派和召回派的反抗，因而掌握了各种形式的合法运动，并把合法组织变成了自己革命工作的据点。

党在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作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自己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广泛地利用了杜马讲坛来进行革命鼓动，并创办了出色的群众性的工人报纸《真理报》，因而造就了新一代的革命工人，即真理派。这个工人阶层在帝国主义战争年代始终忠于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他们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的核心。

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党领导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发动。这是一种前卫战斗，它被帝国主义战争打断了（但三年后它又恢复起来，把沙皇制度推翻了）。布尔什维克党高举着飘扬招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进入了帝国主义战争这一艰苦的阶段。

第六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战争 时期。俄国第二次革命

(1914年—1917年3月)

一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和起因

1914年7月14日(27日)，沙皇政府宣布总动员。7月19日(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

俄国加入了战争了。

在战争开始以前很久，列宁、布尔什维克早已预见到战争不可避免。列宁在几次社会党人国际代表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提议确定社会党人在战争爆发时所应采取的革命行动路线。

列宁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抢劫他国领土，侵占和掠夺殖民地，夺取新的市场，这些已经不止一次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侵略战争的原因。战争也如剥削工人阶级一样，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种自然和当然的事情。

尤其是当资本主义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全发展到它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即发展成帝国主义的时候，战争更是不可避免的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资本家联合组织(垄断组织)和银行已在资本主义各国生活中起着决定的作用。金融资本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宰。金融资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侵占新的殖民地，需要新的资本输出场所，需要新的原料产地。

但到十九世纪末，地球上的全部领土都已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完毕。加以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是极不平衡和跳跃式的：从前居第一位的国家现在工业发展得比较慢，而从前落后的国家却迅速地跳跃前进，赶上并超过它们。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趋向。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使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1914年的战争就是重新分割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已久的。发动这次战争的祸首是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者。

特别努力准备了这次战争的，一方面是德国和奥地利，另一方面是英法和依赖于它们的俄国。1907年成立了三国协定（或称协约），即英法俄三国联盟。组成另一帝国主义联盟的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但意大利在1914年战争开始时退出了这个联盟，随后便加入了协约国。支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德国准备帝国主义战争，是要从英法两国手中夺取殖民地，从俄国手中夺取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德国建筑了巴格达铁路，威胁到英国在近东的统治。英国害怕德国海上军备的增长。

沙俄力图分割土耳其，想要侵占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峡（例如达达尼尔海峡），想要夺取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还打算夺取奥匈帝国的加里西亚。

英国力图通过战争打败它的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因为战前德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日益排挤英国商品。此外，英国还打算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并在埃及站稳脚跟。

法国资本家力图从德国手中夺取盛产煤铁的萨尔矿区，以及在1870—1871年战争时德国从法国手中占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区。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的最大矛盾引起的。

这次重新分割世界的掠夺战争牵连到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来日本、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被卷进去。

战争成为世界性的了。

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是资产阶级背着本国人民极端秘密地准备的。当战争爆发时，每个帝国主义政府都竭力证明，不是它侵犯了邻国，而是邻国侵犯了它。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隐瞒战争的真正目的，隐瞒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每个帝国主义政府都说，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卑鄙地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事业。他们不仅没有起来反对战争，反而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去挑动各交战国工农互相残杀。

俄国不是偶然站到英法协约国方面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必须注意到，在1914年以前，俄国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里，主要是英法比三国即协约国资本手里。俄国最重要的冶金工厂由法国资本家把持着。整个说来，冶金业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依赖于外国资本。煤炭工业的情形，顿巴斯的情形，也是如此。石油开采约有一半是在英法资本手里。很大部分俄国工业利润流进了外国银行，主要是英法两国银行。所有这些情况，再加上沙皇向英法两国借的几十亿债款，使沙皇政府紧紧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把俄国变成了这些国家的纳贡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

俄国资产阶级指望开始战争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状况：获得新的市场，从军事定货和军需供给中赚得暴利，利用战争局势顺便把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沙俄参加战争是没有充分准备的。俄国工业大大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工厂多半是些设备破旧的老厂。农业由于存在着半农奴制地产和大批贫困破产的农民，不能成为进行长期战争的巩固的经济基础。

沙皇主要是依靠农奴制地主。黑帮大地主同大资本家结成联盟，操纵着俄国和国家杜马。他们完全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满心希望沙皇专制政府成为一个铁拳头，一方面保证它夺得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土，另一方面把工农革命运动镇压下去。

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立宪民主党以反政府派自居，却无条件地支持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从战争一开始就在社会主义幌子下帮助资产阶级欺骗人民，隐瞒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质。他们鼓吹必须保卫、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祖国”而抵抗“普鲁士野蛮人”，他们支持“国内和平”政策，这样，他们就是帮助俄国沙皇政府进行战争，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帮助德国皇帝政府进行战争反对“俄罗斯野蛮人”一样。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仍然忠于革命国际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地主资本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党从战争一开始就认定：发动这次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为了地主资本家去侵占别国领土、掠夺别国人民，因此工人必须坚决向这次战争宣战。

工人阶级支持布尔什维克党。

固然，战争开始时笼罩着知识分子和富农阶层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狂热，也熏染了一小部分工人。但这主要是流氓式的“俄罗斯人民同盟”中的分子，以及一部分同情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他们当然没有反映而且也不可能反映工人阶级的情绪。正

是这些分子参加了沙皇政府在战争开始时组织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游行。

二 第二国际各党转到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方面。第二国际瓦解为各个社会沙文主义党

列宁不止一次提醒过，要注意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领袖们的不坚定性。他始终强调说，第二国际领袖们只是口头上反对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投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方面去，就会成为战争的拥护者。战争一开始就证实了列宁的预言。

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说社会党人应当在国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1912年巴尔干战争时，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曾发表声明，说各国工人认为，为资本家增加利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在口头上，在决议上，就是这样讲的。

而当帝国主义战争轰隆一声爆发、必须实现这些决议的时候，第二国际领袖们却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和变节者，成了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战争的拥护者。

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投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法英比和其他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党人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国际已不存在了。它事实上已瓦解为各个互相进行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党。

各国社会党领袖背叛无产阶级而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帮助帝国主义政府愚弄工人阶

级，用民族主义毒药毒害工人阶级。这些社会主义叛徒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挑动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挑动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去反对德国工人。第二国际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国际主义立场，逆潮流而进，虽然不是十分坚定，不是完全明确，但毕竟是逆潮流而进的。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毫不犹豫地立刻举起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列宁在1914年秋拟定的关于战争的提纲中指出，第二国际的瓦解不是偶然的。第二国际是被机会主义者断送的，而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还在很早以前就已预告过必须反对这些机会主义者。

第二国际各党在战前就传染上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公开鼓吹放弃革命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二国际不愿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而主张同机会主义和睦相处，让它巩固起来。第二国际既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政策，于是自己也成了机会主义的了。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靠着它从殖民地、从剥削落后国家获得的利润，用较高的工资和其他的小恩小惠来不断地收买熟练工人上层，即所谓工人贵族。从这个工人阶层中产生了不少工会和合作社的领导者、地方议会和国会的议员、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战争时，这些人害怕失掉自己的地位，于是就成了革命的敌人，成了本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最狂热的维护者。

机会主义者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社会沙文主义者包括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鼓吹工人在国内要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和平，在国外要同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战争。他们向群众隐瞒战争的真正祸首，说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不是造成战争的祸首。许多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本国

帝国主义政府中的部长。

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即所谓中派，对于无产阶级事业也是同样危险的。中派分子考茨基、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等人，极力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洗刷、辩护，即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起背叛无产阶级，只不过用了一些专门欺骗工人阶级的“左的”反战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罢了。事实上中派是支持战争的，因为中派提议在表决用于战争的拨款时不投票反对而只限于弃权，就等于是支持战争。他们也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要求在战争期间放弃阶级斗争，以免妨碍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战争。中派分子托洛茨基在战争和社会主义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是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

列宁从战争爆发时起，就开始聚集力量，准备建立新的国际即第三国际。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1914年11月的反战宣言^①中，就已提出了成立第三国际来代替已经遭到可耻破产的第二国际这一任务。

1915年2月，在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李维诺夫同志受列宁委托作了发言。李维诺夫要求比法两国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桑巴、盖得）退出资产阶级政府并完全同帝国主义者决裂，放弃同他们合作。他要求所有社会党人都同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作坚决的斗争，并谴责投票赞成军事拨款的行为。但李维诺夫的呼声在这个会上没有得到响应。

1915年9月初，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称这次会议是国际反战运动发展中的“第一步”^②。列宁在这次会议上组织了一个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但在这个齐美尔

^① 指《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一文，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8—574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2—367页。——译者注

瓦尔得左派中，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唯一正确的、贯彻到底的反战立场。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用德文出版了《先驱》杂志，上面刊载过列宁的文章。

1916年，在瑞士的昆塔尔村召开了国际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这时差不多在所有国家中都已有一批国际主义者分离出来，国际主义分子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已经更加明显了。而主要的是，这时群众自己已因受战争和战争灾难的影响而左倾了。昆塔尔宣言的拟定是会上互相斗争的各个集团妥协的结果。它和齐美尔瓦尔得宣言相比前进了一步。

但是昆塔尔代表会议也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基本原则：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成立第三国际。可是昆塔尔代表会议终究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分离出来的过程，后来正是这些分子组成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列宁批评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不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错误，同时又帮助他们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 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

布尔什维克不是那种只是感叹和平和局限于宣传和平的和平主义者（和平派），象大多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布尔什维克主张用积极的革命斗争来争取和平，直到推翻好战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权。布尔什维克把和平事业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消灭战争，取

得公正的和平，即取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最可靠的手段。

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背弃革命的行为和在战争时期保持“国内和平”的叛卖性口号，而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说，劳动群众，包括武装的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如果想摆脱战争而赢得公正的和平，就应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并推翻他们的政权。

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保护资产阶级祖国的政策，而提出“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政策。这就是说，必须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在军队中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支持前线士兵联欢，组织工农的反战革命发动，并把这种发动转变为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起义。

布尔什维克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对人民害处最少的是沙皇政府在军事上失败，因为这种失败有助于人民战胜沙皇制度，有助于工人阶级顺利地摆脱资本主义奴隶制和帝国主义战争。同时，列宁认为不仅俄国革命者，而且一切交战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都应实行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失败的政策。

布尔什维克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他们只是反对掠夺性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认为战争有两种：

(一) 正义的、非掠夺性的、解放性的战争，其目的或者是保卫人民抵御外来的侵犯和奴役人民的企图，或者是把人民从资本主义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或者是把殖民地和附属国从帝国主义者压迫下解放出来；

(二) 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其目的是掠夺和奴役别的国家和别国人民。

布尔什维克拥护前一种战争。至于后一种战争，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举行革命和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

列宁在战争时期所写的理论著作，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都有巨大的意义。1916年春，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它已由“进步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寄生的资本主义，变成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资本主义会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自行死亡，不是说资本主义会自己连根烂掉。列宁始终教导说，不经过工人阶级的革命，就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列宁在这本书中肯定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之后，同时说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①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因素日益成熟。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对帝国主义愤恨的因素日益增长，反帝解放战争的因素日益增加。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尖锐；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争夺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使得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列宁指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使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

列宁根据这一切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或某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战线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7页。——译者注

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写的两篇不同的文章中，把这个英明的结论表述如下：

（一）“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摘自 1915 年 8 月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8 卷第 232—233 页）^①

（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坚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这就不仅要引起摩擦，而且要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公然企图扑灭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说来是合理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摘自 1916 年秋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19 卷第 325 页）^②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09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873 页。——译者注

这是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单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关于社会主义胜利条件、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前途的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列宁早在 1905 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本小册子中就已规定了的。

这个理论同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认为社会主义将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卓越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论据，改变了这种已经过时的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不可估量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用新的理论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的意义还在于它向各个国家的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去冲击本国的资产阶级，教导他们利用战争环境去组织这样的冲击，加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心。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

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一理论和策略在俄国进行了他们的实际工作。

在战争开始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巴达也夫、彼得罗夫斯基、穆拉诺夫、萨莫依洛夫和沙果夫不顾警察的残酷迫害，巡视了许多地方组织，在那里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革命态度问题的报告。1914 年 11 月，布尔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开会讨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开到第三天，全体代表都被捕了。法庭判决剥夺所有这些代表的权利，判处他们在西伯利亚东部终身流放。沙

皇政府给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定的是“叛国”罪。

在法庭上揭示出来的杜马代表的活动情况，使我们党感到光荣。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沙皇法庭上表现得很英勇，他们把沙皇法庭变成了揭露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讲坛。

当时为此案受到审讯的加米涅夫却是另一种表现。他由于胆怯成性，一遇到危险就背弃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加米涅夫在法庭上声明他在战争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不合，并为证明这点请求法庭把孟什维克约尔丹斯基传来作证。

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大量工作来反对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反对孟什维克想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企图。资产阶级切身需要在大众面前把帝国主义战争说成是全民的战争。资产阶级在战争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全俄组织——地方自治局联合会和市政公所联合会，因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事务。同时，它还想使工人也服从它的领导和影响。资产阶级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工人小组”。孟什维克支持资产阶级的这种想法。把工人代表拉进这些军事工业委员会对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有些工人当了代表，就会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鼓动，说必须在炮弹厂、大炮厂、枪械厂、子弹厂以及其他进行国防生产的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一切为了战争，一切用于战争”，——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实际上，这个口号是说：“不顾一切地靠军事订货和侵占别国领土发财吧。”孟什维克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玩弄的这种冒牌爱国主义勾当。他们帮助资本家拼命鼓动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的“工人小组”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反对这种花招。他们主张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这种抵制。但一部分工人仍然在著名的孟什维克格沃兹迭夫和奸细阿布罗西莫夫领导下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当工人代表在1915年9月集合起来进行军事工业委员会“工

人小组”决选时，才发现大多数代表都反对参加“工人小组”。大多数工人代表通过了强烈反对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决议，说明工人的任务是为和平、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

布尔什维克在陆军和海军中也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向士兵和水兵群众说明谁是造成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惨祸和人民苦难的罪人，说明革命是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唯一出路。布尔什维克在陆军和海军中，在前线和后方部队中建立了支部，散发了反战传单。

布尔什维克在喀琅施塔得成立了“喀琅施塔得军队党组织总干事团”，总干事团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下设立了负责在卫戍部队中进行工作的军事局。1916年8月，彼得格勒保安局局长呈报说：“喀琅施塔得干事团工作做得很慎重、很严密，参加者都是一些沉默寡言和作事谨慎的人。该干事团在岸上也派有自己的代表。”

党在前线进行了鼓动，号召交战国军队的士兵联欢，并着重指出：敌人就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只有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才能结束战争。个别部队拒绝进攻的事件日益增多了。早在1915年，特别是1916年，就已有过这样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北方战线各集团军中进行了特别巨大的工作。1917年初，北方战线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鲁兹斯基将军向上级报告，说布尔什维克在北方战线开展了规模巨大的革命工作。

战争是各国人民和国际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最大转折。它使各个国家的命运、各国人民的命运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都处于决定的关头。因此，它同时又是对所有以社会主义自命的党派的试金石和考验。这些党派是坚持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国际主义事业

呢，还是宁愿背叛工人阶级，卷起自己的旗帜，把它抛到本国资产阶级的脚下呢，——当时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战争表明，第二国际各党没有经住考验，背叛了工人阶级，在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面前放下了自己的旗帜。

这些党也不能不如此，因为它们在自己的队伍中间培植机会主义，它们是用对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让步的精神教育出来的。

战争表明，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光荣地经住了考验，才彻底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

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有新型的党，只有用同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精神教育出来的党，只有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党，才能经得起伟大的考验，才能坚持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事业。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这样的党。

四 沙皇军队在前线的失败。经济 破坏。沙皇制度的危机

战争已经进行三年了。战争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有的被打死，有的因伤致死，有的死于战争所引起的瘟疫。资产阶级和地主大发战争财。而工人和农民却愈来愈贫穷困苦。战争破坏了俄国的国民经济。约有一千四百万壮劳力被拉去当兵，脱离了生产。工厂纷纷停产。谷物播种面积因缺乏劳力而缩减。居民和前线士兵忍饥挨饿，赤脚露体。战争耗尽了国内的一切资源。

沙皇军队屡战皆败。德军炮兵轰击沙皇军队时弹如雨下，而沙皇军队则缺乏大炮，缺乏炮弹，甚至缺乏步枪，有时三个士兵用一枝枪。还在战争期间就已发觉了沙皇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同

德国特务勾结的卖国行为。苏霍姆林诺夫执行德国间谍机关的指令，破坏前线的弹药供应，不供给前线大炮和枪枝。沙皇的一些大臣和将领自己暗中协助德军获胜：他们同跟德方有勾结的皇后一起把军事秘密泄露给德军。难怪沙皇军队屡遭失败，不得不退却。到 1916 年，德军已侵占了波兰全境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地区。

这一切激起了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对沙皇政府的深恶痛绝，使后方和前线、中心地区和边沿地区人民群众反对战争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加强和加剧起来。

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不满情绪。它看见权奸拉斯普庭之流悍然企图同德方单独媾和，而沙皇朝廷上又由他们说了算，感到十分恼火。它愈来愈确信沙皇政府不能进行胜利的战争。它害怕沙皇政府为摆脱自己的困境而去同德方单独媾和。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决定举行宫廷政变，以废黜沙皇尼古拉二世，另立同资产阶级有勾结的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资产阶级是想借此一箭双雕：第一，僭取政权而保证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二，用小小的宫廷政变来阻止当时已经汹涌澎湃的人民大革命。

英法政府在这方面完全支持俄国资产阶级。它们知道沙皇不能把战争继续下去。它们害怕沙皇会以同德方单独媾和而就此了事。要是沙皇政府缔结单独和约，英法政府就要失掉俄国这样一个战争中的同盟者，俄国就不仅不能在自己战线上牵制敌军力量，而且不能向法国提供数以万计的俄国精锐部队。因此，它们支持俄国资产阶级举行宫廷政变的尝试。

于是沙皇陷于孤立了。

在前线接连失利的同时，经济破坏也有增无已。1917 年 1、2 月间，粮食、原料和燃料生产方面的破坏，已达到最厉害最尖锐的地步。供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食品，差不多完全停止了运输。

企业相继倒闭。企业的倒闭又使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生活特别困苦不堪。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确信：要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状况，只有一条出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

沙皇制度显然经历着毁灭性的危机。

资产阶级想用宫廷政变来解决危机。

但人民按自己的方式把危机解决了。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的覆灭。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成立。临时政府的成立。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17年一开始就发生了1月9日的罢工。在罢工时，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库和下新城都举行了游行示威，而且莫斯科参加1月9日罢工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当时在特维尔林荫道上有两千示威群众被骑警驱散。在彼得格勒的维波尔格公路上，有士兵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

彼得格勒警察局报告说：“有总罢工这种想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种想法已经象1905年那样成为普遍的想法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力图把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纳入自由资产阶级需要的轨道。2月14日国家杜马开幕这天，孟什维克提议组织工人游行去向国家杜马请愿。但工人群众跟布尔什维克走了，不是去向杜马请愿，而是去游行示威。

1917年2月18日，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2月22日，大多数大企业的工人也宣布了罢工。2月23日（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女工们响应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号召，上街游行示威，反对饥饿，反对战争，反对沙皇制度。工人们举行了全彼得格勒的总罢工来支援女工的游行示威。政治罢工开

始转变为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总示威了。

2月24日(3月9日),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工工人已达二十万左右。

2月25日(3月10日),革命运动席卷了整个工人的彼得格勒。各区的政治罢工转变成全彼得格勒的政治总罢工。到处都在举行游行示威,并同警察发生冲突。工人群众举着的红旗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

2月26日(3月11日)清晨,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开始转变为起义的尝试。工人解除警察和宪兵的武装,把自己武装起来。但当时同警察发生的武装冲突,却以示威群众在兹那缅斯克广场上遭受枪击而告终。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发出布告,说工人必须在2月28日(3月13日)复工,不然就要把他们派往前线。2月25日(3月10日),沙皇给哈巴洛夫将军下令:“着令于明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

但要“制止”革命已经办不到了。

2月26日(3月11日)白天,巴甫洛夫团后备营第四连开火了,不过不是向工人开火,而是向那些同工人交火的骑警队开火。当时大力地坚持地展开了争取军队的工作,尤其是女工,她们径直走到士兵面前,同他们欢谈,号召他们帮助人民推翻那个令人痛恨的沙皇专制制度。

当时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实际工作的,是设在彼得格勒的以莫洛托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局。2月26日(3月11日),中央局发表宣言,号召继续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

2月27日(3月12日),彼得格勒驻军拒绝向工人开枪,开始转到起义的人民方面来。2月27日早晨起义的士兵还只有一万

人，而到晚上就已超过了六万人。

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开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狱中的革命者。被释放的政治犯加入了革命斗争事业。

在街上，群众还在同那些架着机关枪盘踞房顶的巡警和宪兵互相射击。但军队迅速转到工人方面来，已决定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命运。

当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消息传到其他城市和前线时，各处的工人和士兵都起来推翻沙皇官吏。

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

革命所以获得了胜利，是因为工人阶级做了革命的先锋，领导了数百万身穿军服的农民群众“争取和平，争取面包，争取自由”的运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决定了革命的成功。

列宁在革命的初期写道：“无产阶级实现了革命，它表现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鲜血，它率领了最广泛的劳苦大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23—24页）^①

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准备了1917年的第二次革命的迅速胜利。

列宁写道：“如果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在1905—1907年三年间进行了极其伟大的阶级战斗和表现了革命的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的进展就不会这样迅速，也就是说这次革命的开始阶段就不会在几天以内完成。”（同上，第13页）^②

在革命的最初几天就出现了苏维埃。获得胜利的革命依靠着工兵代表苏维埃。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1905年的革命表明，苏维埃是武装起义的机关，同时又是革命新政权的萌芽。苏维埃思想已经深入到工人群众意识中，所以他们

^①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页。——译者注

在推翻沙皇制度后的第二天就实现了这个思想，不过所不同的是，1905年成立的还只是工人代表苏维埃，而1917年2月则由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当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的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主义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却在苏维埃中夺取代表席位以组成自己的多数。其所以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部分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领袖还在监狱和流放地（列宁侨居国外，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西伯利亚流放地），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却在彼得格勒街上自由自在地游逛。因此，妥协主义政党的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掌握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权。莫斯科和其他许多城市也是这种情况。只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及其他几个城市，苏维埃中的多数才是从一开始就属于布尔什维克。

武装的人民——工人和士兵选派自己的代表到苏维埃去，是把苏维埃当作人民政权机关看待的。他们认为并且相信，工兵代表苏维埃定会实现革命人民的一切要求，并且首先会缔结和约。

但过度的轻信使工人和士兵上了大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没有想结束战争、争取和平。他们想的是利用革命来继续战争。至于革命和人民的革命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革命已经完结了，现在的任务是巩固革命，转上按“正常的”宪制的原则同资产阶级共处的轨道。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竭力设法把结束战争的问题、和平的问题压下去，并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

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国家杜马中的自由派代表根据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的秘密协定，成立了以第四届杜马主席、地主分子兼保皇派罗将柯为首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几天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

革命党一孟什维克领导，又背着布尔什维克商定了组织俄国的新政府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让早在二月革命前就由沙皇尼古拉二世指定充任自己政府首相的李沃夫公爵来担任首脑。参加临时政府的有立宪民主党人的首领米留可夫，十月党人的首领古契柯夫，以及资本家阶级的其他一些有名的代表，而作为“民主派”代表参加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

结果就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一孟什维克领导把政权拱手交给了资产阶级，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知道此事之后，又不顾布尔什维克的抗议而以多数表决认可了社会革命党一孟什维克领导的行动。

于是在俄国就形成了如列宁所说的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① 的代表所组成的新的国家政权。

但是当时同资产阶级政府并存的还有另一个政权，即工兵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中的士兵代表主要是被征召参战的农民。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反对沙皇政权的工农联盟机关，同时又是工农政权机关，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

于是就形成了两个政权、两个专政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以工兵代表苏维埃为代表的工农专政二者交错在一起的特殊局面。

结果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为什么起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呢？

为什么获得胜利的工人和农民自愿地把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呢？

列宁认为，这是因为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的千百万人缺乏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页。——译者注

政治经验。他们大部分是小业主、农民、不久前还是农民的工人，即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人们。当时俄国是欧洲所有的大国中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15页）①。

这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浪潮，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涌到表面上来了。

列宁指出，另一个原因就是无产阶级的成分在战争时期起了变化，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开始时缺乏足够的觉悟性和组织性。在战争时期，无产阶级本身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骨干工人被征召入伍了。在战争年代，有很多同无产阶级心理格格不入的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为逃避征兵而钻进了企业。

工人中间的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也就成了小资产阶级政治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吸取养料的土壤。

正因为如此，缺乏政治经验、为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浪潮所吞没、沉醉于革命的最初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就成了妥协主义政党的俘虏，同意把国家政权让给资产阶级，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政权不会妨碍苏维埃进行自己的工作。

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在群众中耐心地进行解释工作：揭穿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性质，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说明不用苏维埃政府代替临时政府就得不到和平。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0页。——译者注

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就用全力把这项工作担当起来。

它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机关报。二月革命后第五天，《真理报》就在彼得格勒开始出版；再过几天，《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在莫斯科出版了。党开始出来领导正在放弃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信任、放弃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信任的群众。党耐心地向士兵、向农民解释必须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党向他们解释，不继续发展革命，不以苏维埃政府来代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农民就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土地。

简短的结论

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是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由于几大强国之间的均势遭到破坏，由于帝国主义者需要用战争重新分割世界和造成新的均势。

如果第二国际各党不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如果它们不违背第二国际几次代表大会的反战决议，如果它们下决心采取积极行动并发动工人阶级去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反对战争挑拨者，那末战争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破坏性，或许根本就不会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

布尔什维克党表明，它是坚持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事业并组织了国内战争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二国际所有其余的党因为经过它们的上层领导同资产阶级拴在一起，都成了帝国主义的俘虏，投到帝国主义者方面去了。

战争本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反映，而战争本身又加剧了这个危机，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俄国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弱点，突破了帝国主义战线，推翻了沙皇并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士兵以至工人沉醉于革命最初的胜利，满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谓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担保，都痴心信任临时政府并给它以支持。

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向这些沉醉于最初的胜利的工人和士兵群众说明：现在离革命完全胜利还很遥远；只要政权还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而苏维埃还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妥协派所操纵，人民就既不能获得和平，也不能获得土地，也不能获得面包；要获得完全的胜利，必须前进一步，使政权转归苏维埃。

第七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准备和进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1917年4月—1918年)

一 二月革命后的国内状况。党走出地下 状态转向公开政治活动。列宁回到彼 得格勒。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向社 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

事变和临时政府的行为，日益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正确。它们愈来愈清楚地表明：临时政府不支持人民而反对人民，不主张和平而主张战争；临时政府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给予和平、土地和面包。布尔什维克的解释工作获得了适宜的土壤。

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政府和消灭了君主制的根基，而临时政府则分明想把君主制保存下去。1917年3月2日，它密派古契柯夫和叔尔根去见沙皇。资产阶级想把政权转交给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弟弟米哈伊尔。但是当古契柯夫在铁路工人的集会上演说完毕高呼“米哈伊尔皇帝万岁”的时候，工人们要求立即逮捕和搜查古契柯夫，并忿然说道：“洋姜不比萝卜甜。”

很清楚，工人是决不容许恢复君主制的。

工人和农民干革命、洒热血，是盼望结束战争，想要获得面包和土地，要求采取坚决措施来消除经济破坏现象；而临时政府却对

人民的这些切身要求置若罔闻。这个由资本家和地主的最有名的代表组成的政府，根本不想满足农民关于把土地转归他们的要求。同样，它也不可能给劳动者以面包，因为要做到这点，就得触犯大粮商的利益，就得用各种办法征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但政府是下不了决心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就同这些阶级的利益分不开。同样，它也不可能给予和平。同英法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临时政府，不仅不想停止战争，反而企图利用革命来使俄国更加积极地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来实现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和两个海峡、占领加里西亚的帝国主义计划。

很清楚，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政策所持的轻信态度很快就要完结了。

显然，二月革命后所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可能长久支持下去，因为事变进程要求政权集中到一方面：或是集中到临时政府宫墙内，或是集中到苏维埃手中。

诚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政策，在人民群众中暂时还受到支持。当时还有不少工人，尤其是士兵和农民，相信“很快就会有立宪会议来把一切安排妥贴”，以为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需要。列宁把这种人叫作诚心诚意误入迷途的护国派。当时这些人还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许诺和劝说政策看作是正确的政策。但是很清楚，靠许诺和劝说是不可能支持多久的，因为事变进程和临时政府的行为日益暴露和表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主义政策是拖延时日和欺骗轻信者的政策。

临时政府没有局限于暗中反对群众革命运动的政策，即用阴谋手段反对革命的政策。有时它也企图公开向民主自由进攻，企图“恢复纪律”（特别是在士兵中），企图“整顿秩序”，即把革命纳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道。但不管它怎样朝这方面努力，总是不成

功，人民群众照样起劲地实现着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自由。工人和士兵力求充分利用他们第一次争得的民主权利来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以便认识和理解目前的局势，并决定今后如何行动。

二月革命后，曾在沙皇制度的极其困难条件下秘密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走出了地下状态，开始进行公开的政治和组织活动。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人数不过四万至四万五千。但这是在斗争中受过锻炼的干部。各级党委会已按民主集中原则实行了改组。确立了全党上下各级机关都按选举产生的制度。

党一转到合法状态，党内的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加米涅夫和莫斯科组织的某些工作人员，例如李可夫、布勃诺夫和诺根，采取半孟什维主义的立场，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斯大林（他当时刚从流放地回来）和莫洛托夫等人，同党内多数同志一起，坚持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号召积极地为争取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一部分党的工作人员态度动摇，反映出他们由于长期蹲监狱、被流放而造成政治上的落后。

处处感觉到党的领袖列宁不在。

1917年4月3日（16日），列宁经过长期流亡以后，回到了俄国。列宁的归来，对党、对革命有着巨大的意义。

列宁还在瑞士接到革命的最初消息时，就在从那里寄发的《远方来信》中向党和俄国工人阶级写道：

“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人民的英雄主义的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和全体人民的组织的奇迹，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19页）^①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页。——译者注

列宁于 4 月 3 日夜到达彼得格勒。当时在芬兰车站和车站前的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欢迎列宁。列宁一下车，群众就狂热地欢腾起来。他们把列宁举在手上，就这样把自己的领袖举到车站大厅。孟什维克齐赫泽和斯柯别列夫开始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致“欢迎”词，“表示希望”列宁会找到和他们“共同的语言”。但列宁没有理会他们，而绕过他们走向工人和士兵群众，并从装甲车上发表了他有名的演说，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列宁这样结束他经过多年流亡回来后的第一个演说。

列宁一回到俄国就全力以赴地投入革命工作。回国后的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报告，接着又在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会上重述了自己报告的提纲。

这就是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这个提纲向党和无产阶级提出了从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革命路线。

列宁的提纲对革命、对党后来的工作有巨大的意义。革命是全国生活中最大的转折，所以党在推翻沙皇制度后新的斗争条件下，必须有一个新的方针，以便能大胆而有信心地循着新的道路前进。列宁的提纲向党提供了这样的方针。

列宁的四月提纲向党提出了一个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天才计划。党自己所经历的全部历史，已使党准备好来执行这一伟大任务。早在 1905 年，列宁已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说过，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无产阶级将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中的新东西，就是提出了一个有理论根据的着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计划。

在经济方面，过渡的办法是：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情况下把全国

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把所有的银行合并成一个国家银行并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加以监督，对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

在政治方面，列宁提出由议会制共和国过渡到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在此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认为议会制共和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的政治形式。现在列宁提出用苏维埃共和国来代替议会制共和国，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

提纲中说：“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88页）^①

又说：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同上，第88页）^②

列宁说，在新政府即临时政府的统治下，战争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党的任务是要向群众说清这一点，并向他们指明，要用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产阶级不可。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列宁所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

其次，列宁在提纲中指出，我们党在苏维埃中暂时还占少数，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孟什维克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5页。——译者注

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因此，党的任务是：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经常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发错误，同时宣传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88页）^①

这就是说，列宁并没有号召实行起义去反对当时得到苏维埃信任的临时政府，没有要求推翻它，而是力求用解释的和征集力量的工作来争得苏维埃中的多数，改变苏维埃的政策，通过苏维埃去改变政府的成分和政策。

这是和平地发展革命的方针。

其次，列宁要求抛弃“肮脏的衬衫”，即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第二国际各党和俄国孟什维克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已被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们玷污、糟蹋了。列宁建议象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呼自己的党那样，称呼布尔什维克党为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正确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共产主义。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各人的劳动分配产品。列宁说，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最后，列宁在提纲中要求建立新的国际，建立没有沾染机会主义，没有沾染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列宁的提纲引起了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疯狂叫嚣。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5页。——译者注

孟什维克向工人发表了一篇宣言，开头就警告说：“革命在危险中”。所谓危险，据孟什维克的意见，就是布尔什维克提出了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要求。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统一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列宁的演说叫作“梦话”。普列汉诺夫引用孟什维克齐赫泽的话说：“只有列宁一人仍将处于革命之外，而我们将走我们自己的路。”

4月14日，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会议赞同列宁的提纲，并把它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

此后不久，党的各个地方组织也赞同了列宁的提纲。

全党，除加米涅夫、李可夫、皮达可夫之流几个独夫外，都非常满意地接受了列宁的提纲。

二 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党 四月代表会议

当布尔什维克准备进一步开展革命时，临时政府却继续干着反人民的勾当。4月18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盟国声明：“全体人民愿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临时政府决意完全遵守我们对盟国承担的义务。”

这样，临时政府发誓忠于沙皇条约，并且许诺说，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最后胜利”还需要人民流多少血，它就让流多少血。

4月19日，这个声明（“米留可夫照会”）已为工人和士兵们知道了。4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号召群众抗议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1917年4月20—21日（5月3—4日），对“米留可夫照会”极表愤慨的工人和士兵群众，至少有十万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旗帜上写的口号是：“公布秘密条约！”“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自城郊走向市中心，走向临时政

府所在地。在涅瓦大街和其他地方，他们和几群资产阶级分子发生了冲突。

科尔尼洛夫将军之流最露骨的反革命分子号召向示威者开枪，甚至下过这样的命令。但军队接到这种命令后拒绝执行。

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里的少数委员(巴格达齐也夫等)在游行示威时提出了立刻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严厉地谴责了这种“左的”冒险主义者的行为，认为这个口号不合适、不正确，妨碍党把苏维埃的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而且同党的和平地发展革命的方针相抵触。

4月20—21日事件意味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

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政策中发生的一个严重裂口。

1917年5月2日，在群众的压力下，从临时政府中撤销了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

成立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参加的除资产阶级代表外，还有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等人)。

这样，在1905年否认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可以参加革命的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现在却认为自己的代表可以参加反革命的临时政府了。

这表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反革命资产阶级营垒去了。

1917年4月24日，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四月)代表会议开幕。这是有党以来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就其意义来说在史上等于一次党代表大会。

全俄四月代表会议表明了党的蓬勃发展。出席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三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十八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八万

名有组织的党员。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关于目前形势、关于战争、关于临时政府、关于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关于民族问题等等）上的路线。

列宁在报告中发挥了他先前在四月提纲中所阐述的原理。党的任务是要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列宁）^①。党应该采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列宁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当前任务。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意味着必须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结束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分掌政权的局面，必须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将地主资本家的代表驱逐出政权机关。

会议确认，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要不倦地向群众说明这样一个真相，即“临时政府按其性质来说，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关”^②，同时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妥协主义政策的危害，指出他们是在用虚伪的诺言欺骗人民，使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战争和反革命的打击。

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在会上发言反对列宁。他们跟着孟什维克唱一个调子，说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说俄国只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建议党和工人阶级只限于“监督”临时政府。其实他们也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保存资本主义、保存资产阶级政权。

季诺维也夫也在会上发言反对列宁，他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应留在齐美尔瓦尔得联盟中还是同这个联盟决裂而建立新的国际这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4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37页。——译者注

个问题上反对列宁的。正如战争年代所表明的，这个联盟虽然进行和平宣传，但实际上并没有同资产阶级护国派决裂。因此，列宁坚决主张立即退出这个联盟而组织新的国际，即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建议仍旧同齐美尔瓦尔得派留在一起。列宁坚决驳斥了季诺维也夫的这个发言，称他的策略是“极端机会主义的和有害的”策略。

四月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

根据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它交给农民委员会支配和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号召农民为争取土地而斗争，并向农民群众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是真正帮助农民推翻地主的唯一的革命党。

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还在革命前，即在帝国主义战争前夜，就已规定了民族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的原则。列宁和斯大林说，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坚持各民族有权自决直到分离并成立独立国家。中央的报告人斯大林同志在会上捍卫了这个观点。

发言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有皮达可夫，他和布哈林一起，还在战争年代就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皮达可夫和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

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坚定的和一贯的立场，党为实现民族的完全平等和为消灭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保证党获得了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

下面就是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决议的原文：

“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地主、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支持这种政策，是为了维护其阶级特权，分化各民族的工人。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征服弱小民族，它是加深民族压迫的新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消除民族压迫，除非建立最民主的共和制度和国家管理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

必须承认俄国境内一切民族有自由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否认这种权利和不设法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就等于拥护侵略政策或兼并政策。无产阶级只有承认民族分离权，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的充分团结，才能促进各民族真正民主的接近。……

决不允许把民族有权自由分离的问题和某一民族在某个时期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为一谈。对于后面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完全独立地加以解决。

党要求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取消自上而下的监督，废除带强制性的国语，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边界。

无产阶级政党坚决摈弃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就是说，反对把原来由国家管理的教育事宜等等交给本民族议会管理。民族文化自治人为地把那些在同一地方居住、甚至在同一企业做工的工人按其所属的‘民族文化’分开，就是说，使工人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联系加强起来；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要加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

党要求把取消任何民族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权利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包括在宪法里。

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工人结成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如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教育组织等等。只有各民族工人结成这种统一的组织，无产阶级才有可能胜利地

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239—240页）^①

这样，四月代表会议就揭穿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他们的一小撮志同道合者的机会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议一致拥护列宁，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推行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路线。

三 布尔什维克党在首都的成功。临时政府军队在前线进攻的失利。工人和士兵七月游行示威的被镇压

党根据四月代表会议的决定展开了争取群众、用战斗精神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巨大工作。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是，通过耐心解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揭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主义，在群众中孤立这两个党，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

除在苏维埃中工作外，布尔什维克还在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在军队中，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到处都开始建立军事组织。在前线和后方，布尔什维克孜孜不倦地努力进行着士兵和水兵的组织工作。布尔什维克的前线报纸《战壕真理报》，在促使士兵革命化方面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很多城市的工人就改选了苏维埃——特别是区苏维埃，驱逐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选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拥护者。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446—447页。——译者注

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彼得格勒。

1917年5月30日—6月3日，召开了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已占四分之三。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差不多全体都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1917年6月3日(16日)，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苏维埃中还占少数，他们在会上仅有百多名代表，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却有七八百名代表。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坚决地揭露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危害性，揭穿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在会上发表了演说，论证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正确，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给劳动者面包、给农民土地，才能争得和平，才能使国家摆脱经济破坏状态。

这时彼得格勒各工人区正广泛酝酿着组织游行示威和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一些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为了防止工人自动游行示威，为了把群众的革命情绪引导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定6月18日(7月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一次游行示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指望这次游行示威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举行。布尔什维克党努力准备着这次游行示威。斯大林同志当时在《真理报》上写道：“……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彼得格勒6月18日的游行示威在我们的革命口号下举行。”①

1917年6月18日在革命烈士墓旁举行的游行示威，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的一次真正检阅。它表明群众的革命性日益高涨，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日益提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信任临时政府、必须继续战争的口号，淹没在布尔什维克口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83页。——译者注

号的汪洋大海中了。四十万示威者举着旗帜，上面的口号是：“打倒战争！”“打倒十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首都的一次惨败，是临时政府在首都的一次惨败。

但是，临时政府因为得到了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支持，决定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恰巧在6月18日这天，临时政府遵照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旨意，驱使前线士兵进攻。资产阶级认为这次进攻是结束革命的唯一机会。如果进攻胜利，资产阶级打算攫取全部政权，排挤苏维埃，摧毁布尔什维克。如果进攻失利，照样可以把全部罪过推给布尔什维克，就怪他们瓦解了军队。

进攻显然是要失败的，而它果真失败了。士兵的疲劳，他们对进攻目的的茫然不解，他们对异己的军官的不信任，炮弹和大炮的缺乏，——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前线进攻的失败。

前线进攻以及接着进攻失败，消息传来，首都大哗。工人和士兵愤怒万分。原来，临时政府宣布和平政策是欺骗人民。原来，临时政府主张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原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不想制止，或者说不可能制止临时政府的罪恶行动，并且自己做了临时政府的尾巴。

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义愤达到了极点。7月3日（16日），在彼得格勒的维波尔格区自发地开始了一次次的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持续了一整天。单个的游行示威发展成了总的大规模的武装游行示威，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本来反对在这个时候实行武装发动，因为它认为：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军队和外省还没有准备来支持首都的起义；在首都举行孤立的和为时过早的起义只会有助于反革命击溃革命先锋队。但是当看到阻止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已不可能时，党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变成和平的和有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党做到了这点，于是几十

万示威者就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进发，要求苏维埃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虽然游行示威带有和平的性质，但还是调了反动部队（士官生和军官队伍）来对付示威者。彼得格勒街头洒满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为了击溃工人，从前线调回了最愚昧无知的反革命军队。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和白卫将军镇压了工人和士兵的游行示威之后，就猛攻布尔什维克党。《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真理报》、《士兵真理报》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报纸被封闭。工人沃伊诺夫只是因为出售《真理小报》就在街上被士官生杀害。开始解除赤卫队的武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革命部队被撤出首都而调往前线。在后方和前线进行逮捕。7月7日，颁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遭逮捕。印刷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劳动”印刷所被捣毁。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布告，说列宁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因“叛国”和策划武装暴动，应受审判。加给列宁的罪名，是邓尼金将军司令部根据特务和奸细的证词伪造出来的。

这样，有策烈铁里和斯柯别列夫、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这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著名代表参加的联合临时政府，滚到公开的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泥潭中去了。它不实行和平政策，而实行继续战争的政策。它不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实行取消这种权利并用武力摧残工人和士兵的政策。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没有敢做的事情，“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切尔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却做了。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

结束得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全部政权转到了临时政府手中，而苏维埃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变成了临时政府的附

属品。

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因为刺刀已经提上日程。

鉴于形势改变，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改变自己的策略。党转入地下，把自己的领袖列宁深深地隐藏起来，开始准备起义，以便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

四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的 方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报刊大肆攻击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伦敦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十年和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五年召开的。大会于1917年7月26日—8月3日秘密举行。报上只公布了开会的消息，没有指明开会的地点。头几次会在维波尔格区举行。后几次会在纳尔瓦门附近的一个学校举行，现在那里已经盖起了文化馆。资产阶级报纸要求逮捕大会参加者。密探疲于奔命，想找到开会的地点，但怎么也没有找到。

这样，在推翻了沙皇制度五个月以后，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秘密开会，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不得不在这个时候躲藏在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一个草棚中。

列宁虽因受临时政府的密探追寻没能出席大会，但他通过自己在彼得格勒的战友和学生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莫洛托夫和奥尔忠尼启泽，秘密地领导了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一百五十七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一百二十八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当时党员人数在二十四万左右。截至7月3日，就是说在工人的游行示威被摧残之前，布尔什维克还在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党拥有四十一个机关刊物，其中二十九个是俄文

的，十二个是其他文字的。

在七月事变时对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的迫害，不仅没有使我们党的影响削弱，反而使它更加扩大了。各地代表举出的大量事实说明：工人和士兵开始大批脱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轻蔑地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狱卒”。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中的工人和士兵党员纷纷撕毁自己的党证，咒骂着离开他们的党，而请求布尔什维克接收他们加入自己的党。

大会上的主要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政治形势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虽然资产阶级倾全力镇压革命，但是革命仍然在不断发展。他指出，革命提出了关于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问题。他说，革命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七月事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苏维埃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领导，不想掌握全部政权。因此，苏维埃已经没有权力了。政权已集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而这个政府还在解除革命的武装，摧残革命的组织，摧残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斯大林同志说，现在只有一条路：推翻临时政府，用暴力夺取政权。但能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只有同农村贫民联盟的无产阶级。

仍然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着的苏维埃，已滚入资产阶级的营垒，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起临时政府走卒的作用。斯大林同志说：在七月事变以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应当撤回。但暂时撤回这个口号并不是说不再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了。当时说的不是作为革命斗争机关的一般苏维埃，而仅仅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那些苏维埃。

斯大林同志说：“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不和平的时

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俄文版第111页）^①

党朝着武装起义前进。

会上有人反映资产阶级的影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关于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出：只有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可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同志反对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提议。

斯大林同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同上，第233—234页）^②

布哈林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说农民怀有护国主义情绪，说农民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而不会跟工人阶级走。

斯大林同志驳斥了布哈林。他证明说，有各种各样的农民：有富裕农民，也有贫苦农民。前者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后者愿同工人阶级联盟，并一定会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支持工人阶级。

大会否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提出的修正案，批准了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决议草案。

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的要点是：没收地主土地并把全国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把银行收归国有，把大工业收归国有，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大会强调了为实现工人监督生产而斗争的意义（工人监督生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74页。——译者注

产在把大工业收归国有时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它的所有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的原理。

大会斥责了孟什维克的工会中立论。大会指出，只有在工会始终是承认布尔什维克党政治领导的战斗的阶级组织的情况下，俄国工人阶级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才能实现。

大会通过了《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当时青年团往往是自动成立的。经过后来的努力，党终于把这些青年组织作为党的后备军管起来了。

大会讨论了列宁应不应当到法庭受审的问题。加米涅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等人还在大会召开以前就认为，列宁应当到反革命法庭去受审。斯大林同志坚决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反对列宁到法庭受审，认为这不是审判，而是迫害。大会毫不怀疑，资产阶级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列宁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进行肉体摧残。大会抗议资产阶级对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警察式的迫害，并致函列宁表示慰问。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党章指出，党的各级组织应当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

这就是说：

-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上到下按选举产生；
- (二)党的各级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
- (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 (四)上级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执行。

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根据党员二人介绍，经党组织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后，由地方党组织接收入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接收了“区联派”及其首领托洛茨基入党。这是个人数不多的集团，它从1913年起就存在于彼得格勒，成员是

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和一部分从党内分裂出去的前布尔什维克。战争期间，“区联派”是个中派组织。他们反对过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许多方面也不赞同孟什维克，因此他们采取的是中间的、中派主义的、动摇的立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区联派”声明，他们在一切方面赞同布尔什维克，并请求接收他们入党。大会满足了他们的请求，指望他们将来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区联派”分子，如沃洛达尔斯基和乌里茨基等，后来真正成了布尔什维克。至于托洛茨基及其某些亲密朋友，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们入党不是为了进行有益于党的工作，而是为了动摇党和从内部炸毁党。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决议，都是为着准备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去实行武装起义。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指向武装起义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大会发表了党的宣言，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准备力量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宣言结尾说：

“我们的战斗同志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要坚定、勇敢、镇静，不受挑拨，积蓄力量，列成战斗的队伍！无产者和士兵们，站到党的旗帜下来！农村的被压迫者们，站到我们的旗帜下来！”^①

五 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反革命阴谋。 阴谋被粉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苏维埃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

资产阶级夺得全部政权之后，就准备摧毁软弱无力的苏维埃，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07页。——译者注

建立赤裸裸的反革命专政。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悍然声称他看到了摆脱现状的出路，说“饥饿的魔掌和人民的贫困定会扼杀冒充人民之友的民主的苏维埃和委员会”。在前线，为士兵设立的战地法庭和死刑猖獗一时。1917年8月3日，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在后方也实行死刑。

8月12日，临时政府为动员资产阶级地主的力量，在莫斯科的大剧院召开了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地主、资产阶级、将军、军官和哥萨克的代表。代表苏维埃出席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在国务会议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组织了有大多数工人参加的总罢工作为抗议。在其他许多城市也同时举行了罢工。

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在会上讲话时吹嘘自己的力量，扬言要用“铁和血”来镇压革命运动的任何尝试，包括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尝试在内。

反革命将军科尔尼洛夫公然要求“取缔各委员会和苏维埃”。

银行家、商人和工厂主，接踵到大本营（当时这样称呼总司令部）来见科尔尼洛夫将军，答应给他金钱和支持。

“盟国”即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也来见科尔尼洛夫将军，要求他立刻起事反对革命。

眼看科尔尼洛夫将军就要发动反对革命的阴谋了。

科尔尼洛夫的阴谋是公开准备的。为了转移视线，阴谋者们散布流言，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于8月27日革命半周年那天在彼得格勒举行起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猛攻布尔什维克，对无产阶级政党加紧实行恐怖手段。同时，科尔尼洛夫将军调集军队，准备把它们开到彼得格勒来消灭苏维埃和建立军事独裁政府。

科尔尼洛夫准备这次反革命发动，事先是同克伦斯基商量好的。但是在科尔尼洛夫举行发动的时候，克伦斯基突然改变方针，和自己的同盟者划清了界限。克伦斯基害怕，如果他的资产阶级政府不立刻同科尔尼洛夫叛乱划清界限，那末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和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时，也会把它一起扫除。

8月25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将军指挥的第三骑兵军开往彼得格勒，宣称他要“拯救祖国”。为了反击科尔尼洛夫的暴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号召工人和士兵对反革命势力进行积极的武装抵抗。工人迅速地武装起来准备抵抗。赤卫队在这些日子里增长了好几倍。工会动员了自己的会员。彼得格勒的革命部队也作好了战斗准备。在彼得格勒周围挖好了战壕，设置了铁丝网，拆毁了铁道。几千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开来保卫彼得格勒。向进攻彼得格勒的“野蛮师”派出了一些代表，去对山民士兵说明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实质，于是“野蛮师”拒绝进攻彼得格勒了。对科尔尼洛夫的其他部队也派去了鼓动员。凡是有危险的地方，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指挥部。

在这些日子里，吓得要死的社会革命党一孟什维克领导，包括克伦斯基在内，都到布尔什维克这里来寻求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在首都唯一能够击败科尔尼洛夫的实际力量是布尔什维克。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动员群众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时候，也没有停止同克伦斯基政府作斗争。布尔什维克在群众面前揭露了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指出他们的全部政策在客观上帮助了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阴谋。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了。克雷莫夫将军开枪自杀。科尔尼洛夫及其同僚邓尼金和卢柯姆斯基被捕（不过克伦斯基不久就把他们释放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一下子被粉碎，揭示了和说明了革命和反革

命的力量对比，表明整个反革命营垒，从将军们和立宪民主党到沦为资产阶级俘虏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必然要灭亡。很清楚，把力不胜任的战争拖延下去的政策和由旷日持久的战争引起的经济破坏，彻底破坏了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其次，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已成长为革命的决定力量，能够击败任何反革命阴谋。当时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它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是作为真正执政的力量在那里起作用的，因为工人和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它的指示。

最后，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表明，仿佛已经死亡了的苏维埃实际上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抵抗力量。毫无疑问，正是苏维埃及其革命委员会挡住了科尔尼洛夫的军队，损伤了他们的力量。

反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使气息奄奄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复活起来，摆脱了妥协主义政策的束缚，走上了革命斗争的康庄大道，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方面。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空前增长了。

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影响也迅速增长起来。

科尔尼洛夫暴动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地主和将军们摧残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以后，接着就将进攻农民。因此，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至于中农，如果说他们的动摇阻碍过1917年4—8月时期的革命发展，那末在科尔尼洛夫被击溃以后，他们已在向贫苦农民群众靠拢，开始肯定地转向布尔什维克党方面。广大的农民群众已经开始了解，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能使他们摆脱战争，才有能力摧毁地主并准备把土地转交农民。1917年9月和10月，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事件大大增加。自行耕种地主土地已成为普遍的现象。无论劝说或讨伐队，都已制止不住奋起革命的农民了。

革命高潮正在到来。

苏维埃活跃和革新的阶段即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阶段开始了。工厂和部队改选自己的代表，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选进苏维埃去代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第二天，即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彼得格勒苏维埃原来以齐赫泽为首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主席团宣布辞职，让位给布尔什维克。9月5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方面。莫斯科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主席团也宣布辞职，让路给布尔什维克。

这就是说，成功的起义所必需的基本前提已经成熟。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重新提上了日程。

但这已不是把政权转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苏维埃手中的那个旧口号。不，这是苏维埃起义反对临时政府以便使国内全部政权转归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苏维埃的口号。

各妥协主义党派内部一片混乱。

社会革命党内部在怀有革命情绪的农民的压力下出现了一个左翼，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开始表示不满意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

孟什维克中也出现了一个“左派”集团，即所谓“国际主义者”集团，他们开始倾向于布尔什维克。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是个没有多大影响的集团，现在已彻底瓦解为一些很小的集团：有的去同社会渣滓中的刑事犯、盗贼和奸细为伍；有的去作“有思想的”剥夺者，抢劫农民和小市民，掠夺工人俱乐部的房屋和储金；有的公开转入反革命分子的营垒，在资产阶级豢养下过日子。他们所有的人都反对一切政权，特别是反对工农的革命政权，因为他们深知，革命政权决不会让他们抢劫人民和侵吞人民的财产。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作

过一次尝试，想削弱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为此他们在 1917 年 9 月 12 日召开了全俄民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妥协派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界以及军队的代表。由这次会议产生了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妥协派想利用预备议会来阻止革命，使俄国离开苏维埃革命道路而走上资产阶级宪制发展的道路，即走上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但这是已遭破产的政治家们想倒转革命车轮的绝望的尝试。它必然要遭到失败，而且果然遭到了失败。工人们嘲笑了妥协派的议会作业练习。他们挖苦预备议会是“澡堂预备间”。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抵制预备议会。诚然，象加米涅夫和泰奥多罗维奇这样的人盘踞着的布尔什维克预备议会党团，不愿意退出预备议会。但党中央强迫他们退出了预备议会。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顽固地主张参加预备议会，企图诱使党不去准备武装起义。斯大林同志在全俄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中坚决反对参加预备议会。他把预备议会叫作“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

列宁和斯大林认为，甚至短时间参加预备议会也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会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幻想，似乎预备议会真能替劳动者做些事情。

同时，布尔什维克坚忍不拔地准备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打算在这次会上争取到多数。不管盘踞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支吾搪塞，但在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压力下，终于定于 1917 年 10 月下半月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六 彼得格勒的十月起义和临时政府人员的被捕。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

布尔什维克开始加紧准备起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既然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列宁在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时着重指出：“多数人民是拥护我们的。”^①列宁在文章中和给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信中，提出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如何利用陆军、海军和赤卫队，彼得格勒哪些有决定意义的地点必须夺取以保证起义成功，等等。

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10月10日，党中央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决定在最近期间开始武装起义。列宁给党中央起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说：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1页。——译者注

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1卷第330页）^①

发言和投票反对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的有两个中央委员，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也和孟什维克一样梦想成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并诬蔑工人阶级，硬说它没有力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硬说它还没有成长到夺取政权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这次会上虽然没有直接对这一决议投反对票，但是他对决议案提出了一个必然会使起义化为乌有和遭到失败的修正案。他提议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不要开始起义，这就等于拖延起义一事，事先泄露起义日期，把这事预先告诉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派了全权代表分赴顿巴斯、乌拉尔、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西南战线等地去组织当地的起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伏龙芝、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其他同志，受了党的专门委托领导当地的起义。在乌拉尔的沙德林斯克军队中进行工作的是日丹诺夫同志。中央全权代表们向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传达了起义计划，组织他们做好动员准备，以便随时支援彼得格勒起义。

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下面成立了革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5页。——译者注

命军事委员会，它成了起义的公开的司令部。

同时，反革命也赶紧纠集自己的力量。军官们成立了反革命的“军官联合会”。反革命分子到处都建立了突击营编建指挥部。到10月底，反革命已经拥有四十三个突击营。专门组织了几个乔治勋章军人营。

克伦斯基政府提出了把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问题。由此可见，它准备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以防止彼得格勒发生起义。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反对迫使临时政府留在彼得格勒。

10月16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选出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它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

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发言反对起义。在遭到回击之后，他们竟在报刊上公开反对起义、反对党。10月18日，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发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说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而他们认为起义是冒险。这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向敌人泄漏了中央关于起义、关于在最近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这是叛变。列宁关于此事写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向罗将柯和克伦斯基泄露了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①列宁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党的问题。

革命的敌人接到叛徒的警告，立即采取措施来防止起义，来摧毁革命的领导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党。临时政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解决了关于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措施问题。10月19日，临时政府急忙从前线调军队来彼得格勒。街道上开始加岗巡逻。反革命在莫斯科纠集了特别大的力量。临时政府制定了一个计

^① 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05—206页。——译者注

划：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进攻和占领布尔什维克中央所在地斯莫尔尼，粉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心。为此，政府把它认为忠实可靠的部队集结到彼得格勒。

可是临时政府的末日已到。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了。

10月21日，布尔什维克向所有的革命部队派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起义前的所有日子里，各部队、各工厂都在加紧进行战斗准备。两艘战舰——“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自由曙光”号舰，也接到了明确的任务。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通过吹嘘，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泄露了布尔什维克预定开始起义的日子。为了不让克伦斯基政府有可能破坏武装起义，党中央决定在原定日期以前，即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天开始和进行起义。

10月24日(11月6日)清晨，克伦斯基开始行动，下令查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并把一些装甲车开到《工人之路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印刷厂前。但到上午十点时，赤卫队和革命士兵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把装甲车赶走了，并在印刷厂和《工人之路报》编辑部附近加强了防卫。上午十一点，《工人之路报》出版了，报上号召推翻临时政府。同时，根据领导起义的党总部的指示，革命士兵和赤卫队的队伍立即向斯莫尔尼集结。

起义开始了。

10月24日夜晚，列宁到了斯莫尔尼，直接领导起义。革命部队和赤卫队通宵不停地向斯莫尔尼开来。布尔什维克把它们派往首都中心去包围临时政府的老巢冬宫。

10月25日(11月7日)，赤卫队和革命部队占领了火车站、邮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和国家银行。

预备议会被解散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所在的斯莫尔尼，成了革命的战斗司令部，从这里发出战斗的命令。

在这些日子里，彼得格勒的工人表明，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经布尔什维克做过工作而作好了起义准备的革命部队，准确地执行了战斗命令，同赤卫队一起并肩战斗。海军也不比陆军落后。喀琅施塔得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这里早就不承认临时政府的政权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纪元的开始。

10月25日(11月7日)，公布了布尔什维克《告俄国公民书》，宣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苏维埃手中。

临时政府躲在冬宫里面，由士官生和突击营警卫着。10月25日深夜，革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发起冲锋，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晚十点四十五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大会在斯莫尔尼开幕，当时彼得格勒的胜利起义已达沸点，首都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手中了。

布尔什维克在会上获得了压倒多数。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眼看大势已去，声明不参加大会工作而离开了大会。他们在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的声明中，把十月革命称为“军事阴谋”。大会痛斥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且指出，对于他们的退出不仅不表示惋惜，反而表示欢迎，因为叛徒的退出使代表大会成了真正革命的工兵代表大会。

用大会名义宣布全部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说：

“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

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①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夜，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大会向各交战国建议，立即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大会在向一切交战国的政府和人民呼吁的同时，还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的觉悟工人”呼吁。大会号召这些国家的工人帮助“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②。

同夜，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令**，上面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③。这个土地法令的基础就是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根据这个委托书，土地私有权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一律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

农民根据这个法令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总共获得了一亿五千万俄亩以上的新土地，这些土地从前都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室、寺院和教堂手中。

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五亿左右金卢布的地租。

所有地下矿藏(石油、煤炭、矿石等等)、森林和水流都转归人民所有。

最后，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宁被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56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63页。——译者注

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大会代表分赴各地，以传达彼得格勒苏维埃胜利的消息，并保证把苏维埃政权扩展到全国。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权都是一下子转归苏维埃的。当彼得格勒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时，莫斯科街头还顽强激烈地进行了好几天战斗。为了不让政权转到莫斯科苏维埃手中，反革命党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跟白卫分子和士官生一起，发动了反对工人和士兵的武装斗争。过了几天，叛乱者被击败，苏维埃政权才在莫斯科建立起来。

就是在彼得格勒本城及其几个区里，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初几天，反革命分子还曾试图推翻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10日，克伦斯基（他是在起义期间从彼得格勒逃往北方战线地区的）纠集了一些哥萨克部队，让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着向彼得格勒进发。1917年11月11日，以社会革命党人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发动士官生叛乱。但是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叛乱者打垮了。经过一个白天，到11月11日傍晚，水兵和赤卫队就平定了士官生的叛乱，而到11月13日，又在普尔科沃高地击溃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列宁也如在十月起义时一样，亲自领导粉碎反苏的叛乱。他的坚定不移的精神和确信胜利的镇静态度，鼓舞并团结了群众。敌人被打垮了。克拉斯诺夫被俘虏，他“保证”以后决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凭这一“保证”被释放了，但是后来表明，克拉斯诺夫违背了自己的这种将军诺言。至于克伦斯基，已男扮女装藏得“不知去向”了。

在全军总司令的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寥夫，杜鹤宁将军也企图发动叛乱。当苏维埃政府要杜鹤宁立刻着手同德军指挥部进行停战谈判时，他拒绝执行政府的指令。于是苏维埃政权下令撤掉杜鹤宁。反革命大本营被摧毁了，杜鹤宁本人则被起来反对他的士

兵打死。

党内人所共知的机会主义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施略普尼柯夫等人，也曾试图袭击苏维埃政权。他们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让刚被十月革命推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1917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通过决议，坚决反对同这些反革命党派达成协议，宣布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破坏革命的工贼。11月17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米柳亭因不同意党的政策，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同日，即11月17日，诺根用本人的名义和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李可夫、弗·米柳亭、泰奥多罗维奇、亚·施略普尼柯夫、达·梁赞诺夫、尤列涅夫和拉林等人的名义提出声明，说他们不同意党中央的政策，并退出人民委员会。一小撮懦夫的逃跑，使十月革命的敌人兴高采烈。整个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都幸灾乐祸，叫嚷布尔什维主义在瓦解，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必然灭亡。但一小撮逃兵丝毫也没能动摇党。党中央轻蔑地斥责他们是革命的逃兵和资产阶级的帮凶之后，就转而进行当前的工作。

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想在明显地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农民群众中保持影响，决定不同布尔什维克争执，暂时同布尔什维克保持统一战线。1917年11月召开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承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成果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当时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了协议，几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柯列加也夫、斯皮里多诺娃、普罗相和施泰因别尔格）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但这一协议只存在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和成立贫农委员会时止，因为这时农民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而愈来愈反映富农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叛乱，被苏维埃政权打垮了。

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1、2月这一时期，苏维埃革命扩展

到了全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在广阔的国土上推进得如此迅速，列宁把这叫作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进军”。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

从决定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俄国这样较为容易获得胜利的种种原因中，应该指出如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十月革命所遇到的是俄国资产阶级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组织不好而又缺乏政治经验的敌人。在经济上还不强固而完全依赖政府定货的俄国资产阶级，既没有为找到摆脱现状的出路所必需的政治独立性，又没有为此所必需的充分的主动性。它既没有如法国资产阶级那种大规模搞政治权术和政治欺骗的经验，也没有如英国资产阶级那种大规模搞诡诈妥协的训练。它昨天还在谋求同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沙皇达成协议，所以后来到执政时根本想不出什么高招，只能在一切基本问题上继续可恶的沙皇的政策。它和沙皇一样主张“战到最后胜利”，而不顾国家已经力不胜任、人民和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它和沙皇一样主张基本上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顾农民由于缺乏土地和遭受地主压迫而奄奄待毙。至于对工人阶级的政策，俄国资产阶级比沙皇更加仇视工人阶级，因为它不仅竭力保存和巩固工厂主的压迫，并且竭力用大规模的同盟歇业使这种压迫变得更加不堪忍受。

难怪乎人民认为沙皇的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政策没有重大区别，把对沙皇的仇恨转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身上。

当妥协主义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人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的时候，资产阶级还能靠它们掩护而保持住政权。但是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暴露自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从而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之后，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就悬在空中了。

(二)领导十月革命的是俄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革命阶级；它

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在短短的时期内经历过两次革命，在第三次革命前夜在争取和平、土地、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了人民领袖的威信。没有俄国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受到人民信任的革命领袖，就不会有工农联盟；而没有这样一个联盟，十月革命就不能胜利。

(三)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有占农村居民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可以和几十年“常态”发展相比的八个月的革命经历，对于劳动农民群众并没有白白过去。在这个期间，他们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验俄国的一切政党，并且确信：无论立宪民主党，无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不会为农民真正同地主翻脸和流血牺牲；俄国只有一个党同地主没有联系，并决心打倒地主，以满足农民的需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情况成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联盟的现实基础。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也决定了中农的态度，使他们在长期动摇之后，到十月起义前夜终于同贫苦农民站到一起，真正转到了革命方面。

根本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这个联盟，十月革命就不能胜利。

(四)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在政治斗争中考验出来的党。只有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党，只有这样一个有充分的勇气、能引导人民进行坚决的冲击，又十分谨慎、能绕过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的党，才能非常巧妙地将各种不同的革命运动——如争取和平的一般民主运动，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民主运动，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平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运动——汇合成一个总的革命洪流。

毫无疑问，这些不同的革命潮流汇合成一个总的强大的革命洪流，决定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五)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正酣、主要资产阶级国家分

裂成两个敌对营垒、它们正忙于互相交战和互相削弱而不可能认真干涉“俄国内政”和积极反对十月革命的时刻开始的。

毫无疑问，这种情形大大有助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七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布列斯特和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破坏和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代之以新的苏维埃国家机构。其次，必须消灭等级制度残余和民族压迫制度，废除教会特权，取缔反革命的出版物以及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组织，解散资产阶级立宪会议。最后，必须在土地国有化之后把全部大工业也收归国有，然后摆脱战争状态，结束那个最妨碍苏维埃政权巩固的战争。

这一切措施，在1917年底至1918年中这几个月内实现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织的旧政府各部官吏的怠工被粉碎和消灭了。撤销了政府各部，代之以苏维埃管理机构和相应的人民委员部。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管理全国的工业。组织了以费·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来同反革命和怠工行为作斗争。颁布了关于建立红军和红海军的法令。基本上在十月革命前选出，拒绝批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政权转归苏维埃法令的立宪会议被解散了。

为了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等级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颁布了废除等级、取消民族限制和信教限制、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样一些法令。

苏维埃政府的一项专门决议，即人所共知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把俄国各族人民自由发展和完全平等定为法律。

为了摧毁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新的苏维埃国民经济（首先是组织新的苏维埃工业），把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以及大工业的所有部门——煤炭、冶金、石油、化学、机器制造、纺织和制糖等收归国有了。

为了使我国的财政独立和摆脱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废除（取消）了沙皇和临时政府向外国借的国债。我国各族人民不愿偿付那些用来进行掠夺战争并使我国奴隶般地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债款。

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从根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地主、反动官吏和反革命政党的势力，使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大为巩固。

但是，只要俄国还处于同德奥交战的状态，就不能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是完全巩固的。要彻底巩固苏维埃政权，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党从十月革命刚一胜利就展开了争取和平的斗争。

苏维埃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的和约开始谈判”^①。但是，英法两个“盟国”不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建议。由于英法两国拒绝和谈，苏维埃政府执行苏维埃的意志，决定同德奥两国进行谈判。

谈判于 12 月 3 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12 月 5 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即暂时停止战争行动的协定。

谈判是在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们普遍疲于战争和我国军队从前线撤退、前线陷于瓦解的局势下进行的。在谈判期间看出，德帝国主义者企图夺取前沙皇帝国的大块领土，而把波兰、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变为德国的附属国。

在这些条件下继续战争，无异拿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命作赌注。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的是，必须接受苛刻的和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354 页。——译者注

约条件，对当时最危险的强盗德帝国主义让步，以便取得喘息时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立一支能保卫国家抵抗敌人进攻的新的军队即红军。

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最坏的白卫分子，都疯狂地进行煽动，反对签订和约。他们的路线很明显，他们想破坏和谈，挑起德国人进攻，使尚未巩固的苏维埃政权遭受打击，使工农获得的成果受到威胁。

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黑暗勾当的，是托洛茨基及其帮手布哈林——布哈林同拉狄克和皮达可夫一起领导着一个反党集团，这个集团为了掩饰自己，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党内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激烈斗争，要求继续战争。这些人显然是在帮助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力图使年轻的、还没有自己军队的苏维埃共和国去受德帝国主义的打击。

这是用左的词句巧加掩饰的一种挑拨政策。

1918年2月10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谈中断了。虽然列宁和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坚决主张签订和约，但是托洛茨基作为驻布列斯特的苏维埃代表团首席代表，却叛卖性地违背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指示。他声明苏维埃共和国拒绝在德国提出的条件下签订和约，而同时他又通知德方，说苏维埃共和国将不进行战争，并在继续复员军队。

这真是骇人听闻。德帝国主义者所能要求于苏维埃国家利益叛卖者的，无过于此了。

德国政府中断停战，转入进攻。我国旧军队的残部抵挡不住德军攻势而开始溃散。德军迅速推进，夺取了大片领土，并威胁着彼得格勒。德帝国主义入侵苏维埃国家，目的是推翻苏维埃政权，把我们祖国变为它的殖民地。陷于瓦解的旧沙皇军队，抵挡不

住德帝国主义的大批武装部队。它在德军打击下溃退了。

但是德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干涉激起了我国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工人阶级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加紧组织红军部队。年轻的新军队（革命人民的军队）英勇地击退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强盗的攻击。德国占领者在纳尔瓦和普斯科夫附近遭到了坚决的回击。他们向彼得格勒的推进被阻止了。抗击德帝国主义军队的日子——2月23日，成了年轻的红军的生日。

还在1918年2月18日，党中央就通过了列宁提出的致电德国政府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德方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更有利的和约条件而继续进攻，直到2月22日德国政府才表示同意签订和约，但这时的和约条件比原先苛刻得多了。

为了争取通过关于缔结和约的决定，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不得不在中央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最顽强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了德帝国主义者，阻碍了德国革命的壮大和发展”（《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307页）^①。

2月23日，中央决定接受德军统帅部提出的条件并签订和约。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叛卖行为使苏维埃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不用说还有波兰，都割让给了德国。乌克兰脱离苏维埃共和国，变成德国的附庸国（附属国）。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向德国人交纳赔款。

但“左派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反对列宁的斗争，愈来愈深地陷入叛卖的泥潭。

暂时被“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奥新斯基、雅柯夫列娃、斯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47页。——译者注

土柯夫、曼策夫)篡夺的党的莫斯科区域局，通过了不信任中央的分裂主义决议，并说它认为“党在最近的将来恐难避免分裂”。在这个决议中，他们甚至作出了反苏的决定。“左派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决定中说：“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

列宁称这个决定为“奇谈与怪论”。^①

当时党还不清楚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这种反党行为的真实原因。但是正如不久前对反苏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判(1938年初)所证实的：布哈林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托洛茨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当时策划过反苏维埃政府的阴谋。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阴谋同伙曾打算破坏布列斯特和约，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由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共同组织一个新政府。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一面策划反革命阴谋，一面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公开的攻击，力图分裂党和瓦解党的队伍。但是，党在这个严重关头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的周围，在和约问题上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支持中央委员会。

“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孤立了，被击败了。

为了彻底解决和约问题，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18年3月6日开幕。这是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十六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五十八个有发言权的代表。这次大会代表着十四万五千个党员。实际上当时党至少已有二十七万党员。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差别，是因为这次大会带有非常的性质，相当一部分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38页。——译者注

组织没有来得及选派代表，而暂时被德国人占领的地区的组织又没有可能选派代表。

列宁在这次会上做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报告时说：“……我们的党由于党内出现左倾反对派而遇到的严重危机，是俄国革命所遇到的最大的危机之一。”（《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321页）^①

列宁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决议案以三十票赞成、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获得通过。

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列宁在《不幸的和约》一文中写道：

“和约条件的确苛刻得难以接受。但是历史终究会占上风……我们要从事组织，组织和组织。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同上，第288页）^②

大会的决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发动在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大会认为，党的基本任务是采取最有力最坚决的措施来加强工人和农民的自觉纪律和纪律，发动群众作好奋勇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准备，组织红军，对人民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

大会确认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正确，谴责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立场，痛斥了已遭失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在这次会上继续进行分裂活动。

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使党有可能赢得时间来巩固苏维埃政权，调整全国的经济。

和约的缔结，使得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奥德两国同协约国在继续进行战争），瓦解敌人的力量，组织苏维埃经济，建立红军。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462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页。——译者注

和约的缔结，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保持农民对自己的支持，为在
国内战争时期击溃白卫将军们积蓄力量。

在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教导布尔什维克党，当具备进攻所必需
的条件时应怎样大胆坚决地进攻。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列宁教
导党，当敌人力量显然超过我方力量时，应怎样有秩序地退却，以
便用最大的努力准备对敌人实行新的进攻。

历史证明了列宁路线完全正确。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更改党的名称和修改党纲的决
定。党开始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列宁
提议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是因为这个名称准确地符合党的目
标——实现共产主义。

选出了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起草新党纲，
列宁拟定的草案被采纳为党纲的基础。

这样，第七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击败了党
内暗藏的敌人“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使俄国退出了帝
国主义战争，争得了和平即喘息时机，使党赢得了时间来组织红
军，向党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要求。

八 列宁关于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 划。贫农委员会和制裁富农。“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及其被镇压。苏维 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 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通过

苏维埃政权在缔结了和约和取得了喘息时机后，就着手开展
社会主义建设。从 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2 月这个时期，列宁称

之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苏维埃政权在1918年上半年成功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工厂、银行、铁路、对外贸易、商船等等），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机构，胜利地消灭了反革命势力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次尝试。

但这一切还远远不够。要前进，还必须从破坏旧制度转到建设新制度。因此，在1918年春，就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过渡——“从剥夺剥夺者”过渡到组织上巩固既得的胜利，即过渡到建设苏维埃国民经济。列宁认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喘息时机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应该学会按新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管理生产。列宁写道，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夺取了俄国，从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列宁说，现在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学会管理俄国。

列宁认为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中所生产的东西进行计算，对一切产品的消费实行监督。当时国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在经济中占优势。城乡千百万小业主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土壤。这些小业主既不承认劳动纪律，也不承认全国纪律；他们既不服从计算，也不服从监督。在这个困难时刻，特别危险的是小资产阶级投机谋利的自发势力和小业主、小商人利用人民困苦来发财的行为。

党同生产中的松懈现象、同工业中缺乏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斗争。群众养成新的劳动习惯很缓慢。因此，加强劳动纪律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列宁指出，必须在工业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实行计件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在采取说服教育办法的同时还要用强制手段对付那些想从国家手里多捞一些的、游手好闲的和投机倒把的分子。列宁认为新的纪律，即劳动纪律、同志关系纪律、苏维埃纪律，是由

千百万劳动者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培养起来的。他指出：“这件事情要占去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44页）^①

所有这些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这些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问题，都由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一名著中阐明了。

“左派共产主义者”配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这些问题上也发动了反对列宁的斗争。布哈林和奥新斯基等人反对建立纪律，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反对在工业中利用专家，反对实行经济核算。他们诬蔑列宁，硬说实行这样的政策就是回到资产阶级秩序。同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宣扬托洛茨基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在俄国是不可能的。

“左派共产主义者”用“左的”词句作掩护，来维护那些反对纪律、敌视国家调节经济生活、敌视计算和监督的富农、懒汉和投机分子。

党在解决了组织新的即苏维埃的工业问题之后，就来解决农村问题。当时农村里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十分激烈。富农得了势，夺取了从地主那里剥夺来的土地。贫农急需帮助。富农同无产阶级国家作斗争，拒绝按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想借助饥荒迫使苏维埃国家放弃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党提出了打垮反革命富农的任务。为了把贫农组织起来和顺利地反对拥有余粮的富农，组织了工人下乡运动。

列宁写道：“工人同志们！你们要记着，革命情况危急。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才能拯救革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人。我们需要几万名精悍、先进、忠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决不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75页。——译者注

会受贿行窃，而能组成钢铁一般坚强的力量去反对富农，反对投机者，反对抢劫者，反对贪赃受贿者，反对捣乱者。”（《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3卷第25页）^①

列宁说：“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当时就是在这个口号下来组织工人下乡运动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实行粮食专卖并赋予粮食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的特别权力。

根据1918年6月11日法令成立了贫农委员会（贫委）。贫委在同富农斗争中，在重新分配没收的土地和分配农具方面，在收购富农的余粮方面，在为工人中心区和红军供应粮食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富农的五千万公顷土地转到了贫农和中农手中。富农的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被没收来给了贫农。

成立贫农委员会是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又一个阶段。贫委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据点。当时用农村居民编建红军基干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贫委来进行的。

无产者的下乡运动和贫农委员会的成立，巩固了农村的苏维埃政权，对于争取中农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1918年底，贫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同农村的苏维埃合并而不再存在了。

1918年7月4日，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在这次会议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一场激战来反对列宁，维护富农。他们要求停止反富农的斗争，要求放弃派遣工人征粮队去农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看到他们的路线受到大会多数的坚决回击，便在莫斯科发动了叛乱，占据了三仙巷，接着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射击。但是经过几小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这次冒险行

^① 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64页。——译者注

动就被布尔什维克镇压下去了。在国内其他许多地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地方组织也企图暴动，但是这种冒险行动不管在哪里都很快被扑灭了。

正如现在对反苏的“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的审判所证实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知道和同意的，并且是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总计划的一部分。

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勃柳姆金（后来成了托洛茨基的代理人）钻进德国使馆刺死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同德国的战争。但是，苏维埃政府成功地防止了战争，使反革命分子的挑拨未能得逞。

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即第一个苏维埃宪法。

简短的结论

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2月至10月的八个月中完成了极其困难的任务：争得了工人阶级和苏维埃中的多数，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方面来。它使这些群众摆脱了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它一步一步地揭露了这些政党的反对劳动者利益的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在前线和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工作，组织群众作好了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

在党的这一段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列宁的回国，列宁的四月提纲，党的四月代表会议和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人阶级从党的决议中汲取了力量和胜利的信心，找到了对革命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四月代表会议指引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第六次代表大会把党指向实行武装起义去推翻资产阶级及其临时政府的目标。

妥协主义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共产主义党派，结束了自己的发展过程——还在十月革命前它们都已经成了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完整无损的资产阶级党派。布尔什维克党独自领导了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同时，布尔什维克粉碎了党内投降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想使党离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企图。

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联合贫苦农民，并在士兵和水兵的支持下，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转交农民使用，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剥夺了资本家，争取到退出战争而赢得了和平，获得了必要的喘息时机，从而创造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击溃了资本主义，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工厂、土地、铁路和银行变成了全民财产，即公共财产。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把一个巨大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工人阶级，从而使它成了统治阶级。

这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元。

第 八 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

(1918—1920年)

一 外国武装干涉的开始。 国内战争的第一个时期

苏维埃政权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并通过一系列经济方面的革命措施而得到巩固(当时西方正在酣战)，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极大的惊慌。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担心，德俄两国缔结和约会有利于德国的作战地位，而相应地增加协约国前线军队的困难。其次，他们担心，俄德之间建立和平会加强各国和各战场要求和平的趋向，从而破坏战争事业，破坏帝国主义者的事业。最后，他们担心，苏维埃政权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的存在以及它在推翻那里的资产阶级政权后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会使西方工人和士兵受到传染，因为西方工人和士兵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深感不满，可能效法俄国人，掉转枪口反对本国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因此，各协约国政府决定开始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干预)，以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成立资产阶级政权，认为这样一来就能恢复俄国的资产阶级秩序，取消对德和约，恢复对德奥的作战。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所以乐意干这种黑暗勾当，还因为他们深

信苏维埃政权不稳固，以为只要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稍微努一把力，苏维埃政权必然很快灭亡。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巩固，引起了被推翻的阶级（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被打倒的党派（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及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白卫将军和哥萨克军官等等更大的惊慌。

所有这些敌对分子，从十月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起，就到处叫嚷：苏维埃政权在俄国没有根基，它注定要失败，它经过一两个星期、一个月、至多两三个月就会灭亡。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在敌人诅咒下继续存在而且不断巩固，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得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要比他们先前想象的强大得多；要推翻苏维埃政权，需要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很大的努力，来一场激战。因此，他们决定广泛地进行反革命叛乱工作来纠集反革命力量，搜罗军事干部，组织叛乱，首先是在哥萨克和富农聚居的地区组织叛乱。

由此可见，还在 1918 年上半年就已经形成了两股准备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明显势力：协约国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俄国内部的反革命势力。

这两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势力，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推翻苏维埃政权。俄国的反革命势力虽然有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所必需的相当的军事干部以及相当的人力——主要是哥萨克上层分子和富农，但没有金钱和武器。反之，外国帝国主义者有金钱和武器，但不可能“抽出”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武装干涉，这不仅因为这些力量必须用于对德奥作战，而且因为这些力量用于反苏维埃政权会不十分可靠。

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条件迫使国内外这两股反苏势力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就在 1918 年上半年形成了。

这样，就形成了以俄国内部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反革命叛乱为

内应的外国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

这样，喘息时机结束了，俄国的国内战争，即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内外敌人的战争开始了。

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没有宣战就发动了武装干涉，虽然这种武装干涉是对俄国的战争，并且是一种最坏的战争。这些“文明”强盗不声不响地偷偷摸到俄国边境，驱使自己的军队在俄国登陆。

英国人和法国人驱使军队在俄国北部登陆，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牟尔曼斯克，支持当地的白卫叛乱，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白卫的“俄国北方政府”。

日本人驱使军队在海参崴登陆，夺取了沿海边区，解散了苏维埃，支持白卫叛乱分子，使这些叛乱分子得以在后来恢复资产阶级秩序。

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和邓尼金这几个将军在英法支持下组织了白卫“志愿军”，发动了哥萨克上层分子的叛乱，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

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两个将军在德帝国主义者秘密支持下（德国人不敢公开支持他们，因为同俄国订有和约）发动了顿河哥萨克的叛乱，占领了顿河区，开始向苏维埃大举进攻。

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策动，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这个军是战俘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允许他们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但是中途他们受社会革命党人和英国人法国人的利用而举行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这个军的叛乱成了一个信号，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富农、沃特金斯克工厂和伊热夫斯克工厂同情社会革命党的工人跟着也举行叛乱。伏尔加河流域成立了萨马拉白卫一社会革命党人政府。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白卫政府。

德国没有参加而且也不可能参加英法日美联盟所进行的这次武装干涉，因为——至少是因为——它同这个联盟还处于交战状态。但是，虽然如此，虽然订有俄德和约，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深知威廉皇帝的德国政府也如英法日美干涉者一样，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敌人。而德帝国主义者也确实在竭尽一切努力来孤立、削弱和消灭苏维埃国家。他们从苏维埃俄国（诚然是按他们和乌克兰拉达^①订立的“条约”）夺去了乌克兰，应乌克兰白卫拉达之请派兵进驻乌克兰，残暴地掠夺和压迫乌克兰人民，禁止他们同苏维埃俄国保持任何联系。他们从苏维埃俄国夺去了南高加索，应格鲁吉亚和阿捷尔拜疆的民族主义者之请派去了德国和土耳其的军队，在梯弗里斯和巴库横行霸道。他们千方百计（虽然是暗地里）用武器和粮食援助在顿河区进行叛乱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反对苏维埃政权。

这样，苏维埃俄国同自己主要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苏维埃俄国在这一时期很困难。面包不够。肉类不够。饥饿折磨着工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人每两天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磅的面包。甚至还有根本得不到面包的时候。工厂因为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停工或几乎停工。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灰心丧气。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灰心丧气。这一时期所遭到的极大困难和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证明工人阶级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具有极其巨大和无法估计的力量。

党宣布全国为军营，并把全国的经济生活 and 文化政治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苏维埃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人民进行抗战。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几十万工人和农

① 乌克兰拉达即乌克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1917年成立，1918年被推翻。——译者注

民志愿加入红军、奔赴前线。党员和共青团员约有一半上了前线。党发动人民起来进行卫国战争，抗击外国武装干涉军的侵犯，消灭被革命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叛乱。列宁组织的工农国防委员会负责为前线供应人员、粮食、服装和武器。志愿兵改为义务兵，使红军得到几十万新兵的补充；红军在短时期内就成了一支百万大军。

尽管国内状况十分困难，尽管红军很年轻、还来不及巩固，但由于采取种种防御措施，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克拉斯诺夫将军已经被撵出他认为保证能固守的察里津，而且被赶到顿河区以外。邓尼金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北高加索的狭小地区，科尔尼洛夫将军则在与红军交战时被打死。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社会革命党白卫匪帮被赶出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并被压迫到乌拉尔。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团长洛卡尔特策动白卫分子萨文可夫在雅罗斯拉夫里进行的叛乱已被粉碎，洛卡尔特被捕。刺杀了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同志并恶毒地谋害过列宁的社会革命党人，因搞反布尔什维克的白色恐怖而受到红色恐怖的惩治，在俄国中部一切较为重要的地点都已被打垮。

年轻的红军在同敌人的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

当时在红军中任政治委员的共产党员，在巩固红军、进行政治教育、加强战斗力和纪律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

布尔什维克党知道，红军的这些成就还不能解决问题，还仅仅是它的初步成就。党知道，前面还有新的更加严重的战斗，只有同敌人进行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之后，国家才有可能收复失去的粮食、原料和燃料产区。因此，布尔什维克加紧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决定使整个后方都来为前线服务。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除对大工业实行监督外，对中小工业也实行监督，以便积蓄日用品供应军队和农村。它实行了粮食贸易垄断制，禁止私

人买卖粮食，规定了余粮收集制，以便掌握农民的余粮数字、搞好粮食储备、向军队和工人供应粮食。最后，它实行了遍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党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强制的体力劳动，从而腾出工人去从事其他的对前线更为重要的工作，这样就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为了适应极其困难的防御条件而暂时采取的这一整套措施，就叫作战时共产主义。

国家准备同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敌人进行长期的严重的国内战争。它应当使军队人数到 1918 年底增加两倍。它应当积蓄供应这个军队的物资。

列宁当时指出：

“我们原来决定到春天建立一支一百万人的军队，现在我们需要三百万人的军队了。我们能够有这样多的军队。我们一定会有这样多的军队。”^①

二 德国的军事失败。德国的革命。第三国际的成立。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正当苏维埃国家准备对外国武装干涉进行新的战斗的时候，在西方，在各交战国的后方和前线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当时德国和奥地利被战争和粮荒压得喘不过气来。英、法和北美还能不断挖掘新的潜力，而德国和奥地利连最后一点潜力也快耗尽了。精疲力竭到了极点的德国和奥地利，眼看很快就要失败。

同时在德奥两国内部，民怨沸腾，怨恨战争无休无止、招致灭亡，怨恨两国帝国主义政府把人民弄到精疲力竭和饥饿的境地。十

^① 见《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87 页。——译者注

月革命的伟大革命影响，布列斯特和约前就发生过的苏维埃士兵同奥德士兵在前线的联欢，以及后来同苏维埃俄国停战媾和本身的影响，在这里也起了作用。俄国人民通过推翻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而结束了可恨的战争，这个实例不能不给奥德工人以教育。而德军方面那些原先在东线、到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又调到西线的士兵，通过讲述他们先前怎样同苏维埃士兵联欢以及苏维埃士兵怎样摆脱了战争，也不能不在西线造成军心的瓦解。至于奥地利军队，还要更早一些，就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开始瓦解了。

由于这一切情况，德军中要求和平的趋向加强了，他们已经没有先前那样的战斗力了，他们开始在协约国军进攻之下节节败退；而在德国本国，于1918年11月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威廉及其政府。

德国不得不承认战败，并向协约国求和。

这样，德国这个头等强国一下子就降到二等强国的地位。

从苏维埃政权的地位来看，这种情况有某些消极的作用，因为它使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的协约国变成了欧亚两洲的统治力量，使它们有可能对苏维埃国家加强武装干涉和实行封锁，加紧围困苏维埃政权。结果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往下就可看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情况还有更为重大的积极的作用，即从根本上缓和苏维埃国家处境的作用。第一，苏维埃政权有了可能废除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停付赔款和进行公开的斗争（军事的和政治的）来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和南高加索从德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这也是主要的），在欧洲的心脏德国存在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必然会使欧洲各国革命化，而且也确实使它们革命化了，这就不能不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当然，德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苏维埃是资产阶级议会的驯服工具，因为在苏维埃

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俄国孟什维克那样的妥协派，因而德国革命是软弱无力的。德国白卫分子可以任意杀害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这样著名的革命家而不受到制裁，仅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德国的革命软弱无力到何等地步。但它终究是一场革命。威廉被推翻了，工人挣脱了锁链，单是这一点就不能不发动西方的革命，不能不引起欧洲国家革命的高潮。

欧洲的革命高潮开始了。奥地利的革命运动展开了。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欧洲各国共产党在革命浪潮基础上出现了。

现在有了把各国共产党统一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现实基础。

1919年3月，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虽然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迫害阻挠了许多代表来莫斯科，但是欧美各重要国家的代表还是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领导了大会的工作。

列宁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中，说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指出它是真正的劳动者的民主。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的宣言，号召他们为在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苏维埃在各国胜利而坚决奋斗。

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为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执行机关。

这样，就成立了新型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共产国际，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

1919年3月，一方面协约国反动联盟加紧反对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欧洲（主要是战败国）的革命高潮大大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在这样一种矛盾情况下，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百零一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万三千七百六十六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零二人。

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第一句话就是悼念大会开幕前夜逝世的布尔什维克党优秀组织者之一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党纲说明了资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特征。党纲对比了两种国家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党纲详细地指出了党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具体任务：把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按照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管理全国经济，使工会参加组织国民经济的工作，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纪律，在国民经济中由苏维埃机关监督利用专家，逐渐地有计划地吸收中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采纳了列宁的建议：在党纲上除载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定义外，还把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旧党纲说明工业资本主义和简单商品经济的那一部分写进去。列宁认为，在党纲上必须估计到我国经济的复杂情况，指出国内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其中包括中农所代表的小商品经济。因此，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反对布哈林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因为布哈林建议把关于资本主义、关于小商品生产、关于中农经济的条文从党纲上删去。布哈林的这种观点，就是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否认中农在苏维埃建设中的作用的观点。同时，布哈林又抹杀富农分子正从小农商品经济中产生和滋长的事实。

列宁还驳斥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布尔什维主义观点。他们反对把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写进党纲，反对民族平等，借口是这个口号会妨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妨碍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列宁驳倒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这种极其有害的大国沙文主义观点。

关于对中农的态度问题，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工作中占着

重要的地位。由于实现了著名的土地法令，农村愈来愈中农化了，现在中农已在农村居民中占多数。中农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他们的情绪和态度对于国内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至关重要。国内战争的结局如何，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中农倒向哪一边，取决于哪一个阶级（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能吸引中农跟自己走。捷克斯洛伐克军、白卫分子、富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 1918 年夏在伏尔加河流域所以能推翻苏维埃政权，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农支持了他们。富农在俄国中部举行叛乱时情形也是如此。但是从 1918 年秋天起，中农群众在情绪上开始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农民已经看到，白军胜利的结果就是：地主重新掌权，农民土地被夺，农民遭受掠夺、鞭笞和折磨。贫农委员会击败富农，也促进了农民情绪的转变。因此列宁在 1918 年 11 月提出了如下的口号。

“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只是牢牢地依靠贫农。”（《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3 卷第 294 页）①

当然，中农还没有完全停止动摇，但是他们比过去更接近苏维埃政权、更牢靠地支持苏维埃政权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对中农的政策，大大促进了这点。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党对中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列宁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确定了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路线。大会要求党的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严格地把中农与富农区别开、划分开，通过关心中农的需要把中农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必须用说服的方法，而绝不要用强制、暴力去克服中农的落后性。因此，大会指示，在农村中实行社会主义措施（成立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时，不允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612 页。——译者注

许采取强制手段。凡涉及中农切身利益的场合，都要同他们达成实际的协议，例如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上要对中农让步。大会提出实行这样的政策：在保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列宁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对中农的新政策，要求无产阶级依靠贫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对富农作斗争。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大体上是实行中立中农的政策。这就是说，党争取中农不站到富农方面去，不站到一般资产阶级方面去。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够了。第八次代表大会从中立中农的政策转到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以反对白匪帮和外国武装干涉，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大会对基本农民群众即中农所采取的路线，对于胜利地结束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及其白卫走狗的国内战争，起了决定的作用。1919年秋，正当需要在苏维埃政权和邓尼金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农民支持了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就战胜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

关于红军的建设问题在会上占有特殊地位。会上出现了所谓“军事反对派”。它联合了不少先前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但是，除了已被打垮的“左派共产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参加“军事反对派”的，还有从未参加任何反对派但对托洛茨基在军队中的领导表示不满的工作者。大多数军人代表都激烈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他崇拜来自旧沙皇军队的军事专家（其中有一部分在国内战争时期直接背叛了我们），反对他对军队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干部采取傲慢和敌视的态度。会上举出的许多“来自实践”的例子证明，托洛茨基曾企图枪毙许多他所不喜欢的在前线担任军事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借以帮助敌人；只是由于中央的干涉和军事工作人员的抗议，这些同志才幸免于死。

“军事反对派”虽然反对托洛茨基对党的军事政策的歪曲，但是在军事建设的许多问题上维护不正确的观点。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地反对了“军事反对派”，因为这个派别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军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队。斯大林同志在反驳“军事反对派”时要求建立一支纪律非常严格的正规军。

斯大林同志说：“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工农的、主要是农民的军队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遭到灭亡。”^①

大会否决了“军事反对派”的一系列提案，同时给了托洛茨基以打击，要求改进中央军事机关的工作，要求加强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作用。

由于大会成立的军事小组进行了工作，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使红军得到了加强，使它跟党进一步接近了。

其次，大会讨论了党和苏维埃的建设问题，即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问题。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回击了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的机会主义集团，因为他们否认党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最后，由于新党员大批涌入党内，大会通过了关于改善党的社会成分和重新进行登记的决议。

这是第一次清党的开始。

^① 参看《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22页。——译者注

三 武装干涉的加剧。苏维埃国家被封锁。 高尔察克的进攻及其被粉碎。邓尼金 的进攻及其被粉碎。三个月的喘息时 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协约国把德国和奥地利打败之后，决定投入大批兵力来反对苏维埃国家。在德国战败、德军退出乌克兰和南高加索后，英法两国就取代了德国，把自己的军舰开进了黑海，派兵在敖德萨和南高加索登陆。协约国武装干涉者在占领区横行霸道，残暴到竟然整批整批地屠杀工农。到后来占领土尔克斯坦时，武装干涉者甚至猖狂到将邵武勉、菲奥列托夫、查帕里泽、马里根、阿集兹别科夫、柯尔加诺夫等二十六个巴库布尔什维克领导同志解到里海东岸，在社会革命党人协助下把他们残暴地枪杀了。

不久，武装干涉者宣布对俄国实行封锁。所有同外界来往的海上的和其他的通道，都被切断了。

于是，苏维埃国家陷入了几乎四面受围的境地。

当时协约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傀儡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高尔察克被宣布为“俄国最高执政”。俄国一切反革命势力都听命于他。

于是，东线成了主要战线。

1919年春，高尔察克纠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差不多推进到伏尔加河畔。为反对高尔察克派去了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力量，动员了共青团员和工人。1919年4月，红军大败高尔察克。不久高尔察克的军队开始全线退却。

正当红军在东线的攻势达到高潮的时候，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可疑的计划：在乌拉尔停下来，对高尔察克军队停止追击，把军队

从东线调往南线。党中央很明白，不能让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留在高尔察克手中，不能让他在那里靠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帮助恢复元气和重新站稳脚跟，因此否定了这个计划，指示继续进攻。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一指示，提出辞职。中央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辞职，同时责令他立刻停止参加对东线战事的领导。红军开始更猛烈地向高尔察克展开进攻，使高尔察克遭到了一连串新的失败，并在白军后方的强大游击运动的支持下从白军手里解放了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1919年夏，帝国主义者责成领导西北方面（波罗的海沿岸，彼得格勒附近）反革命势力的尤登尼奇将军向彼得格勒进攻，借以转移红军对东线的注意。彼得格勒附近两个炮台的守备部队受旧军官的反革命煽动，发动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在前线司令部中又发现了反革命阴谋。彼得格勒岌岌可危。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措施，在工人和水兵的支持下，从白军手中解放了两个叛乱的炮台，打败了尤登尼奇军队，把尤登尼奇驱逐到爱沙尼亚去了。

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失败，有利于反高尔察克的斗争。1919年底，高尔察克军队被彻底击溃。高尔察克本人被俘，根据革命委员会的判决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

这样高尔察克就完结了。

当时，西伯利亚民间流传着一首讥讽高尔察克的歌谣：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叶，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脱落了，
烟叶吸完了，
执政王不见了。”

武装干涉者看到高尔察克没有实现他们所寄托于他的希望，就改变了他们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敖德萨的陆战队不得不撤回，因为武装干涉者的军队同苏维埃共和国军队接触后受到了革命精神的感染，开始起来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者。例如，敖德萨法国水兵举行了起义。因此现在，在高尔察克被击溃以后，协约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科尔尼洛夫的同僚和“志愿军”的组织者邓尼金将军身上。当时邓尼金正在南俄库班地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勾当。协约国供应邓尼金军队大批武器装备，驱使他北上去反对苏维埃政权。

于是，南线这次成了主要战线。

1919年夏，邓尼金开始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大进军。托洛茨基把南线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使我军接二连三遭到失败。到10月中旬，白军控制了整个乌克兰，攻占了奥勒尔，逼近到供应我军子弹、步枪和机关枪的土拉。白军向莫斯科进逼。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党敲起警钟，号召人民奋起抵抗。列宁提出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口号。在布尔什维克鼓舞下，工人和农民集中了全力来歼灭敌人。

为了组织好歼灭邓尼金的战事，中央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布琼尼四同志派往南线。托洛茨基被撤销领导南线红军作战的职权。在斯大林同志来到以前，南线指挥部同托洛茨基一起曾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从察里津经顿河草原前往诺沃罗西斯克，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突击，但红军在顿河草原会遇到完全没有道路的地带，并且还要经过当时很大一部分居民还受白卫影响的哥萨克地区。斯大林同志尖锐地批评了这个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歼灭邓尼金的计划：取道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对邓尼金施行主要突击。这个计划保证我军能迅速前进去攻打邓尼金，因为在我军经过的工农地区，人心显然是归向我们的。

此外，这个地区有稠密的铁路网，使我军有可能按时获得一切必需品的供给。最后，实行这个计划，就能解放顿巴斯，保证我国燃料的供给。

党中央采纳了斯大林同志的计划。1919年10月下旬，邓尼金经过激烈的抵抗以后，在奥勒尔附近和沃龙涅什附近的两次决战中被红军击败。邓尼金开始迅速退却，随后在我军追击下向南逃窜。1920年初，整个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都从白军手中解放了。

在南线两次决战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又把尤登尼奇军调来进攻彼得格勒，以牵制我南线兵力，缓和邓尼金军队的处境。白军进抵彼得格勒城下。彼得格勒英勇的无产阶级挺身捍卫第一个革命之城。和往常一样，共产党员战斗在最前列。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白军被击败，重新被逐出我国国境，被赶到爱沙尼亚去了。

这样，邓尼金也完结了。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以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

帝国主义者看到白卫军队被击败，武装干涉不成功，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巩固起来，而在西欧，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又使工人的愤懑情绪不断高涨，于是他们开始改变自己对苏维埃国家的态度。1920年1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停止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

这是武装干涉墙壁上打开的一大缺口。

当然这并不是说苏维埃国家已消灭了武装干涉和结束了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波兰进犯的危险依然存在。远东、南高加索和克里木的武装干涉者还没有被彻底赶走。但是苏维埃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时机，可以集中更多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党有了可能来处理经济问题。

国内战争时期，许多熟练工人因为工厂关闭而离开了生产。

现在党动员熟练工人回到生产岗位，从事本行工作。几千名共产党员被派去恢复情况严重的运输业。如果不恢复运输业，就无法切实地恢复基本工业部门。粮食工作加强了和改进了。开始制定俄罗斯电气化计划。近五百万现役红军战士由于存在战争危险，暂时还不能复员。因此一些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劳动军**，用来搞经济建设。工农国防委员会改成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为了协助它工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于1920年3月底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五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二人。

大会规定了国家在运输业和工业方面当前的经济任务，并特别指出工会必须参加经济建设。

大会对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特别注意，这个计划要求首先发展运输业、燃料业和冶金业。关于整个国民经济电气化的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占有主要的地位，这是列宁提出的“10—20年的伟大纲领”^①。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那个著名的计划，现在它已远远超额完成了。

大会回击了反党的“民主集中派”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反对在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而坚持在工业领导方面事事都实行“集体领导”，完全不要专人负责。这个反党集团中的主要角色是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和弗·斯米尔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他们的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① 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4页。——译者注

四 波兰地主对苏维埃国家的进攻。弗兰格尔将军的袭击。波兰计划的失败。弗兰格尔的溃败。武装干涉的结束

虽然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击溃，虽然苏维埃国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从白军手中解放了北部边区、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顿河区、乌克兰等等，虽然协约国被迫取消了对俄国的封锁，但是协约国仍然不甘心承认苏维埃政权坚不可摧，苏维埃政权不可战胜。因此，他们决定再作一次武装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尝试。这次他们决定，一方面利用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波兰国家的实际首脑皮尔苏茨基，另一方面还利用在克里木收集了邓尼金的残兵败将并从那里威胁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弗兰格尔将军。

按照列宁的说法，地主波兰和弗兰格尔是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用来掐死苏维埃国家的两只手。

波兰人的计划是，占领苏维埃乌克兰的河西地区^①，占领苏维埃白俄罗斯，在这两个地区恢复波兰地主政权，把波兰国界扩大到“由一海到另一海”，即由但泽到敖德萨，并且帮助弗兰格尔击败红军，在苏维埃俄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以报答弗兰格尔对他们的帮助。

这个计划得到了各协约国的赞同。

苏维埃政府为了保持和平、防止战争，试图同波兰进行谈判，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皮尔苏茨基无意谈和，只想打仗。他认为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打得疲惫不堪的红军抵挡不住波兰军队的进攻。

短暂的喘息时机结束了。

1920年4月，波兰军队入侵苏维埃乌克兰，占领了基辅。同

^① 指乌克兰境内德涅泊河以西地区。——译者注

时，弗兰格尔也转入进攻，开始威胁顿巴斯。

作为对波军进攻的回答，红军部队展开了全线反攻。南线红军部队解放了基辅、把波兰地主赶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一鼓作气，一直打到加里西亚的里沃夫城下，而西线红军部队则逼近了华沙。波兰地主军队的彻底失败，已经指日可待了。

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红军总司令部中的拥护者的可疑行动，破坏了红军的成功。由于托洛茨基和土哈切夫斯基的过错，西线红军部队向华沙方面的进攻毫无组织：没有让部队巩固已占领的阵地，先头部队前进得太远，预备队和弹药远远落在后方，先头部队因此没有弹药、没有预备队，战线过长而易于被突破。由于这一切，当波军一个不大的集团突破我西线一点的时候，缺乏弹药的我军不得不实行退却。至于进抵里沃夫城下压迫着该处波军的我南线部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却禁止他们攻占里沃夫，并命令他们把骑兵集团军即南线主力远远地调往东北，似乎是去援助西线，虽然不难明白，攻占里沃夫是对西线唯一可能的和最好的援助。但是骑兵集团军退出南线和离开里沃夫，实际上意味着我军在南线也实行退却。这样，就是托洛茨基的有害的命令迫使南线部队实行莫名其妙的、毫无根据的退却，而使波兰地主兴高采烈。

这是直接的援助，但不是对我西线的援助，而是对波兰地主和协约国的援助。

过了几天，波兰军队的进攻被阻止住了，我军开始准备向波军发起新的反击。但是波兰无力再战，又怕红军反击，不得不放弃占领乌克兰的河西地区和白俄罗斯的奢望，愿意同俄国缔结和约。1920年10月20日，在里加同波兰缔结了和约，根据和约波兰保留了加里西亚以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

苏维埃共和国同波兰缔结和约后，决定消灭弗兰格尔。弗兰

格尔从英法方面得到了最新式的武器：装甲车、坦克、飞机和装具。他拥有白卫突击部队，主要是军官部队。但是弗兰格尔没能给他在库班和顿河区登陆的部队纠集起多少可观的农民和哥萨克力量。然而弗兰格尔仍推进到了顿巴斯附近，威胁着我们的产煤区。苏维埃政权所以处于很困难的境地，还因为红军这时已经相当疲惫。当时红军战士必须在空前困难的条件下推进，既要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又要消灭援助弗兰格尔的马赫诺无政府主义匪帮。但是，虽然弗兰格尔拥有技术上的优势，虽然红军根本没有坦克，红军还是把弗兰格尔驱逐到克里木半岛上去了。1920年11月，红军攻占了皮列柯普筑垒阵地，冲进了克里木，击溃了弗兰格尔部队，从白军和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克里木。克里木成为苏维埃的了。

武装干涉时期以波兰大国民主义计划的破产和弗兰格尔的溃败而宣告结束。

1920年底，南高加索开始从阿捷尔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木沙瓦特派、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阿尔明尼亞达什纳克党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在阿捷尔拜疆、阿尔明尼亞和格鲁吉亚胜利了。

但这还不是说武装干涉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在远东的武装干涉一直继续到1922年。此外，还有过组织武装干涉的新尝试（在东方有哥萨克军队首领谢明诺夫和男爵翁格恩，在卡列里亚有芬兰白军1921年的干涉）。但是苏维埃国家的主要敌人，武装干涉的主要力量，到1920年底已经被击溃了。

外国武装干涉者和俄国白卫分子的反苏维埃战争，以苏维埃胜利而告终。

苏维埃共和国保卫住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和自由生存。

这是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结束。

这是苏维埃政权的历史性胜利。

五 苏维埃国家怎样和为什么战胜了 英法日波武装干涉和俄国资产阶 级地主白卫反革命的联合势力？

只要看看武装干涉时期的欧美重要报刊，马上就可以肯定：没有一个有名的著作家（军事的或非军事的）或军事专家相信，苏维埃政权会获得胜利。相反，所有有名的著作家、军事专家、研究各国和各民族革命的历史学家即所谓学者，都异口同声地叫喊，苏维埃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苏维埃政权的失败必不可免。

他们确信武装干涉必获胜利的根据是，苏维埃国家还没有已经组织好的红军，还得临时建立，即所谓边打边建，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拥有比较现成的军队。

其次，他们的根据是，红军缺乏有经验的军事干部，因为这样的干部大多数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拥有这样的干部。

再次，他们的根据是，由于俄国军火工业落后，红军的武器弹药数量少、质量差，而从其他国家获得军用品又不可能，因为俄国被包围得水泄不通，而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却大批获得而且今后会继续获得头等的武器、弹药和军服的供给。

最后，他们的根据是，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当时占领了俄国最富饶的产粮区，而红军失去了这样的地区，痛感粮食不足。

的确，所有这些缺点和不足在红军部队中确实都有过。

在这方面，但也只是在这方面，武装干涉者老爷们是说得完全对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这么多严重缺陷的红军战胜了没有这些

缺陷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呢？

(一)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所捍卫的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人民认识到和了解到这一政策是正确的政策，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对它支持到底。

布尔什维克知道，为不正确的、人民所不支持的政策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拥有一切：有经验的老指挥官、头等的武器、弹药、军服、粮食。但是就少一件——俄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因为俄国各族人民不愿意支持也不可能支持武装干涉者和白卫“执政”的反人民政策。因此，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军队失败了。

(二)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彻底忠实于和献身于自己的人民，因此人民也爱戴它、支持它，把它看作自己的、亲同骨肉的军队。红军是人民的儿子，只要它象儿子对待母亲那样忠实于自己的人民，它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一定会胜利。而反对本国人民的军队一定会失败。

(三)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整个后方、整个国家来为前线的需要服务。军队如果没有坚固的、全力支持前线的后方，必然要遭到失败。布尔什维克知道这点，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全国变成了一个为前线供应武器、弹药、军服、粮食、兵员的军营。

(四)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甲)红军战士了解战争的目的和任务，认识到了这些目的和任务的正确；(乙)由于认识到了战争的目的和任务的正确，红军战士加强了纪律性和战斗力；(丙)因此，广大红军战士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往往表现出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空前的普遍的英雄主义。

(五)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红军的后方和前线的领导核心

是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一个由于自己的团结和纪律而统一的党，一个由于具有革命精神、具有为共同事业的胜利牺牲一切的决心而强有力的党，一个善于组织千百万群众并在复杂环境中正确领导他们的出色的党。

列宁说：“只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戒，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只因为有这一切，才使目前的奇迹能够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我们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

（《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96页）^①

(六)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甲)它在自己的队伍中锻炼出了伏龙芝、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这样一些新型的军事领导者；(乙)在它的队伍中战斗的有柯托夫斯基、恰巴也夫、拉佐、肃尔斯、帕尔霍缅柯等许多有才能的英雄；(丙)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的是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古比雪夫、米高扬、日丹诺夫、安得列也夫、彼得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捷尔任斯基、沙金柯、美赫利斯、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等这样一些活动家；(丁)红军有政治委员这样出色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团结了红军战士的队伍，培养了战士遵守纪律和英勇作战的精神，有力地(迅速和无情地)制止了个别指挥员的叛变行为，而另一方面，又大胆和坚决地维护了献身于苏维埃政权并能果断地领导红军部队的那些指挥员(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的威信和荣誉。

列宁说：“没有政治委员，我们就没有红军。”^②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8—159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5页。——译者注

(七)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在白卫军队的后方，即在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和弗兰格尔的后方，有出色的党员和非党员布尔什维克在进行地下工作。他们发动工农起义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后方，从而给红军的进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家知道，乌克兰、西伯利亚、远东、乌拉尔、白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游击队，通过破坏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的后方，给了红军不可估量的帮助。

(八)红军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在反对白卫反革命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及其成功，赢得了全世界无产者的同情和援助。当帝国主义者企图用武装干涉和封锁来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国家的工人站在苏维埃方面，援助苏维埃。这些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的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促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放弃武装干涉。英法和其他参加武装干涉的国家的工人举行罢工，拒绝装载军用品去援助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建立了以“不许干涉俄国！”作为自己口号的“行动委员会”。

列宁说：“只要国际资产阶级向我们举起拳头来，他们的手就会被本国工人抓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05页)^①

简短的结论

被十月革命打倒的地主资本家同白卫将军们一起，牺牲祖国的利益，同各协约国政府勾结，想共同用武力来进攻苏维埃国家，来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和俄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76页。——译者注

国边沿地区的白卫叛乱，结果俄国同粮食和原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了。

德国的军事失败和两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欧洲战争的结束，导致协约国的加强，武装干涉的加强，给苏维埃国家增加了新的困难。

另一方面，德国的革命和欧洲国家中开始的革命运动，却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缓和了苏维埃国家的处境。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工人和农民进行卫国战争，反对外国侵略者和资产阶级地主的白卫匪帮。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把协约国的傀儡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弗兰格尔一个接一个地相继打败，把协约国的另一个傀儡皮尔苏茨基驱逐出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而击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干涉军赶出了苏维埃国境。

这样，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次武装进攻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被革命打倒的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在武装干涉时期支持白卫将军和武装干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搞反革命阴谋，对苏维埃活动家搞恐怖活动。这些十月革命前在工人阶级中还有某些影响的党派，在国内战争时期已在人民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是反革命党派。

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是这些党派在政治上灭亡和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彻底胜利的时期。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党在过渡到恢复 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时期

(1921—1925年)

一 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的 苏维埃国家。恢复时期的困难

苏维埃国家在结束战争以后，开始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必须医治战争创伤。必须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整顿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但是，过渡到和平建设这件事，必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进行。国内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国家被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反武装干涉战争弄得贫穷不堪。

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而且战前水平还是沙俄那个贫困农村的水平。不仅如此，1920年还有许多省份歉收。农民经济情况困难。

工业情况更坏，已处于破坏状态。1920年的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了七分之六。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和矿井被破坏、被淹没。冶金业情况特别严重。生铁在1921年全年总共只炼了十一万六千三百吨，只等于战前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三左右。燃料不足。运输业遭破坏。国内原有的金属和布匹的储备差不多都已用完。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如面包、脂油、肉类、鞋类、衣服、火柴、

食盐、煤油、肥皂，都痛感不足。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人们对这种物品缺乏的情况还能忍受，有时甚至没有觉察。但是现在战争没有了，人们突然感到这种情况不堪忍受，要求立刻加以消除。

农民中间出现了不满情绪。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建立了和巩固了工人和农民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农民从苏维埃政权方面取得土地和免除地主富农压迫的保障，工人按照余粮收集制从农民方面取得粮食。

现在这种基础已经不够了。

苏维埃国家为了国防的需要，当时不得不按余粮收集制收集农民的所有余粮。不实行余粮收集制，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国内战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由于战争和武装干涉而被迫采取的。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接受余粮收集制，没有觉察商品不足，但是当战争已经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经过去的时候，农民就开始对征收全部余粮的办法即余粮收集制感到不满，而要求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了。

整个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正如列宁指出的，同农民的利益发生了抵触。

不满情绪也侵入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承受了国内战争的主要重担，英勇忘我地进行了反对白卫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群寇的斗争，进行了消除经济破坏和饥荒的斗争。最觉悟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遵守纪律的优秀工人，表现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热忱。但是，极其严重的经济破坏也影响了工人阶级。还在开工的少数工厂常常长时间停产。工人们不得不从事手工业，制作打火机和从事小宗的粮食买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涣散，一部分工人跑到农村去，不再成为工人，脱离了本阶级。一部分工人由于饥饿和疲惫产生了不满情绪。

一个问题摆在党的面前：要制定党在国内经济生活一切问题上的新方针，以适应新的情况。

于是党就着手制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新方针。

但是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他们企图利用经济上的困难，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策动的富农叛乱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唐波夫省（安东诺夫叛乱）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白卫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都积极活动起来。敌人采取了新的策略手段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现在涂上了一层苏维埃色彩，已经不提“打倒苏维埃”这种破产了的旧口号，而是提“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新口号。

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乱，就是阶级敌人实行新策略的明显表现。这次叛乱发生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即1921年3月。领导叛乱的是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外国的代表有勾结的白卫分子。起初，叛乱者力图打出“苏维埃”的招牌，掩盖他们恢复资本家地主的政权和所有制的意图。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反革命势力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不满情绪，想在假装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

促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有两个情况：军舰上水兵成分的变坏和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薄弱。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水兵，几乎个个上了前线，参加红军队伍英勇作战去了。补充到海军中的新兵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这些新兵都是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农民群众，反映了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至于当时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由于多次动员上前线，它已经大大削弱。这两个情况使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白卫分子有可能混进并控制了喀琅施塔得。

叛乱分子掌握了这个头等要塞、舰队和大批武器弹药。国际反革命势力已在欢庆胜利。但是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叛乱很快被苏维埃军队镇压下去。当时为了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分子，党派去了自己的优秀子弟——以伏罗希洛夫同志为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红军战士踏着薄冰向喀琅施塔得前进。冰面踩破了，许多人被淹死。必须向几乎是坚不可摧的喀琅施塔得炮台冲击。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敢、为苏维埃政权捐躯的决心占了上风。喀琅施塔得要塞由红军猛力攻克。喀琅施塔得叛乱被肃清了。

二 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党的 第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派的失败。 过渡到新经济政策

党中央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清楚地知道，在战争结束并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以后，没有理由再保持由战争和封锁的情况所造成的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

中央懂得，余粮收集制已经没有必要了，必须代之以粮食税，好使农民能随意处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余粮。中央懂得，这种办法能活跃农业，扩大工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活跃国家的商品流转，改善城市供应，为工农联盟建立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

中央也知道，活跃工业是首要的任务。但是它认为：如果不吸引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参加，就不可能活跃工业；只要说服工人相信经济破坏同武装干涉和封锁一样，也是人民的危险的敌人，他们是能够吸引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只要党 and 工会对工人阶级不是象在前线那样采用军事命令（在前线确实需要采用命令），而是通过说服的途径，采用说服的方法，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并非所有的党员都象中央这样想。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民主集中派”等反对派小集团都处于思想混乱的状态，在向和平经济建设轨道过渡的困难面前动摇不定。党内有不少从前的孟什维克、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从前的崩得分子、从前的斗争派和俄国边沿地区的各种半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某个反对派小集团。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受过列宁主义的党性锻炼，而只是加强了反对派小集团的思想混乱和动摇。其中有的认为不需要削弱规定太死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相反需要“再拧紧螺丝”。有的认为党和国家应该把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丢开不管，应该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工会。

很明显，既然思想这么混乱，党内某些成分中间就一定有一些人，爱好争论的人，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首领”，会竭力强迫党进行争论。

结果正是如此。

争论是从工会的作用问题开始的，虽然工会问题当时并不是党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挑起争论、反对列宁、反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列宁多数的急先锋是托洛茨基。他唯恐天下不乱，在1920年11月初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党员会上提出了“拧紧螺丝”和“整刷工会”的可疑口号。托洛茨基提出立刻把“工会国家化”的要求。他反对对工人群众采取说服方法。他主张把军事方法搬到工会里来。托洛茨基反对在工会里扩大民主，反对工会机关按选举产生。

托洛茨基派反对说服方法（不采用说服方法，工人组织是无法进行活动的），而主张采用赤裸裸的强制方法，赤裸裸的命令手段。凡是托洛茨基派把持工会领导的地方，他们都通过自己的政策在工会里引起了冲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派通过自己的政策来

挑动非党工人群众反对党，分裂工人阶级。

实际上，工会问题争论的意义，要比工会问题本身广泛得多。如后来俄共（布）中央全会（1925年1月17日）决议所指出的，实际上当时争论的是“关于如何对待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农民，关于如何对待非党工人群众，总的是关于党在国内战争已告结束的时期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651页）^①。

跟在托洛茨基后面的还有其他的反党集团：“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捷夫、柯伦泰等人），“民主集中派”（萨普龙诺夫、德罗布尼斯、鲍古斯拉夫斯基、奥新斯基、弗·斯米尔诺夫等人），“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对派”提出把整个国民经济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去管理的口号。他们想把党的作用化为乌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工人反对派”把工会同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党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工人反对派”实际上是个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反党集团。

“民主集中派”（民集派）集团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完全自由。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派一样，力图破坏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列宁称民集派为“叫喊得最响亮者”^②的派别，而把它的纲领称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纲领。

布哈林帮助托洛茨基反对列宁和反对党。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烈布利雅柯夫、索柯里尼柯夫一起成立了“缓冲”集团。这个集团维护和掩护最凶恶的派别分子托洛茨基派。列宁称布哈林的行动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③。不久，布哈林派就同托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27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33页。——译者注

洛茨基派公开联合起来反对列宁了。

列宁和列宁主义者集中主要火力打击托洛茨基派，因为托洛茨基派是反党集团的主力。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揭露了托洛茨基派把工会同军事组织混淆起来，向他们指出不能把军事组织的方法搬到工会里来。针对各反对派集团的纲领，列宁和列宁主义者拟定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指出：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工会应该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贯彻说服方法。只有这样，工会才能发动全体工人消除经济破坏，才能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同反对派集团的斗争中，党的各个组织团结在列宁的周围。莫斯科的斗争特别紧张。反对派在这里集中了自己的主要力量，打算夺取首都的组织。但是，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给了派别分子的这种阴谋以坚决的回击。乌克兰党组织内的斗争也很尖锐。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乌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同志领导下，打败了托洛茨基派和施略普尼柯夫派。乌克兰共产党仍然是列宁党的可靠支柱。在巴库，在奥尔忠尼启泽同志领导下，打垮了反对派。在中亚细亚，拉·卡冈诺维奇同志领导了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

主要的地方党组织全都拥护列宁的纲领。

1921年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六百九十四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二千五百二十一名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二百九十六人。

大会对工会问题的争论做了总结，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纲领。

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争论是一种不能容许的奢侈品。他指出，敌人正指望共产党发生内讧和分裂。

鉴于派别集团的存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

大的危险，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党的统一问题特别注意。列宁作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大会谴责了一切反对派集团，指出它们“实际上在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①。

大会责令立刻解散一切派别集团，并责成各级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而且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此项决议的，都将被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

所有这些决定，都写进了由列宁提出、经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专门决议中。

在这个决议中，大会提醒全体党员注意，在目前第十次代表大会这个时期，由于许多情况加剧了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

决议指出：“但是，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殊纲领、力求在一定程度上闹独立并建立其集团纪律的集团。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了解，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派别活动事实上必然要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的敌人又能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大会在这个决议中接着说：

“无产阶级的敌人竭力利用一切离开共产主义的坚定路线的倾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喀琅施塔得叛乱。当时，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都急忙表示，只要能推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9页。——译者注

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当时，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起义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要能削弱和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白卫分子都会竭力装扮而且善于装扮成共产主义者，甚至装扮得比共产主义者‘更左’。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夜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同样表明了孟什维克在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时所采用的方式：口头上装作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要给苏维埃政权加上一些不大的所谓的修正，实际上在鼓舞和支持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

决议指出，党的宣传应当从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一观点，来详细说明派别活动的危害和危险。

大会决议说，另一方面党的宣传应当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采用的新的策略手法的特点。

决议指出：“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竭力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象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集团，用这种办法来推进反革命事业。”（《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1册第373—374页）①

决议接着指出，党的宣传“还应当阐明过去革命的经验，这些经验证明反革命势力总是支持那些与极端革命政党最相似的小资产阶级集团，以便动摇并推翻革命专政，促使资本家地主反革命势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3—64页。——译者注

力获得完全的胜利”^①。

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密切相联的另一个决议是《关于我们党内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个决议也是由列宁提出、经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这个决议中谴责了所谓“工人反对派”。大会确认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思想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能相容，并号召全党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税即关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议。

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显示了列宁政策的无比的英明和远见。

大会决议说明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实物粮食税征收额要比余粮收集制征收额低些。粮食税额必须在春播以前公布。明确规定了纳税期限。纳税后剩下的全部粮食完全归农民支配，即可以自由出卖。列宁在报告中指出，贸易自由在开始时，会使国内资本主义有某种活跃。必须容许私人贸易和准许私营工厂主开设小企业。但是用不着怕它。列宁认为：少许的商品流转自由能造成农民经营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迅速高涨；在这个基础上，国营工业将得到恢复，私人资本将被排挤，积蓄了人力物力以后，就可以建立强大的工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然后转入坚决进攻，以消灭国内资本主义的残余。

战时共产主义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这时主张稍许后退一点，暂时退到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堡垒转到较为长期地包围堡垒，待积蓄起力量后，重新开始进攻。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64—65页。——译者注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纯粹是退却。这样的解释是对他们有利的，因为他们的路线是要恢复资本主义。这是对新经济政策的极其有害的反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以后，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宣布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了一个口号：“准备向私人经营的资本进攻。”（《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13页）^①

反对派分子是些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政策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他们既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也不了解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实行的退却的性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上面已经说过了。至于退却的性质，那末有各种各样的退却。有时候，党或军队因为遭到了失败，不得不实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党或军队实行退却，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存人力，以利再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根本不是要实行这种退却，因为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没有遭到失败，没有被击败，反而击败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但也有这样的时候，获得了胜利的党或军队在进攻中向前跑得太远，不能保证得到后方根据地的支持。这就造成严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经验的党或军队为了不脱离自己的根据地，通常都要稍许后退一点，跟自己的后方靠得近些，以便同自己的后方根据地更牢固地联结起来，保证自己要什么有什么，然后更有信心地、确有把握地重新实行进攻。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暂时的退却。列宁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时，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保证足够的根据地”^②，因此必须暂时向有保证的后方退却。

反对派可悲，就在于他们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而不了解而且

① 见《列宁全集》第36卷第59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61页。——译者注

至死也不了解在新经济政策下实行退却的这种特点。

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定，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能结成巩固的经济联盟来建设社会主义。

大会的另一个决议，即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也是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是斯大林同志作的。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但是这还不够。现在的任务是要消灭旧时代的沉重遗产，即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必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赶上俄国中部。

其次，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反党倾向，即大国（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大会谴责了这两种倾向，认为这两种倾向对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都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同时，大会集中主要火力打击了当时的主要危险——大国主义，即打击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在沙皇制度下对非俄罗斯民族所采取的那种态度的残余和遗毒。

三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总结。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列宁患病。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遇到了党内不坚定分子的抵抗。这种抵抗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左的”空谈家，如洛明纳泽和沙茨金等这种类型的政治畸形儿，他们“证明”说，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放弃十月革命的成果，回到资本主义，毁灭苏维埃政权。这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和不了解经济发展规律，所以不懂得党的政策，惊惶失措，在自己周围散布灰心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是公开的投降主

主义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加米涅夫、施略普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拜倒在资本主义“威力”面前，并且力图巩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国家中的阵地——要求对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作巨大让步，要求按租让原则或按吸收私人资本参加混合股份公司的原则把苏维埃政权在国民经济中的许多命脉交给私人资本。

这两种人都是敌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

党揭露并孤立了这两种人。党给了惊惶失措者和投降主义者坚决的回击。

这种对党的政策的抵抗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把不坚定分子清洗出党。为此中央大力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在1921年进行了清党。清党工作吸收了非党员参加，在公开的会议上进行。列宁建议彻底从党内清除“……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13页）^①。

清党结果共开除党员十七万人，占全体党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清洗工作大大巩固了党，改善了党的社会成分，加强了群众对党的信任，提高了党的威信。党的团结和纪律性增强了。

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第一年，就证明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大大加强了工农在新的基础上的联盟。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坚强有力了。富农匪患差不多已全部肃清。余粮收集制取消后，中农帮助了苏维埃政权同富农匪帮作斗争。苏维埃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全部命脉：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土地、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党使经济战线的情况有了转变。农业进展很快。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564页。——译者注

工业和运输业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暂时还很缓慢、但是扎实的经济高涨开始了。工人和农民已经感到和看到，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1922年3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五百二十二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三万二千名党员，即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一些。有发言权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党员数量减少，是由于开始了清党。

党在代表大会上对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行情况做了总结。根据这个总结，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宣布：

“我们退却已经一年了。现在我们应当代表党来说：已经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就要结束，或者说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配置力量。”（《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38页）^①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谁战胜谁”，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为了胜利，必须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办法是大力发展城乡商品流转。为此必须学会管理经济，必须学会文明经商。

这个时期，党的任务的链条中的主要一环是商业。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扩展城乡商品流转，不能巩固工农经济联盟，不能提高农业，不能使工业走出破坏状态。

当时苏维埃商业还很薄弱。商业机构很薄弱，共产党员还没有经商的技能，对敌人耐普曼^②还没有进行过研究，还没有学会同他们作斗争。私商耐普曼趁苏维埃商业薄弱，把布匹和其他畅销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29页。——译者注

② 耐普曼是俄语“нэпман”一词的音译，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译者注

商品的贸易抓到了手上。关于组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问题有了重大的意义。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经济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国家遭到的歉收的后果，已被顺利地消除。农民经济恢复得很迅速。铁路运输已有所改善。重新开工的工厂日益增多。

1922年10月，苏维埃共和国庆祝了巨大的胜利，红军和远东游击队从日本武装干涉者手中解放了武装干涉者所占领的最后一块苏维埃国土海参崴。

这时，苏维埃国家的全部领土已经肃清了武装干涉者，而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的任务又要求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联盟，于是各苏维埃共和国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联盟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必须联合各族人民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巩固的国防。必须保证我们祖国各民族全面发展。为了这个目的，必须使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更加接近起来。

1922年12月，召开了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提议，建立了苏维埃各族人民自愿的国家联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最初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在中亚细亚成立了三个独立的加盟苏维埃共和国，即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共和国和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所有这些共和国都按自愿和平等原则联合成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苏联，同时每个共和国都保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立，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了演说。列

宁在总结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年来的情况时，表示坚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①。这是他向全国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1922年秋，党遭到了重大的不幸：列宁患重病了。全党和全体劳动者都感到，列宁患病如同他们自己遭到了巨大的痛苦。大家都为亲爱的列宁的生命担忧。但是，列宁即使在病中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列宁在病势已很沉重的时候，还写了好几篇很重要的文章。在这最后一批文章中，他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拟定了在我国通过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列宁提出了一个吸引农民参加建成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合作社计划。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社，特别是农业合作社，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由小的个体经济过渡到大的生产协作组织即集体农庄的道路。列宁指出，我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应该是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逐渐把集体制原则应用于农业，起初是农产品的销售方面，然后是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条件下，正确地组织起来的、拥有千百万农民的生产合作社，是能用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

1923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不能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四百零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三十八万六千名党员，即比上次党代表大会时少了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在继续清党，有相当一个百分数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有发言权的代表有四百一十七人。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1页。——译者注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决议中，考虑了列宁在他最后一批文章和书信中所作的各项指示。

大会坚决回击了所有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出社会主义阵地、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分子和提议接受资本主义盘剥的分子。在会上作这种提议的，是托洛茨基的拥护者拉狄克和克拉辛。他们提议向外国资本家投降，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工业部门租让给外国资本家。他们提议偿还被十月革命废除了的沙皇政府债务。党把这些投降主义的提议痛斥为叛卖性的提议。党不是不利用租让政策，但这只能以有利于苏维埃国家的部门和规模为限。

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在代表大会以前就提议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这个提议也是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把自己的阵地交给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当时痛斥了布哈林，说他是搞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坚决驳斥了对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不可动摇性的侵犯。

大会还回击了托洛茨基强迫党对农民采取毁灭政策的企图。大会指出，不要忘记小农经济在国内占优势的事实。大会强调说，发展工业，包括发展重工业，不应同农民群众的利益相抵触，而应同他们的利益相结合，应有利于全体劳动居民。这些决定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因为他提议用剥削农民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工业，因为他事实上不承认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政策。

同时，托洛茨基还提议关闭普梯洛夫和布良斯克等等具有国防意义的大工厂，据他说，这些工厂不赢利。大会气愤地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议。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向大会提出的书面建议，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这个机关负有维护我们党的统一、巩固党和国家的纪律、全力改进苏维埃国家机关等项

重大任务。

大会对民族问题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强调了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的国际意义。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都把苏联看作是解决民族问题和消灭民族压迫的榜样。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大力消灭苏联各民族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他号召全党坚决反对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大会揭露了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以及他们对少数民族的大国主义政策。当时发言反对党的有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穆吉万等人。这些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成立南高加索联邦，反对巩固南高加索各民族的友谊。他们对格鲁吉亚其他民族的态度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他们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特别是阿尔明尼西亚人，都迁出梯弗里斯，用法律规定格鲁吉亚女子嫁给非格鲁吉亚人要丧失格鲁吉亚籍。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和拉柯夫斯基支持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倾向分子。

大会以后不久，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民族问题工作者的专门会议。会上揭露了苏丹-加里也夫等人的鞑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集团和斐祖拉·霍札也夫等人的乌兹别克民族主义倾向分子集团。

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两年的结果。这个总结使人鼓舞和对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说道：“我们党依然是团结一致的，它经受住了最伟大的转变，正举着展开的大旗前进。”^①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80页。——译者注

四 克服恢复国民经济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趁列宁患病加紧积极活动。党内的又一次争论。托洛茨基派的失败。列宁的逝世。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恢复国民经济的头几年，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 1924 年，各方面都有了提高。播种面积从 1921 年起就已大大增加，说明农民经济日趋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增长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工资提高了。工农生活比 1920—1921 年好过了、改善了。

但是，还没有消除的经济破坏的后果，仍然令人感觉得到。工业还落后于战前水平，工业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国家需要的增长。到 1923 年底，还有一百万左右失业者，因为国民经济增长缓慢，不可能消灭失业现象。商业的发展时好时坏，因为城市产品价格过高，这种过高的价格是耐普曼和我们商业组织中的耐普曼分子强加给国家的。因此，苏维埃卢布极不稳定，币值降低。这一切都阻碍了工农生活状况的改善。

到 1923 年秋，由于我们的工业和商业机关违反了苏维埃的价格政策，经济困难有些加重。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差太大。粮食价格很低，而工业品价格过高。工业中杂费开支很大，这就把商品价格提高了。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货币迅速贬值。加上当时盘踞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皮达可夫又向经济工作人员发出一项罪恶的指令：从出卖工业品方面多赚利润，放手提高价格，美其名是为了发展工业。实际上，这种耐普曼的口号只能缩小工业生产的基础和破坏工业。在这种条件下，农民买城市商

品不合算，就不买了。销售出现了危机，影响了工业。工资发不出，引起工人不满。在某些工厂中，最落后的工人停工不干了。

党中央委员会定出了克服这一切困难和缺点的办法。采取了消除销售危机的种种措施。降低了日用品的价格。决定实行币制改革——采用稳固的货币切尔文。整顿了给工人发放工资的工作。采取了通过苏维埃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发展商业、把各种私商和投机商从商业中排挤出去的措施。

当时本应鼓起劲来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忠实于党的人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但是托洛茨基派却不是这样。他们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以为击败党和推翻党的领导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他们在反党的斗争中利用了一切：1923年秋德国和保加利亚革命的失败，国内的经济困难，列宁的患病。正是在党的领袖卧病不起这个苏维埃国家的困难时刻，托洛茨基开始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攻击。他把党内一切反列宁主义分子纠集在自己周围，炮制了一个旨在反对党、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的反对派纲领。这个纲领叫作四十六个反对派分子的声明。在反对列宁党的斗争中，所有的反对派集团——托洛茨基派、民集派，以及“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反对派”的残余，都联合起来了。他们在自己的声明中预言苏维埃政权必遭严重的经济危机、必遭灭亡，要求各派别和集团能自由活动，说这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

这就是要竭力恢复被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提议禁止了的派别。

托洛茨基派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改进工业或农业，关于改进国内商品流转、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具体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趁列宁不能视事，恢复党内的派别，动摇党的基础，动摇党的中央。

继四十六人纲领之后，托洛茨基又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诬蔑党的干部，对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诽谤性的责难。托洛茨基在这封信中搬弄着党已听他讲过不止一次的孟什维主义陈词滥调。

托洛茨基派首先攻击党的机关。他们知道，没有巩固的党机关，党就不能生存和活动。反对派企图动摇、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党内的青年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想在青年学生身上打主意，想在不知道党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历史的青年党员身上打主意。托洛茨基为了争夺青年学生而对他们阿谀奉承，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同时又说列宁主义老近卫军在蜕化。他指桑骂槐，用第二国际首领的蜕化来卑鄙地影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也在走着这条路。托洛茨基企图通过叫喊党在蜕化来掩盖他自己的蜕化和他自己的反党阴谋。

反对派分子的两个文件，即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由托洛茨基派散发给各区和各支部，并交付党员讨论。

党接到了要党争论的挑战。

这样，现在也如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夜进行工会问题争论时一样，托洛茨基派又强迫党来进行全党争论了。

党虽然忙于更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但仍接受了挑战而宣布进行争论。

全党都参加了争论。斗争很激烈，莫斯科的斗争特别尖锐。托洛茨基派力图首先夺得首都组织。但是争论并没有帮托洛茨基派的忙。争论只是使他们丢了脸。托洛茨基派无论在莫斯科或在全苏联各地，都遭到了惨败。只有少数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拥护托洛茨基派。

1924年1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斯

大林同志对争论所作的总结报告。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指出它是党内一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会议的决议后来由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国际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但是，托洛茨基派并没有停止其破坏活动。1924年秋，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他在文章中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这篇文章完全是诬蔑我们党和党的领袖列宁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都把这本诽谤性小册子奉为至宝。党愤怒地回击了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英勇历史的诬蔑。斯大林同志揭穿了托洛茨基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企图。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①

斯大林同志的1924年出版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对于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捍卫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本小册子是对列宁主义的精辟阐述和理论上的深刻论证。它在当时和现在都起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锐利的武器武装世界各国布尔什维克的作用。

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战斗中，斯大林同志把党团结在它的中央周围，并动员起全党为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而继续斗争。斯大林同志证明了，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是保证继续向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这一时期时说：

“不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就不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取得胜利，就不能把目前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1页。——译者注

但是，党的列宁政策所取得的成就，由于党和工人阶级遭到的最大的不幸而显得暗然无光。1924年1月21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在莫斯科附近哥尔克村逝世了。全世界工人阶级把列宁逝世看作最沉痛的损失。在列宁安葬的那一天，国际无产阶级宣布一切行业都停止工作五分钟。铁路停运了，工厂停工了。全世界劳动者怀着极大的悲痛送别自己的父亲和导师，最好的朋友和保护者——列宁。

苏联工人阶级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列宁党的周围来纪念列宁的逝世。在这些哀悼的日子里，每个觉悟工人都仔细考虑了自己应如何对待执行着列宁遗嘱的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成千上万非党工人请求接收他们入党的申请书。中央委员会欢迎先进工人发起的这一运动，宣布大批接收先进工人入党，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这次加入了党。加入党的都是决心为党的事业、为列宁的事业而献身的人。当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二十四万多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即最觉悟最革命最勇敢最守纪律的分子加入到党里来了。这就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

列宁的逝世表明，我们党同工人群众多么亲密，工人们对列宁的党多么珍爱。

在哀悼列宁的日子里，斯大林同志代表全党在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伟大的宣誓。他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

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①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对自己的永垂不朽的领袖列宁的誓言。

1924年5月，举行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七百四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万五千八百八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6页。——译者注

十一名党员。党员数量比上次代表大会时大大增加，是因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时党的队伍增加了约二十五万新党员。有发言权的代表有四百一十六人。

大会一致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纲领，肯定它是一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同时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和《关于争论的总结》这两个决议。

从巩固城乡结合的任务出发，大会指示进一步扩大工业，首先是轻工业，同时强调必须迅速发展冶金业。

大会批准建立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并向一切商业机关提出了控制市场、把私人资本从商业领域排挤出去的任务。

大会提出了扩大国家对农民的低利贷款而把高利贷者从农村中排挤出去的任务。

大会提出了用各种方法使农民群众合作化的口号作为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最后，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青年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五 苏联在恢复时期结束时的情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

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已经奋战了四年多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英勇工作行将结束。苏联的经济实力和

政治实力日益增长。

这时国际形势已有变化。资本主义抵挡住了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第一次革命进攻。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波兰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各妥协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这方面帮了资产阶级的忙。革命的暂时退潮到来了。西欧资本主义的暂时局部稳定，即资本主义阵地的局部巩固到来了。但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并没有消除使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各种基本矛盾。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使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同殖民地民族的矛盾、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稳定酝酿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新爆发和新危机。

除资本主义的稳定外，还有苏联的稳定。但是这两种稳定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稳定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新危机。苏联的稳定则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虽然西方的革命失败了，但是苏联的国际地位仍在继续巩固，虽然速度较为缓慢。

1922年，苏联被邀请参加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在热那亚会议上，各帝国主义政府因资本主义各国革命遭到失败而气焰嚣张，企图对苏维埃共和国施加新的压力，不过这次是采取外交形式。帝国主义者向苏维埃国家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他们要求把十月革命宣布国有的工厂归还给外国资本家，要求偿还沙皇政府的一切债务。只有这样，帝国主义国家才答应给苏维埃国家少量的贷款。

苏联拒绝了这些要求。

热那亚会议没有什么结果。

英国外交大臣寇松1923年通过最后通牒再一次进行干涉的尝试，也遭到了应有的回击。

资本主义国家在试探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性、确信苏维埃政权已不可动摇之后，就相继来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1924年，同英法日意四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很清楚，苏维埃国家已经争得整整一个和平喘息的时期了。

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农的忘我工作，已经开花结果。国民经济迅速地增长了。1924—1925经济年度，农业已接近战前规模，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七。苏联大工业的产值在1925年已约占战前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1924—1925年度，苏维埃国家已经能够向基本建设投资三亿八千五百万卢布。国家电气化计划在顺利执行中。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命脉巩固了。反对私人工商业资本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由于经济的高涨，工农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工人阶级人数迅速增加。工资增长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1924—1925年度，工农国家已能拿出近二亿九千万卢布来帮助力量单薄的农民。在工农生活状况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和影响增长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接近结束。但是，对苏维埃国家来说，对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单单恢复经济，单单达到战前水平是不够的。战前水平是个落后国家的水平。必须继续前进。苏维埃国家争得的长时间的喘息，保证了继续建设的可能性。

但是这里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前途、关于我国发展即我国建设的性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的问题。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循着什么方向进行，循着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循着其他什么方向？我们是应当建成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我们注定要为另一种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去准备肥沃土壤呢？一般说来，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呢，如果有，那末能不能

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推迟和资本主义处于稳定状态的条件下做到呢？能不能在一方面竭力巩固和扩大我国社会主义力量，同时又暂时让资本主义得到某种发展的新经济政策道路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要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呢，从哪里开始这种建设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恢复时期快结束时提到了党的面前，已经不是作为理论问题，而是作为实践问题，作为日常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到了党的面前。

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给以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好让我们从事工农业建设的党的经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知道要朝什么方向走——朝社会主义走，还是朝资本主义走？

如果对这些问题不给以明确的回答，那我们在建设方面的全部实际工作就会成为没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劳无益的工作。

党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给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

党回答说，是的，在我国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1917年10月，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专政，在政治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切措施，来粉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力和创造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条件。这些措施就是：剥夺资本家和地主，变土地、工厂、铁路和银行为全民财产；实行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建设，从而在经济上也彻底击败资本主义。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服从于实现这个主要任务的要求。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实现这个宏伟的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展开社会主义国民

经济的建设必须由以开始的基本环节。无论西方革命的推迟，无论非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

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回答。

但是党知道，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的全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但这终究是苏联内部的事情，仅仅是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论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原理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应当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开。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即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方面，即外部关系方面，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同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仇恨苏维埃制度，总在寻找机会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新的武装干涉，在苏联作恢复资本主义的新尝试。由于苏联暂时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从而产生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很清楚，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也就存在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苏联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不能消灭这种外来危险即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就至少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做到。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成，还不能算是最后胜利，因为外国进行武装

干涉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仍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缺少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

当然，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在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能给外国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以应有的回击，正如他们在1918—1920年给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武装干涉以回击一样。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此消灭了。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还继续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即使新的武装干涉失败，也不会消灭武装干涉的危险。

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同苏联劳动者休戚相关的事情。

这就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方针。

中央要求把这个方针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去讨论，以便得到代表会议的批准和通过，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

党的这个方针使反对派分子大为震惊。其所以使他们大为震惊，首先是因为党使这个方针带有具体实践的性质，把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计划联系起来，并要求把这个方针变成党法，变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遵守。

托洛茨基派反对党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对立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只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才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

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

“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苏联在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但是后来他们被迫缩回去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谴责了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对派分子的所有这些投降主义“理论”，批准了党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可奈何，只好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党知道，他们只是暂缓同党作斗争，因为他们拿定主意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来“向党开火”。他们在列宁格勒纠集了自己的同伙，组织了所谓的“新反对派”。

1925年12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内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整整一个列宁格勒代表团，这个党员最集中地区的代表团，居然准备出来反对自己的中央，这种情况有党以来还没有过。

出席大会的有六百六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四万三千名党员和四十四万五千名预备党员，即比上一次代表大会时略微少一些。这是对混杂有反党分子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进行了局部清洗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他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实力增长的情景作了清晰的描绘。由于苏维埃经济制度的优越，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恢复，并接近了战前水平。虽然有这些成就，斯大林同志还是提议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些成就并不能消除我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事实。当时农业生产占全部产值的三分之二，而工业仅仅占三分之一。斯

大林同志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现在成了党的中心任务。

斯大林同志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①

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新反对派”又使出另外一招，他们硬说什么（无视列宁的意见！）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又说什么（也是无视列宁的意见！）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但这也救不了他们的命。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译者注

大会痛斥了“新反对派”的这些胡说，指出它们是反列宁主义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

很清楚，季诺维也夫派就是伪装得很不高明的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建立工人阶级同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固联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当时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两种危害这个联盟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低估和小看富农的危险，第二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而低估中农的作用。对于哪一种倾向更坏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①

党确实把“左”右两种倾向都粉碎和消灭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经济建设问题的讨论时，一致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主义计划，并在自己的著名决议中写道：

“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大会认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②。代表大会认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党章。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译者注

③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7页。——译者注

季诺维也夫派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并没有向党屈服。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结束，季诺维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团省委的领导人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等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培养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

但是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根本没有反映列宁格勒广大共青团员的情绪。因此，这些领导人很容易地被打垮了，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很快又站上了它在共青团中应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一批大会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必须向列宁格勒组织的党员揭露，用欺骗手段取得代表资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是犯罪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各单位的党员大会听了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介绍，会开得很激烈。重新开了一次列宁格勒党组织紧急代表会议。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赞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谴责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了。

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

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150页）^①

简 短 的 结 论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形势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加强了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上的联盟。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苏维埃国家卓有成效地渡过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开始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从国内战争向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特别是在最初——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联共（布）队伍中的反党分子，在这整个时期内一直都在拼命反对列宁的党。领导这些反党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帮手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对派分子指望在列宁逝世后瓦解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分裂党，使党产生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苏联胜利的心理。实际上，托洛茨基派是企图在苏联建立一个新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建立另外一个党，即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党。

党在列宁旗帜下团结在自己的列宁中央周围，团结在斯大林同志周围，挫败了托洛茨基派以及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新朋友们，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布尔什维克党积蓄了人力物力，把国家引上了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阶段。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178—179页。——译者注

第十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 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1926—1929年)

一 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困难和克服 困难的斗争。托洛茨基派—季诺维 也夫派反党联盟的形成。这个联盟 的反苏行动。联盟的失败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

恢复时期的任务是首先活跃农业，从农业取得原料和粮食，并
在农业的带动下恢复工业，恢复现有的工厂。

苏维埃政权较为容易地解决了这些任务。

但是恢复时期有三大缺点：

第一，当时的工厂都是老厂，技术陈旧落后，可能很快就不能
生产了。任务是要用新技术来改造这些工厂。

第二，恢复时期的工业，基础非常狭窄：在当时的工厂中缺乏
数十个、数百个机器制造厂。这些工厂是国家绝对必需的，是我们
当时没有而需要建立的，因为没有这些工厂，工业就不能认为是
真正的工业。任务是要建立这些工厂，用现代化技术把它们装备
起来。

第三，恢复时期的工业主要是轻工业。这种工业已有发展而且已走上正轨。但是轻工业发展本身后来也因重工业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说国家的其他种种只有靠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满足的需要了。任务是要在现在侧重发展重工业。

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

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

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用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为了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

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当然，这样巨大的基本建设没有数十亿投资是不行的。指靠外债没有可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只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自己的资金来从事建设。而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

这就是当时的主要困难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重工业，通常是靠从外面流入资金，即靠掠夺殖民地，靠战胜国人民的赔款，靠外债。苏维埃国家根本不能靠掠夺殖民地或战胜国人民这样的龌龊办法来取得工业化的资金。至于外债，苏联又被切断了来源，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拒绝贷款给苏联。必须在国内找到资金。

而在苏联也就找到了这样的资金。在苏联找到了任何一个资

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积累泉源。苏维埃国家掌握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资本家地主手中夺来的一切工厂和一切土地，以及运输业、银行、国内外贸易。国营工厂、运输业、贸易和银行所得到的利润，现在已不是供寄生的资本家阶级消费，而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工业了。

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的外债；这些外债，单是利息一项，人民每年就要支付几亿金卢布。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五亿金卢布的地租。农民摆脱了这一切重担，就能够帮助国家建设新的强大的工业。农民迫切需要获得拖拉机和农业机器。

所有这些收入的泉源都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这些泉源能够为建设重工业提供几亿至几十亿卢布。只是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办事，在开支上厉行节约，实行生产合理化，降低生产成本，消灭非生产费用等等。

苏维埃政权也正是这样做的。

由于实行节约制度，基本建设资金的积累逐年增多。这就有可能着手兴建一些大型企业，如德涅泊水电站、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铁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几个机床制造厂、“阿模”汽车制造厂（即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等等。

1926—1927 年度工业的投资约十亿卢布，而过了三年就已经有五十亿左右了。

工业化的事业向前推进了。

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是个威胁。因此，各帝国主义政府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对苏联施加新的压力、制造混乱、破坏或者至少是阻挠苏联的工业化。

1927 年 5 月，英国执政的保守党人（“死硬派”）向“阿尔柯斯”（苏联对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挑衅性的袭击。1927 年 5 月 26 日，

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

1927年6月7日，波兰籍俄国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杀了苏联大使沃依柯夫同志。

同时在苏联境内，英国特务和破坏分子在列宁格勒向党的俱乐部投掷炸弹，炸伤约三十人，其中有几人受重伤。

1927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差不多同时发生了袭击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

这就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额外的困难。

但是苏联没有屈服于压力，很容易地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挑衅性袭击。

托洛茨基派和其他反对派的破坏活动，给党和苏维埃国家也带来了不少困难。难怪斯大林同志当时说，“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① 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尽管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了决定，反对派也声明对党忠诚，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不仅如此，他们的破坏活动、分裂活动搞得更厉害了。

1926年夏，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结成一个反党联盟，把所有已被击败的反对派集团的残兵败将纠集在这个联盟的周围，奠定了他们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地下党的基础，从而粗暴地破坏了党章和历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成立派别组织的决议。党中央警告说：这个类似有名的孟什维克八月联盟的反党联盟如果不解散，它的参加者就不会有好下场。但是他们不肯罢休。

同年秋，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前夕，他们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工厂党员大会上又搞袭击，企图强迫党再次进行争论。同时他们还提出自己的纲领要党员讨论，而这个纲领不过是通常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纲领的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译者注

翻版罢了。党员群众给了反对派分子无情的回击，有些地方干脆把他们赶出了会场。中央再次警告联盟的参加者说，党不能再容忍他们搞破坏活动了。

反对派分子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签名向中央递交声明，谴责自己的派别活动，保证今后对党忠诚。然而这个联盟事实上仍继续存在，它的参加者并没有停止反党的地下活动。他们继续拼凑自己那个反列宁主义的党，建立秘密印刷所，在自己的同伙中征收党费，散发自己的纲领。

鉴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这些行为，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1926年11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1926年12月）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在自己的决议中痛斥联盟参加者是分裂主义者，指出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已经滚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去了。

但是，这并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1927年，当英国保守党人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时候，他们又变本加厉地攻击党。他们炮制了一个新的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所谓“八十三人纲领”，并在党员中散发，要求中央再在全党展开争论。

在所有的反对派纲领中，这个纲领算是最虚伪最骗人的了。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不反对遵守党的决议，并且表示对党忠诚，但事实上，他们极其粗暴地破坏党的决议，嘲笑对党和党中央的任何忠诚。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不反对党的统一，并表示反对分裂，但事实上，他们极其粗暴地破坏党的统一，实行分裂的路线，并且单独建立了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秘密党，而这个党已具备了成为一个反苏反革命政党的一切条件。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赞成工业化政策，甚至责备中央实行工业化的速度不够快，但事实上，他们咒骂党关于社会主义在

苏联胜利问题的决议，嘲笑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要求把一系列工厂租让给外国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外国资本主义在苏联的租让企业上。

在口头上，即在纲领中，他们赞成集体农庄运动，甚至责备中央实行集体化的速度不够快，但事实上，他们嘲笑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宣传说工人阶级同农民必然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农村的“文明租佃人”富农身上。

这是反对派的一切虚伪纲领中最虚伪的纲领。

这个纲领原来就是为了欺骗党的。

中央拒绝立刻宣布进行争论，并向反对派分子说，进行争论只能根据党章的规定，即只能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举行。

1927年10月，即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进行全党争论。争论会开起来了。争论的结果对于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是极其可悲的。投票赞成中央政策的党员有七十二万四千人。赞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只有四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反党联盟遭到了惨败。党以压倒多数一致否决了这个联盟的纲领。

这就是党的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志，而联盟的参加者自己正是向党提出申诉的。

但是这次教训也没有使联盟参加者醒悟过来。他们不仅不服从党的意志，反而决定破坏党的意志。还在争论结束之前，他们看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来反对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决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公开的抗议示威。他们选定了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纪念日作为自己示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苏联劳动者要举行全民的革命示威。这样，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就是有意举行一个平行的示威了。不出所料，联盟的参加者能够带上街去的只是他们那一

撮少得可怜的应声虫。应声虫和他们的头目被全民示威队伍冲垮和撵走了。

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滚进了反苏泥潭，现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了。在进行全党争论时，他们是向党控诉中央的，而在这里，在他们举行这个可怜的示威时，他们已走上向敌对阶级控诉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了。既然他们立意破坏布尔什维克党，也就必然要滑到破坏苏维埃国家的道路上去，因为在苏维埃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党和国家是分不开的。这样，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头目们就是自外于党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里不能再容忍有滚进反苏泥潭的人了。

1927年11月14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开除出党。

二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的落后。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农业集体化 的方针。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 联盟的被粉碎。政治上的两面派手腕

到1927年底，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实行的工业化，短时期内就有了重大的进展。工业和整个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就其总产值来说，不仅达到战前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了战前的相应水平。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私营成分下降。社会主义成分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营成分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十九降到百分之十四。

这就是说，苏联的工业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在沿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提前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

私商也被迅速排挤出商业。私商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批发商业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私商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社会主义大工业增长得还要迅速，它的产值在1927年，即恢复时期后的第一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这是创纪录的增长数，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所达不到的。

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整个农业已超过战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说明，粮食的商品产量有继续下降的危险。

这就是说，1918年开始的农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经济单位变小再变小的过程还在继续着。变小和再变小的农民经济成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粮的半自然经济。1927年这个时期的粮食生产虽然只略低于战前的产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粮食，则仅仅等于战前的三分之一强。

毫无疑问，在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是粮食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畜牧业的危机。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农业必须过渡到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能使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国家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群众破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

村失败；或者是另一条道路，即把小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只能走发展农业的第二条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

党在这方面遵循的是列宁的如下一些关于在农业中必须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劳动组合的集体经济的指示：

(一)“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40页)^①

(二)“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7页)^②

(三)“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99页)^③

(四)“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页)^④

这就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临的形势。

① 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6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63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5页。——译者注

④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译者注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 1927 年 12 月 2 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八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三名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名预备党员。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高涨，同时向党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①

斯大林同志拿农业和工业比较，指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由于分散和不能采用现代化技术而落后了，他着重指出，农业的这种不相称的状况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威胁。

斯大林同志问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②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

同时，大会还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256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261 页。——译者注

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60页)^①

最后，大会从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原则出发，并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全线组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成分有计划地展开进攻，指示有关机关编制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后，就来讨论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

大会确认：“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同上，第232页)^②

大会认为，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进行反苏斗争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同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内不能相容。

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出党的决定，并通过决定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谢烈布利雅柯夫、伊·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穆吉万、斯米尔加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龙诺夫、弗·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等)开除出党。

思想上被打败和组织上被粉碎的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参加者，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影响。

被开除出党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递交声明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请求让他们回到党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0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64页。——译者注

里来。当然，那时党还不可能知道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早已是人民的敌人和受外国间谍机关雇用的特务，还不可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要同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但党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知道这些屡次在最紧要的关头反对列宁和列宁党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党对被开除者的声明还抱怀疑。为了检验（初步的检验）声明者的诚意，党提出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 （一）公开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反苏的思想体系；
- （二）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机关的决议；
-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党在考察期内对声明者进行考察；在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结果，个别地提出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恢复问题。

当时党是这样盘算的：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几条，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会破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队伍的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显示党的正确和强大，并使党有可能在声明者确有诚意的情况下让党的原工作人员回到党内来，而在他们没有诚意的情况下，则在大家面前揭露他们的面目，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工人阶级的骗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

大多数被开除者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党怜惜他们，给了他们重新回到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机会，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

但是后来发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

子”(除少数外)的声明，是虚伪透顶的两面派的声明。

原来，这些老爷还在递交声明以前，就已不再是一个准备在人民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一伙毫无原则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面前践踏自己观点的那一点残余，在大家面前颂扬自己所敌视的党的观点，象变色龙一样需要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只求自己能留在党内、留在工人阶级内，好有机会来危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都是政治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

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但是，决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仅仅看作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力图用各种方法来重新博得信任——不管是欺骗的方法、变色龙变色的方法、招摇撞骗的方法都可以，只要自己能保留政治活动家的称号就行。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为了在“适当时机”重新爬上政治舞台、骑在人民头上当“统治者”，而对什么人都依靠——哪怕是刑事犯、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死敌。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上的两面派。

三 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 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 取。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 农庄运动的开始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煽动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

会主义建设，反对集体化。布哈林派也进行煽动，说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所有这些煽动，在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现在富农从报刊上的反应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为他们辩护申诉。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煽起富农反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情绪。果然，富农的反抗愈来愈厉害了。大批大批的富农开始拒绝把他们囤积了不少的余粮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

党懂得，只要富农的反抗还没有被打垮，只要农民还没有亲眼看到富农在公开的战斗中被打败，工人阶级和红军就要吃缺粮的苦头，而农民的集体农庄运动也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

党遵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转而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党在进攻中实行这样的口号：牢固地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为了对付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时由法庭判处没收其余粮的刑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同时给了贫农一系列优待，如贫农可分到百分之二十五从富农那里没收的粮食。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就在这一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沙赫特破坏分子同从前的企业老板（俄国和外

国的资本家)和外国军事间谍机关有紧密勾结。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促使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破坏分子不合理地在井下进行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他们毁坏机器和通风设备，设法使矿井崩塌，炸毁和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破坏分子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

破坏分子被交付法庭审判了。他们受到了法庭应有的惩罚。

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案件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该成为生产技术行家，以免今后再受旧资产阶级专家中的破坏分子的欺骗；必须加速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培养新的技术干部。

根据中央的决议，改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培养青年专家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非党员被动员去学习。

在党没有转入对富农的进攻、仍在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还比较沉得住气，还处在反党势力的后备地位，还不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随着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就扔掉了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富农本性已经按捺不住了，于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就公开出来替富农辩护。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措施，并吓唬头脑简单的人说，否则农业就会开始“退化”（下降、衰落、崩溃），而且硬说退化已经开始。他们看不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高级形式的农业的增长，一看见富农经济在衰落，就把富农经济的退化说成农业的退化。为了使自己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

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即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

不难明白，党面前的这个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它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区别仅仅是在形式上，即仅仅在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有某种可能用“不断革命”这种左的、空喊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实质，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在党转入对富农的进攻的时候跳出来反党的，因而已没有可能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面目，不得不去掉假面具而公开地、不加粉饰地替我国的反动势力首先是富农辩护。

党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迟早会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残余携起手来共同反党。

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组织“工作”来收罗支持者。通过布哈林纠集了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之流的资产阶级青年，通过托姆斯基纠集了官僚化了的工会领导人（美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通过李可夫纠集了腐化了的苏维埃领导人（阿·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弗·施米特等）。凡是政治上腐化的、不掩盖自己投降主义情绪的人，都欣然加入了这个集团。

当时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得到了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乌格拉诺夫、柯托夫、乌哈诺夫、柳亭、雅果达、波朗斯基等）的支持。但一部分右倾分子仍然是隐蔽的，没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

业为时过早。乌格拉诺夫反对兴建德涅泊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乌格拉诺夫和其他右倾投降主义者硬说，莫斯科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出产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着修建机器制造厂。

莫斯科党组织揭露了乌格拉诺夫及其同伙，向他们提出了最后警告，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斯大林同志1928年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指出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斯大林同志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34页）^①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派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中央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这种犯罪活动，并警告说，这种勾当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场。但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肯甘休。他们在中央又提出一个反党纲领（一项声明）。中央谴责了这个纲领。中央再次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下场。但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仍不理睬，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谴责了这种怠工的辞职政策。最后，1929年中央十一月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39页。——译者注

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头目们见势不妙，就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

右倾投降主义者决定暂时实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免遭粉碎。

党和右倾投降主义者斗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党内再次出现的意见分歧，不能不引起苏联外部敌人的注意。他们以为党内“再次出现的纷争”是党削弱的表现，又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破坏我国还没有巩固的工业化事业。1929年夏，帝国主义者挑起中苏冲突，嗾使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属于苏联的），指使中国白军侵犯我国远东边界。但中国军阀的袭击在很短期间就被消灭了，被红军击败的军阀退却了，这次冲突以我国同满洲当局签订和平协定而宣告结束。

苏联的和平政策排除了一切干扰、克服了外敌的阴谋和党内的“纷争”而再次胜利了。

不久，原被英国保守党人中断的苏英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恢复了。

党在顺利地打退内外敌人的进攻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开展重工业的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最后，为采取和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必要的条件。

192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采取了五年计划的“理想”方案，要求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这样，党采取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1928—1933年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电气化在内）的投资为一百九十五亿

卢布，运输业为一百亿卢布，农业为二百三十二亿卢布。

这是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宏伟计划。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485页）^①

这个计划虽然非常宏伟，但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和冲昏头脑的事情。它是由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全部发展进程准备好了的。它是由在此以前已普及于工农群众、反映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劳动高潮准备好了的。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告全体劳动者书。

社会主义竞赛展示了劳动和新的劳动态度的卓越榜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在许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了响应计划。他们作出了英勇工作的榜样。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人们对劳动的看法改变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不自由的苦役，而现在它开始变成“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斯大林）^②。

全国各地进行着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德涅泊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开展起来了。在顿巴斯，开始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和戈尔洛沃工厂的修建以及鲁干斯克机车制造厂的改建。新的矿井和高炉增多了。在乌拉尔兴建着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伯列兹尼基和索里卡姆斯克两个化学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动工了。在莫斯科和高尔基，两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开展起来了。许多地方都在兴建大型的拖拉机制造厂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如顿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46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5页。——译者注

河岸罗斯托夫在修建大型的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第二个产煤基地库兹巴斯在扩建。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制造厂经过十一个月就在草原地带的斯大林格勒矗立起来。在德涅泊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工人们打破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新工业建设、这样的新建设热潮、这样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英雄主义。

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竞赛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真正的劳动高潮。

农民这次也不落后。农村中也开始了农民群众建立集体农庄的劳动高潮。农民群众开始确定地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用拖拉机和其他机器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农民们一批批地来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观看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操作，看得眉飞色舞，马上决定“加入集体农庄”。农民过去分散成了小而又小的个体经济，没有什么象样的农具和牵引力，没有可能开垦大片的荒地，没有改善经济的前途，为贫困所压抑，孤苦零丁而无人过问。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在于把小农户联合为大集体即集体农庄，就在于采用能够开垦任何“硬地”、任何荒地的拖拉机，就在于从国家方面获得机器、资金、人员和意见的帮助，就在于有了可能免除富农的盘剥——因为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刚打败了富农，把他们打翻在地，使千百万农民群众拍手称快。

在这个基础上，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接着又全面铺开了：它到 1929 年底时急剧发展起来，那空前的增长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也未曾有过。

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 1928 年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1929 年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到了 1930 年，集体农庄已经有可能提出耕种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计划了。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1929年）中讲到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时说：“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这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①

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发展中的转变。

这是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问道：“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他回答说：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成就。”^②

这就是说，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正在成熟，或者说已经成熟了。

简短的结论

党在1926—1929年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斗争中克服了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困难。党和工人阶级的努力使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获得了胜利。

工业化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即为建设重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能够重新装备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的基础奠定了。

采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地开展了新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18页。——译者注

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

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同时，国内阶级斗争尖锐起来，党内斗争尖锐起来。这一斗争最重要的结果是：镇压了富农的反抗，揭露了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投降主义者联盟是反苏联盟，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是富农的代理人，驱逐了托洛茨基派出党，确认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联共（布）党籍不能相容。

托洛茨基派被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打败、在工人阶级中丧失了任何根基后，已不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变成了一伙毫无原则的怀有野心的政治骗子，一帮政治上的两面派。

党在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之后，就动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实现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各地展开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掀起了蓬勃的劳动高潮，培养出了新的劳动纪律。

这一时期以大转变的一年告终，这个转变的标志就是社会主义在工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农业取得了第一批重大的成就，中农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

第十一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 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1930—1934年)

— 1930—1934 年间的国际形势。资本 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日本强占中 国东三省。德国法西斯分子上台。 两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迅速地发展着工业，而资本主义国家却在 1929 年底爆发了破坏力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在以后的三年中加深了这一危机。工业危机同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更加恶化。

在危机的三年（1930—1933 年）内，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在 1933 年达到了 1929 年的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国工业在 1933 年底却降到 1929 年的百分之六十五，英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国工业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国工业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这种情况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济危机的国家。

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果，有二千四百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痛苦的境地。几千万农民遭受着农业危机的折磨。

世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两方面寻找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专政，即建立资本主义极端反动分子、极端沙文主义分子、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掠夺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结果正是如此。

1932年，日本发动战争的危险加大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欧洲列强和美国为应付经济危机都在国内忙得不可开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防御能力薄弱的中国施加压力，企图把它征服而成为那里的主宰。日本帝国主义者没有向中国宣战，狡诈地利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地方事件”，偷偷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东三省。日本军队完全占领了东三省，为侵占中国北部和进攻苏联准备了合适的阵地。为了便于自由行动，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自己的军备。

这种情况促使美英法三国去加紧扩充它们在远东的海上军备。日本的目的显然是征服中国，并把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从这里赶走。后者就以加紧扩充军备来对付。

但日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侵占苏联的远东地区。苏联当然不能把这种危险置于不顾，于是就来努力加强远东边区的防御能力。

这样，由于日本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者作祟，在远东形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矛盾不仅在远东尖锐化，而且在欧洲也尖锐化了。工农业危机旷日持久，工人大批失业，贫苦阶级生活无

着，加强了工农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转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义愤。在德国，由于这个国家被战争、被付给英法战胜国的赔款以及经济危机弄得民穷财尽，由于工人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和英法外国资产阶级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满情绪特别强烈。德国共产党在法西斯分子上台前最后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六百万张选票，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看到，德国保存着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会使它吃苦头，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这些自由来开展革命运动。因此它认定，为了在德国保持资产阶级政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自由，把国会化为乌有，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恐怖专政，一个能够镇压工人阶级而把充满复仇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作为自己的基础的专政。于是它就叫那个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国家社会党的法西斯党上台执政，因为它清楚地知道：第一，法西斯党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仇视工人阶级的部分；第二，法西斯党是个复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党，能把千百万怀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工人阶级的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这方面帮了忙，他们用自己的妥协主义政策替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

就是这些条件使德国法西斯分子在 1933 年取得了政权。

斯大林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时分析了德国的事变，他说：

“不仅应当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看做工人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替法西斯主义扫清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看做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用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旧方法来实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在对内政策上采用恐怖的管理方法的表现……”（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 10 版第 545 页）^①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 515 页。——译者注

德国法西斯分子火烧国会、残酷镇压工人阶级、消灭工人阶级的组织、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内政策。他们退出国际联盟、公开准备战争、企图用暴力手段按德国的需要来修改欧洲国家的边界，以此表明了他们要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这样，由于德国法西斯分子作祟，在欧洲的中心形成了第二个战争策源地。

苏联当然不能把这样严重的事实在于不顾。于是它就警惕地注视着西方事变的进程，并加强它在西部边陲的防御能力。

二 从限制富农分子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同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政策的行为作斗争。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全线进攻。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1929—1930年全面铺开的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是党和政府过去全部工作的结果。社会主义工业已发展到开始为农业大批生产拖拉机和农业机器；1928年和1929年粮食收购运动期间对富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使农民逐渐习惯了集体经济；第一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这一切为过渡到全盘集体化，为农民整村、整区、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做好了准备。

向全盘集体化过渡并不是基本农民群众简单地和平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一场农民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实行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在富农手里，因此农民就把富农从土地上赶走、剥夺富农的财产、

夺取耕畜和机器，并要求苏维埃政权逮捕和驱逐富农。

所以，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

这就是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当时苏联已经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铲除富农，打垮他们的反抗，消灭他们这个阶级，并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他们的生产。

1927年，富农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粮食，其中商品粮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7年能够提供的商品粮仅仅三千五百万普特。1929年，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发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坚定方针，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在以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供给农村方面取得了成绩，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成长为一支重大的力量。就在这一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了不下四亿普特的粮食，其中商品粮已超过一亿三千万普特，即超过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而在1930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提供而且确实提供了的商品粮已达四亿多普特，即远远地超过了富农在1927年提供的数量。

这样，由于我国经济方面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变动，由于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来代替富农的粮食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布尔什维克党就有可能从限制富农的政策过渡到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

1929年以前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向富农征收高额赋税，要求他们按照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颁布土地租佃法把富农的土地使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颁布个体农民经济使用雇佣劳动法来限制富农经济的规模。但是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因为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容许富农存在，而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又对此给予了一定的保障。这样的政策限制了富农的增长，使那些经不住这种限制

的个别富农阶层受到排挤和陷于破产。但这一政策并没有消灭富农阶级的经济基础，并没有消灭富农。这是限制富农的政策，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一定时期，即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力量还薄弱、不能用自己的粮食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的时期，是必要的。

1929年底，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苏维埃政权放弃这个政策而实行了一个急剧的转变。它采取了消灭的政策，采取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他农具转交集体农庄。富农被剥夺了，如同1918年资本家在工业中被剥夺一样，不过有这样一个区别：富农的生产资料这一次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联合起来的农民，即转归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变革，是从社会的旧质态到新质态的飞跃，按其结果来说，与1917年10月的革命变革具有同等的意义。

这个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上有国家政权的倡议，下有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对富农盘剥、争取自由的集体农庄生活这一斗争的直接支持。

这个革命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它消灭了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即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富农阶级；

(二)它使我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劳动阶级，即农民阶级，从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道路转上了公共经济、集体农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

(三)它在农业这个最广泛的、生活必需的、但又最落后的国民经济部门中，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同时创造了建成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所必需的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斯大林同志 1929 年在论证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指出全盘集体化这一群众性农民运动的结果时写道：

“世界各国资本家梦想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希望——‘神圣的私有制原则’正在破灭，正在化为泡影。被他们看做资本主义滋养料的农民正在大批地离开被颂扬的‘私有制’旗帜而走上集体制的轨道，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恢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希望正在破灭。”（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 10 版第 296 页）^①

联共（布）中央在 1930 年 1 月 5 日《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这一历史性决议中，明文规定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这一决议充分估计到了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充分估计到了苏联不同地区对集体化准备的不同程度。

当时规定了不同的集体化速度。联共（布）中央按照集体化的速度把苏联各地区分为三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对集体化最有准备、拖拉机较多、国营农场较多、在过去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同富农斗争的经验较多的那些最重要的产粮区，即北高加索（库班、顿河、捷列克）、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下游。中央提议这一类产粮区在 1931 年春基本完成集体化。

第二类产粮区，即乌克兰、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地，可以在 1932 年春基本完成集体化。

其余各州、边区和共和国（莫斯科州、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等地），集体化完成的时间可以到五年计划期末，即到 1933 年。

党中央认为，由于集体化速度日益增长，必须加速建立生产拖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 336 页。——译者注

拉机、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牵引农具等等的工厂。同时，中央要求“坚决反对在集体农庄运动现阶段轻视马匹牵引作用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导致随意处置和变卖马匹”^①。

1929—1930 年度给集体农庄的信贷增加了一倍（达五亿卢布）。

规定由国家出资给集体农庄进行土地规划。

在这个决议中有一个极重要的指示：集体农庄运动在现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集体化的农业劳动组合。

中央十分严肃地提醒各级党组织注意，必须“反对任何从上面对集体农庄运动‘发号施令’的做法，因为这会造成一种危险，把集体化当作儿戏，而不是开展真正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竞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 2 册第 662 页）^②。

中央的这一决议把如何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新政策的问题讲清楚了。

在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这一政策的基础上，蓬勃的集体农庄运动全面铺开了。农民整村、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扫除了前进路上的富农，摆脱了富农的盘剥。

可是，在集体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党的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中也很快暴露出一些缺点，即对党的集体农庄建设政策的歪曲。尽管中央提醒不要在集体化取得成就时头脑过于发热，许多党的工作人员还是不顾当时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准备程度，人为地加速集体化。

当时出现了违背集体农庄建设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地区不贯彻自愿原则，而以所谓“剥夺富农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来强迫加入集体农庄。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4 分册第 114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115 页。——译者注

有些地区不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不去耐心地解释党的集体化政策的一些原则，而是官僚主义地在上面发号施令，造成虚报集体农庄数字的现象，人为地扩大集体化的百分数。

中央指示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只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但有些地方不顾这一指示，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等都实行公有。

某些州的领导人刚一看见集体化取得成绩就头脑发热，违背了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莫斯科州为了追求浮夸的数字，竟责成该州工作人员在 1930 年春完成集体化，虽然他们至少还有三年的时间（到 1932 年底）。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违背指示的情况更为严重。

富农及其应声虫就利用这种过火行为进行挑拨，提出组织公社而不组织农业劳动组合，提出立刻把住宅、小牲畜和家禽实行公有。同时，富农还鼓动农民在加入集体农庄前把牲畜杀掉，诱骗农民说牲畜到集体农庄内“反正会被没收”。阶级敌人指望地方组织在集体化运动中所犯的过火行为和错误会激怒农民，会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

由于党组织的错误和阶级敌人的直接挑拨，1930 年 2 月下半月，在集体化普遍取得无可置疑的成就的情况下，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严重不满的危险征兆。有的地方，富农及其走狗甚至煽起了农民公开反对苏维埃。

党中央在接到一连串警报、知道党的路线遭到歪曲因而集体化有失败的危险之后，就立刻开始纠偏，努力把党的干部引上迅速改正错误的道路。1930 年 3 月 2 日，根据中央决定，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这篇文章警告了所有由于集体化成就而头脑发热、犯了严重错误和离开了党的路线的人，警告了所有

企图用行政强迫手段使农民转上集体农庄道路的人。文章特别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的速度和方法时必须考虑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斯大林同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等不实行公有。

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这篇文章帮助党组织改正了错误，极其有力地打击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因为这些敌人原以为他们一定能利用这种过火行为来煽起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广大农民群众确信，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与某些地方发生的鲁莽的“左的”过火行为毫无共同之处。这篇文章使农民群众安了心。

为了把斯大林同志的文章所发动的纠正过火行为和纠正错误的运动进行到底，联共（布）中央决定对这些错误再一次进行打击，于1930年3月15日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

这个决议详细分析了所犯的错误，认为这是离开党的列宁斯大林路线的结果，是直接违背党的指令的结果。

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是对阶级敌人的直接帮助。

中央提议：“撤换那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工作者。”（《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663页）^①

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能改正错误的州和边区的党组织（莫斯科州、南高加索）的领导进行了改组。

1930年4月3日，发表了斯大林同志的《答集体农庄员同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20页。——译者注

志们》一文。文章指出，在农民问题上发生错误的根源和集体农庄运动中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了中农，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估计到苏联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的原则，跳过了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公社。

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克服了一些地区的地方工作人员的过火行为。

只是因为中央非常坚决，善于逆潮流而进，才把党内很大一部分因取得成就而头脑发热、离开党的路线使劲往下滑的干部及时引上了正确道路。

党把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行为克服了。

结果就把集体农庄运动的成就巩固了。

结果就为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党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以前，为消灭资本主义成分而对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的严重进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工业方面。农业、农村暂时还落后于工业，落后于城市。因此，进攻还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非总攻性质的。但是现在，农村的落后已开始从画面上消失，农民为消灭富农而进行的斗争已十分清楚地呈现出来，党已进而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所以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有了总攻的性质，片面的进攻转变成了全线的进攻。到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总攻已经全线展开了。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于 1930 年 6 月 26 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六万零八百七十四名党员和七十一万一千六百零九名预备党员。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作为“社会主义在全线展开大规模进攻、消灭富农阶级和实现全盘集体化的代表大会”（斯大林）^①载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298 页。——译者注

入党的史册的。

斯大林同志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开展社会主义进攻中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的比重。在 1929—1930 经济年度，工业的份额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至少占百分之五十三，而农业的份额约占百分之四十七。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即在 1926—1927 年度，全部工业的总产值还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即在 1929—1930 年度，已约为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了。

重工业，即生产生产资料的机器制造业，更加强大了。

斯大林同志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说：“……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①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但是不能把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和工业发展的水平混为一谈。虽然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速度是空前的，但按工业发展的水平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电力生产的情形就是如此，尽管苏联在电气化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金属生产的情形也是如此。苏联的生铁产量，根据计划在 1929—1930 年度末应为五百五十万吨，而德国 1929 年的生铁冶炼量为一千三百四十万吨，法国为一千零四十五万吨。为了在最短期间消灭我国技术和经济落后的情形，必须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同企图减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速度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最坚决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232 页。——译者注

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

（《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369页）^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计划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后，群众中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在许多先进工业部门（石油工业、泥炭工业、普通机器制造业、农业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甚至可在两年半至三年内完成这些部门的五年计划。这就证实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是完全现实的，并揭穿了那些缺乏信心、怀疑这个口号能实现的人的机会主义。

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委托党中央“保证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②。

到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苏联的农业发展实现了极其重大的转变。广大农民群众完全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了。截至1930年5月1日，在各产粮州的主要产粮区，集体化的农户已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在1928年春为百分之二三）。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达三千六百万公顷。

这样，中央1930年1月5日决议中所规定的那个提高了的计划（三千万公顷）超额完成了。而集体农庄建设的五年计划，在两年内超额百分之五十多完成了。

集体农庄的商品产量三年内增加了三十九倍多。1930年，国家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不算）取得的商品粮，已占国内粮食的全部商品产量的一半多。

这就是说，今后决定农业命运的将不是个体农户而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了。

如果说在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群众性运动以前，苏维埃政权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40页。——译者注

②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36页。——译者注

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工业，那末今后它也要开始依靠农业中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成分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了。

正如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所指出的，集体农民已经成了“苏维埃政权真正的可靠的支柱”^①。

三 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方针。技术的作用。集体农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机器拖拉机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总结。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不仅已经建立和巩固、而且向前发展得相当迅速的时候，党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必须向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森林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提供现代化的新技术，提供新机床和新机器。由于对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大量增长，必须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产量增加一两倍。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现代化的新设备来供给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旧的设备不能使产量提高得这么快。

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满足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更高的需要。

不改造，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就不能进行到底，因为要打垮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不仅要依靠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依靠新的技术，依靠自己技术的优越。

不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171页。——译者注

义国家，因为从工业的发展速度看，苏联已超过这些国家，但从工业的发展水平看，从产量看，苏联还大大落后于它们。

为了消灭这种落后，必须用新的技术来供给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必须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

这样，技术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阻碍这件事情的，并不是新机器和新机床不够，因为机器制造工业已能提供新的设备，而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正确地对待技术，低估技术在改造时期的作用，鄙薄技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认为：技术是“专家”的事情，是交给“资产阶级专家”去做的一种次要的事情；党员经济工作人员不应干预生产技术；他们应该抓的不是技术，而是更重要的事情，即对生产的“一般”领导。

这样，让资产阶级“专家”管生产上的事情，而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则从事“一般”领导，即签署公文。

用不着证明，采取这样的态度，“一般”领导必然变成“一般”地空谈领导，为签公文而签公文，在一纸公文上瞎忙。

当然，在党员经济工作人员这样鄙薄技术的情况下，我们就不仅永远不能超过、而且也永远不能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对待技术，而且是在改造时期，就会使我国注定要落后，使我们的发展速度注定要降低。这样对待技术实质上掩盖和掩饰了一部分党员经济工作人员内心深处的愿望——放慢、降低工业发展速度而为自己造成一种“安静的环境”，办法就是把生产的担子推给“专家”。

必须使党员经济工作人员面向技术，使他们对技术产生兴趣，向他们指明：掌握新技术是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切身的事情，不掌握新技术就有使我们祖国永远落后、永远不能翻身的危险。

这个任务不解决就不能前进。

斯大林同志 1931 年 2 月在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

的演说在这方面起了极重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

旧俄的历史，其中有一点，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

我们至多在十年内就应当跑完我们落后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已经是抛弃那种不干预生产的陈腐方针的时候了。已经是领会另一个方针，即适合于目前时期的要干预一切的新方针的时候了。如果你是厂长，你就要干预一切事务，就要熟悉一切，什么都不要忽略过去，就要学习再学习。布尔什维克应当掌握技术。已经是布尔什维克自己成为专家的时候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444—446页）^①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党员经济工作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399—402页。——译者注

人员对技术的鄙薄态度，使他们面向技术，开辟了为布尔什维克自己掌握技术而斗争的新时期，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开展。

从这时起，技术不再由资产阶级“专家”所垄断而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切身的事情，而“专家”这一鄙薄的称呼变成了掌握技术的布尔什维克的光荣称号。

从这时起，必然会出现而后来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一批、成千成万掌握了技术和能够领导生产的红色专家。

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的即苏维埃的生产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现在是我们经济领导中的基本力量。

所有这些都必然会促进并且也确实促进了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开展。

改造工作不仅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进行，而且还要以更快的速度在农业方面进行。这也可以说，因为农业拥有的机器本来就比其他部门少，它比哪一个部门都更需要得到新机器。而现在特别需要加紧用新机器供给农业，因为现在集体农庄的建设每月每周都有新的发展，也就是说每月每周都提出了供给它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的新要求。

1931年，集体农庄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就主要产粮区来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全盘集体化在这些地区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二等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万个集体农庄和四千个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而个体农民只占三分之一。

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巨大胜利。

但是，集体农庄建设暂时还没有向深度发展，而只是向广度发展；还没有向改进集体农庄工作和集体农庄干部的质量方面发展，

而只是向增加集体农庄的数量和扩大集体化的地区的方面发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集体农庄积极分子的成长、集体农庄干部的成长，赶不上集体农庄本身数量的增加。因此，新集体农庄中的工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而集体农庄本身暂时还幼弱，不巩固。农村缺少集体农庄所必需的能读会写的人（会计、管理员、秘书），农民缺乏经营集体农庄大经济的经验，这些也妨碍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在集体农庄里都是些昨天的个体农民。他们只有经营小块土地的经验，还没有领导集体农庄大经济的经验。要获得这样的经验是需要时间的。

由于这些情况，集体农庄工作在最初一个时期暴露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当时发现集体农庄的劳动还组织得不好，劳动纪律松弛。有许多集体农庄不是按劳动日而是按人口分配收入。常有这样的时候，懒汉竟比埋头苦干不要滑的庄员分的粮食还多。由于集体农庄领导方面的这些缺点，庄员们对工作的切身利害感降低了，许多人甚至在大忙季节也不出工，一部分集体农庄庄稼直到下雪时还没有收割，并且收也收得不细，糟蹋很厉害。机器和马匹无人照管，工作没有专人负责，也削弱了集体农庄经济，减少了集体农庄的收入。

在那些被过去的富农和富农走狗钻进集体农庄窃取了某些职务的地区，情况特别严重。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往往跑到另外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区，钻进那里的集体农庄进行破坏和捣乱。有时候由于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缺乏警惕性，富农竟钻进了本地区的集体农庄。过去的富农之所以易于钻进集体农庄，是因为他们对集体农庄急剧改变了斗争策略。从前，富农公开反对集体农庄，用残酷手段来对付集体农庄积极分子、先进庄员，躲在角落里对他们放冷枪，焚烧他们的房屋和仓库等等。当时富农想用这种手段吓倒农民群众，不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现在，公开反对

集体农庄的斗争已经失败，他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他们现在已经不用半截枪杀人了，而是装得很温和、驯服、听话和完全象个苏维埃人的样子。他们钻进集体农庄之后，就暗中进行破坏。他们到处设法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把计算收成和计算劳动的工作搅乱，富农企图灭绝集体农庄的马匹，并且居然害死了许多马匹。富农故意让马匹感染上鼻疽、疥癣和其他病症，不给马匹任何照料，如此等等。富农破坏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富农所以能够欺骗庄员和进行破坏活动而不受到惩罚，是因为集体农庄还幼弱和没有经验，而集体农庄的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

为了消灭富农对集体农庄的破坏活动和加速巩固集体农庄，必须迅速地、认真地给集体农庄以人员、意见和领导方面的帮助。

布尔什维克党给了集体农庄这样的帮助。

1933年1月，党中央通过决议：在为集体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中成立政治部。为了帮助集体农庄，向农村派出了一万七千名党的工作人员去担任政治部工作。

这是一种重大的帮助。

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在两年（1933年和1934年）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消除集体农庄工作的缺点，培养集体农庄的积极分子，巩固集体农庄，清除集体农庄中的敌对分子，即从事破坏活动的富农分子。

政治部光荣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在组织上经济上巩固了集体农庄，培养了新的集体农庄干部，整顿了集体农庄的业务领导，提高了庄员群众的政治水平。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2月）和斯大林同志在这次大会上的演说，对提高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对比了农村中集体农庄以前的旧制度和集体农庄这个新制度。他说：

“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28页）^①

斯大林同志在演说中指出了农民走上集体农庄道路以后所取得的实际成绩。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千百万贫农群众加入了集体农庄，摆脱了富农盘剥。加入集体农庄并在农庄中使用着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产工具的千百万贫农群众，从前都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现在在农庄里上升到了中农的水平，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这是集体农庄建设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个成绩。

斯大林同志说，第二步就是要把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都提得更高，要使全体庄员都成为生活富裕的人，使所有农庄都成为布尔什维克式的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集体农庄庄员要成为生活富裕的人，只需要一件事情，就是在集体农庄里诚实地工作，正确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正确地使用耕畜，正确地耕种土地，爱护集体农庄的财产。”（《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32—533页）^②

斯大林同志的演说深深印在千百万庄员的心里，成了集体农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94—49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00页。——译者注

庄的具体的战斗纲领。

到 1934 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牢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苏联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三左右，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1934 年苏联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已有二十八万一千台，联合收割机三万二千台。1934 年的春播工作比 1933 年早十五至二十天完成，比 1932 年早三十至四十天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则比 1932 年早三个月完成。

这样，由于党和工农国家的巨大帮助，集体农庄在两年之内就巩固了。

集体农庄制度的牢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高涨，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取消面包和其他食品的配给制而规定食品可以自由购买。

由于作为临时政治机关而设立的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中央决定把它们改为通常的党的机关，使其同当时党的区委会合并。

所有这些成就，无论在农业方面或在工业方面，都是由于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而获得的。

到 1933 年初已看得很明显，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已经提前完成，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完成。

这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所获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

1933 年，斯大林同志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月联席全会上作的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总结。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过去这一时期，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取得了如下的基本成绩。

(一) 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

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增长到百分之七十。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消灭了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成分而成了工业中唯一的经济体系。

(三)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消灭了农业领域的富农阶级而成了农业中的统治力量。

(四)集体农庄制度消灭了农村中的贫穷、困苦现象，几千万贫农变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

(五)社会主义体系在工业中消灭了失业现象，在一些生产部门里保持八小时工作制，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已改为七小时工作制，在有害于健康的企业中规定了六小时工作制。

(六)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胜利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这些成绩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们使工人和农民彻底摆脱了剥削的桎梏，并为苏联**全体**劳动者过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开辟了道路。

1934年1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一百八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八名党员和九十三万五千二百九十八名预备党员。

大会总结了党在过去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出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一切部门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确认党的总路线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掉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

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广泛地设立了用苏联各民族语言来教学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初等学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53页)^①

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已占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九十九。社会主义农业,即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已占我国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至于商品流转,资本主义成分已从商业中完全排挤出去了。

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说过:我国有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第一种成分是宗法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经济,即几乎不进行任何贸易的经济。第二种成分是小商品生产,即占农民大多数的、出卖农产品的农户以及手工业者。这种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成分是私人资本主义,它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活跃起来了。第四种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第五种成分是社会主义,即当时还幼弱的社会主义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国民经济中微不足道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同样很幼弱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

列宁指出,在这五种成分中,社会主义成分一定会占绝对优势。

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获得完全胜利。

而这个目的到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实现了。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这点时说:“我们现在可以说,第一种、第三种和第四种社会经济成分已经不存在了,第二种社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4页。——译者注

会经济成分已经被排挤到次要地位了，而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成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独占统治地位的唯一的领导力量。”（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55页）^①

政治思想领导的问题在斯大林同志报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醒党说：虽然党的敌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各种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已被击败，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残余还留在一些党员的头脑中，并且时常在兴妖作怪。经济中特别是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是已被击败的反列宁主义集团的思想体系得以死灰复燃的良好土壤。人们意识的发展落后于人们的经济地位。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在经济中已经消灭，但资产阶级观点的残余仍然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着，并且将来还会存在下去。同时必须估计到，应当时刻加以防范的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图复活和支持这些残余。

斯大林同志还讲到，在民族问题方面，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特别有生命力。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有些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内，党组织放松了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竟让它发展到同敌对势力结合起来、同武装干涉者结合起来，成了危及国家的一种祸害。斯大林同志在答复民族问题上什么倾向是主要危险的问题时说道：

“主要危险就是人们停止和它作斗争因而让它发展到危害国家的那种倾向。”（同上，第587页）^②

斯大林同志号召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揭露敌对阶级的和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系及其残余。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26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563页。——译者注

接着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单是通过正确的决议本身还不能保证事业成功。要保证事业成功，必须正确配备能够实现领导机关决议的人员，并组织对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不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决议就有变成一纸空文而不能落实的危险。说到这里，斯大林同志援引了列宁的著名原理：组织工作主要就是挑选人员和检查执行情况。同时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主要祸害，就是通过的决议同执行决议、检查这些决议执行情况的组织工作脱节。

为了改进对党和政府的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直属联共（布）中央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以代替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完成了任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

斯大林同志把党在新阶段上的组织任务规定如下：

- (一) 要使我们的组织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
- (二) 把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的水平；
- (三) 使组织领导能够完全保证党的政治口号和决议得到实现。

斯大林同志在结束报告时提醒说：虽然社会主义的成就是伟大的，使我们产生了应有的自豪感，但是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不要高枕而卧。

斯大林同志指出：“……不要使党高枕而卧，而要在党内提高警惕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不要解除党的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使党涣散，而要使它保持动员状态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596页）^①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74页。——译者注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听取了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两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更加宏伟。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1937年，工业产值和战前水平比，大概增长七倍。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项目投资规定为一千三百三十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六百四十多亿卢布。

这样多的基建项目，能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都得到彻底的技术改造。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拖拉机的总功率要从1932年的二百二十五万马力，增加到1937年的八百多万马力。还规定要广泛采用各种农艺措施（实行正确的轮作制，用精选的种籽播种，秋耕等等）。

对运输业和邮电业规定要进行工程巨大的技术改造。

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工农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广泛规划。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对组织问题很重视，并根据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的专门决议。在党的总路线已经取得胜利、党的政策已经由实际生活即由千百万工农的经验检验过了的时候，组织问题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新的复杂任务要求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

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掌握新技术和新企业，实行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这些任务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提高一切部门的工作质量，首先是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的领导质量的问题。”（《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591页）^①

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它和旧党章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是增加了导言部分。党章导言部分对共产党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说明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体系中的地位。新党章详细列出了党员的义务。党章中加进了关于接收党员的更严格的规定和关于同情者小组的条文。党章更详细地阐明了党的组织机构问题，重新拟定了关于党的支部（原称支部，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起改称基层组织）的条文。新党章还重新拟定了关于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的条文。

四 布哈林派蜕化为政治上的两面派。 托洛茨基两面派分子蜕化为一帮白 卫杀人凶手和特务。谢·米·基洛 夫遭凶杀。党在加强布尔什维克警 惕性方面的措施

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不仅使我们党，不仅使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欢欣鼓舞，而且使我们的整个苏维埃知识界，使苏联全体忠实的公民欢欣鼓舞。

这些成就没有使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余孽感到高兴，而是使他们更加恼恨。

这些成就使被打倒的阶级的应声虫——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可怜余孽发了狂。

这些老爷评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时，并不是从欢迎每一个这样的成绩的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从自己那个可怜的脱离实际生活和完全腐化了的派别集团的利益出发。我国社会主义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84页。——译者注

的成就意味着党的政策的胜利，意味着这些老爷的政策的彻底破产，因此他们不仅不承认明显的事实在加入共同的事业，反而为自己的失败和破产向党和人民进行报复，对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事业进行捣乱和破坏，炸矿井，烧工厂，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搞破坏，以便破坏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成绩，并在人民中间挑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同时，为了使自己那个可怜的集团免遭揭露和粉碎，他们戴上了一副忠诚于党的假面具，越来越起劲地巴结党、吹捧党、谄媚党，而事实上继续在暗中进行反对工农的破坏活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作了忏悔的发言，他们颂扬党，把党的成绩吹得天花乱坠。但是代表大会感觉到，他们的发言有些言不由衷和两面派的味道，因为党要求于党员的不是吹捧和颂扬党的成绩，而是在社会主义战线上忠诚地工作，但这一点是布哈林派早已没有的了。党看到，实际上这些老爷是通过自己的虚伪发言同他们在会外的同伙遥相呼应，教他们要两面派，叫他们不要放下武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派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发了言，他们过甚其词地斥责自己的错误，也过甚其词地赞扬党的成绩。但是代表大会不能不看到，无论是令人作呕的自我斥责，还是甜言蜜语的歌功颂德，都是这些老爷心地龌龊和做贼心虚的另一种表现。不过党还不知道，还没有料到，这些老爷在会上甜言蜜语的同时，已经在准备凶杀谢·米·基洛夫了。

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谢·米·基洛夫被人用手枪凶杀了。

当场捕获的凶手，原来就是由季诺维也夫反苏集团参加者在列宁格勒组成的一个反革命地下集团的成员。

全党敬爱的、工人阶级敬爱的谢·米·基洛夫被杀害的消息，

引起了我国劳动者无比的愤慨和深切的悲痛。

调查材料表明，1933—1934年，前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成员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以所谓“列宁格勒总部”为首的反革命地下恐怖集团。这个集团的宗旨是杀害共产党的领导人。谢·米·基洛夫是预定的第一名牺牲者。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的口供中知道，他们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勾结，从他们那里领取经费。

这个组织中被揭露的成员，由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判处了枪毙的极刑。

很快查出存在着一个反革命地下“莫斯科总部”。调查材料和审判表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和这个组织的其他领导人在培植自己同伙的恐怖主义情绪方面，在准备杀害中央委员和苏联政府成员方面，起了卑鄙的作用。

这些人的两面手法和卑鄙龌龊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季诺维也夫这样一个组织和指使杀害谢·米·基洛夫、催促凶手赶快下毒手的人，居然写了一篇颂扬死者基洛夫的悼文，要求把它登载出来。

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装出悔过自新的样子，其实他们就在这时也还在耍两面派。他们隐瞒了自己和托洛茨基的勾结，隐瞒了他们同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卖身投靠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事实，隐瞒了他们的特务活动和暗害活动。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隐瞒了自己和布哈林派的勾结，隐瞒了法西斯分子的雇佣走狗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的存在。

后来查明，基洛夫同志就是被这个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联合匪帮杀害的。

还在当时，即在1935年，就已很清楚，季诺维也夫集团是个暗藏的白卫组织，完全应该把它的成员当作白卫分子来严办。

一年后知道，杀害基洛夫的真正的、直接的、实际的组织者和准备杀害其他中央委员的组织者，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皮克里、伊·恩·斯米尔诺夫、穆拉契科夫斯基、帖尔-瓦加年、勒因哥里德等被交付法庭审判。这些当场捕获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当众承认，他们不仅组织了杀害基洛夫的事件，而且还作了准备要杀害党和政府的其他一切领导人。后来调查材料表明，这些恶棍走上了组织破坏活动的道路，走上了充当特务的道路。193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审判，揭穿了这些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极其骇人听闻的堕落，揭穿了这些人用假装对党表示忠诚的两面派声明所掩盖的最下流的卑鄙勾当和叛卖行为。

犹大托洛茨基是这一大帮凶手和特务的主要指使人和组织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主义的仆从，是托洛茨基的帮手和反革命指令的执行者。他们进行着使苏联在受到帝国主义者侵犯时遭到失败的准备工作，他们是主张工农国家失败的失败主义者，他们是德日法西斯分子的可恶奴仆和走狗。

各级党组织从谢·米·基洛夫凶杀案的审判中应该得出的基本教训是，要消灭自己的政治盲目病，消灭自己的政治麻木病，提高自己和全体党员的警惕性。

党中央在它为谢·米·基洛夫被凶杀一事发表的给各级党组织的信中指示说：

(一)“必须铲除机会主义的好心肠，它的根源就是错误地以为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会越来越驯服、善良。这种想法是根本不正确的。这是那种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不声不响地爬进社会主义、最终将成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右倾思想的翻版。布尔什维克决不应高枕而卧，决不应马虎从事。我们不要好心肠，而要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要

记住，敌人愈绝望，就愈要采取‘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唯一的最后挣扎的手段。要记住这一点，并保持警惕。”

(二)“必须把下列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在党员中讲授党史，研究我党历史上的一切反党集团，研究他们反对党的路线的斗争手段、他们的策略，尤其要研究我们党同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策略和手段，即保证我们党战胜并彻底击溃这些集团的策略和手段。必须使党员不仅知道党怎样反对和战胜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知道党怎样反对和战胜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右倾分子、右的‘左’的畸形儿等等。不应该忘记，熟悉和了解我党的历史是完全保证党员具有革命警惕性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这一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是 1933 年开始的把混进来的和异己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队伍的工作，特别是在谢·米·基洛夫被凶杀后进行的仔细审查党员证件和更换党员证件的工作。

在审查党员证件以前，许多党组织中任意和随便对待党证的情况很严重。在好些地方党组织中发现，党员登记工作混乱到了根本不能容忍的地步，敌人利用了这一点来实现他们的卑鄙目的，他们以党证作掩护来搞特务、暗害等等活动。许多党组织的领导人竟把接收新党员和发党证的事情交给一些很不重要的人员去作，甚至往往交给一些完全没有经过考查的党员去作。

1935 年 5 月 13 日，党中央在给各级组织的一封专门讲党证的登记、发给和保存问题的信中，建议各级组织对党员证件进行一次仔细的审查，“在我们自己党的屋子里整顿一下布尔什维克的秩序”。

审查党员证件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党中央全会

1935年12月25日关于审查党员证件工作的总结这一决议中指出，这次审查对于巩固联共（布）的队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组织和政治措施。

在党员证件审查和更换以后，恢复了接收新党员的工作。对此，联共（布）中央要求，接收新党员时，不要用集体接收的方式，而要用严格地个别地接收的方式，“从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不同岗位上经受了考验的工人（首先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接收“我国真正先进的、真正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入党^①。

中央在恢复接收新党员的工作时，要求各级党组织记住，敌对分子今后还会企图钻进联共（布）的队伍。因此：

“每个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竭力提高布尔什维主义的警惕性，高举列宁党的旗帜，保证不让异己分子、敌对分子和偶然分子钻进党的队伍。”（联共（布）中央1936年9月29日的决议，载于1936年《真理报》第270号）

布尔什维克党清洗和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消灭了党的敌人，坚决地克服了歪曲党的路线的行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和苏维埃国家过渡到了新的阶段，即完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

简短的结论

1930—1934年，布尔什维克党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千百万小私有农户转上集体农庄道路，转上社会主义道路。

富农这一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被消灭和基本农民群众转上集

^① 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60页。——译者注

体农庄道路，导致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最后根源的消灭、社会主义在农业中的完全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完全巩固。

集体农庄在克服了许多组织方面的困难后已完全巩固，并且走上了富裕生活的道路。

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固基础——头等的社会主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集体农业，消灭了失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为不断改善我们祖国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创造了条件。

我国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和一切劳动者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因为党和政府实行了大胆的、革命的和英明的政策。

资本主义包围势力力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威力，就加紧进行他们的“工作”：在苏联内部组织杀人凶手、暗害分子和特务的匪帮。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资本主义包围势力的反苏活动特别加紧起来。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这样一批忠实的仆役来从事特务活动、暗害活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来促使苏联遭到失败，以便恢复资本主义。

苏维埃政权果断地惩罚了这些人类蟊贼，无情地惩治了这些人民的敌人和祖国的叛徒。

第十二章

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社会 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1935—1937年)

— 1935—1937 年间的国际形势。
经济危机的暂时缓和。新的经
济危机的开始。意大利强占阿
比西尼亚。德意两国武装干涉
西班牙。日本侵入中国中部。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1929年下半年在资本主义各国爆发的经济危机，一直继续到1933年底。然后工业低落暂时停止，危机转为停滞，接着工业开始略见活跃，略见上升。但这次上升之后并没有接着就出现在新的较高的基础上的工业繁荣。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甚至不能上升到1929年的水平，到1937年年中只达到这一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而到1937年下半年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首先卷进去的是美国。到1937年底，美国失业人数又增加到了一千万。英国失业人数也开始迅速增加。

这样，各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从不久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就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

这种情况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更加剧烈了。因此，各侵略国愈来愈趋向于以掠夺其他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来弥补国内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并且这次除大家知道的德日两个侵略国外，还加上了第三个国家——意大利。

1935年，法西斯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并征服了它。意大利侵犯阿比西尼亚，从“国际法”来看是没有任何根据或理由的，它是采取当时法西斯分子惯用的方式，不宣而战，偷偷地干的。这不仅打击了阿比西尼亚，而且也打击了英国，打击了英国从欧洲到印度和亚洲的海上通道。英国想阻止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站稳脚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后来，意大利为了便于自由行动，就退出国际联盟，并加紧扩充军备。

于是就在从欧洲到亚洲的最短的海上通道上结成了一个新的战争纽结。

法西斯德国用单方面的行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并决定实现它用暴力修改欧洲国家边界的计划。德国法西斯分子毫不隐晦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征服邻国，至少是占领这些国家里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这个计划预定首先占领奥地利，随后打击捷克斯洛伐克，然后也许打击波兰，那里也有整整一片与德国毗邻的德意志人居住区，然后……然后“再看分晓吧”。

1936年夏，德意两国开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意大利和德国借口援助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得到了可能悄悄地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西班牙境内，即开到法国背后，又把自己的舰队开进西班牙的水域——南面到巴利阿里群岛和直布罗陀一带，西面到大西洋一带，北面到比斯开湾一带。1938年初，德国法西斯分子强占了奥地利，侵入多瑙河中游，并扩展到欧洲南部，进到亚得利亚海附近。

德意法西斯分子在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时向大家担保，他们在西班牙是进行反对“赤色分子”的斗争，并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但这是用来愚弄头脑简单的人的一种蠢笨拙劣的手腕。其实，他们是打击英国和法国，因为他们把英法两国通向其亚洲和非洲的广大殖民地领土的海上通道截断了。

至于强占奥地利，要说这是德国同凡尔赛条约作斗争，是德国为保护“民族”利益而力求收回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丧失的领土，那已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了。奥地利无论战前或战后都不是德国的领土。德国用暴力兼并奥地利，就是用蛮横的帝国主义手段侵占别国的领土。这种做法无疑暴露了法西斯德国想称霸西欧大陆的野心。

这首先是对法国和英国利益的打击。

于是就在欧洲南部，在奥地利和亚得利亚海一带，以及在欧洲最西部，在西班牙及其周围水域，结成了两个新的战争组结。

1937年，日本法西斯军阀侵占北平，侵入中国中部，占领了上海。日本军队侵入中国中部，也象几年前侵入东三省一样，用的是日本方式，即偷偷地干的，办法就是玩弄骗术，借日方自己制造的种种“地方事件”找岔寻衅，用实际行动破坏一切“国际的准则”、条约和协定等等。日本占领天津和上海，就抓到了同中国这一广阔市场通商的钥匙。这就是说，只要日本掌握着上海和天津，就随时都能把英美从它们有巨额投资的中国中部驱逐出去。

当然，中国人民及其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国规模巨大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中国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疆土，以及中国民族政府誓将中国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把侵略者逐出中国国境的决心，——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前途的。

但另一方面，当日本还掌握着同中国通商的钥匙的时候，它对

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就严重地打击了英美的利益，这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

于是，在太平洋，在中国一带，又结成了一个战争纽结。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它是不宣而战、悄悄开始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这次战争是由三个侵略国，即由德意日三国的法西斯统治集团在世界不同的角落挑起的。战争在从直布罗陀至上海这样广阔的地域内进行着。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已有五亿以上人口。这次战争归根到底是反对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重新分割世界和势力范围，使侵略国得到利益而使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受到损害。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前特点在于，进行和开展这次战争的是几个侵略国，而其他国家，即战争锋芒所指向的“民主”国家，却装作这次战争与它们无关的样子，袖手旁观，节节退让，吹嘘自己爱好和平，责骂法西斯侵略者，并……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阵地奉送给侵略者，同时却硬说它们在准备回击。

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相当奇怪和带有单方面性质的战争。但它终究是一次残酷的和野蛮的侵略战争，是使防御能力薄弱的阿比西尼亚人民、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受到蹂躏的战争。

如果认为这次战争的这种单方面性质是由于各“民主”国家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薄弱，那就不正确了。各“民主”国家无疑要比法西斯国家强大。目前正在扩大的世界大战所以具有单方面的性质，是由于各“民主”国家没有结成反对法西斯国家的统一战线。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当然不赞同法西斯国家“走过了头”，并且害怕法西斯国家势力的加强。但他们更害怕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对付这一切“危险”运动的“良好消毒剂”。因此，各“民主”国家中的统治集团，特别是英国执政的保

守党，只限于采取一种劝导猖狂的法西斯头目们“不要走过了头”的政策，同时还暗示，他们“完全谅解”和基本上同情法西斯头目们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反动警察政策。英国统治集团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大体上和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者在沙皇制度下所采取的政策相同，当时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者就是既害怕沙皇政策“走过了头”，但更害怕人民，所以就采取劝导沙皇的政策，亦即勾结沙皇反对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国自由保皇派资产阶级因采取这种两面政策而吃了大亏。可以断定，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法国和美国的朋友们也会得到历史的报应的。

苏联看到这样一种国际局势，当然不能把这种严重事变置于不顾。侵略者发动的任何一次战争，即使规模不大，也是对爱好和平国家的威胁，至于“不知不觉地”落到各国人民头上并且已包括了五亿多人口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更不能不是对各国人民、首先是对苏联的极严重的威胁。德意日三国“反共联盟”的成立，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国家一方面执行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强我国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加强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准备。1934年底，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因为苏联知道，国际联盟虽然软弱，终究可以成为一个揭露侵略者的场所，成为一种虽很软弱但多少总能阻碍战争爆发的和平工具。苏联认为，在目前这样的时候，即使是国际联盟这样一个软弱的国际组织，也不应当忽视。1935年5月，法苏两国签订了互助条约以防止侵略者可能的进攻。同时，同捷克斯洛伐克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1936年3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互助条约。1937年8月，同中华民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二 苏联工农业的继续高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农业的改造和集体化的完成。干部的意义。斯达汉诺夫运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苏维埃革命的力量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1930—1933年经济危机过去以后三年，又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在整个这一时期，工业一直在继续高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到1937年年中只勉强达到1929年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并且到1937年下半年又进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而苏联工业却蓬勃发展，到1937年底达到了1929年水平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六倍以上。

这些成就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造政策的直接结果。

由于获得了这些成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37年4月1日，即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

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胜利。

农业方面也差不多达到同样的高涨。各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从1913年（战前）的一亿零五百万公顷增长到1937年的一亿三千五百万公顷。粮食产量从1913年的四十八亿普特增长到1937年的六十八亿普特；籽棉产量从四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一亿五千四百万普特；亚麻（纤维）产量从一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千一千万普特；甜菜产量从六亿五千四百万普特增长到十三亿一千一百万普特；油料作物产量从一亿二千九百万普特增长到三亿零六百万普特。

普特。

应当指出，单是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除外）在1937年供给国家的商品粮，就达到十七亿普特以上，即比地主、富农和农民在1913年所供给的总数至少多四亿普特。

农业中只有畜牧业一个部门仍然落后于战前水平，而且继续保持着缓慢的发展速度。

至于农业集体化，那末可以说已经完成了。集体农庄在1937年包括的农户达一千八百五十万户，即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而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则已占农民的全部谷物播种面积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

改造农业和大力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所产生的成果，已经历历在目。

由于工农业改造的完成，国民经济已装备了丰富的头等技术。工业和农业，运输业和军队，都已获得大量新的技术，大量的新的机器和机床、拖拉机和农业机器、机车和轮船、大炮和坦克、飞机和军舰。必须配备几万以至几十万受过训练、能够驾驭所有这些技术并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作用的干部。没有这一点，没有足够能量的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就有可能变成一堆废铁。这是严重的危险，它的造成是由于能够驾驭技术的干部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并且远远落后于技术增长的速度。而使事情复杂化的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认为有了技术，一切都“迎刃而解”。从前人们是过低估计技术和鄙薄技术，而现在则是过高估计技术，把技术变成了偶像。人们不了解，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就是死的东西。人们不了解，只有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才能产生高度的生产率。

因此，掌握技术的干部问题，就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必须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从过分迷信技术和低估干部的作用转

变为注意掌握技术，精通技术，在培养大量的能够驾驭技术并充分发挥技术效能的干部方面狠下功夫。

从前，在改造时期的初期，即国内痛感缺乏技术的时候，党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现在，在技术已很丰富、改造时期已基本结束、国内感到干部奇缺的时候，党应当提出新的口号，把大家的注意力从技术上转到人材上，转到能够充分利用技术的干部上。

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 1935 年 5 月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起了巨大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说：“从前我们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里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材。这是很好的。但这还远远不够。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材，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就是死的东西。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材，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如果在我们的头等工厂里，在我们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里，在我们的运输部门里，在我们的红军里，有足够的数量的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干部，那末我们国家所得到的效果，就会比现有的要多两三倍。正因为如此，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材，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正因为如此，‘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毕竟应该了解：人材，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

‘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末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①

于是，加速培养技术干部和迅速掌握新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这种干部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的
人材已掌握新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已进一步增长的最明显的例子。
这个运动在顿巴斯、在煤炭工业中产生和开展起来，随即扩展到其
他工业部门，推广到运输业，后来又普及到农业。这个运动之所以
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因为它的发起者是“中央伊尔敏诺”矿井
(顿巴斯)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还在斯达汉诺夫以前，
尼基塔·伊左托夫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采煤纪录。1935年8月31日，
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这一榜样促成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提高生
产定额、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群众运动的诞生。汽车工业中的布塞根，制鞋工业中的斯美塔宁，运输业中的克里沃诺斯，森林
工业中的穆辛斯基，纺织工业中的叶沃多基亚·维诺格拉多娃和
玛丽亚·维诺格拉多娃，农业中的玛丽亚·杰姆钦科、玛丽娜·格
娜田科、普·安格林娜、波拉古亭、科列索夫、科瓦尔达克和波林
等，就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第一批先驱者的名字。

继他们而起的还有其他先驱者，还有超过第一批先驱者的劳动生产率的整批整批先驱者。

1935年11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1—583页。——译者注

斯大林同志在这次讲话中说：“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一个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座的这些人，象斯达汉诺夫、布塞根、斯美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材，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材，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材。……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①

然后，斯大林同志在说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和阐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对于我国前途的巨大意义时说：

“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材，他们作出了准确工作和认真工作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中善于珍惜时间的因素，他们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4—586页。——译者注

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材。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一定会增加十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①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为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创造了条件。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工资基金在1933年为三百四十亿卢布，而在1937年则已增加到八百一十亿卢布。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在1933年为四十六亿卢布，而在1937年则已增加到五十六亿卢布。仅仅在1937年这一年，国家用在工人和职员的保险方面，用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文化需要方面，用在疗养院、天然疗养地、休养所和医疗方面的经费，就大约有一百亿卢布。

在农村，集体农庄制度已最终巩固。1935年2月举行的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及集体农庄的全部耕地归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规定，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集体农庄制度的巩固，农村中的贫穷和生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87—588页。——译者注

活无保障的现象已经消灭。三年以前，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两公斤粮食，而现在，产粮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已能分到五至十二公斤粮食，许多人甚至能分到二十公斤，此外还能分到其他产品和现金。已有几百万集体农庄农户，在产粮区每年分到五百至一千五百普特粮食，在棉花、甜菜、亚麻、牲畜、葡萄酒、柑橘和蔬菜产区每年分到几万卢布的收入。集体农庄富裕起来了。建筑新粮仓和仓库已成为集体农庄农户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因为原有的贮藏室的设计只考虑到每年分到少量产品，对于现在集体农庄庄员的新的需要是十分之一也不能满足的。

1936年，鉴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政府颁布了禁止堕胎的法律。同时又拟定了大规模建筑产科医院、托儿所、乳品厨房和幼儿园的计划。1936年，用于这些设施的拨款达二十一亿七千四百万卢布，而1935年只有八亿七千五百万卢布。还有一项专门的法律规定给多子女的家庭大量补助。按照这个法律，1937年支出的补助金达十亿卢布以上。

由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新学校的建设，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工作。小学和中学学生人数1914年为八百万，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二千八百万。高等学校学生人数1914年为十一万二千，而1936—1937年已增加到五十四万二千。

这是一次文化革命。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表明了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过去的革命所以遭到灭亡，是因为它们给了人民自由之后没有可能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状况得到切实的改善。它们的根本弱点就在这里。我国革命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使人民摆脱沙皇制度、摆脱资本主义而获得了自由，并且根本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

生活状况。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

斯大林同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幸福生活的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①

三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 苏联新宪法的通过

1935年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修改1924年通过的苏联宪法。苏联宪法必须修改，是因为从1924年以来，即从通过第一个苏联宪法以来，苏联生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在过去这些年代里，苏联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完全改变：新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已经建立起来，富农已被消灭，集体农庄制度已经获得胜利，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确立起来，成为苏维埃社会的基础。由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有可能使选举制度更加民主化，已有可能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590—591页。——译者注

由斯大林同志主持的专门的宪法委员会，拟定了苏联新宪法的草案。草案经过了五个半月之久的全民讨论。宪法草案被提交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

1936年11月，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任务是批准或否决苏联新宪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叙述了自1924年通过的宪法以来苏维埃国家内发生的基本变化。

1924年宪法是在新经济政策第一个时期制定的。当时，苏维埃政权还容许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当时，苏维埃政权打算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竞赛过程中组织和保证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胜利。当时，“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立在旧的贫乏的技术基础上的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当时农业更不成样子。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只不过是个体农户汪洋大海中的一些零星小岛。当时还不是要消灭富农，而只是限制富农。在商品流转方面，社会主义成分还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1936年苏联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到1936年，苏联经济已经完全改观了。到这时候，资本主义成分已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产量已超过战前六倍，并完全排挤了私人工业。在农业方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生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已获得了胜利。到1936年，富农阶级已完全消灭了，而个体成分在国家的经济中已不起什么重大作用。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在国家和合作社手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永远铲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确立起来，成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新社会

中已永远消灭了危机、贫困、失业和破产。已为苏维埃社会的全体成员过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斯大林同志在报告中说：苏联居民的阶级成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地主阶级和旧时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被消灭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又消灭了所有的剥削分子——资本家、商人、富农和投机分子。现在只留下了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的少数残余，而完全消灭这些残余不过是最近时期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苏联劳动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起了深刻的变化。

工人阶级已不再象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被剥削阶级。它已消灭了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了生产资料而把它变成了公有财产。它已不是原来的旧的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了。掌握国家政权的苏联无产阶级已变成一个崭新的阶级。它已变成摆脱了剥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确立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工人阶级，即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人阶级。

苏联农民的情况也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时代有两千多万分散的个体农户——小农户和中等农户，都是单独在自己的份地上辛辛苦苦地耕作。他们使用落后的技术，受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和高利贷者等等的剥削。现在在苏联成长起来的是崭新的农民，因为那些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已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农户已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基础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农民。这样的农民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知识分子也发生了变化。苏联知识分子就其大多数来说，已经是崭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不象

旧知识分子那样为资本主义服务，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知识分子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的一员。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社会。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摆脱了一切剥削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样，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正在缩小和消除。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

苏联生活中的这些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的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成就，都在苏联新宪法中得到了反映。

按照这个宪法，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友好的阶级组成，工人和农民之间还存在着阶级差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政治基础是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它由于推翻地主资本家政权和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得以成长壮大。

苏联全部政权属于体现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城乡劳动者。

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

苏联最高苏维埃由平等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选出，任期四年。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象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一样，是普遍的。这就是说，所有年满十八岁的苏联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不分信仰、教育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的活动，都有选举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只有精神病患者和由法庭判决褫夺选举权者除外。

代表的选举是平等的。这就是说，每个公民都有一票选举权，

所有公民都按平等原则参加选举。

代表的选举是直接的。这就是说，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从村的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到苏联最高苏维埃，都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由公民直接选出。

苏联最高苏维埃在两院联席会议上选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

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所有苏联公民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享有在年老以及患病和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妇女在一切活动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苏联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一律平等，是确定不变的法律。

一切公民都有信仰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宪法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召开群众大会的自由，保障结成各种社会组织的权利，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因维护劳动群众利益或进行科学活动或进行民族解放斗争而受迫害的外国公民有居留权。

同时，新宪法责成苏联一切公民履行下列重要义务：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忠实地履行社会义务，尊重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保卫祖国是每个苏联公民的神圣职责。”

关于公民结成各种团体的权利，有一条宪法条文说：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则结成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劳动者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先锋队，劳动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和批准了苏联新宪法草案。

这样，苏维埃国家就有了新的宪法——社会主义和工农民主取得胜利的宪法。

这样，宪法就明文记载了一件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渐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四 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特务、暗害分子和叛国者余孽的被消灭。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准备。党的扩大党内民主的方针。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

1937年，发现了属于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的一群恶棍的新材料。对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案件的审判，对土哈切夫斯基、亚基尔等人案件的审判，以及对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罗晋哥里茨等人案件的审判，都表明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派早已结成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共同匪帮，即所谓“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审判表明，这些人类渣滓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已和人民公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勾结起来阴谋反对列宁，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国家。在1918年初进行破坏布列斯特和约的挑衅尝试；在1918年春阴谋反对列宁，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图谋逮捕和杀害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在1918年夏恶毒地向列宁开枪，使列宁受伤；在1918年夏发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在1921年为了从内部动摇和推翻列宁的领导而故意使党内意见分歧尖锐化；在列宁患病时和列宁逝世后企图

推翻党的领导；出卖国家机密，向外国间谍机关提供情报；凶杀基洛夫；进行暗害、破坏和爆炸；凶杀明仁斯基、古比雪夫和高尔基，——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二十年来原来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走狗的参加或领导下，遵照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指示干出来的。

审判表明，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恶棍们遵照他们的主子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旨意，力图破坏党和苏维埃国家，破坏国防，协助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让苏联被肢解，把苏联的沿海边区割让给日本，把苏联的白俄罗斯割让给波兰，把苏联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

这些象虫子一样软弱无力的白卫小丑，俨然以国家主人自居（真可笑），竟以为他们真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沿海边区割让和出卖给别人。

这些白卫虫子忘记了，苏维埃国家的主人是苏联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流的老爷不过是暂时窃据了国家职务，而这个国家是随时都可以把他们从办公室里当作废物扔出去的。

这些微不足道的法西斯分子奴仆忘记了，苏联人民只要动一动指头，就能把他们变成齑粉。

苏联法庭把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恶棍们判处了死刑。

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这一判决。

苏联人民对消灭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匪帮表示赞许，接着转入当前的任务。

当前的任务就是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并有组织地进行这次选举。

党用全力开展了这次选举的准备工作。党认为苏联新宪法的

实施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变。党认为这个转变就表现为选举制度完全民主化，从有限制的选举过渡到普遍的选举，从不完全平等的选举过渡到平等的选举，从多级的选举过渡到直接的选举，从公开投票的选举过渡到秘密投票的选举。

在新宪法实施以前，对僧侣、过去的白卫分子、过去的富农以及不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的人的选举权是有限制的，新宪法取消了对这几类公民的选举权的一切限制，使代表的选举成了普遍的选举。

从前代表的选举是不平等的，因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选举名额不同；现在选举的这种限制已没有必要，一切公民都有平等参加选举的权利。

从前苏维埃政权的中级和高级机关的选举是多级的；现在新宪法规定，各级苏维埃，从村苏维埃和市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都采用直接选举的办法由公民直接选出。

从前选举苏维埃代表采取公开投票，并按整个名单投票；现在选举代表则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并按选区提出的候选人逐个投票而不按整个名单投票。

这是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明显的转变。

新选举制度应当是而且确实是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加强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机关的监督，加强了苏维埃政权机关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为了有充分准备地迎接这个转变，党应当领导这个转变，完全保证自己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起领导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各级党组织本身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成为彻底民主的组织，使它们在自己的党内生活中贯彻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各级党的机关都按选举产生，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充分开展起来，使党组织对党员群众完全负责，并使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出来。

1937年2月底，日丹诺夫同志在中央全会上就各级党组织作好准备以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的问题作了报告，其中指出，许多党组织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往往违背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用委派代替选举，用按整个名单投票代替按候选人逐个投票，用公开投票代替秘密投票等等。显然，采用这种做法的组织不可能在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必须首先消除党组织中这种反民主的做法，并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会听取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后决定：

“（一）在无条件实现和彻底实现党章所规定的党内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改造党的工作。

（二）取消委派党委员会委员的做法，根据党章恢复各级组织领导机关按选举产生的制度。

（三）禁止在选举党机关时按整个名单投票，而要按候选人逐个投票，同时保证一切党员都有不选候选人和批评候选人的充分权利。

（四）党机关的选举采用秘密（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五）各级组织都进行党机关（从基层组织的委员会起直到边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止）的选举，最迟到5月20日结束。

（六）各级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党章所规定的党机关的选举期限：基层组织的党机关选举一年一次，区组织和市组织的一年一次，州组织、边区组织和共和国组织的一年半一次。

（七）基层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在全厂党员大会上选举党委员会的制度，不得以代表会议代替全厂党员大会。

（八）取消目前许多基层组织所通行的那种实际上是否止全体党员大会而代之以车间党员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做

法。”^①

这样就开始了党对即将举行的选举的准备。

中央的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揭开了党为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而进行的选举运动的序幕。它的意义首先在于它帮助了各级党组织去进行自身的改造，去贯彻开展党内民主的方针，去有充分准备地迎接最高苏维埃选举。

党在开展选举运动时，决定把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结成选举同盟的思想作为自己选举政策的中心。于是党就同非党群众结成同盟、同非党群众结成联盟去进行选举，它决定同非党群众一起提出各个选区的共同候选人。这是资产阶级国家选举运动的实践中从来没有和完全不可能有的。而在我国，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却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在这里已没有了敌对的阶级，在这里各阶层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937年12月7日，党中央发表了告全体选民书。其中说：

“1937年12月12日，苏联劳动者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宪法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同非党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结成同盟、结成联盟进行选举…… 布尔什维克党同非党群众并没有隔开，相反，它同非党群众结成同盟、结成联盟进行选举，同工人和职员的工会、同共青团和其他非党的组织和团体结成同盟进行选举。因此，将要提出的代表候选人对于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双方都是共同的，每个非党的代表也就是共产党员推举的代表，同样，每个党员代表也就是非党群众推举的代表。”

中央委员会告选民书在结束时向选民发出如下号召：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共产党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467—468页。——译者注

员和同情者象选举党员候选人那样一致投票选举非党的候选人。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非党的选民象选举非党的候选人那样一致投票选举党员候选人。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选民在1937年12月12日那天，都到选举箱前选举联盟院代表和民族院代表。

每个选民都应当行使其选举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代表的光荣权利。

每个积极公民都应当把促进所有一切选民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当作自己的公民职责。

1937年12月12日应当成为苏联各族劳动者团结在列宁斯大林胜利旗帜周围的伟大节日。”

1937年12月11日，即在选举前夕，斯大林同志在他被提名的选区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讲到人民的使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应当是怎样的活动家时说：

“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象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象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象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象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

12月12日，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选举是在巨大的热潮中进行的。这不是平常的选举，而是伟大的节日，是苏联人民的盛典，是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显示。

在九千四百万选民中，参加这次选举的有九千一百余万人，即占选民总数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万四千人，即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选民，都投票选举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提出的候选人。只有六十三万二千人，即不到百分之一的选民，投票反对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所提出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地全部当选。

这样，九千万人用一致的投票证实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

这是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同盟获得的辉煌胜利。

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辉胜利。

莫洛托夫同志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所说的苏联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在这里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结 束 语

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可以作出什么样的基本总结呢？

联共(布)的历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

(一)首先，党的历史教导说，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的历史教导说，把无产阶级弄到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是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而把它弄到没有革命的领导，就是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到失败。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决不是通常那种西欧类型的社会民主党，那种在国内和平条件下薰陶出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牵着走、幻想“社会改良”而害怕社会革命的党。

党的历史教导说，能够成为这样的党的，只能是新型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主张社会革命的党，能够训练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决战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党。

这样的党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同志说：“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第二国际各党是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力量，议会斗争形式是基本的斗争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党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它后来在公开的革命搏斗的条件下所具有的那种重大的和决定

的意义。考茨基在第二国际遭受攻击时替它辩护说：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不是战争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时期，就没有力量采取什么重大措施。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二国际各党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不适用的，它们不是引导工人去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而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正因为如此，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统治的时期，无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并不是党，而是议会党团。大家知道，事实上党在这个时期只是议会党团的附属品和服役者。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是谈不到训练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的。

可是，新时期一到来，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新时期是公开的阶级冲突的时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是直接准备力量去推翻帝国主义而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无产阶级面前提出种种新的任务：要按新的革命规范去改造党的全部工作，要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精神去教育工人，要准备后备军并使他们跟上来，要和邻国的无产者结成联盟，要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巩固的联系，如此等等。如果以为这些新任务可以用那些在议会制度的和平条件下教育出来的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解决，那就是使自己陷于绝望的境地，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肩负着这样的任务而仍然以旧的党为领导，那就是完全解除武装。几乎用不着证明，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

因此，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

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

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新的党就是列宁主义的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62—63页）^①

(二)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本阶级的领导者，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就在于它使党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

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才能信心百倍地前进，并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相反，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党，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对自己的行动失去信心，没有能力引导工人阶级前进。

有人也许以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要做到用心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结论和原理，学会及时引证这些结论和原理，就算不错了。他们是指望把熟读的结论和原理用于各种环境、用于实际生活的一切场合。但这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看成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人和书呆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它既是一种科学，就不会也不可能停留不前，而会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显然，它在自己的发展

^①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2—74页。——译者注

进程中不能不用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结论和新原理来代替。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决不是说要熟读它的一切公式和结论，抱住这些公式和结论的每一个字句不放。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首先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

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不怕根据这个理论的实质去用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代替它的某些已经陈旧的原理和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以前，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社会最适宜的政治组织形式。固然，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最适宜的形式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组织。但可惜马克思的这一指示没有在著作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于是就被人遗忘了。此外，恩格斯在1891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作的权威性声明，即“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①，也不容置疑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认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的这个原理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奉行的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译者注

则。但是，俄国 1905 年的革命，特别是 1917 年 2 月的革命，提出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即一个社会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俄国两次革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不是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这一点，列宁在 1917 年 4 月，即在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提出了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政治形式的口号。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议会制共和国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破坏了民主。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的一个原理变成了教条。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不敢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适合新的历史形势的新原理来代替恩格斯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旧原理，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苏维埃就会瓦解，我们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研究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举行进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说的。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但是，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

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抱住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不放，责备列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而机会主义者则把这个理论向后拉，把它变成木乃伊。

如果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的字句所束缚，如果他在理论上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那末党、我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会是什么情况呢？党就会在黑暗中徘徊，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开始衰退。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无产阶级的敌人就会获得胜利。

机会主义并不总是意味着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它的某些原理和结论。机会主义有时还表现在企图抱住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还已经过时的原理不放，把它们变成教条，以便阻碍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从而也阻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逝世后，最伟大的理论家列宁，以及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学生，是唯一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新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列宁和列宁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新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的先进干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他们没有学会把这个理论看作行动的指南，如果他们没有学会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

这个理论，那末布尔什维克党就不会有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恩格斯在批评那些担负着美国工人运动领导工作的侨居美国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时写道：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第 606 页）^①

列宁批评加米涅夫和某些老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4 月，即在革命运动已经向前发展而要求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仍抱住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公式不放时写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列宁全集》俄文第 3 版第 20 卷第 100—101 页）^②

(三)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

我们党的历史是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斗争并把它们打垮的历史。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6 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4—26 页。——译者注

不战胜这些党派，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就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打垮这些起初主张保存资本主义、到十月革命后又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党派，那就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建成社会主义。

一切为了欺骗人民而自称“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早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就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政党，后来又变成了外国资产阶级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一帮特务、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凶手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50页）①

（四）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是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派”、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的历史。

党的历史教导说，所有这些投降主义集团实质上都是孟什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的仆从，是孟什维主义的继续。它们也同孟什维主义一样，起着在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作用。因此，消灭党内这些集团的斗争，就是消灭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72页。——译者注

孟什维主义的斗争的继续。

如果不打败“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我们就不能把党建立起来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不打败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我们就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准备好必要的条件。

如果不打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倾向分子，我们就不能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就不能保住苏联各族人民伟大友谊的旗帜，就不能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起来。

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用了过多的时间去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过高估计了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作用。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有机会主义，正如不能容忍健全的机体上有脓疮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是它的先头堡垒，是它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能容许信念不坚定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垒中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去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遭到失败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必须在工人阶级的党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内，在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内，把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和民族主义倾向分子反对列宁反对党，遭到了与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同样的结局，即变成了法西斯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变成了特务、暗害分子、凶手、破坏分子和叛国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列宁说：“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

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末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462—463页）^①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除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72页）^②

（五）其次，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老大难的问题，用虚假的表面上的一切满意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妄自尊大，躺在功劳簿上，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

① 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45—346页。——译者注

② 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84页。——译者注

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200页）^①

又说：

“过去一切灭亡了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7卷第260—261页）^②

（六）最后，党的历史教导说，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如果党善于象列宁所说那样“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5卷第174页）^③，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小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同志说：“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

①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3页。——译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译者注

③ 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译者注

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靠近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

以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的基本教训。